张文雄
胡锦昌
叶健君
主编

主政中



1949—1956

九十年革命，筚路蓝缕，前仆后继，开先人未有之业
五千年文明，辟地开天，推陈出新

李万青 杨正辉 等著









東方出版社

1949—1956

主政中国

聚焦主席台



ISBN 978-7-5060-4104-1

定价：45.00元

张文雄 胡锦昌 叶健君 主编

主政中國

1949—1956

李万青 杨正辉 等著

主席台聚焦

東方出版社

策　　划：王德树
责任编辑：鲁艳芳
封扉设计：万有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政中国：1949~1956 / 李万青等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聚焦主席台 / 张文雄，胡锦昌，叶健君主编）
ISBN 978-7-5060-4104-1

Ⅰ.①主…　Ⅱ.①李…　Ⅲ.①中国共产党—党史—1949~1956—通俗读物
Ⅳ.①D23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2382 号

主政中国（1949—1956）
ZHUZHENG ZHONGGUO（1949—1956）
李万青　杨正辉　等著
张文雄　胡锦昌　叶健君　主编

出版发行：東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字　　数：336 千字
印　　张：20.75
书　　号：ISBN 978-7-5060-4104-1
定　　价：45.00 元

前　言

90年前，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20世纪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她的成立给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之火，给历尽苦难的中国人民点燃了希望之灯。90年后，我们适逢建党九十周年盛事，为由中国共产党带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创造的辉煌和灿烂成就惊叹不已。

从1921年到现在，我们党走过了艰难曲折而又辉煌灿烂的历程。在挫折中经受考验、在困难中探索前行、在奋斗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已从幼年时期仅有五十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七千八百多万党员并执政六十多年的大党、成熟的党。在风雨磨难中，在艰辛建设中，在改革大潮中，我们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引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向前发展的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正是由于领袖的导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航船虽历经惊涛骇浪却能始终奋勇向前，中国革命事业虽多次濒于绝境却能转危为安，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才能在内有敌特破坏、外有帝国主义封锁、经济百孔千疮、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得以迅速稳固、发展，并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迎来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经过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保持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我们党近九十年艰辛探索和历史经验的集中概括，是对我们党近九十年不懈奋斗历程的精辟总结。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兴旺发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奉献，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巨大推动力和创造力，同样，也离不开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作用。他们是引路人，离开了正确的引导，人民群众难免迷失方向；他们是组织者，离开了坚强的组织，人民群众凝聚力难以有效形成；他们是决策者，离开了科学的决策，人民群众的行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是先锋队，离开榜样的示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充分调动。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奋斗史，既是一部人民群众的创造史，也是一部领袖人物的活动史。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一个政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革命队伍中难免有矛盾，难免有经不起考验的堕落分子，难免有凭借不正当手段登台表演的丑角。但他们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只是匆匆过客，并最终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唾弃。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公正回答，也是历史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聚焦主席台》丛书以中共中央先后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丰富的史料，客观地分析点评了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这一历史时期，曾活跃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分析了这些代表人物走上成功之路的原因，剖析了个别人物失意甚至走向堕落的教训。通过透视领导者的活动，聚焦领导者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脉络，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的不懈追求和艰辛探索，深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领导规律的认识，进而能够更加坚定起我们对党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能够更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能够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　录

第一章　五大书记　进京“赶考”

聚焦时间：1949年10月

聚焦地点：北京

聚焦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聚焦话题：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炮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是他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书记们进京“赶考”书写的第一页辉煌的答卷

李自成进城以后，不思进取，骄横跋扈。结果，皇皇伟业，一朝倾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进城时，曾戏言“进京赶考”，绝不学李自成。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书写了一份为全国各族人民拍手叫好的精彩答卷。

一、葵花向阳，百川归海。毛泽东以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威望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开国大典那天，他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金秋时节的中南海，碧波荡漾，翠柳婆娑。

1949年9月30日下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在怀仁堂举行会议，进行两项举世瞩目的庄严选举：

一、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

大会的选举是根据9月29日通过的《关于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进行的。《规定》指出：（1）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名额由本届全体会议主席团经协商规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不设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通过参加本届全体会议各单位的协商，由主席团提交全体会议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的方式来选举。（2）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经参加本届会议各单位协商，由主席团提交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3）任何代表对候选人名单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权利。

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高组织的全国委员会的选举，事先由主席团与各单位协商，议定候选人名单草案之后，每个单位又召开了几次分组会讨论研究，最后确定了180位委员的候选人名单。选举前，周恩来对“协议选举”做了说明。他说：如果对整个180名候选人名单没有疑义，则用整个名单付表决，而不用投票进行选举。选举开始时，大会执行主席刘少奇在反复征询大会对候选人名单的意见时，大家鼓掌表示没有异议。然后，将候选人名单整个付表决，全场一致举手通过。之后，大会执行主席再次申明，有反对者可举手，有弃权者也可举手。结果均无人举手。于是宣布全体通过。毛泽东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等人为副主席。

第二项选举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选举。其候选人名单是经过主席团和参加大会的各单位连日慎重协商后提出的。此次会议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共585人。但因两名正式代表空额，14人列名缺席，六人请假，所以实际投票的为563人。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共为63人，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员56人。选举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按照选举法规定，代表们在选举时仍有完全的权利舍弃名单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行选举，包括选自己。

当日，主席台旁设有九个票箱。投票之前由执行主席对票箱验看加锁，监票人检视票柜。然后，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投票开始。在投票者分批投票入箱后，执行主席当众开启票箱。核对票数无误后，便立即将选票交监票人。监票人分20组，每组三人，同时进行唱票。

唱票结果表明，投票者无一人弃权，也没有一张废票。代表们都极庄严地行使了自己神圣的权利。

这次选举的选票被作为珍贵档案完整地保存下来了，选票清楚地表明，

当时一些代表确曾舍弃了选票上的若干人而另选他人，包括副主席、委员的人选。

验票统计结束后，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

当执行主席宣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会场上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10月1日清晨，喷薄而出的红日把天安门前的华表、金水桥及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炫目的金光，天边一片红云，显示出一派灿烂的景象。

下午2时50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走出了勤政殿，分别上车，五分钟后到达天安门城楼后边。天安门前广场上，参加政协会议的各界代表正在等候，委员们依次下车，毛泽东戴上了帽子，抬头向天安门望去。

金秋时节的北京，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秋日映照下，天安门城楼显得雄伟、庄严。巍峨的古城楼被装饰一新，宽阔的红色宫墙显得尤为庄重，黄澄澄的琉璃瓦在秋阳的照耀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八盏大红宫灯垂着金黄色的流苏在微风中摆动。高高的城楼檐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的会标，宫墙的正中央挂着毛泽东的彩色画像。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前一天才堆起奠基土。广场正中，刚刚竣工的一根22米高的白色旗杆高耸入云，工程技术人员经过数次试验的电动升旗装置已安装就绪。

在灿烂的阳光下，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安门广场沸腾起来了。聚集着30万人的广场上，千万面红旗呼啦翻卷，千万幅标语飒飒有声。大会主持人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开始。毛泽东心潮澎湃地走到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用他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震耳欲聋，有如隆隆春雷在中国大地上回荡。这时，毛泽东的表情是那么庄严凝重，两眼熠熠发光。广场中央组成方阵的200名军乐队员奏起了庄严激越、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请毛主席升旗!”麦克风里传出大会主持人林伯渠的声音。

毛泽东亲自将电动升旗装置的电钮拨向“升”的位置。他轻轻一按，广

场前高高矗立的国旗杆上，那面巨大、鲜艳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便在万众翘首仰望的庄严热烈的目光中徐徐升起。

天安门城楼上的代表们注视着飘扬的国旗，心情激动；广场上几十万群众仰望着国旗，欢呼跳跃；毛泽东神情专注凝重，似乎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在心中沸腾，他脱口喊了很大一声："升得好！"

话音才落，"轰——"、"轰——"、"轰——"，54尊礼炮齐鸣28响，将那热烈、庄严、团结、喜庆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待轰鸣的礼炮声稍稍平息，毛泽东开始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那铿锵有力的话语，随着话筒传遍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当时正在大典新闻处担任联络秘书的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也听得清清楚楚，她是演话剧和电影的，对朗读的要求和规则比一般人要懂得多，她觉得毛泽东的庄严宣告念得太好了，她也没想到毛泽东会念得这样好。几十年以后，当她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情不自禁地赞叹："哎呀，毛主席念这个文件的断句、停顿、语调，真是太好了！太棒了！"

广场上的群众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得跳跃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像海潮迭起，面对这沸腾的场面，毛泽东的脸上焕发出庄严慈祥的光彩。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中他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时代的主人。只有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可不是吗，从金田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南昌起义，从抗日游击战争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史上的丰功伟绩，哪一

件不是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奋起创造的呢！毛泽东把身子探出栏杆外，有力地挥动手臂，向群众频频致意。当"毛主席万岁"的声浪再次涌起时，毛泽东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领袖和群众的心在一起交融、激荡，化作巨大的声浪直冲霄汉。胜利的欢欣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时在人们的心中汹涌、奔腾……

二、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二

1949 年 9 月 30 日，在新政协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六位副主席中，刘少奇排在朱德的后面，但在党内，他一直排在毛泽东的后面，位居第二。

这是历史的定位。

——刘少奇是"白区工作的代表"。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两种斗争形式：一是苏区的公开武装斗争，二是白区的地下斗争。两种斗争虽然形式不同，但各领风骚，相得益彰，共同描绘出了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画面。当时，苏区的斗争任务主要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承担，而白区的斗争任务则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主要由刘少奇等同志承担。毛泽东曾经说过，刘少奇是"白区工作的代表"。

1922 年 9 月，刘少奇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的委派前往安源，和李立三一同担起组织和领导一万多名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担子。在这次罢工中，刘少奇的坚定和勇敢是众所周知的。

1928 年 3 月至 1929 年初，刘少奇在天津铁路总工会工作，并参加了顺直省委的领导。在这一段实践中，刘少奇经历了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正确地指导对敌斗争的过程，以及作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不断总结、不断提高自己的斗争艺术的过程。

1929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 月 14 日，他到达沈阳。当时，东北地区党的组织连续遭到破坏，尤其是 1928 年底，省委常委全部被捕，省委委员仅一人逃出，东北党的组

织正处于危急之中。尽管中共中央立即责成正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央特派员刘少奇尽快恢复满洲省委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缺乏在白色恐怖下进行斗争的远见、勇气和经验，新省委依旧很不得力，党员数量锐减，质量很低。刘少奇受命于危急之秋，担任了满洲省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独自担起白色恐怖下一个地区党的工作的重任。然而他毫不畏缩，大胆地进行开拓性的工作。

1936 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这一年多的时间是他白区工作策略思想发展的高峰，也是他白区斗争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当时的北方局，领导着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及东北的党组织，并担负着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工作。但是，刘少奇到达天津时，在北方局所领导的区域中，仅有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保存了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些中下级干部，北方党组织仍被“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着。中央在这种时刻派刘少奇到北方工作，正是希望依靠他对党的赤诚和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迅速地打开局面，建立反对日寇侵略的前哨阵地。刘少奇果然不负厚望。他一到北方局，便投入了忘我的工作。

由于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又有了正确的白区工作策略，刘少奇领导的党的北方局迅速地打开了局面，北方局党的各项工作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此，党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36 年 8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指出：“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代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试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刘少奇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重视理论学习是刘少奇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对理论的重视和娴熟运用，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他既有扎实的理论根底，

又长期在第一线领导全面工作；既长于理论研究，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是集活动家与思想家于一体的领导人。

刘少奇一生在理论上建树颇多，尤其是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为了把党培养成一个成熟的具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非常注重党的理论修养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党的建设中极为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三本重要论著。

刘少奇最早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他任中原局书记，前往河南竹沟正式建立中原局的途中。经过渑池时，中共豫西省委于1939年1月初在这里办了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刘少奇在训练班上作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和中共党史报告。后来他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第一次提出了加强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必要性和意义，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创立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

刘少奇的演讲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反响强烈。张闻天认为，刘少奇所讲的内容，正是广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所迫切需要的，因而请刘少奇整理成文，在他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刘少奇将演讲稿修改整理成九个部分、共四万字的长文。

按照当时的规定，发表重要文章，都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939年8月看了《解放》周刊送来的文章，马上回信：

> 少奇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该快登。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文章一直是比较喜爱的。对刘少奇文章中犀利的笔锋，生动活泼的文风，提出问题高屋建瓴、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他深为赞赏。此前，他在评价刘少奇的理论文章时就指出：“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解放》周刊马上照登原文。11月7日，延安新华书店又出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列为干部必读的22个文件之一。

——刘少奇曾两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一次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由于刘少奇具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领导能力，他除在1953年12月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期间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并主持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外，还两次名正言顺地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第一次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约三个月时间。当时，他既要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工作，又要配合毛泽东重庆谈判的进度，适时地开展反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斗争，更要抓住机遇，进军东北，协调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行动，进入有利的战略态势，真是日理万机，夜以继日。这一时期算是刘少奇一生中为党的革命事业，工作最繁忙、最操劳、最紧张的一个时期。

东北是我国的工业基地，物产丰富，交通发达。谁控制东北，谁就获得了枪支大炮等战略物资。当时，我党具备取得东北的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经过多年的经营，在东北已有相当的基础；二是在东北和华北的接合部我党已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便于八路军、新四军出关。而蒋介石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主义”，放弃东北，给东北人民带来灾难，已失民心；他的部队远在大西南，更是鞭长莫及。

控制东北，建立民主根据地，巩固冀热辽根据地，这是在毛泽东去重庆前，中共中央就已定下了的基本战略。1945年8月初，刘少奇就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见解：东北的北面是苏联，西面是蒙古，东面是朝鲜，都是友邻，是一个有利于我们的战略区。向北发展，时不我待。同时，在中央领导下，八路军延安总部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准备接受日“满”敌伪投降，已发出了第二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两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在冀热辽边境之李运昌率冀热辽部队向东北挺进。

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集中在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去东北。2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令他们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去，令晋察冀中央局迅速争取热河、察哈尔。

正当刘少奇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争夺东北的时候，情况出现了突变。

9月14日，延安机场突然降落一架苏式小型军用飞机。从机舱里走出来的是苏联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雅科夫列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陪同他来的是我军沈阳市卫戍司令曾克林。曾克林自9月6日率军占领沈阳后，由于电台功率低，与延安联系不上。因此，他们的到来，是一个“突然袭击”。

贝鲁罗索夫向朱德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的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朱德当即将这些情况告知刘少奇。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讨论答复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和东北工作问题。对于苏联要求八路军撤出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问题，刘少奇提出三种办法：

1. 名义上撤；

2. 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在沈阳；

3. 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

三种撤法都用。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不能撤出。对于这点，必须明确地答复马林诺夫斯基。由山东派四个师到东北，大城市不能进，农村、小城镇还是要进去。方针还是争取东北。

政治局在延安的同志一致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经过深思熟虑，9月15日，刘少奇就以此意见回复莫斯科，同时向毛泽东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大转移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出发点在于保证争取东北的军事实力，归宿点则在于集中兵力，保存和发展我们的势力，以夺取全国的胜利。

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果断复电，完全同意刘少奇提出的战略部署。

在刘少奇紧锣密鼓的部署下，不到两个月时间，陆续开到东北的中共军

队达11万人，其中包括罗荣桓等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六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部3.5万人。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有两万余人，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十位候补中央委员。他们进入东北后，以东北人民自卫军名义迅速扩军，至年底，已发展至20万人。

毛泽东于10月11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健康状况很不好，11月中旬入院治疗。12月中旬出院后又继续休养了几个月。在此期间，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由于战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军态度的突变，刘少奇认为“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他在11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在重庆的周恩来电报中，第一次提出我在东北的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2月28日，毛泽东在看了最近一个多月东北与延安的往来电报之后，在休养所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指示，其中心是做好群众工作，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建立巩固根据地。这实际上就是对刘少奇这段争取东北工作的充分肯定。

刘少奇第二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期间。

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随即决定了两件事，一是毛泽东访问苏联，二是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任会长。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

11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在车站发表书面讲演，首先指明对苏联政府与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

可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将近半月，并没有实现他所说的“经过双方协商

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这时毛泽东生气了。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联方面倒有些着慌。大家为此着急。王稼祥提议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一则可以辟谣，二则把寻求苏联援助的意图以自然的方式提出，双方都较主动，又保持了民族气节。毛泽东同意了。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答记者问后，马上驰电北京，要刘少奇“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刘少奇密切配合，和莫斯科同时刊发了毛泽东的“答记者问”。

自此以后，谈判比较顺利。

1月2日、3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去莫斯科，希恩来9日动身；恩来出国，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废除国民党与苏联在1945年签订的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还应邀集政府委员在京者开一座谈会。在两个会议上，都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迫使资本主义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刘少奇在北京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先后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草案，并将与会者同意立即签字的意见电告毛泽东。

2月14日，上述条约与协定在莫斯科顺利签订。根据这些条约协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在1952年之前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归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贷款三亿卢布给中国政府。

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期间，全世界刮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国际事务纷至沓来。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民主进步

人士受到鼓舞。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亚洲妇女会议先后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作为东道主举办的最早的两个国际会议，会议开得成功与否，关系到新中国的形象。刘少奇从起草文件到会议安排，都作了细心指导。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开幕，刘少奇作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会议期间，由于苏联和欧洲的代表以工人运动的正统和当然领袖自居，未尊重东方国家的代表，出现了争执。刘少奇了解这些情况后，发表了不卑不亢的讲话，求同存异，化解了矛盾，平息了风波。

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在告别宴会上，举杯走到刘少奇面前，翘起大拇指祝酒，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也在这期间，越南派出代表，要求中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和派人到越南帮助工作。这时，中央机构还不健全，还没有设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涉及外国党的问题，多是刘少奇亲自处理。他请示毛泽东，确定了援越方针，并派遣罗贵波作为中共联络代表前往越南。罗贵波还在路途中，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就来了。刘少奇一面把胡志明秘密来访的情况电告毛泽东，一面安排他去苏联。从此以后，处理同越南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就交给了刘少奇，直至1951年3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

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期间，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自然赢得了毛泽东和全党的一致赞许和信赖。

因此，刘少奇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接班人，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民主人士纷纷称赞说："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

中南海勤政殿。

毛泽东主持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从此，51 岁的周恩来便受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挑起了管理和建设世界上的一个大国也是穷国的重担。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声，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

1948 年，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一天，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来到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向刘少奇、朱德汇报工作。在谈到两大解放区合并后，家底更大了，工作千头万绪，尤其是要赶紧把经济工作抓起来时，话语间流露出一种焦急的心情。这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朱德还特别加重语气说：“他这个人，历来是个管家的，是个好管家。”薄一波一听，心里似乎有了底，宽慰地笑了。

1949 年 1 月，周恩来同斯大林派遣来西柏坡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单独谈过一次话。他谈到战后经济、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和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对他们力量的运用和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他们的作用和意义等。这些，都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苦心思考和探索的一些问题。这次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早在 1949 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明确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周恩来为何在党内党外都有着如此崇高的威望呢？担任总理这一职务为何非他莫属呢？

——周恩来曾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1931 年底，33 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到 1934 年 10 月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止，周恩来共在中央苏区战斗了三年时间。这个时期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统治的高峰期，党和革命的各方面工作均遭受着“左”的严重危害。所以，周恩来一到苏区，便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

虽说那时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的赣南会议上刚刚挨过"批判"，周恩来不顾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泽东，跟他长谈。这时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一直是很尊重的，并多次代表党中央肯定和支持处在逆境中的毛泽东。

在打不打赣州的问题上，周恩来曾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凭借这几年跟蒋介石多次交锋的经验，深知国民党军队力量远比红军强大，认为攻打江西的仅次于南昌的第二大中心城市，势必会失败。

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告知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临时中央坚持要打。周恩来毕竟是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必须执行临时中央的命令。于是，在 1932 年 2 月 4 日，红军进逼赣州城下。结果城未攻克，伤亡很大。

一个月后，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经过这次教训，周恩来更加深信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军事上十分注意听取毛泽东的意见。长征时，周恩来还安排毛泽东在红一军团"随军行动"，并强调指出"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他为毛泽东留好伏笔，以便在适当时机，恢复他的军职。

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为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四十多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和朱德一起领导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这次战争的胜利还表明周恩来具有组织和指挥战争的卓越的军事才能。

为了总结长征以来军事失败的教训，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会上，他既真诚地承担战争失败自己应负的责任，又理直气壮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因而得到了全党全军的谅解和信任。

——周恩来具有处理内政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才能和高超智慧。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在武汉、重庆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施展了他善交友的才能，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建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7年12月，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来到武汉。由于历史的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中有很多朋友。这次到武汉后，他又和他们重叙旧情，并广结新交，开诚合作，向他们诚恳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周恩来和张治中相交近半个世纪，可谓“患难相济，真诚合作”。对其他各党派人士，周恩来也和他们保持密切的交往。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谈话中，周恩来亲切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周恩来还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李公朴，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经常接见记者来访或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同武汉的新闻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和《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感情。

周恩来同在武汉的外国朋友也保持频繁接触。他不仅同斯诺、史沫特莱、鹿地亘夫妇、爱泼斯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通过周恩来在武汉一年多的广泛活动，结交了各方面的朋友，使许多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希望。这就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在当时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以后全国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一部分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中共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重庆，周恩来还同许多国家的驻华使节和一些援华组织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结交。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

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见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徐、爱泼斯坦等时有过从；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他还接待过许多外国记者，向他们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宣传中共中央有关团结抗战的主张，介绍解放区的民主设施和八路军、新四军奋勇抗战的事迹。

周恩来在同朋友们的交往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待人以诚。他总是尊重对方，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照顾到对方的困难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态度同他人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总是坦率、明朗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含糊和敷衍，对正确的意见诚恳地接受，对不正确的意见则进行入情入理的说服工作。他常对周围的人说：对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和某些工商业者，不能只看到他们消极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们要求抗日的一面。这是周恩来所以能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恩来具有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组建新中国首届“内阁”方面，周恩来是最忙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首先，政府机构的人事安排是一件亟须解决的重要事情。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再从其他大区陆续抽调一部分负责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各大行政区负责人陈云、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就是这以后陆续调来政务院工作的。

1949 年 10 月 21 日，人们依旧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欢乐气氛中。新上任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勤政殿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接着，他发表了重要讲话，详细地论述了政务院的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事，以及当前必须抓紧解决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讲到政务院的组织形式时说，政务院以总理一人、副总理四人、秘书长一人和政务委员 15 人组成。政务院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政务院作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首脑部，领导面很广泛，不仅有它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三个指导委员会，即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又是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另外还有人民监察委员会。四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三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成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四十多人，讨论一般政策，报告一般工作。

周恩来讲到政务院的人事安排时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三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并且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方面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中财委，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较多。周恩来还针对人事安排中个别人的名位思想指出，有的人计较安排的地位，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现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

周恩来讲到干部来源时说：政府草创之初，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周恩来详细地分析了这三方面人的长处与不足后说：“我们要把这三方面的人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做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

周恩来认为，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三个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他说：党与非党或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还不习惯，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地位和不肯学习等倾向。

周恩来十分重视新政府这部“机器”能否尽快地有秩序地运转起来这一问题。他要求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为了便于各部门制定组织条例时有所遵循，他提出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

报政务院批准。

当晚，周恩来主持了法定的政务会议，对于当务之急的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1. 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物资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

2. 为了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办公制度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

3. 为拟定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

4. 即日起建立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

政务院和所属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如下：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政务委员：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15人

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副秘书长：齐燕铭、许广平、郭春涛、孙起孟、辛志超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重工业部部长：陈云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

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

海关总署署长：孔原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在上述选举和任命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四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占了两人；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为正职。

陈毅曾对薄一波说："周总理平衡这个班子的功绩是，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照顾到被安排人的经历、职业和他的能力。"

民主人士更受感动，纷纷赞扬说："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四、朱德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说："从现在起，我才是真正的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碧空如洗，艳阳高照。

接受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排着整齐的方阵，肃立在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东长安街。

检阅这支部队的是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

今天，这位65岁的元戎，是多么的高兴和激动！

阅兵，早在公元前，古埃及、波斯和罗马等国就有记载。18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已广泛普及了阅兵活动。遇国家重大节日或举行大型军事演习时，通常都要举行阅兵，以扬国威、振士气。在中国，阅兵更是源远流长。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首领夏禹，就曾在今河南嵩县境内的涂山，与南方各部落首领会盟。会上，众多士兵手持各种用羽毛装饰的兵器，和着乐曲边歌边舞，以示对南方部落首领的隆重欢迎。在中国春秋时期，也有"观兵以威诸侯"的记载。

下午四时，阅兵典礼开始，首先进行的是检阅式。朱德穿着一身呢料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登上了敞篷阅兵车。

阅兵车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中缓缓驶出，通过金水桥，驶向受阅部队。这里是"天街御路"，从前只有坐十八台大轿的皇帝才能通行；而今，这位农民出身的统帅乘着当时最高级的美式敞篷轿车，威风凛凛地驶过来了。

迎候在华表下的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立即行了一个军礼，以洪亮的声音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此时，设置在金水桥畔石狮子前的“九头鸟”扩音器里响起了聂荣臻“请总司令检阅”的声音。这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高昂激越，严肃庄重。

人民解放军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和骑兵部队，组成一个个威武雄壮的方队等待检阅。

军乐队立即奏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胜利果实》等乐曲。

在军乐的伴奏声中，朱德由聂荣臻陪同，乘车出东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外国领事馆聚集的东交民巷，依次检阅肃立严整的三军部队，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上。这时，人民解放军四个野战军的首长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肃立在朱德的左侧。朱德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
>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朱德宣读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后，激动人心的分列式开始了。

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中，一面火红的军旗在护旗兵的护卫下，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行进。这是“八一”军旗首次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这些分别选调自东北海军学校和

华东海军舰队的水兵们，显得格外英俊威武。

紧跟着的是强大的步兵师，八千余名官兵携带缴获的各种武器，组成12个方阵，英姿勃勃，锐不可当。他们是分别来自华北军区第20兵团第67军119师和独立207师619团的步兵。对于能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官兵们感到非常自豪。8月的北平酷暑难当，他们顶着炎炎烈日训练，有的皮肤被晒脱了几层皮；而雨天，更是分不清雨水、汗水和泥水。就这样，他们每天训练十五六个小时，几天下来就磨破一双新鞋。据当时的119师师长李水清回忆：训练期间，朱德两次来到这里，亲自指挥操练，并叫人到刘伯承那里找来他留学苏联时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再参考旧的《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步兵操典》，为阅兵操练确立了初步统一的规范。

接着，开过来的是炮兵师，野炮、榴弹炮、战防炮、高射炮排成"一"字形的横列前进。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各种坦克车、装甲车以排山倒海之势通过检阅台，战士们昂首挺胸站立在车上，注目城楼，庄严敬礼。

当人民解放军战车方队似铁流汹涌般通过天安门前时，突然从东边天空传来一阵嗡嗡的马达声，只见九架野马式战斗机排成"品"字形以550—900米的高度飞临天安门上空。不一会儿，又有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排成"一"字形呼啸而来，掠过人群上空。紧接着三架大型运输机，后边跟着三架教练机，以"品"字形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时，空中与地面交相奏出立体的马达奏鸣曲，把庆典推向了高潮。

检阅式和分列式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两个多小时，浓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的战斗历程，也预示着未来的漫漫征途。

阅兵结束后的当晚，朱德在北京饭店宴请受阅的陆海空军部队代表。觥筹交错之际，朱德来到空军代表席，气宇轩昂地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陆海空军总司令"，这是一个多么神圣和崇高的职位！这一光彩照人的历史定位，是朱德几十年来为了人民的崇高事业而南征北战、浴血沙场的必然归宿。

——朱德和毛泽东一道缔造了人民军队。

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这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碰到了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血腥屠杀面前怎么

办？是束手就擒，还是起而反抗？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有力的回答，他们在南昌打响了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的第一枪。朱德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组织领导，并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南昌是朱德的老根据地了。1927年1月，受党组织派遣，朱德就来到南昌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先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市政委员会委员，在军中安插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使党在南昌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同时他还有不少老朋友、老部下、老关系，他们都是南昌城内的显赫人物，江西的“土皇帝”、第五路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就与朱德有着难忘的同窗之谊，这样朱德在南昌活动起来就特别方便。

7月27日上午，周恩来出现在朱德的寓所。满怀兴奋和期待的朱德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南昌国民党军队的驻军情况、兵力部署，以及他做的准备工作。起义中，朱德的任务就是设法拖住留在南昌城内的第三军的两个团长，保障起义的顺利进行。

8月1日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昌起义打响了。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取得胜利。随后，朱德率起义军离开南昌。在严峻局势面前，朱德决定部队必须到敌人兵力薄弱的湘粤赣边界去。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这时，朱德从赣南特委派来的联络员处知道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情况。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德又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活动的消息，证实了毛泽东确实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于是，他和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前进，终于在1928年4月28日实现了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胜利会师。5月4日，宣布正式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

朱德与毛泽东的会师，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猛增。当时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是两千多人，加上湘南农军八千余人，共计为一万余人。而当时毛泽东领导上井冈山的秋收起义部队是千余人，原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部各300人。毛泽东部有枪1200支，朱德部有枪3000支。特别是

朱德带上山的部队中有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的基础，战斗力较强，装备有近千支枪。两军会师井冈山后，如虎添翼，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朱德从此被誉为“中国红军之父”。“朱毛”的名字从他们会师开始便连在了一起。

——朱德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伟大的抗日战场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爆发后，全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八路军和新四军活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1939年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刚刚在山西五台山南茹村落脚，朱德即电令115师师长林彪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25日，八路军115师一举歼灭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第一次同日军交手，就取得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次大捷。捷报传出，举国欢腾。28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在涞源、灵丘、广灵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这是朱德设想到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即后来的晋察冀边区。10月，日寇长驱直入，包围了守卫沂口的卫立煌部队。朱德于10月13日、14日分别致电贺龙、萧克和林彪、聂荣臻，命令各部断绝日军后方交通，并从侧背予以攻击，配合沂口作战。129师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二十余架，歼敌百余人，既狠狠打击了敌人，又解了卫立煌之围。卫立煌表示感谢。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总部决定：115师少数部队留五台山一带，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主力转移到汾河流域与晋西南地区；120师仍留太原附近，并担负开辟晋西北根据地任务；总司令部和129师挺进晋东南，进行创建太行山根据地的工作。朱德即率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挺进晋东南。4月，朱德率领129师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连克18座县城，歼敌四千多人，为建立晋冀鲁豫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秘密制定了对共产党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密令部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就要在日寇、伪军、国民党军的三面夹击之下坚持对日作战。面对这种情况，朱德一方面揭露、驳斥国民党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同时命令八路军对那些“一贯反共反八路军，摧残进步力量，摧毁抗日政府，行动如汉奸，已无争取可能”的反动力量，“应立即抽调兵力歼灭之”。另一方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国民党投降妥协的危险处于严重关

头，必须加强我们的力量，巩固扩大华北的八路军。为了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朱德于4月下旬离开八路军部，前往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5月上旬到达洛阳后，朱德在同卫立煌谈判中既坚持原则，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耐心说明利害关系。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使国共两方的军队得以遵循统一战线原则维持现状，也使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人士后来能为抗战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同卫立煌谈判后，按照中央决定，朱德于5月下旬返回延安。

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转战在太行山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指导整个华北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这期间，八路军由最初挺进华北的3.2万人发展到22万人，还不包括各地方的游击队。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也已经在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鲁西南等十余处建立起来，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巨大的威望。

——朱德在解放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

1948年4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省阜平县以后，中央工委撤销，朱德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协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军事地图上插上了一面又一面的红旗。在那段国共展开战略大决战的紧张岁月，身在西柏坡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经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工作。军情的变化、战局的演变，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心。

在那段时间里，周恩来、朱德天天往毛泽东屋里跑，再大的事，三个人一碰头，就下了决心。他们一去，分管敌军工作的参谋就跟着去“搬旗”。蓝旗代表敌军，红旗代表我军，敌情来回变，旗子就来回搬。

正确的战略决策、得当的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使我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取得了彻底胜利，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历时142天，共歼敌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

这个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震撼了世界，预示着蒋介石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即将告终。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这个重大课题立刻被突出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防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武力保障。要保护革

命的胜利果实，要不受别国的欺负，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是不行的。

新中国成立六天前，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曾庄严地宣告：

“共同纲领又要求人民军队应当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续加强，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建设空军和海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我今天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坚决地这样做，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的、现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充分有效地保卫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朱德的这个讲话，明确地把现代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的总任务和总目标提出来，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五、开国大典那天，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因患重病未能出席庆典。叶剑英赞誉道：“他是我们的骆驼”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可是，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却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刻，他病魔缠身，正躺在玉泉山疗养所的病床上。

他多么想登上城楼，走近群众，汇入欢乐激动的海洋，拥抱无与伦比的喜悦。

下午三时许，任弼时忍受身体的巨大不适，离开病床，拧开收音机的开关，收听天安门开国盛典的实况转播。他听到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他情不自禁地将夫人陈琮英的手紧紧捏了一把。

“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这是 28 年前，他赴俄留学时给父母信中的述怀言志。当年，他认为“达此便算成功”，可现在，他感到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征途遥远，重任在肩，所以毛泽东说夺取全国政权是万里

长征第一步。

任弼时特别激动。他坐在钢琴前，弹奏起《咱们工人有力量》、《您是灯塔》；随后又铺开宣纸，挥笔誊抄《木兰辞》。

开国大典这天，任弼时虽然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但他依然耸立在亿万人民的心坎里。

——任弼时曾赴莫斯科共产国际，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

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以增进相互了解，消除共产国际在中国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独立自主方面同中共中央存在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的使命。因为王明 1937 年 11 月回国后提出的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新政策”。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利于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

任弼时于 3 月底到莫斯科后，加紧准备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4 月 14 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5 月 17 日，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任弼时在会上就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他的书面报告及说明和补充发言，系统地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说明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任弼时首先指出八个月来中国抗日战争虽在军事上遭受到严重的部分失利，但这“不是决定胜负的最后失败，最后谁胜谁负的问题，要在长期的持久战中去解决”。接着分析了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中国、日本和国际三个因素，明确肯定“以上三种因素的变动，都将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指出：“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战，以求取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他阐明了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坚定的、长期的，指出在日本侵略面前，国民党要抗战到底，“就需要革命的群众力量来支持”，而蒋介石又没有决心将其内部的腐旧分子、亲日派、主和派等“驱逐淘汰出去”，且对共产党抱有很深的成见，这是产生国共摩

擦的必然因素。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更加依靠群众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力量。任弼时的报告和说明，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共产国际的认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了任弼时提交的书面报告后，提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赞同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此过程中起了作用。他从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享有崇高威望，遵义会议后在中央一直起着实际领导核心作用的情况，坚定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看法。他还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公开批评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又喜欢自以为是，拉帮结派，想当领袖。

7月6日，苏联《真理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的照片。不久，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又接见任弼时、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语重心长地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为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任弼时早在1943年就成为了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法处理日常工作。任弼时开始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1944年5月21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负责起草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在毛泽东领导、任弼时主持下，为起草好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任弼时主持召开了二十多天的湘赣问题座谈会和多次代表团负责人会，听取意见。同时耐心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特别受中央委托，两次找王明谈话，促进党的团结。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是以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书记处，成为当时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任弼时为人朴实，长期以来默默地为党工作，不愿显山露水。在他39岁时为何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党的七大时又成为中共五人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政治上的坚定性，高度的原则性。任弼时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非凡的胆识。在大革命时期，身为团中央书记的他就不惧重压，捍卫真理，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多次正面交锋；大革命失败后，他战斗在白色恐怖下，克服了生活的艰辛，忍受了被捕后敌人对他的残酷折磨，以坚强的意志、忘我的精神一直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的威逼利诱，他冷静分析形势，耐心细致地工作，既坚持斗争又积极争取，终于争取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对此，毛泽东曾给予极高评价。

第二，实事求是，一身正气。任弼时是党内实事求是的典范。他一生中也曾犯过错误，也曾有过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误解，但在实践中他发现自己的错误后，就勇于承认错误，从不遮掩，后来更成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在肃反扩大化、延安审干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他勤于调查，实事求是，坚决纠正“左”的过火的错误。为延安审干运动中的错误，他曾在大会上当面批评康生。师哲晚年回忆：“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

第三，卓越的才干和巨大的贡献。人很难样样精通，而任弼时在革命实践中却显露出党内全才的本领。他早年先后求学于序贤初等小学、湖南第一师范、私立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后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三年，打下了深厚的理论根基，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又显示了卓越的才干，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还是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身为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就显露出很高的领导素养和善于开拓新局面的能力。在1925年党的三大以前，团组织还是一个组织极小、影响微弱的知识青年进步团体，任弼时上任后，经过一番努力，到1926年底，它已拥有五万名团员，15万童子军团员。

——任弼时具有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由于经历了多次被捕敌人对他身体的严重摧残，加上长期负重工作，到新中国成立时，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经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科夫医生诊断，他那时已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症，因而时常出现头痛。

1949年9月29日，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主任瓦西林柯和神经科主任康诺瓦诺夫教授专程来北京为任弼时检查病情。傅连暲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 ……瓦西林柯同志认为是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征，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起自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最近情况稍好，乃是在心理上患者自觉转佳，实际并未好转……昨晚又由科罗大夫检查眼底，亦证明较前次所查为重，并有小的出血部位，诊断与瓦大夫所述洽相符合。目前正待苏联大夫继续检查。

两位苏联医生最后建议任弼时应去莫斯科治疗三个月。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系任弼时的治疗问题。经斯大林同意，11月底，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赴苏治病。

在准备赴莫斯科时，任弼时主动提出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他说："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家属一个也不带，译员也不必配备，我自己会讲俄语，只要刘医生去就可以了，主要是陪我说说话。卫士呢，也不需要。"同志们说："你虽然懂俄语，但你是病号，说话多了也是很累的。"后来中央决定，加派朱子奇任秘书。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他乐观地估计，此行时间不长，莫斯科冷，冬季皮大衣是需要的，但夹大衣就不必做。他对陈琮英说："人家送给我一个皮大衣领子，送给刘医生吧！"

临走前，周恩来来看望他，给他送来了护照。

毛泽东又亲自到景山东街的寓所来看望任弼时。他们谈话开始不久，刘医生来给任弼时服药，毛泽东以为谈话时间超过了医生的规定，说："我马上就谈完，我就走。"

11月末，任弼时在苏联医生舍琴科陪同下，和朱子奇、刘佳武一行四人乘坐国际列车起程，卫士长郭仁随车送至满洲里。

经过九昼夜的长途旅行，12月上旬任弼时到达莫斯科。这是他第四次到莫斯科。这次，虽然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是，他没有公务，是作为病号来求医的。因此，不讲礼仪，不做报道，一到莫斯科就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朱子奇和刘佳武则住在莫斯科大旅社，隔一天来探望他一次。

12月24日，任弼时给家属的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已有两星期，检查过程大体已告结束……总的方面说，是有进步的：血压早晨还在190—110（低压）上下，因为白天少运动，晚间比上述数字稍低一点。脉搏早晨九十多次，傍晚八十多次。医生说血压不会恢复常态，总希望能降到170左右就好……我在这里医治和休养的时间，可能比预定还要短一些，就是说我能回得比预定时间要早。”

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苏联。21日，斯大林70寿辰，任弼时在朱子奇陪同下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晚会。不久，毛泽东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探望任弼时，他报告毛泽东，治疗有进步，年底可以出院，转到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

不久，任弼时的血压已由原来的240水银柱下降到160水银柱。1950年3月2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治疗于本月底完毕，前日会诊，认为结果良好，但为巩固已得成绩，将送我去黑海边休息四至六星期，然后回国。”

30日，任弼时在刘佳武陪同下，坐火车离开莫斯科，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所。这里濒临黑海，自然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夏季可以游泳，对任弼时进一步恢复健康都十分有益。五个星期之后，任弼时自觉身体坚实了许多。他想念着祖国，想念着战友和亲属，盼望早日恢复工作。5月9日，他和刘佳武返回莫斯科。5月16日，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给任弼时检查身体。5月17日晚上10时，从莫斯科发出的列车，终于载着任弼时父女和刘佳武一起返回祖国。

5月28日，车抵北京站。站台上，朱德、聂荣臻和陈琮英带着孩子们一起早已等候着。看到任弼时康复归来，大家由衷地表示祝贺。任弼时和朱德、聂荣臻等谈笑自若，扶杖步出车站，回到景山东街的寓所里。第二天，

傅连暲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译成中文报告毛泽东：

> ……苏联大夫的诊断为：一、高血压症，糖尿病。二、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建议：一、自今日起休息两星期（5月29日至6月11日来莫斯科）。二、每日上下午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4小时。三、9月1日仍要到疗养院再休养一月。四、经常要有医生照顾他。弼时同志仍拟以苏联大夫白祖比克为他的主治医生，我亦同意。

这时，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肃清残余敌人，完成统一大业，恢复和发展生产，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对于历经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来说，和平是多么令人渴望。6月初，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研究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任弼时要求出席会议。考虑到他的健康，中央同意他参加部分会议。

不久，朝鲜内战爆发。任弼时急于想投入工作。他写信给毛泽东：

> ……这样不但对身体没有坏处，而且对于巩固身体、恢复工作能力反会有某些好处。我也很同意他们的意见。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6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从此，任弼时开始"练习工作"。

作为一个离开战斗岗位一年多的老战士重返第一线，任弼时觉得有许多事需要马上去做，他一恢复工作，就忙着听取组织部和团中央的汇报，详细了解一年多以来的工作发展和当前的安排，特别是对邻邦朝鲜的战局和美帝国主义在中朝边境的挑衅，他更为关注，每天阅读电报，查看地图，工作量实际超过四小时，但自我感觉"无不适"。如此两个月，至8月底，他满怀信心地对傅连暲说："我现已经好了，请你给刘医生安排个地方去学习。"

接着，主治大夫白祖比克也返回苏联，临行前叮嘱任弼时：“练习工作”到9月需要休息。9月初，刘佳武依依不舍地惜别任弼时，到天津医科大学去深造。任弼时无以为赠，拿出一个旧皮包给刘医生：“你拿去做纪念吧！”陈琮英说：“这是弼时长征时用过的。”

白祖比克和刘佳武走后，傅连暲催促任弼时从9月开始休息。任弼时说：“不如继续练习工作，到12月再休息。”任弼时情真意切，傅连暲只好同意。不料9月初，因一次感冒，任弼时的高压回升到185水银柱，卧床十天，才得以恢复。10月1日，任弼时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检阅了海陆空三军队伍和40万群众的游行队伍。

10月19日上午8时，任弼时约请河北武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到他的办公室座谈，调查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为召开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做准备。座谈会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正是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几路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他仔细阅读前方发来的战报，深夜，他的办公室里灯光依然亮着。

这时，欣逢《中国青年》杂志创刊27周年，他为刊物写了纪念文章，21日的《人民日报》和当天出版的《中国青年》刊载了他的文章。谁知道这竟成了他的遗教。他写道：

> 办好《中国青年》这样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刊物，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一个结合实际、联系群众并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青年刊物，在团结教育中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事业上，能够发挥很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
>
> 为了更进一步办好这样一个刊物，《中国青年》应该继承发扬过去历史上的战斗传统，更密切地结合广大青年群众的实际斗争和更生动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青年》能够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更有力的武器。

10月23日，任弼时和师哲谈话，当晚，出席中共中央会议。

10月24日，秘书送给他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和《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等电报，晚上，他继续在灯下查看地图。陈

琮英劝他早些休息，有事明天再忙。他说：“明天有明天的事啊！”他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病在身，却坚持一个信念：能走100步，绝不走99步。夜深了，他在地图上标了最后一个红圈，随手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10月25日。他完全没有料到这就是他生命的最后日子……

10月25日清晨，任弼时的病情恶化了。傅连暲医生紧急赶到景山东街，立即组织医生抢救，同时向毛泽东报告：“任弼时同志今早七时发现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

两位苏联医生全力抢救，但病情没有好转。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任弼时溘然长逝！英年46岁。

2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为他覆盖党旗。30日，首都各界四万余人集会，追悼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叶剑英称赞任弼时说：

>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第二章　民主人士　活跃政坛

聚焦时间： 1949 年 10 月

聚焦地点： 北京

聚焦人物： 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

聚焦话题： 各路民主人士纷纷会聚北京，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种百凤朝阳、百川归海的瑰丽风景，一定会带给人们无比深刻的启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有过美好的追求，也有过辉煌的奋斗；有过惨痛的教训，也有过无奈的彷徨。是天安门前鲜艳的五星红旗擦亮了他们的双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车站迎接

1949 年 10 月 1 日，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这一天，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共和国开国元勋并排站在一起，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阅兵仪式，检阅北京 30 万人参加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在天安门广场的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当 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的时候，当毛泽东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第一面

五星红旗的时候，宋庆龄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她想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愿，想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想到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8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而这一切现在终于实现了！

宋庆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女性。

中国共产党尊敬她，民主进步人士拥戴她，全国人民热爱她，这与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月里，能够始终站在人民利益一边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辉煌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追随者和亲密合作者。

宋庆龄，广东海南岛文昌人，1893年1月27日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经常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之间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却无从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她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从政治上和历史背景来说，他们的婚姻是为同一目的奋斗的中国两代革命者的结合。他是一个年近五旬的老战士，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也带着失败的创伤，但战斗意志毫不动摇。她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手，却在渴望着投入战斗。在文化和观念上，他们两人在当时都属于最先进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义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是现代的爱国者。他们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家，并进而超过它们。但他们知道，

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被严重破坏的独立并在国内消除封建主义。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决心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一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当有人问宋庆龄为什么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因此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她对斯诺说，这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一个中国友人引述她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的话：把她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要高于通常的爱情”。一位外国作者恰当地总结说，她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当时宋庆龄32岁。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从此以后，每逢孙中山的忌辰，她总是避免参加任何公众的纪念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念沉思。但是，在失去亲人的几个星期之后，她又重新奋起，充当了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的生气勃勃的富有号召力的战士。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发表了一篇义正词严的讲话，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为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惜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

当时外国报纸、北京政界和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力图把这次惨案淡化为警察与学生之间有关“法律与秩序”的一桩小事，企图通过私下谈判来解决。所以宋庆龄专门针对这种阴谋，提出了相反的要求：“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

她的号召是同孙中山给全国全党的遗嘱密切联系的：“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

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宋庆龄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象征，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坚持孙中山的原则，并且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同他战斗在一起。那些嫌她碍事的人想破坏她的名声，或者把她拉到他们一边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遗教。4月22日，她联署了一个给全国各地的通电，尖锐谴责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在这封通电上签名的还有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以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他们在通电中指出，“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反共’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武汉及由武汉政府领导的地区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要求深化革命，作为对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当时，尽管普通民众对蒋介石极为愤怒，一些以“左派”闻名的国民党政客也发出特别愤怒的声音，但他们中已有人在开始谋划“退路”。宋庆龄却毫不动摇，在武汉和南京两者之间，她坚定地站在武汉一边。在武汉那些图牟私利的动摇分子和劳动人民两者之间，她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她的弟弟宋子文，武汉、南京两边也都在拉他。他犹豫不决，干脆丢下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职责，溜到上海，住进莫里哀路宋庆龄寓所。宋庆龄试图说服他返回武汉，但他正倒向蒋介石，反而想要她也来上海，归顺蒋政权。她的妹妹美龄（未来的蒋夫人）从上海赶到武汉，一时报章盛传她将使庆龄回心转意，结果徒劳无益。宋庆龄所挚爱的母亲也来劝说，但同样无济于事。宋庆龄长期以来对公众的责任感大于家庭私情这一特点，丝毫没有改变。

1927年6月，武汉的反动浪潮高涨，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及遣返俄国顾问，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

此时，宋庆龄发表了著名的“七一四”声明，无情地剥去他们所谓“孙

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她指出：“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先后在广州、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与儿童保育工作，并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支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她返回了阔别八年的上海，在上海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募集了大量物资援助。1948 年 1 月，她促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担任名誉主席。

——宋庆龄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局面。蒋介石演出了一场“引退”的闹剧，李宗仁登上代总统的宝座。为了在政治上筑起一道抵制解放军继续南下的防线，李宗仁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参加他的政府。宋庆龄是他们争取的第一个目标。

于是，他们在社会上散布宋庆龄将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谣言，企图给她施加舆论压力。对此，宋庆龄立即以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的名义，在《字林西报》上发表声明：“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李宗仁仍然不死心，就在他上台的第二天，又亲自写信给宋庆龄，请她到南京任职。但是，宋庆龄不为高位所动，断然拒绝了李宗仁的盛情邀请。她要留在上海准备迎接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也始终关注着宋庆龄的工作，惦念着她的安全，特别是在人民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奔赴解放区。基于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她面临的险恶环境，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和措施。

1949 年 1 月 19 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发出邀请电，附在中共中央致香港华南局领导人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并要求他们

设法转交宋庆龄。周恩来在审改中央指示电中特别强调："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华南局领导人接到中央指示电后，经认真研究，决定派地下工作尖兵华克之执行这项重大任务。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潘汉年在向华克之交代任务时特别将周恩来的嘱咐强调一遍，并仔细交代了如何传递信件和护送宋庆龄有关交通等细节。第二天，华克之打扮成商人模样，混上一艘从香港开往青岛的外国货轮，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货轮抵达上海。华克之按照潘汉年指引的地址，见到宋庆龄的秘书，讲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务，并等待宋庆龄的指示。

在以后的几天里，华克之开始筹划如何护送宋庆龄离沪赴港有关事宜。几天后，华克之接到宋庆龄的亲笔复函，宋在信中表示愿在上海迎接解放。尽管宋庆龄未去香港，但鉴于国民党当局阴谋策划将她劫持去台湾的危急情势，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宋庆龄经常变换住处，并积极筹划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机构工作人员及其他革命者的转移工作。

1949 年 4 月 22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蒋家王朝全面崩溃。5 月 27 日，上海回到人民手中。当天，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专程拜访了宋庆龄，征询她对接管上海的意见。

第二天，史良到宋庆龄寓所探望她。宋庆龄正在弹奏欢快的钢琴乐曲。史良知道，自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宋庆龄一直在高压下过日子，难得有好心绪。今天，上海解放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回到了人民手中，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覆灭，新中国就要成立了。看到自己多年的夙愿即将变为现实，她怎么能不高兴呢！欢乐的情绪顺着她的手指，在琴键上纵情地流淌。

宋庆龄侧身看到史良，连琴盖也顾不得盖上，就激动地站起来，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解放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周恩来曾几次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上海的解放，为宋庆龄的北上扫清了障碍。

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十分敬重，特派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

席邓颖超专程前往上海拜会宋庆龄。陪同邓颖超赴上海的还有廖梦醒，她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又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两人感情十分深厚。

6月初的一天，廖梦醒去看望宋庆龄，说明来意。一提起北平，宋庆龄就显得异常激动。她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在几十年中只到过北京两次，两次又都与悲痛连在一起。一次是1925年春天，她陪同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到北平与北洋政府谈判南北统一事宜。就是这一次，她尊敬的导师、挚友、丈夫孙中山病逝于北平；另一次是1929年春夏，南京中山陵落成，她到北平参加丈夫的灵柩南移的活动。从此以后，她害怕提到北平。

6月4日，邓颖超拜访宋庆龄，转呈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在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早命驾，实为至幸。端上，敬颂大安。

周恩来

1949年6月21日

宋庆龄读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感激之情，无可名状。她噙着激动的泪花，欣然同意北上。

8 月 28 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从上海开往北平的专列，飞速地驰骋在祖国的大地上。宋庆龄曾描述她沿途的观感：

> 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那些新种植的田地，那些最近收割的田地，当它们在我的眼前滑过，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驶过去，当我看到标明出地形的、无数大小的河流，有些是涓涓的细流，有些是急浪翻腾的大河，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当我看到这些景色时，我觉得生产和发展的可能性，似已近在眼前了。

8 月 28 日下午 4 时 15 分，宋庆龄安抵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五十余人到车站热烈欢迎。宋庆龄下车后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并接受了洛杉矶儿童保育院儿童的献花。

9 月 21 日至 30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她说：

>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惟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她热情地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就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从此，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帝反霸、争取和平、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二、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和毛泽东一样，被定为"国家一级干部"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会上，李济深第一个走上讲台，代表民革郑重表示："完全赞同人民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出的《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共同纲领》草案，因为这个草案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内容正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艰苦奋斗追求实现的目标，更是与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完全符合。"

第二天，他和毛泽东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李济深特别兴奋。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这样的诗篇：

叱咤风云定九州，指挥筹策世无俦。
百年帝国空回首，千载工农庆领头。
耕者有田增生产，劳资合作利营谋。
安心倒向和平阵，建设荣华万万秋。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国家给李济深配备了三名秘书、一名副官、一名医生以及厨师、汽车司机和公务员等，同时又派了一个警卫班到他家中负责警卫工作。国家公务人员实行工资制度后，李济深和毛泽东一样，被定为"国家一级干部"，每月领取工资五百多元。

由于李济深全家人口多，住房本来就不宽裕，增加警卫班和秘书等一批工作人员后，房子住不下了。于是，国家又替李济深在西总布胡同五号的原住址，将原来的平房改建成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全楼及院子的面积约两千平方米，共有大小房间四十余间，一楼有十多间，除给秘书、副官、警卫班、厨师、公务员等做办公室、卧室、活动室外，还设有一个大会议室、宴会厅和阅报室等。二楼也有十多间，做李济深的办公室、书房、卧室、便餐厅、

弹子房和李济深夫人及年幼的孩子与保姆的卧室等。三楼共有九间，是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钰、李沛琼、李沛瑶和女儿李筱薇、李筱莲、李筱桐等人的卧室以及储藏室等。此外，一楼还有一个汽车房和小花园。小花园中栽种了不少花草树木，环境宁静而优美。

李济深的政治定位，是他的政治选择的必然结果。

——李济深坚决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共、独裁政策。

李济深，字任潮，桂系著名将领。出生于广西苍梧，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11师参谋长、师长、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谋总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在李济深的经历中，曾多次反对蒋介石，与南京独裁政府分庭抗礼。特别是自1937年以后，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共、独裁政策。1948年，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主席。李济深的反蒋行动招致了蒋介石特务的“关注”。尤其是当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悄然离港后，仍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如退潮后的礁石，格外引人注目。围绕李济深的政治动向，各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人积极拉拢李济深，想利用他影响未来中国政权的政策；桂系为了实现划江而治的企图，极力拉李济深加盟，希望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加强自己的地位；国民党则千方百计要把李济深扣留在香港，如不能达到目的，不惜置之于死地；而港英当局，则是倾向国民党的。李济深的周围，风云诡谲，杀机四伏。然而，他倒向共产党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李济深拥护和信赖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北上。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李济深的保护工作也不遗余力。中共中央指示在香港的潘汉年、钱之光秘密做帮助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出走香港的工作。

按照原定计划，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是在大连登陆，然后取道哈尔滨。可是，就在第二批民主人士抵达大连海面时，被苏联军队控制的大连港以“军事重地”为由，拒绝载有民主人士的“阿瓦塔尔”号停靠码头。最后，这艘挪威籍的货轮只好在大东沟靠岸。

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周恩来特地事先发电报指示在大连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共办事处，要求他们接待这一批民主人士时，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

部门交涉，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此外，北方时值冬季，天气寒冷，周恩来指示一定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

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强调指出：

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

钱之光等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的夜晚。此时，人们都在欢度圣诞节，注意力分散，是行动的有利时机。

于是，在1948年岁尾的圣诞节，一场由中共香港地下党策划的行动开始了……

圣诞之夜，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香港一片火树银花，到处轻歌曼舞，节日气氛十分浓重。夜晚七点多，坐落在坚尼道的皇家酒店三楼灯火辉煌，高朋满座，觥筹交错。与往日宴会不同，这场酒宴引来了众多的新闻记者。这些记者们像一群寻觅猎物的猎犬，聚集在酒楼内外，窥探着酒宴的动静。甚至香港当局也出动了警探，布置在酒楼周围。酒楼四周的出租汽车与小摊贩也比平日多了许多，明眼人一望而知，那是国民党的特务。此刻表面轻松、热闹的气氛下，潜伏着一种紧张，仿佛要发生什么事情。

是夜，香港酒楼家家爆满，为何唯独此宴如此引人注目？只因座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

果然，李济深在社交场合一露面，立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记者、特务闻讯而来。他们要弄明白，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以来，一向深居简出的李任公，这一回如此招摇，究竟是纯粹的节日娱乐，还是别有他举？

此时此刻，虽然酒楼外招来不少“围观”人物，但却无人能接近举行宴会的包间。包间外，两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如临大敌，剑拔弩张，任何人接近包房的企图，在四条有力的臂膀前，均化为泡影。席间，一曲又一曲优雅的圣诞音乐，弥漫在灯红酒绿的南国夜空中，令人陶醉。

李济深难得这样高兴，环顾左右，都是至交好友，多年来冒死犯难，忠诚地追随在自己的左右。现在，他将带领他们进行一次新的冒险，也是一次

新的征程。李济深感慨良久，说：“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谓煞费苦心了。你我定不辜负中共朋友的厚望，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他面向大家，十分动情地说：“诸位，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香港了，我的宗祖李白诗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此一行，对我们来说，是回家。大家风雨同舟这么多年，这一回要真正风雨同舟一回了，别的，我就不必多说了。来，我请大家一起干了这杯酒，祝我们旅途顺利，早日回到家中。”

朱蕴山、吴茂敬等人纷纷起立碰杯。酒阑意尽，大家纷纷离座而走。迎面新闻记者们蜂拥而上，七嘴八舌抢着发问：

“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随行人员从人群中奋力推出一条夹缝，李济深才得以冲出记者的人墙。记者们瞪大了双眼，瞧着一行人登车而去，仍有锲而不舍者尾随其后。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浩浩荡荡直奔维多利亚海湾。来到海边，早有几条游艇靠在码头上，小艇上有酒有菜，一行人弃岸登舟。是夜，正是农历十一月十五，一轮皓月当空，阵阵湿润的海风微微拂面，在如缎的海面上将一盏银灯摇碎，斑斑点点，碎银无数。近处几点渔火明灭，远处万家灯火辉煌，如此良辰美景，泛海赏月，何等美事？记者们眼睁睁望着小艇远去，好生纳闷：时局艰难，李任公何来此雅兴呢？正当记者迷惑之际，港湾里游艇如梭，李济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迷离莫辨了。

李济深诸公载酒泛舟，表面上看去陶然怡然，其实他们内心都很紧张，酒带了不少，谁也不敢多喝。游艇在港湾中来回巡梭，所有的眼睛都紧张而焦急地在海面上搜寻。有游船向他们靠近，他们会惊吓得心跳加速，但是他们又盼望着有人向他们驶来，指引他们快快登上北行之船。在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游艇在海上飘荡了近一个小时。

这时，一条小艇飞也似的向他们冲过来。由于过久的等待，希冀压倒了惊惧。果然，那条小艇驶近时，按事前的约定发来了信号，李济深等人不约而同地长吁一口气，接应人终于盼来了。渐渐地，在如水的月光中，大家看

清那条小艇的船头立着一个人，海风吹拂着他的长发，如风中狂柳，虽然看不清他的脸庞，但那身影大家早已熟悉了。这位昂首船头向他们招手的，正是钱之光。

钱之光的小艇在前方不远的水面上划了一道弧线，然后，调头向东南方驶去，李济深他们的游艇立即加大马力，紧随其后。

前方有一艘巨轮，是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小艇一驶近货轮，便发出信号，巨轮上立即放下软梯。当李济深被搀扶着颤悠悠登上甲板时，立刻有人过来问候，定睛一看，四周熟人不少，他略微有些惊异。因为登船之前，谁也不知道同行的有谁。但他旋即醒悟，知道此次北上，除了他们民革的几位，还有许多朋友：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士。这些人，不是西服革履，便是长袍马褂，真是各有千秋。大家一见面，握手寒暄，兴致十分高昂。

不一会儿，这一“节目”的总导演钱之光登船，与大家告辞，他叮嘱大家：

“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线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去东北做‘生意’的，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的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熟悉自己新的身份。”

末了，钱之光又再三嘱咐：

“诸位先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把诸位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但是，目前在海上，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有靠机智、勇气和纪律，战胜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在航行过程中，希望大家与陪同随行的同志多联系。”

的确，这些人物，都是当代中国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专家，钱之光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一旦落入蒋介石手中，就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巨大的风险和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像对小学生那样再三叮嘱。

“阿尔丹”号一声长鸣，缓缓出港，将第三批爱国民主人士送上了北上的征途。

当北上的轮船乘风破浪，即将驶抵大连港时，不少民主人士的眼眶湿润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两年前的情景。1946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下，共产党领导的整个解放区已经没有一块和平安宁的土地。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最大城市不过是塞外的张家口，而且刚一开战，就被国民党军队夺了去，连自己多年的大本营延安也丢给了国民党。环境如此险恶，中国共产党把朋友们安置到了香港。而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解放军战士，无论怎样风狂浪疾，没有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当战争形势好转，他们又把民主人士接到和平安定的解放区。这一伟大而又平凡的行动，足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胸怀与远见。

——李济深积极参加、领导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李济深作为筹备会的副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各项筹备工作。

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筹备之际，李济深的夫人、子女等从香港乘挪威货船，悄悄地通过台湾海峡的封锁线，安全到达解放区天津。

获悉此讯，李济深异常高兴，亲自去天津迎接。当和全家人见面时，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后来孩子问父亲为什么流泪，李济深才对子女说："我的一生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来又积极从事反蒋抗日活动，抗战初期和共产党合作到现在，一直在为实现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理想马上要实现了，你们也从香港回来了，我怎能不高兴得流泪呢？"

李济深一家到达北平后，先临时住在北平饭店，不久就搬到西总布胡同五号一幢二进四合院的平房中安了家。这幢房子抗战时期被一个汉奸霸占，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北平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收，并分配给李济深一家居住。西总布胡同靠近北京东四，也靠近现在的北京火车站，当时很多重要民主人士都住在这一带，宋庆龄、张澜等人就住在附近。

西总布胡同五号面积比较大，但房屋质量并不高。李济深一家搬来后，这里被人称为"李公馆"。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其家中召集民革领导人举行碰头会议，故"李公馆"又成为民革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场所。

三、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神交已久。"毛泽东赞誉张澜"老成谋国"

当你观看《开国大典》的照片时，你一定会发现，离毛泽东主席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位须发斑白、和蔼慈祥的长者。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澜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土布长衫，脚蹬一双旧而又旧的布鞋。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不禁笑着对张澜说："表老，你太俭朴了，现在是国家副主席，还是应该穿得好些。"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9月底，开国大典迫在眉睫，张澜还没有准备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服装。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问他，是要订做，还是去买套现成的？

张澜说："已经来不及了。"他打量了一下穿在身上的土布长衫说："就穿这一件长衫，不是挺好吗？"

"从成都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您总是穿土布长衫。这一件都褪色了，显得很旧。"青年人指着他的长衫说，"您现在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了，还是做件新的吧……周副主席特意嘱咐过，让我们注意照料好您的生活。"

张澜没等他说完，就笑着接过话头说："恩来啊，他总是想着别人，不顾自己的……我参加开国大典，做件新衣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多少百姓连温饱都混不上，不能忘记他们呀！粗茶淡饭，吃着香甜；土布长衫，穿着舒坦。"

在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张澜就穿着这件褪了色的土布长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和张澜谈话以后，机关管理局给张澜送去长袍礼服。张澜特别珍惜这件礼服。但他只在参加庆典和接见外宾时穿一穿，过后就入箱了。他的秘书吕光光后来撰文赞颂说："穿着旧有的土布长衫，参加天安门上的开国大典，他的节俭高风，实在为世人所罕见。"

其实，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穿的呢子衣，也是临时做的呢。

张澜刚刚从上海脱险来到北平后的第一天，毛泽东便专程进城拜访，后

又安排他住进颐和园。为了表示尊重，毛泽东觉得应该穿件像样的衣服，便对卫士长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但李银桥在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竟选不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便为难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也没有。"

毛泽东笑着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着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李银桥建议毛泽东是不是先借一件穿，毛泽东摆摆手说："不要借了，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于是，毛泽东不无歉意地穿着补丁衣服去看望张澜。

毛泽东与张澜可谓是"布衣之交"了。

当然，张澜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不仅仅因为他有勤俭朴素的美德，比这更加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与共产党人的心心相印。

——张澜在"皖南事变"后同国民党蒋介石对着干。

张澜出身于佃农家庭，早年曾在南充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朱德、罗瑞卿、于江震、陈同生等共产主义战士，曾先后是他的学生。1911年，他参加领导四川的保路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民主革命的一生。

1938 年 7 月，张澜出席国民参政会，与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周恩来经常会晤，他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当时，抗日形势险恶，投降危机严重，张澜以其在西南地区的声望，促成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西南军政首脑在政治上向进步方面转化，使西南地区的民主运动得以开展，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 年 1 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国共以外的各党各派为团结民主力量，有利于减少国共之间的摩擦，制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坚持团结抗日而斗争，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民盟，经各政团的推举，于危难之际，出任民盟主席。

同年 11 月，张澜在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向国民党提出结束训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自

由、取消特务组织等十项主张，获得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蒋介石见此提案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拍案大骂，下令对他进行监视。特务头子戴笠立即强租与他所寄居的特园相毗邻的康庄，布置特务，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但他毫不畏惧，照常在特园召开民盟的会议，并经常在此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代表党中央的领导人商谈国家大事。特园也就被董老誉为“民主之家”。

——张澜在重庆谈判时暗中偏向共产党。

张澜与共产党人的心心相印，尤其体现在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的会晤。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当时，机场上聚满了欢迎的人群。年近古稀的张澜也站在欢迎行列中。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在人丛里发现了银髯飘拂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不待介绍，就迈过去一见如故地说：“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先生也握紧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我们神交已久。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毛泽东又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寒暄之时，周恩来安排了毛泽东同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人合影留念。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一直很忙，每天除了和国民党的上层要员会晤外，还挤时间会见许多新朋故友，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但在他到达重庆的第四天，即嘱周恩来亲赴特园，告知张澜先生要亲临拜访。张澜先生喜出望外，兴由衷发，一阵清风，活跃了静谧的寓所。

下午三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来了，张澜和鲜英热情迎接，他们步入花园，穿过葡萄架，进到内室，促膝而谈。

张澜先生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

鲜英更索性道出自己的心思：“国共两党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要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

毛泽东坚定自若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毛泽东和张澜你一句，我一句，谈了很久的“家常”。待到9月2日，张澜先生又以民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的特园，宴请毛泽东一行。沈钧儒、黄炎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做东招待。毛泽东一进门就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作为主人之一的鲜英，捧上家酿的枣子酒，献给毛泽东。张澜先生起身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

毛泽东举杯相邀道：“且共欢此饮！”

9月14日，张澜得知和谈出现阴影，就约请国共谈判代表来特园商谈。他竭力从中斡旋，并当面质问张群：“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留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

张群一惊，随即又镇静地解释道：“上党交战，纯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

经过几番交谈，当张澜先生感到和谈无望时，就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毛泽东点头赞许。

接着张澜又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谢谢张表老！”毛泽东欣然采纳，还当面赞誉张澜先生是“老成谋国”。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张澜是民盟的首席代表。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同他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政协开会期间，张澜坚持同周恩来商定的原则立场，朝夕与中共代表共商大计，使政协会议终于取得五项决议案的胜利。

不久，蒋介石推翻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张澜坚定不移地与中共代表保持一致步调，再度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特务攻击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导演诬蔑他的游行丑剧，张贴反动标语，叫嚣“法办张澜”！“打死张澜”！1946年7月，特务在昆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张澜在成都主持追悼会。散会时，他遭到特务的袭击，头部受伤。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驰电慰问。8月20日，重庆

《新华日报》发表《李闻惨案与成都暴行》的社论，赞扬张澜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

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逼迫民盟提交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名单。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于11月12日晨亲临南京民盟总部，向民盟各领导人建议：对于民盟是否参加伪国大这样的关键问题，应向主席张澜请示。当时张澜因病在重庆休养，民盟总部当即与他通电话。他在电话中坚决地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当天下午和晚上，他又接连打电话给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强调民盟的立场。民盟总部当天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伪国大。这就使国民党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民盟也保持了它在政治上的纯洁性。

——张澜领导的民盟坚持与中共密切合作。

1947年2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强迫中共代表团从南京、上海、重庆撤退。同年11月，国民党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其解散。张澜发表《呼吁书》，严正声明："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而且公开号召民盟盟员，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继续奋斗。当时，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即迁居到张澜的住所，同他朝夕相处，共商大计。接着，沈老赴香港，主持恢复民盟总部的工作，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告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

1949年6月24日，张澜、史良、罗隆基等安抵北平，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维汉、沈钧儒、郭沫若等亲往车站迎接。老友相见，分外亲热，周恩来紧紧握住张澜的双手，深情地说："表老，您好！您为我们担了风险，感谢您！"

张澜到北平的次日，毛泽东亲临他的下榻处北平饭店看望。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邀张澜到中南海家中共同进餐。

过了几天，朱德设宴招待张澜，并邀请张澜的另一位学生罗瑞卿作陪。张澜看见当年的学生而今已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甚感欣慰。朱德详细询问了张澜的健康状况，说他将派遣他的保健医生给老师检查身体，并负责老师的保健任务。他又指着罗瑞卿对张澜说："老师，瑞卿可是一位好同志

呀！难得的是他早年也受到你的教育，你对他的影响很深，勉励很大！”罗瑞卿连连点头，对于张澜对他的教育极为称道。宴后，朱德、罗瑞卿又陪同张澜泛舟中南海，畅游畅叙，尽欢而散。

7月下旬，天气逐渐转热，周恩来考虑张澜年事已高，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身体又受到过摧残，特安排他到风光如画的颐和园避暑。早年到北平时，京华胜地还是一派民不聊生、军阀战乱的景象，时光流逝，而今已是人民的天下了。张澜心情非常激动，文思泉涌，写出了数首直抒胸臆的《颐和园即景》诗，其中一首题为《傍晚散步》云：

殿前云影犹留彩，树杪蝉声若鼓簧。
昔日霓裳羽衣处，孩儿嬉笑学扭秧。

9月21日，张澜以民盟主席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首先指出：

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中国人民的代表……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他认为，“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和全国民主党派、各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

他称赞“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大宪章”。

他特别指出，要继续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地肃清、扫荡、消灭恶势力。“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因而，“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

四、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毛泽东赞扬他："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1949年10月1日。

站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重檐下轻轻晃动的红色宫灯，广场上滔滔翻卷的红旗的海洋，使郭沫若忘却了自己是在参加开国大典，他仿佛置身于梦幻中，连隆隆的礼炮声和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引起的热烈欢呼声，都听不那么真切，只见那鲜红的一片在扩大、扩大……

那是饮弹后倒在血泊中的纪德甫，是屠刀下鲜血淋漓的孙炳文，是天空中化作一片火光的王若飞和叶挺夫妇，是被蒋介石的无声手枪杀害了的李少石、李公朴和闻一多……

他们的鲜血汇成红色的海洋，如今从这血海中升腾起灿烂的五星红旗。这是秋天收获的金色的硕果，郭沫若睁大眼睛贪婪地看着，他流着热泪笑了："我们应该笑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应该用全生命来保障着我们的笑，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现。"

此时，郭沫若虽年近花甲，却感到自己重又焕发了青春。

10月9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郭沫若被选为副主席，十天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对于郭沫若的上述任命，人们并不感到意外。

——郭沫若是走完北伐战争全过程、复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唯一的五四时期的知名作家。

作为一个文化名人，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五大作家之一，居鲁迅之后，茅盾、巴金、老舍之前；史家"五老"之一，居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思勉之前；甲骨文"四堂"之一，郭沫若（鼎堂）只逊于王国维（观堂）的博而约、董作宾（彦堂）的精而细，排在罗振玉（雪堂）之前。他的经历是十分丰富的。他既是诗人和文学家，又是学者和科学家，还是一个战士和

革命家。鲁迅去世后，郭沫若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以其才情挥斥方遒，领纛前驱。

1892 年 11 月 16 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母亲杜氏秉性和善，略有文化，并爱好诗歌，对郭沫若影响很大。郭沫若发蒙以前，母亲就教他念诗。“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母亲教的这首小诗，激发了他浓厚的读书兴趣；“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等唐诗，使他终生难忘。

郭沫若后来回忆道：“在一生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假使我也算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分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

1913 年 11 月，郭沫若离开家乡，到达天津。这次出川，成了他一生中较大的转折点。因为在这里不久，在北京工作的大哥郭开文决定托友人张次瑜带他去日本留学。他没料到如此好事竟然成于一旦，真是喜出望外。

1914 年 1 月 14 日，郭沫若到了日本，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读书，以求对国家社会有一点切实的贡献。

不久，郭沫若放弃文学，专攻医学，但却在学医过程中，更加发展了文学兴趣。特别是他的自由体诗歌的创作，坚持以抒情为本职，并把诗人的感情流露看做是新诗创作醇化、净化的精髓。他早期的新诗，便是他生命中“感情、冲动、思想、意识”的纯真反映，表现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已到了锋芒毕露的前阶。

对郭沫若正式踏上文学道路给予决定影响的，对他的思想的重大飞跃给予决定推动的是五四运动。他以青春的热情，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心态，为五四运动欢呼。

郭沫若这种获得解放、新生的欢快的心情，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

后来他回忆说：“这个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救了。我从前是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击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它是一部与鲁迅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相对称的新文学的奠基之作。

在这部以“女神”命名的诗集中，根本看不到丝毫女神应有的宁静和柔美，充斥其间的全然是欲望的蓬勃和解放了的个性。

《女神》所显现的时代精神，就是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闪耀着进化的启蒙之光。它以冲决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旧世界的勇气，以战胜被心中“喊不出的苦，喊不出的哀”所围困的“旧我”的雄姿，以一种无差别的透明的新世界和“新我”的“更生”，庄严地宣告：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就这样，诗人借助神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再生的神话故事，来象征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

一场漫天大火终于把凤凰——旧中国化为灰烬后，凤凰更生了，死的宇宙更生了。诗人自己也更生了。

1923 年 3 月，郭沫若回到了上海，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并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他以特有的青春朝气、反抗精神和创作实绩，在新文坛刮起了一股创新思潮，给中国思想文化界以不小的振动。

1926 年 3 月 18 日，经瞿秋白的介绍，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从此，他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新的转变。

7 月下旬，他毅然投笔从戎，与阳翰笙、李一氓一起从广州随军北伐。9 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中将。

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郭沫若和周恩来、朱德等在南昌举行起义。

五四时期的知名作家中，在大革命年代，走完北伐战争全过程，复又参加力图挽救大革命失败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仅有郭沫若一个。

——郭沫若同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26年11月，郭沫若兼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南昌办事处主任的时候，开始与蒋介石直接打交道。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蒋介石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他乘北洋军阀在北伐军的军事打击下剧烈分化的时机，大量收编军阀部队，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北伐军由出师时的八个军很快扩展为四十多个军。与此同时，他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勾结江浙财阀，准备叛变革命，清除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大多数人都未认清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他们大多以为蒋介石是北伐的“功臣”，即使有一些伤害共产党和革命民众的行为，也是形势所迫，或为身边坏人左右，因此对蒋一直采取姑息忍让的态度。蒋介石将计就计，利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误解和信任，暗中积极进行“清党”准备。

然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逃不过郭沫若敏锐的政治眼光。1926年除夕，蒋介石设宴招待校级以上干部，郭沫若出席了宴会。蒋在会上致辞宣称，要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以便将国民党的中央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席间，有人竟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居然也不加制止，欣然领受。于是，郭沫若心中升起一股疑团：蒋介石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他是不是一个野心家？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郭沫若得知陈赞贤遇害的消息后，万分震惊，起初他不知内情，急急地吁请蒋介石制止暴徒的罪恶行径。他以政治部的名义将案件报请总司令“免职查办”肇事者，蒋介石假惺惺“愤怒”一番，在报告上做了批示，但这个报告只准登报，并不发往赣州实行。郭沫若由此进一步怀疑蒋介石究竟站在哪一边。

3月17日，蒋介石雇佣的暴徒们又一次在九江制造了“三一七”惨案，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得到消息后，郭沫若又

天真地去向蒋介石汇报，希望蒋能够派兵弹压，蒋介石敷衍他说："好啦，好啦，我警戒他们一下啦。"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到了3月23日，又发生了"安庆惨案"，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民众团体遭到袭击。郭沫若开始感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

3月23日，郭沫若来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只见里面有许多从未见过面的，着长袍短褂的人进进出出，行动甚为诡秘。于是，郭沫若机警地退入西侧，继续观察动静。正巧，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心腹——安庆电报局长，把郭沫若错当成"自己人"，与他谈起了蒋介石的"秘密"。他告诉郭沫若，所有这些事都是"老头子"（蒋介石）一手安排的。他们已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与各地青红帮暴徒联络好了，他说："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一带，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击赤化分子。"

自此，郭沫若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已经叛变了革命，向着共产党和革命民众挥舞屠刀了。

郭沫若带着满腔悲愤火速离开安庆，在去武汉途中奋笔疾书，写出了震撼人心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他在这篇文章中历数了江西近来发生的一桩桩反共惨案，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蒋介石伪装的假面具，把他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看到和听到的事实全盘端出。他说："现在我明了了，我得到明确答案了。我们的总司令是勾结青红帮来和我们革命民众作战的英雄！你看我们国民革命军三色识别带不是变成了青红带了吗？这就是说我们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成了青红帮的老头子了。我们是何等的光荣啊，三民主义已经被流氓主义代替了，猗欤休哉！"

郭沫若猛烈地鞭挞了蒋介石屠杀民众、背叛革命的罪行。他在文章中写道："他对待民众就是这样的态度！一方面雇用流氓地痞来强奸民意，把革命的民众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了，他又施行用武力来镇压一切。这就是他对于我们民众的态度！他自称是总理的信徒，实则他的手段比袁世凯、段祺瑞还要凶狠。他走一路打一路，真好威风。他之所谓赴前线督师作战就是督流氓地痞之师来和我们民众作战！……现在我把他的假面具揭穿了。在安庆'三二三'之变我看出了他的真相来，他不是为群小所误，他根本是一个小人！他的环境是他自己制造成的，并不是环境把他逼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听了斜

眼局长那番话，谁个还有方法来替他辩护呢？现在还有人来替他辩护，那就是国贼，那就是民众的叛徒，我们要尽力地打倒他！”

郭沫若第一个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他在文章中极为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叛党叛国叛民众的罪恶如此显著，我们是再不能姑息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他第一步勾结流氓地痞，第二步勾结奉系军阀，第三步勾结帝国主义者，现在他差不多步步都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加入反共的联合战线，他不是我们孙总理的继承者，他是孙传芳的继承者了！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郭沫若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建立了忠诚而持久的革命友谊。

毛泽东与郭沫若，一个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伟人，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化舞台上光辉灿烂的巨星。他们共同经历了摧毁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他们同是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桥梁，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骄子。

毛泽东与郭沫若交往的纽带，是他们对人民的深爱和对民族的赤诚，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是他们笔下的诗和他们胸中涌动着的浪漫激情。

中国革命的战争年代，从来都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是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是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毛泽东更多地使用枪杆子战斗，郭沫若更多地使用笔杆子战斗。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用枪杆子和笔杆子谱写了一首动人心弦的革命史诗，创作了一曲并肩战斗的友谊颂歌。

早在 1926 年春，毛泽东和郭沫若就在广州不期而遇，从此开始了一位政治雄才和一位文学骄子的真情交往。

1938 年 12 月 27 日，郭沫若对蒋介石钳制和刁难第三厅抗日宣传工作的种种行为极为愤慨，在一首《有感》诗中写道：

相煎萁豆何犹急，已化沙虫敢后艰？
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

“朔郡健儿”正是指毛泽东领导下的陕北抗日健儿，郭沫若多么想摆脱“相煎萁豆”的困境，北出潼关，投身革命圣地延安啊！这是他多年来在许多首诗作中反复表示过的强烈愿望。

1939年7月5日，郭沫若之父郭朝沛以86岁高龄，病逝于故里。郭沫若得闻噩耗，带着于立群和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汉英，星夜从重庆赶回沙湾，料理丧事。

走进郭家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进堂内挂满了共产党人送来的挽联、题词、彩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称“世侄”的毛泽东及同人从延安送来的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毛泽东送的挽联是对死者的深切哀悼，更是对生者的由衷赞颂，短短数语，高度概括了郭沫若前半生的光辉业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新体诗的奠基人、新史学的开拓者，戎马书生、人民喉舌、民主斗士。同时，也是对时代青年的热情激励：值此外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每一个热血青年要学习郭沫若，奋勇拼搏，共御外敌，不怕牺牲，建功立业。

1944年二三月间，郭沫若写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长文，总结了明末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决定把它作为整风文献，供党内学习。

后来，毛泽东写信称赞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还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更加意气风发地投身到建设伟大祖国的洪流之中。

作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想到了将来新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他积极参加了救济失业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及失学学生的工作，因为他很清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知识分子是越多越好。他关心文字改革，1949 年 10 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一成立，郭沫若便当选为常务理事。其实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已写了有关文字改革的书面意见递呈毛泽东，主张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二要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1952 年 2 月召开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他在讲话中既指出“中国文字改革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又坚决主张必须走向拼音化；他还以生理学作为依据，提出“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因为眼睛视线横看比直看要宽得多，文字横行能减少目力的损耗。由于他竭力倡议报纸书刊的文字均应左起横排，最后终于使这项提议得以在全国实行。

1950 年 5 月间，郭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政府与人民，热情欢迎自海外归国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两双大手紧紧相握，两颗赤子之心密切相连，两双湿润的眼睛交流着心灵的信息。

9 月间，听到美国政府无理拘捕申请回国的钱学森博士和赵忠尧教授时，郭沫若立即致电约里奥·居里，吁请他号召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共同谴责美帝的无理行径。钱学森、赵忠尧既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们自然有权利回到母亲的怀抱，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自此他密切注视着钱学森他们为返归祖国而作的斗争。

在中国科学院内，郭沫若十分重视历史考古工作。跟那些野外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得很快的欧洲国家相比，他总觉得中国的大地已经沉睡得太久，它等待自己子女的挖掘似乎已等待得不耐烦了，因此建议成立有关考古的专门研究机构。不久，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郭沫若亲自领导，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做了很多具体指示。

作为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新中国攀上科学高峰甘当铺路石子。他满怀信心地认定，在未来的科学“赛跑”中，中国人是会夺魁的。

五、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轻工业部部长。他一生以拒绝做官闻名于世，过了古稀之年，却愿意做共产党的“官”

1949年9月21日，黄炎培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他代表民主建国会作热情洋溢的书面发言。他说：

我们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我们要在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这一所新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所新的大厦，是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单位就是一根一根柱子。这钢骨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所新大厦的基础是什么？说理论基础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所新的大厦最高的顶尖上边，飘扬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这所新的大厦的环境，多么美丽！多么伟大！有很高的高山，很多的大水，统统趋向着一个很大的大洋，就是太平洋。太平洋应该是太平的。可是一群小的强盗，想倚靠大的海盗，来兴风作浪，并且强盗自己先闹起来了。只有沿太平洋的各国人民自己觉悟起来，才能保障太平洋的太平。

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10月1日这一天，黄炎培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登上天安门城

楼，出席共和国成立的旷古大典。

不久，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当时，许多人都感到不理解：黄炎培一生淡泊名利，曾经以拒绝做官而闻名于世。辛亥革命后，他曾经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目睹官场的腐败，他下决心不再为官。当袁世凯要他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黄炎培拒绝了。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要封他为部长，黄炎培又拒绝了，为此还得罪了蒋介石。1947年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再次伸出橄榄枝，黄炎培不为利所动，不为势所屈，依然拒绝出仕。现在过了古稀之年，为什么反倒愿意为官呢？为此，黄炎培专门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对自己的决定做了令人感动的说明：

> 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35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是的，黄炎培过去拒绝做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政府不但不是人民政府，而且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府。黄炎培不愿与人民为敌，因此，拒绝做这样的政府的官。今天的政府的的确确是代表人民的意志，黄炎培是人民中的一员，他有责任代表人民行使职权，他有能力把人民交给他的事做好，这同过去的做官完全不同。

那么，人民政府为什么要举荐和接纳黄炎培为官，而且是做政务院副总理这样高职位的官呢？这是因为黄炎培不仅在政治上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而且他在治理国家上具有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

——黄炎培是一位真诚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

中华民国建立不久，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逆潮流而动。黄炎培目睹官场腐败，于1914年辞去了教育司司长职务。这段经历对他后来拒绝做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辞职后，黄炎培当起了山岳使者。在著名报人史量才的慷慨赞助下，他

云游海内。为什么要云游海内，他对友人的一席话道出了缘由。他说：

我在国内旅行，这是向往已久的夙愿。如今梦想将变为现实。在辛亥年以前，我曾经调查过江苏地方教育状况，全省六十多个县，我涉足了三分之二。当时，我就想要遍游全国。诗圣杜子美曾说，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久武汉义旗举起，我任江苏教育行政职务两年，未尝一日放弃这个念头。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对我国民来说是至尊至要的。蔡子民先生提倡“教育救国”，我是全力响应的。问题是怎样来办教育：考察外国教育，是寻找治病良方；而考察国内教育呢？则是寻找病源所在。书中出贵，不可不读，但也不可死读。病源及种种复杂现象千差万别，如果用旧方治今病，用彼方治此病，则于事无补，徒费心机。每每遇及由国外留学归来的学子，他们总是怂恿我多出去考察。去年11月，省里派遣俞子夷、陈容、郭秉文赴欧美考察教育，一年归来。我呢？决计在国内考察教育。等到此行归来，各举所得，互相质证，用以解决今天教育上的种种问题。

黄炎培到各地游历，并不是他醉心于山水之间，而是对教育的细心考察。这对他后来一生的追求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祖国壮丽山河的陶冶，对他爱国主义情操的养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95天的考察，黄炎培对中国的教育认识更加深刻，他观察到社会教育的种种弊端，更多地在思考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和出路。从此，他渐渐萌生改良中国教育的志向。有比较才有鉴别，仅仅对国内教育考察还不够，黄炎培还要考察世界各国的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的这个愿望在1915年实现了。

当时北洋政府组织游美实业团到美国考察，黄炎培受聘担任随行记者。他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广泛接触了美国教育界、工商界人士，还见到了著名科学家爱迪生。他一边观察美国社会，一边把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记录下来，写成《旅美随笔》，在国内刊物上发表。黄炎培还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教育业，对他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开始感到美国等国家的职业教育走到了前头，形成了一股世纪风。他下决心

要把这股世纪风引进到中国来。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自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是一个以倡导、研究和实施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群众教育团体。它渐渐形成以职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职业指导为内容的完整体系。同年年底，他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月刊，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界发行最早、发行时间最长的刊物。

在创办职教社后不久，黄炎培就开始筹办中华职业学校。1918年，中国第一所职业学校诞生了。白手起家办校，谈何容易！从制定办学方针到购买机器，从筹措经费到兴建校舍，黄炎培事必躬亲。为了筹措经费，他专程到南洋拜会了华侨领袖陈嘉庚，一席恳谈，成为莫逆，陈先生慷慨解囊相助，连续五年，每年提供1000元。从学校创办到1952年中央轻工业部接管为止，共培养了七千多名学生。

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深受社会欢迎。全世界公认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后任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演员秦怡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张闻天等也在这个学校附属班学习过。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社会誉为“中华牌”。面对这些成就，黄炎培既高兴又沉重。高兴的是自己努力办起的学校为社会培养了有用人才；沉重的是学校培养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他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发展职业教育。他告诫自己：任重而道远。他还提出职业教育不仅要办好自己内部的事，而且还要参加全社会的运动；不仅要依靠教育界的力量，而且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他认为职教培养的人才要具备四个标准，即高尚纯洁的人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这使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黄炎培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宏论，使毛泽东击节称好。

那是1945年6月，黄炎培在重庆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发起并推动几位参政员联合起来，敦促蒋介石，希望国共两党能早日恢复已经陷于停顿的谈判。6月18日，中共中央即回电，邀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参政员，去延安商谈国事。

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顺利成行，于上午9时35分，由重庆乘飞机飞往延安。

访问延安，是黄炎培多年夙愿。他信奉百闻不如一见，早就想到延安去看个究竟。1936年11月，黄炎培从上海飞到西安时，就想去延安访问，未能如愿。以后虽有一些机会，但也未能成行。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邀大家去延安，黄炎培特别高兴，劲头十足。

下午1时30分，飞机平安抵达延安机场。

中国共产党对黄炎培一行的来访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三十多位党、政、军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并一一与他们握手致意。毛泽东把黄炎培的手紧紧握住，亲切地对黄炎培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你主持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的会议。在演说中，你大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呐喊，那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惊叹毛泽东好记性。后来回到重庆，他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于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得意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交往，就此拉开了序幕。

到延安的第一天，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三人微服私访，觉得样样都很新鲜。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黄炎培在其著名的《延安归来》一文中，是这样记述此次会面的：

>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样是高高矮矮的山坡，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有一所大会堂，规模相当宏伟，背靠山坡。从大会堂的右边绕到后方，走上山坡，便是毛泽东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仿佛就是大会堂后身的上层。会客室是正方形，光线很足，中间安着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20人。四壁挂着清清疏疏的几幅画。其中有一幅画是沈叔羊画的，一壶酒，上写"茅台"二字，几只杯子，并有我题的一首打油诗：
>
>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原来，这画是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沈叔羊为他父亲沈钧儒“画以娱之”。在请黄炎培题词时，他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红军在茅台酒池里洗脚一事，于是针对这个谣传，题了这首七绝以讽喻。真没想到，几年前自己题的诗和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此时的黄炎培，一股知遇之感涌上心头。

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亲切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谈了党内整顿“三风”的运动，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以及开展整风运动的意义。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说的有关问题。

接着，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

>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到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他常常教导党内同志与党外人士交朋友，要交心，要使他们敢于吐诤言、畏言，成为自己的诤友、畏友，这样事业才会兴旺发达。今天，毛泽东遇到了这样一个朋友，自然十分开心，谈话也就十分深入了。毛泽东回答道：

>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这番话，使黄炎培钦佩之极。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方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在政治上坚决和中国共产党做朋友。

对延安的五天访问虽然短暂，却使黄炎培满载而归。所见所闻，大大澄清了他的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回重庆后，黄炎培一边到处做报告，讲他在延安的见闻；一边在很短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在这本书中，黄炎培如实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推行的政策和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成果，以及人民朴实、自由、健康欢乐的生活，使许多长期受国民党谣言蒙蔽的大后方人民，知道了真相，明白了是非。陈毅曾热情地对黄炎培说："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在访问延安的短短几天中，黄炎培以亲见亲闻，目睹了陕甘宁边区人民民主政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并对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由衷地钦佩。然而，黄炎培毕竟是一个熟读史书的饱学之士，他以深邃的目光，敏锐地提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即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当然，作为共产党的朋友，黄炎培提出这一严肃的问题，并非恶意，而是一种与毛泽东推心置腹的探讨与交换意见；同时，也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测验，是一种希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几次交谈中，也深受启发。特别是黄炎培谈到的"周期率"问题，更使毛泽东深受感动。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能为党的未来，国家的未来，直言相告，未雨绸缪，说明他们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因此，毛泽东在当面回答了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提问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多次告诫全党：要谦虚、谨慎，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

黄炎培访问延安三年后，即 1948 年 6 月，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已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反共、独裁、内战维持其统治的蒋介石政权，已经在自己燃起的战火中被烧得焦头烂额。政治上的极端孤立，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崩溃，使得国民党政府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败相毕露。而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连连获胜，中国内战的局面已经逐步明朗化了。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果断地发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前往解放区，共商民主建国之大计。召开这样空前规模的政治协商会议，汇集天下豪杰、群贤，商讨兴建共和国的伟业，实践民主政治，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所做的探索，也是实现毛泽东对黄炎培先生所做的承诺！

因此，在共产党邀请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民主人士当中，黄炎培自然成了最重要的被邀者之一。

黄炎培接到邀请后，心情特别好。他向往解放区扬眉吐气的生活，向往着如朝阳般的新中国，向往着美好的未来。

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他携家眷离开上海，先到达香港。又在香港的中共地下组织的护送下，于 1949 年 3 月 25 日到达北平。就在这一天，中共首脑机关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到达北平。

6 月 11 日，黄炎培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议。能同中共领导人一起商讨建国大业，他内心里洋溢着无限喜悦与豪情。这同他当年参加旧政协时的心情特别不一样了。当年黄炎培参加由蒋介石操纵的旧政协，他们这些民主人士只是一种摆设，虽然他也曾期望通过政协实现国内和平，但这只是一种幻想，而且在政协会议期间，他的家就被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共领导人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他。1948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时，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同民主人士商量，得到民主人士的广泛赞同。为了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安全到达北平，中共在各地的地下组织想尽了办法。

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黄炎培能不为中共的真心实意感动吗！后来他从上海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表达了这层意思。他在信中写道："弟住北平三个月，窥见诸位诚心诚意，努力求是求进，的确使我五体投地。"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已古稀之年，他兢兢业业投入自己分管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六、沈钧儒具有渊博的司法知识和长期的司法实践，共产党任命他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的党政军领导和民主人士，同广场上的几十万群众一道爆发出长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这时，离毛泽东不远的一位“美髯公”，一边使劲地鼓掌，一边激动地说：“我们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

这位“美髯公”，虽然身材矮小，却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就是出任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已76岁高龄的沈钧儒。

不清楚沈钧儒个人经历的人们，难免提出这样的疑问：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不仅要有渊博精深的司法知识和较长时间的司法实践，而且要具有一身正气、疾恶如仇、无私无畏、秉公执法的高尚品质，任命一个儒弱长者担任这一职务，合适吗？

其实，共产党是“慧眼识英雄”。正是基于学识和人品这两个方面的考虑，共产党锁定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从青年时代起就专攻法律。

沈钧儒，浙江嘉兴人，字衡山。1875年生，清光绪进士，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期间，曾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1926年北伐军攻克浙江时，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经营救获释。1928年任上海法科大学（后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2年参加宋庆龄、鲁迅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蒋汪着着退让，对爱国群众的抗日

救亡运动却百般阻挠打击。5月间，上海发生了所谓“新生”事件。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主编的《新生》周刊，登载了艾寒松同志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侵略者大肆指斥该文蓄意侮辱日本天皇，要国民党政府严加惩处。南京蒋汪政府唯日寇之命是从，立即通缉艾寒松，逮捕杜重远。衡老（人们对沈钧儒的习惯尊称）以律师资格出庭为杜重远、艾寒松辩护，凛然斥责日本侵略者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以此为借口制造侵华事变；要求法庭依据本国法律，宣判杜、艾无罪，不应丧权媚外。国民党法庭当然不会同意。衡老义愤填膺，写了一首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诗曰：

我欲入山兮虎豹多，
我欲入海兮波涛深。
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
你到那里去了？
我要去追寻。

又云：

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
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
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
求此心于何从兮，
我泪淋浪其难禁。

这位代表“万民之心”的爱国主义旗手呼唤出来的心声，多么悲壮激烈，震撼人心！

11月，《新生》周刊被迫停刊后，邹韬奋创办了在群众中有更大影响的《大众生活》，它实际上成为当时上海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机关刊物，衡老竭力支持。11月22日，爱国新闻工作者戈公振逝世，韬奋写文章悼念，衡老读后，立即写道：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炯炯悬双睛，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这别具一格、叠用了四句“我是中国人”的诗作，哀壮情深，不胫而走，传遍全国，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沈钧儒运用自己娴熟的司法实践为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伸张正义。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为了反对日寇宰割华北，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12月12日，由衡老等发起，上海文化界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指出：国难日亟，“尽量地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并提出八项具体救国主张。在这一宣言的推动下，衡老联合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等，在上海先后成立妇女界、文化界、职业界、学生、工人等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衡老被推为主席。然后，联络全国各地救亡团体，于1936年6月1日正式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衡老和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被推为常务委员。衡老主持起草了“全救”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

当时搞抗日救亡工作，动辄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而衡老铁骨铮铮，屹立不屈。他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筹备小组会上曾说：“要参加就要准备坐牢房，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陶行知先生因此写下了《离别沈钧儒先生的诗》：

（一）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头，

他是同胞的领头。

他忘记了自己的头，

为爱护别人的头，
惟一念头。

（二）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头，
他是战士的领头。
冒着敌人的炮火，
冲洗四十年的冤仇。
拼命争取，
民族自由。

1936年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和文学家鲁迅逝世，衡老和宋庆龄、蔡元培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22日，由宋庆龄、衡老率领一万多工人、学生、职员、教授，游行送葬，到达上海万国公墓举行隆重葬礼。衡老亲笔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素轴，覆盖在鲁迅灵柩上。衡老并在墓前沉痛致悼词。悼词说：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鲁迅先生精神，也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优良传统。

实际上，这个伟大传统也就是沈钧儒先生的精神，他同鲁迅一样，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魂”。

11月23日凌晨，这位伟大民族之魂和其他六位救国会领袖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等同时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爱国“七君子”案。

“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国民党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爱国人士的义愤，各界纷纷组织后援会，进行营救，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旅美和旅法爱国侨胞也纷纷驰电营救、抗议。世界著名学者爱因斯坦、杜威、孟禄等16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衡老等在狱中泰然自若，临危不惧，威武不屈，把非法审讯中的原告变成了被告，他们的严词驳斥、巧妙答辩使审讯者张口结舌，丑态百出。沙千里在他的《七人之狱》的回忆录中就曾记下了衡老受审时的场面：

法官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衡老答："赞成不赞成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救国会从来不谈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宣传什么主义，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救国主义。"

法官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衡老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

法官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

衡老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利用。"

在狱外，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等还曾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响应，踊跃参加，使国民党反动派无可奈何，狼狈不堪。

1937 年 7 月 7 日夜间，卢沟桥的抗日炮声，宣告了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形势急剧变化，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国民党反动派难以继续迫害主张团结抗日的救国领袖，衡老等斗争胜利，光荣出狱。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是抗日救国运动的胜利，也是衡老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的胜利。

——沈钧儒在司法工作中的严谨作风，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赏。

1942 年，衡老、沙千里、崔国翰和林亨元在重庆合组平正法律事务所，继续执行律师职务。当时沈老 67 岁。林亨元曾回忆说：

衡老德高望重，年寿最长，学识经验最为丰富，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我们都由衷地敬爱他老人家，尊重他老人家。由于我们事务所充满了友爱团结的气氛，有不少人到我们办公室来，都羡慕地说："我们来这里，呼吸了暖如春风的民主空气。"但是我们的亲爱团结，不是和稀泥的一团和气，我们的感情是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而共同奋斗的基础之上。因而彼此志同道合，推诚相与，互相帮助，互相切磋，蔚然成风。尤其衡老对我们的爱护无微不至，一发现我们的缺点，就和蔼而严肃地指出，进行批

评帮助。记得有一次我在重庆地方法院执行律师职务，在法庭上同推事为了法理上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当时有火气，发言过于尖锐，触怒了那位法官，他竟然暴跳如雷地要我退出法庭，我当然不肯让步，声色俱厉地大骂这个法官，搞得双方相持不下。另一位和我一起出庭的律师把我拉出法庭，才算了结了这一场争吵。回来我把此事告诉了衡老，衡老当时是重庆律师公会的常务理事。他说："争论问题，目的是为了使人家信服真理，要心平气和，不能发火动气。动起气来，就不能冷静地分析问题，你理由再充分，也无法做有条理的表达，这样就很难得到旁观者的同情，对方更不能接受。我常说，主张坚决，态度和平，这句话做起来可不容易，孟子说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要注重善于涵养。"我追随衡老几十年，向他老人家学习，得到了不少的教益，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光明磊落的襟怀和炉火纯青的涵养，我始终不能望及其项背。

林亨元还回忆道：衡老当律师受理案件，认为宜于和解的，他极力劝告当事人找对方进行和解。他认为社会上应干的事很多，不要尽缠在私人的无谓的纠纷上。有一次，一对青年夫妇带着怨恨的情绪，来请求衡老办理离婚手续。双方都坚决地表示，他们一定要离婚，绝对不能共同生活下去了。衡老听了他们倾诉情由之后，从容不迫地含着慈祥的笑容，请他们俩坐下来，同他们亲切地谈话。在谈话中着重指出结婚是爱情的巩固与发展，不是爱情的终止。但是，怎样巩固和发展爱情，增进家庭的幸福，是双方的责任。结婚之后，过的是双方合在一起的生活，不同于单方的生活，两方面必须互相谦让，互相爱护，处处体贴对方，替对方着想，不要只想到自己。比如没有结婚的时候，一个人在床上独睡，可以四肢摊开，舒舒服服地睡眠，不会妨碍到任何人。结婚了，睡眠的方式就要跟着改变，如果还是像结婚以前一样，两个人都把两手两足摊开来躺在一个床上，那就非吵起架来不可。所以过夫妇共同生活，务必处处替对方着想，互相体贴，互相帮助，就不会矛盾了。他们听到这里，忍不住地笑起来了，满肚子的气愤逐渐缓和下来，最后表示愿意接受衡老的劝导，笑眯眯地和衡老握别了。衡老受理诉讼案件，对于贫困的当事人，无不给以特别照顾，不但不收他们的公费，有时反而掏腰包帮助他们。他还发动一些进步律师设立"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们、抗日军属义务辩护。有一次，一个所谓有名的人物，利用官府权势，

以办理慈善事业为名，于重庆郊区圈占了几十户贫苦农民的一大片土地。农民们哭诉无门，来到我们事务所，要求衡老援助。衡老慨然允诺，就带领我们事务所全体律师，代表被侵害权利的农民们，登报警告这位所谓“名人”，指出这是违法行为，如果实行强占，立即依法起诉。这位“名人”见报后，赶紧托人来声明，愿意放弃这种做法。

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旧政协决议，片面召开伪国大，威胁利诱民盟领导人交出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名单。衡老等民盟负责人立场坚定，坚决抵制伪国大，否认伪国大上通过的伪宪法，终于导致国民党反动派在1947年10月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民盟被迫宣布自行解散。

1948年1月，衡老同章伯钧、李章达等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衡老在会上致开幕词宣布：“三中全会的使命，是要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三中全会宣言痛斥了蒋介石政权投靠美帝国主义，独裁卖国，发动内战的反革命罪行，并发表“紧急声明”，郑重宣布：“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对于本盟合法地位的取消，是根本违法的。”这次会议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坚决为推翻国民党腐朽政权，反对美帝国主义，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从救国运动到民主运动，衡老始终跟着党，以坚定不渝的革命意志，在民主革命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他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欢迎。

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等人在上海。民盟总部在衡老和章伯钧的主持下在北平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处理民盟的日常工作和筹备召开民盟四中全会。衡老作为民盟总部的代表，直接与共产党合作，对外负责签发民盟的声明、通电等。但他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1949年5月上海解放，衡老立即致电张澜、罗隆基等，请他们尽快北上，主持民盟工作，商订民盟今后决策。

由于衡老的努力，使民盟得以沿着民盟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政治方向和政策继续前进，争取了民盟领导集团在新的形势下，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民盟新的团结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衡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极为注重法律人才，认为执法者必须精通法律，尤其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的最高审判机关，更需要政治坚强、有高深法律修养和丰富经验的人才来从事审判工作。

在他的积极提议下，当时中央为最高人民法院配备的领导干部，有久经革命战斗，在政治上、理论上、法律上都有较高水平和丰富工作经验的红军老干部；有为民主运动做出不少贡献，曾任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著名法学家；有在老根据地担任司法工作多年，在马列主义方面有一定理论修养，又熟悉审判工作的老干部；有在社会上享有声誉，法学知识渊博的著名律师，由他们分别担任副院长、委员、庭长、副庭长等职。审判员则有从部队调来的、具有较高政治、文化水平的优秀干部，有的系原在老区做过审判工作的同志，有的是旧社会法学界的民主人士。其中大部分法律专家学者如张志让、陆鸿仪等是衡老提出任命的。书记员大多数是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样德才并重、新老结合的队伍，形成和谐而壮大的审判阵容，为建立我国崭新的审判制度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章　昔日对手　今日朋友

聚焦时间：1949年10月

聚焦地点：北京

聚焦人物：傅作义、邓宝珊、张治中、程潜、陈明仁、陶峙岳

聚焦话题：历史演绎一个离奇而真实的神话：开国大典那天，傅作义、张治中、程潜、陈明仁等一批共产党的昔日对手，同毛泽东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掩卷沉思，人们将会明白许多道理

"一饭三吐哺"，反映周公求士之切；"三顾茅庐"，体现刘备访贤之诚。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却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无产阶级广阔胸怀，化敌为友。于是，傅作义、邓宝珊、张治中、程潜、陈明仁、陶峙岳等一大批国民党显赫军政人员，高举义旗，弃暗投明，聚集在共产党的麾下，为建设人民的新中国甘效犬马。

一、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毛泽东对他说：过去我们是对手，今后我们是姑舅表亲，难舍又难分

1949年10月21日，新上任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勤政殿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接着，他公布政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当他宣布"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时，有的人感到惊讶：

"傅作义不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的'华北剿总'司令么？"

"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的战犯名单上，就有傅作义的大名呀！"

"人民的罪人怎么能登上水利部部长的'宝座'？"

其实，在这之前不久，傅作义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不分先后”、“立功受奖，立大功受大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广阔胸怀。

当然，要达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真正团结，傅作义本人必须具有团结的忠诚愿望。

——傅作义在抗战时期坚决拥护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英勇抗击了日军的入侵。

1931年9月，傅作义主政绥远还不足半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三省沦陷，华北诸省一下子成了抵抗日本人侵略的最前线。外族入侵，大敌当前，傅作义满腔的爱国救民的热血沸腾了，在绥远向所部全体官兵进行抗日动员，提出了“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著名口号，还规定部队在操练、就餐、晚点名等一切活动列队时，要齐声高呼：“誓死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国耻！”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傅作义联络晋绥将领15人，通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请缨抗日。

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傅作义通电阎锡山和蒋介石、张学良，主动要求率部参加抗战。其间，他曾奉命率所部一个师的兵力与日军西蒙义一师团在怀柔境内牛栏山一带，浴血奋战四天，没有让日军一兵一卒从他的阵地上通过，粉碎了日军沿平古大道攻夺北平的图谋。怀柔一战为海内报界称为抗战以来“最为光荣一战”。傅作义誓死抗日报国的精神，深为海内外人士称道。

1936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傅作义，指出，今日中国的大计是抗日图存，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这既是傅先生的职责，也是我红军及全国人民的责任。如果傅先生毅然率部抗日，我毛泽东和红军立即开赴绥远与贵部并肩作战。这封信全文如下：

作义主席先生勋鉴：

涿州之战，久闻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

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拜启

8月14日

傅作义读了毛泽东的信，立即对南汉宸说："南先生回去后，请代我和绥远全省军民向毛泽东先生表示谢意。请转告毛先生，作义向来主张不惹事，也不怕事，生平不说硬话，也不做软事，以明无愧职守。日本人果真来了，还是我参加长城抗战的那句话，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很快打开，全面抗战终于促成。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与傅作义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并肩作战，抗击日军。平型关一役，傅作义身为前线总指挥，却受制于阎锡山。战斗刚刚打响，就被迫全线撤退；相反，林彪指挥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被称为是自七七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傅作义认识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的爱国军队，是英勇无敌的军队。

1937年9月底，傅作义与卫立煌指挥的抗日军队与日军大战于忻口，战况空前激烈，傅作义指挥的抗日军队因受日本飞机的轰炸而伤亡惨重，又是八路军以仅有的三个师的力量全部开入日军的后方，截断忻口之日军后方供给线，特别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八路军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的作战行动，全部炸毁敌机和机场设施，连续数日内，忻口战场上空没有敌机活动，傅作义指挥中国军队乘势连续发起反攻，取得了重大战果。对

此，傅作义十分感激，他对卫立煌讲："八路军是在以血肉之躯对我们进行支援。"

保卫太原一战，阎锡山明知太原是守不住的，却严令傅作义死守，企图乘机借日本人之手消灭离心倾向日益严重的傅部。当时，连身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军"的卫立煌都看出了这一意图，还上报了蒋介石。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十分关切傅作义此战的命运。他对傅作义说："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主要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他还加重语气说："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请你多加保重！"

事后，傅作义对他的机要秘书说："这才是语重心长、恩重如山的赠言。对咱来说受用无穷，必须铭记在心里。"为表示对中共关心的谢意，傅作义把太原剩余的作战物资全部交给八路军。周恩来接到通知后，当即发动爱国群众，迅速组织力量，把武器弹药及时运出太原城。

1938 年 3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战地动员会在晋西北岚县召开动员新战士大会，傅作义派人员参加，贺龙派 120 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参加。大会由山西战地动员会主任续范亭、组织部长南汉宸、宣传部长武新宇主持。大会鉴于傅作义的第 35 军抗战以来战斗频繁、减员严重，决定为第 35 军补充新战士三千多人，以增强战斗力。

会议期间，傅作义已决定率部反攻归绥。傅作义得知山西战地动员会要为他补充兵员后，激动地说："共产党真是了解我傅作义的燃眉之急呀！"在紧张的行军途中，他主动在晋西北的白文镇约八路军 120 师的领导人会谈，八路军 120 师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萧克及南汉宸、续范亭应约前去会见。谈话中，傅作义向中共方面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并答应了 120 师一部开赴绥远大青山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要求，他说："我此次反攻归绥，准备在绥远坚持长期抗战，希望与贺龙将军密切配合，共同抗日。"

1938 年 6 月，傅作义率部反攻归绥战役结束。因战斗伤亡很重，奉命开到河曲一带整训。此时，傅作义再次要求中共支援一批年轻人来帮助工作，毛泽东随即派出南汉宸去傅部联络，经商定，中共方面派出 300 名青年入傅部的战地政治工作会工作。

此后，毛泽东指示由中共晋西北省工委做这项工作，并要求向派出人员讲明：一不搞兵暴，二不搞瓦解和情报工作，唯一的任务是同各种各样的人广交朋友，从中宣传党的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傅作义部的政治素质。派出人员中有个别中共党员，大部分是从北平各大学撤到西安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中共党员潘纪文以特派员身份负责领导这批青年。

这批青年到后，傅作义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很快，傅作义部队中创建了政治工作制度。第35军的各师、旅、团设政治部，配政治部主任；营、连两级设政治指导员，军所属各部、各连队设有奋斗室，对士兵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活跃战士生活，起到了巩固部队，提高士兵政治觉悟，改善士兵文化素质，加强战斗力的作用。

后来傅作义还让周北峰参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精神，拟定了第35军的《十项纪律》，经他审定，通令全军官兵执行。这十项纪律的主要内容是：

说话和气；
买卖公平；
损物赔偿；
不许调戏妇女；
不许打人骂人；
部队行军时不准损坏青苗；
部队驻宿后要把院落打扫干净；
行军前要缸满院净；
部队煮饭烧柴、马食草料要付钱；
不虐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

在中共的帮助下，傅作义部队的战斗作风、士气以及与老百姓的关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传说傅作义的第35军如何如何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就是得益于此时中共派出的300名政治工作人员对其军队进行的改造。

——傅作义为北京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傅作义毅然作出决定，派出密使与解放军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949年1月21日上午，在北平东交民巷一所西式建筑风格的豪华庭院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国民党“华北剿总”代表王克俊、崔载之，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同一天，傅作义召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读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北平城内的二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到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开进北平的入城仪式。

2月上旬，傅作义提出要亲自见一见毛泽东。

毛泽东得知傅作义要求见他时，开玩笑似的说：“人家原来可是国民党政府华北五省的封疆大吏，不能不见，有事还得请他帮忙解决哩！他熟悉华北情况嘛！”事后毛泽东还指示要邓宝珊也一起来，此外还可以偕一员随从。时间安排在2月22日。

是日上午十时，傅作义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石家庄西郊大郭村机场，尔后，换乘解放军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式吉普车，开赴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

一见毛泽东，傅作义行了一个礼说：“毛主席，我是有罪之人。”毛泽东拉着傅作义的手说：“傅将军，你有功，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傅作义把毛泽东让进里屋。毛泽东一落座，就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你还是把他甩掉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笑起来。接着，毛泽东又对傅作义说：“我们俘虏你的人，都给你放回去。绥远还没有解放，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傅作义感到意外，连忙问道：“把部队交还给我，我怎么处理呢？为什么还要把他们送到绥远去呢？”毛泽东呷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这些部队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就可以帮助

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这些人争取过来了，都是我们的朋友，以后我们还要用得着他们哩！”毛泽东又说：“对于你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但主要的是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民主改革，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毛泽东与傅作义推心置腹，交心谈心，亲切的话语如春风拂面，吹得傅作义心里暖洋洋的。

这一次畅谈，傅作义内心存在的一切疑虑完全消除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傅作义自这次与毛泽东一番谈话后，思想包袱卸下了。他回到北平，精神焕发，心情舒畅，4月1日即向全国发表了《北平和平通电》：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的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放，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正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傅作义的通电，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国内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个通电，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第二天就给傅作义回电慰勉。电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

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已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日

——傅作义对水利建设很有兴趣。

一次，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与傅作义和邓宝珊谈话，征求意见，问他们开国后希望干什么。当问到傅作义时，傅作义说："我对农业，特别是水利建设有兴趣。"

邓宝珊接过傅作义的话说："宜生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农垦，很受老百姓欢迎。"

"我是败军之将，不能在军队工作了，最好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做点水利方面的事情。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傅作义笑着补充说。

毛泽东笑着摇头道："你是有功之人，还应当留在政府部门里工作，为人民服务嘛。你的意思是想到水利部工作？河套水利的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部长嘛。"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第一任部长，李葆华为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以华北水利委员会为基础，组建了水利部。毛泽东让傅作义推荐几个人，傅作义便推荐了治黄专家张含英做副部长。傅作义在北京钓鱼台有一处私产，那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周围大树参天，环境幽静。水利部成立后，傅作义把这座院子交给水利部办了幼儿园。后来，中央要建国宾馆，水利部又将这座院子交了出来。现在，中央在钓鱼台招待国宾的宴会，还常在那个院里举行。

自当了水利部部长后，傅作义一门心思都用到了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上。他常常轻车简从，到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考察，足迹走遍了黄河、长江、淮河、松花江上的水利工程工地。

1950年盛夏，傅作义到河南三门峡考察，为了节约来回路上的时间，他和随行的工作人员一道，就露宿在黄河滩上。有一次，傅作义与李葆华一起视察淮河，从河南坐船经安徽一起到江苏。在河南境内的淮河上乘坐木船

走了十几天，白天黑夜都在船上，十分艰苦，这对六十多岁的傅作义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到了安徽境内，有的地方车船不通，傅作义就让人雇了三头毛驴驮行李，他和大家一块儿步行。

傅作义年纪慢慢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他不顾年高有病，忘我地工作。傅作义的这种工作精神，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对傅作义进行了表扬，并对他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多方面的关心。

二、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对他说："我们一见面就吵架，事情一说开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之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同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与邓宝珊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晤。邓宝珊一行刚刚安顿下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便来看望他们。

一阵寒暄过后，邓宝珊便对毛泽东说："报告毛先生，有一件事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想通，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哦，邓先生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请只管说出来。"毛泽东感到有些意外。

"你们当年为什么要在毫不通气的情况下，攻打榆林？"说完这话，邓宝珊似乎余气未消。

原来，1947年8月，解放军出于战略需要，对榆林发动了进攻。这次榆林战役，解放军消灭了胡宗南派驻的两个整编旅，也使邓宝珊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1947年11月，解放军又发动了第二次对榆林的进攻。解放军两次攻打榆林，使邓宝珊心里结下了疙瘩。他想，自己和共产党交情那么深，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不通一点气的情况下攻打榆林？所以，一见到毛泽东，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个埋在心底很久的问题。

毛泽东笑了：“第一次决定打榆林，我是知道的。我们的目的是牵制胡宗南，配合陈赓部队过黄河。同时，我们也还是想请你嘛！”

邓宝珊摇了摇头：“如此请法，我怎么能去。你们打起来，我总不能去当降将吧。”

毛泽东又说：“第二次打榆林嘛，是彭德怀计划的，主要是想围城打援，后来因为我们的粮食和补给有困难，就主动撤了下来。”

这时，周恩来在一旁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这次你代表傅先生出城谈判，不是谈得很好吗？北平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你是有功劳的呀。”

毛泽东也接着说：“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一见面就吵架，事情一说开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朋友。”谈话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真是不打不成交。

不过，邓宝珊成为中共的朋友，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邓宝珊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孙中山麾下的一员战将。

邓宝珊1894年出生于甘肃秦州（今天水市）一个贫寒的家庭。他的父亲邓尚贤，是一个穷书生，因为生活难以为继，后来便改为从商。邓宝珊只读过两年多私塾，13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他便来到兰州谋生，在父亲的一个朋友马尊义开办的工厂里当学徒。

1909年，湖北新军标统杨缵绪调驻新疆伊犁，路过兰州招募新兵，邓宝珊听说后便前往报名。当时，他尚不满16岁，不够应募年龄，但因身材高大，脸上已显老成之气，招募者一看，相信他已成年，便将他招募入伍。邓宝珊参军后，随部队来到伊犁。

起初，邓宝珊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因为他粗通文字，不久便被提拔为司书。

1910年7月，邓宝珊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1月，伊犁新军响应辛亥革命，在新疆起义。邓宝珊手携五响马枪，随部队猛攻伊犁东关，清兵闻风而逃。起义军在伊犁成立了临时都督府，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此时，新疆巡抚袁大化派兵向伊犁发动了猛烈进攻，双方激战一天一夜。当时，起义军形势十分危急，敌人反复猛扑，指挥官连长阵亡，军心动摇。邓宝珊当即挥枪在阵中大喊：“我们要与清军血战到底，人在阵地在，援军马上就到，

一定要坚持住！”率领士兵顽强抗敌。正在这时，杨缵绪带着人马赶到，邓宝珊向杨建议抄袭清军左翼后路，以扭转危局。杨缵绪表示赞同，命令邓宝珊率部突袭敌人。邓宝珊领命后，率领一队人马，出其不意地袭击清军后方，一直冲到敌军指挥车前。敌军阵脚大乱，落荒而逃。革命军乘胜追击，收复失地，伊犁革命政权得以转危为安。

——邓宝珊在抗战期间曾亲赴延安，和中共领导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宝珊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第 21 军团军团长，驻防陕西榆林，在平绥线西段侧翼抗击日军西侵。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早已怒火中烧的邓宝珊，以为抗日目的可达，带着参谋长俞方臬和译电员飞往榆林，命令部队火速向陕北开拔。

当邓宝珊到达榆林后，蒋介石又改任他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就在邓宝珊到榆林后不久，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来到榆林，双方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

当时，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在陕北仅存的一个据点，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面屏障。邓宝珊驻防榆林期间，一切以抗日为重，非常注意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关系，顶住了国民党多次令其制造摩擦的指示。

1938 年 5 月，邓宝珊去武功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结束返回榆林时，邓宝珊故意选择了途经延安的路线，他想亲眼看一看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的新气象。

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时，天已黑了。他不想打扰边区政府，便在延安大街南头一骡马店住了下来。骡马店是当时出外做苦工、赶骡马的人落脚歇息的地方，条件极为简陋。当夜，延安市公安保卫人员到骡马大店查询过往客人，发现了邓宝珊一行，便马上向上级报告。市公安局得知消息后，告诉了中共中央交际处处长金城。接到市公安局的电话后，金城怎么也不相信，经再三询问核实后，急忙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电话中指示金城："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热情的欢迎和优待。"

当金城带人赶到骡马大店时，被邓的副官于浚都挡驾。他以邓宝珊已休息为由，谢绝了金城的来访。

第二天一大早，金城再次来到骡马店，请求面见邓宝珊。于浚都正想拒绝，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金城上前转达了毛泽东与边区政府的挽留之意：

“听说邓先生到了延安，毛主席想见见你，请你在延安多待几天，走一走，看一看。”

邓宝珊略作思考，回答道：“好吧，我就在延安停留一天。不过，毛先生公务繁忙，就不打扰了。”

金城旋即回去报告。

金城走后不久，毛泽东和萧劲光一起来到了骡马店。

这是毛泽东与邓宝珊初次相识，两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一样，十分亲热。毛泽东笑着说：“邓司令路过延安，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是不是怕我们共产党穷，请不起你吃饭呀？”

“哪里哪里，毛先生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小弟这次路过延安，实在不敢打扰。”邓宝珊连忙表示歉意。

“那好，今天中午，我在交际处请客，请邓先生赏光。”毛泽东的口气，就像下命令似的。

“谢谢毛先生的盛情。”邓宝珊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中午，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等人作陪，参加了毛泽东的宴请。席间，毛泽东与邓宝珊谈笑风生，十分投缘。

这次，邓宝珊在毛泽东的挽留下，在延安整整住了一个星期。他几次与毛泽东单独会谈，参观了抗大，出席了文艺演出晚会和群众大会，还见到了在陕北公学读书的二女儿邓友梅。

这次延安之行给邓宝珊留下了愉悦的印象，边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给邓宝珊留下深刻的印象。离开延安时，他充满了恋恋不舍之情。

从这之后，邓宝珊与延安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多次访问延安。

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命令邓宝珊部队封锁进入边区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被邓宝珊拒绝。他气愤地说：“我们的部队是来打日本军的，怎么能自相残杀！”相反，他命令部队一定要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一线公路的畅通，保护陕甘宁人员往来和车辆顺利出入。

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对邓宝珊与延安的联系他不好公开反对，但暗中却对他施加压力。

1943 年初夏，国民党中央电请邓宝珊到重庆开会，并特意指示他要绕

道宁夏到重庆。接到电报，邓宝珊非常生气，他说："不指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对邓宝珊给予了高度赞扬，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定要大张旗鼓地热情招待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邓宝珊到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就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设宴为他洗尘，请来了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等十多位党内外著名人士作陪。在延安的几天，邓宝珊多次与毛泽东单独会谈，就抗日战争的形势交换看法。

1944 年末，抗日战争的形势好转。同时，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对邓宝珊这些年来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功劳予以很高评价。

——邓宝珊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949 年 1 月 13 日，邓宝珊代表傅作义，由"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主任周北峰陪同，冒着凛冽寒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

邓宝珊一行当天下午到达通县马各庄后，受到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参谋处处长苏静的热情接待。陶铸握着邓宝珊的手说："邓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合作得很愉快，相信这次我们会更好地合作下去。"

"我受傅先生之托，前来贵军商谈解决北平问题。傅先生已认识到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重要性，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好北平问题。"邓宝珊话语里透着信心。

1 月 15 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就傅军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华北剿总"的傅作义军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邮政、行政等单位的接收方法等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整理归纳出了十多项条款。

谈判很快进入尾声。这时，在解放军进城接管时间上，邓宝珊与共产党代表产生了分歧。林彪等人认为，接管时间应在三日以后开始，而邓宝珊则坚持至少应该给傅军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做准备。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不下。

最后，邓宝珊提议说："我们何不将不同意见报告毛泽东先生，由毛主席决定?"

15日当晚，毛泽东回电："尊重邓先生的意见。"

于是，意见很快一致，双方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上签了字。

《初步协议》签字后，邓宝珊决定第二天进城去见傅作义，向其说明双方达成的"初步协议"的内容和经过，如没有不同意见，双方再签订正式协议。

傅作义听完邓宝珊的介绍，没有表示异议。

1949年1月21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华北剿总"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在北平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22日，傅作义部队开出北平，到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当天，邓宝珊赴通县迎接解放军工作人员进城。接着成立了联合办事处，由叶剑英任主任。

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开国大典之后，邓宝珊得知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表现得并不怎么高兴。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不去当省政府主席，而是想到地方上去学习一段时间。

毛泽东看了邓宝珊的信，颇感意外，派人把邓宝珊接到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开玩笑地问道："邓主席，你怎么放着官不去当，而要去学习。我看你要学习是假，对共产党有意见是真啰。"

邓宝珊脸红了，马上解释说："主席误会了，我怎么会对共产党有意见呢！"

"不，你会有自己的想法，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邓宝珊见毛泽东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便道出了自己的顾虑。

原来，当时是彭德怀主持西北局的工作，邓宝珊与彭德怀两度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他担心这对他以后的工作会带来影响。

毛泽东听后，大笑起来："我说邓先生有自己的想法吧。彭德怀是个很好的同志，就是脾气不大好，待人过于严肃。这样吧……"毛泽东稍作思考，说，"为了以后的工作便利，是不是你先给彭德怀和习仲勋拟一份电报，由我替你发出去。"

邓宝珊听后，点头表示同意。他马上起草了一份言辞恳切的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以后你工作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向我反映，或者找周恩来总理。"

两天后，邓宝珊就收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复电，他们在电报中热情欢迎邓宝珊回甘肃工作。

邓宝珊原来的担心也就释然了。于是，他高高兴兴地乘上周恩来为他安排的专机，前往兰州上任。

三、张治中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褒扬道："他这个人一贯做好事"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张治中也应邀参加了这一对新中国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会议。会议期间，张治中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又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张治中曾是国民党的中枢人物，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和尊重，一夜之间成了新中国的座上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张治中是国民党军中从未参加过"剿共"内战的高级将领。

从1927年8月南昌起义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十年内战时期。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整整十年的生死搏斗。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数万、数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倚仗他们在数量上、装备上的优势，一次又一次地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血淋淋的军事"围剿"。国共双方的对立，简直如同水火、冰炭难以相容！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十年里，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却有人始终不愿意、也没有参加过"剿共"战争。此公便是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出身贫寒。六岁入私塾就学，13岁时，因赴省城报考秀才不中，萌发了从军报效国家的心愿。为此，曾两次离开家乡，在外流浪，到处打听有关军校招生的消息。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治中得知消息立即赶往上海加入学生军，准备参加北伐。不久，中华民国成立，学生军奉调去南京，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正式开始军事训练。终于成为军人的张治中极为兴奋，觉得“前头是一重一重的希望了”。

1912年，张治中随入伍生团进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他以顽强的毅力刻苦学习，取得了优异成绩。两年后，他又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校期间，他“专心致志地读书”，刻苦地学习，为他以后的军事指挥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16年12月，张治中从保定军校毕业，分配到驻安徽的北洋军阀倪嗣冲的安武军见习。这是一支腐败的军队，张治中心里很是厌恶。数月后，便寻机出走。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正在上海的张治中得知后，立即奔赴广州，投入护法运动，参加了征闽战役。继而先后在滇军、桂军、川军中任过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此间，他虽然也参加了一些战斗，经历了一些事变，但始终未逢际遇，没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

1922年10月，张治中再次入闽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之后，在虎门筹建成立了建国桂军军官学校，担任了大队长，负责训练教育任务。1924年底，张治中脱离桂军军校，进入黄埔军校，担任了第三期入伍生部总队的队副、代理总队长。而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则成了张治中的朋友。当时，学校内部国共两党常有矛盾斗争，身为国民党人的张治中却常常“站在中间偏左”，因而被右翼分子视为“红色教官”，将他与恽代英、高语罕、邓演达并称为“黄埔四凶”；甚至蒋介石也曾怀疑他是共产党。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张治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汉。11月，张治中调任学兵团团长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这时，蒋介石的个人野心已十分明显，国共两党的分裂已显露端倪。张治中对此焦虑不安，多次劝蒋介石“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可是蒋介石毫不理会。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张治中“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内心充满矛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

变。张治中尽管对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有所不满，但蒋介石对他的赏识、提拔、重用使他不忍背蒋，遂辞去在武汉的职务，去了上海，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8 月间，因大革命失败而心灰意冷的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了出洋考察的请求，意在避开国共两党的争端。临行前，张治中向蒋介石指出了他“过去种种的缺陷”，重申了自己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

1928 年夏，张治中游历回国，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蒋介石则处心积虑要通过军事“围剿”消灭红军。为避免与中共军队作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仍去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于当年秋去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了该校教育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在这里，张治中前后执教十年。期间虽曾五次统兵出征（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时，他以第五军军长兼第 87 师师长身份率兵抗击入侵上海的日军；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他任淞沪战区总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亲临前线部署对日作战；另三次是为蒋介石讨伐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并于 1935 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次年晋升为上将。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治中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他在湘积极备战，编组抗日民众自卫团。然而蒋介石指示对长沙实行焦土政策，致使长沙成为一片瓦砾。事后张治中代蒋介石受过而被革职留任。

1939 年 3 月，张治中担任了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利用职务之便，殚精竭虑为抗战的大业不断奔忙。1940 年 9 月，张治中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为该部副部长之一，郭沫若为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针对一些右翼分子排斥郭沫若等左翼人士的主张，张治中在政治部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他还严肃查处了四川綦江的“战干团事件”，惩办了迫害进步青年的反动分子，释放了被关押的青年学生，并下令撤销了“战干团”。此事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赞扬。1941 年 1 月，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张治中向蒋介石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之失策，恳切建议蒋介石“为了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与共产党谈判解决

事态。

——张治中为和平奔走，曾三次到延安。

第一次到延安是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于 8 月 14 日、20 日和 23 日，连发三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请他来重庆商谈和平建国的有关事宜，并决定让张治中出面，去延安接毛泽东来重庆。8 月 27 日，张治中衔命到达延安。

进入延安解放区的张治中，看到解放区内欣欣向荣的景象、共产党军队蓬勃振奋的精神面貌、老百姓对共产党和自己领袖毛泽东的真心拥戴、中共领导人俭朴清贫的生活，心中顿生感慨。尤其机场上延安军民自发为毛泽东送行的场面和对毛泽东的那种关注依恋神情，使张治中大为意外，先前头脑中的一些疑问不由得渐渐消失。他深深感到在毛泽东身上和身后都存在着一种有形和无形的巨大能量。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好，自古以来能得民心者皆圣贤，毛泽东的确非等闲之人。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毛泽东和张治中——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和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终于有了面对面交谈的机会，两人交往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页由此揭开。

8 月 28 日下午，重庆九龙坡机场人头攒动。得知毛泽东将抵重庆，在渝的中外记者、社会贤达、各界要人及民主人士，于机场候机大厅恭候迎接。毛泽东为国家民族利益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义凛然飞抵重庆的行动，使希望和平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

3 点 40 分左右，毛泽东乘坐的军用飞机缓缓降落在九龙坡机场，他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机舱的门口，面对欢迎的人们，摘下头上的礼帽挥动致意。待张治中走下飞机时，几乎与在延安看到的情形一样，机场上同样是人山人海。他原以为会是很冷清的，因为蒋介石下令，接毛泽东时不要喊口号、不要献鲜花、不要设仪仗队。而现在，机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反对内战，民主建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毛泽东手接、头戴、身披、脖子挂的都是花，简直被花包围了，山城人民对毛泽东也如此厚爱。他这位多次陪蒋介石外出的人，还没有在国统区见到过这样的情景。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多天里，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之一，多次陪同毛泽东参加各种活动，也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就和谈

问题进行磋商。在不断的接触过程中，毛泽东对张治中开始有所了解，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印象也不断加深。

与蒋介石就争取国内和平进行谈判，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行前，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前提及这次和谈的基本点，对此，国民党方面也不能不表示赞同。9 月 3 日，中共又提出一份详细的、包括 11 项内容的“谈判要点”，强调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各党派平等合作、共同建国。然而，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他在 9 月 4 日拟定的《对中共和谈要点》中，充分表露了这一点。针对这一企图，毛泽东表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与此同时，为了争取“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中共也决定做出适当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这种有理有节的态度，使在渝各界人士觉得中共方面对和谈是确有诚意的。

身为国民党谈判代表的张治中，在谈判中却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在国民党内，他一贯主张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此次国共两党最高领袖的会谈能够实现，他做了许多努力，并亲去延安接来了毛泽东。所以，他希望和谈能取得成功。可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在谈判中他又不可能不竭力贯彻蒋介石的意图，努力说服中共方面按蒋介石的意思改编军队、放弃解放区。而这一点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为此，他不得不绞尽脑汁、费尽口舌与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却总是被中共代表义正词严的反驳弄得无话可答。这使他在整个谈判期间常常绕室彷徨、寝食不安、苦思冥想、摇头长叹。不过，为了避免内战的爆发，为了实现自己一贯倡导的和平主张，他还是竭尽心智，努力地调解、从中斡旋，力图使每每陷入僵局的谈判，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第二次去延安是 1945 年 10 月 11 日。这一天，张治中陪同完成了和谈任务的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

在延安机场，毛泽东向前来欢迎的党政军民简要介绍了重庆谈判的情况，并特别向大家介绍了张治中，对张治中前次来延安接他去重庆、此次又专程送他返回延安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请张治中对延安军民发表讲话。顿时，两万多群众热烈鼓掌，向张治中表示欢迎和感谢。盛情难却的张治中面

对着无数双充满诚意的眼睛激动地说，能够两到延安迎送毛先生，实在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当天晚上，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晚宴，答谢张治中在重庆期间的盛情接待和对他再到延安表示欢迎。朱德总司令致了欢迎词，延安的党政军各界人士都出席了宴会，宾主双方共祝和平早日实现，国家早日富强。

第二天，当张治中要乘机返回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又亲往机场送行。张治中感激地推辞："毛先生诸事待理，就不劳远送了。"毛泽东却说："那怎么能行？你千里迢迢飞来接我，又再送我回来。现在你走我不送你，那岂不很对不起朋友吗？共产党也是很讲友情的哩。"见此情景，张治中便不再推辞了。

吉普车在黄土路上奔驰着，张治中不时向两边眺望。收获的田野里，没有运走的庄稼一捆捆堆放在地头；成群的羊儿在路边漫步；看到汽车过来，放羊娃高兴地摇手致意。解放区里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发达的景象，深深铭刻在张治中脑海里。

快到机场时，张治中问："不知润之先生还有什么想法需要我向蒋委员长转达？"毛泽东答道："此次谈判，有关解放区和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达成最后的协议，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共商解决，以便政协会议能及早顺利开幕。这一点，请你向蒋委员长说明。"张治中听了点头答应说："人民经受了八年的战乱，好不容易盼来了胜利，应该让他们过上安宁的日子了。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使协议的内容都得到落实，遗留的问题早日解决，以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毛泽东听了，用赞许的眼光看着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的行动已经作了证明。"停了一下，毛泽东又以幽默的口气说："要是你们的委员长也像你一样有诚意就好了。"

第三次到延安是1946年3月4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经谈判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根据"双十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会议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为执行这一决议案第三部分《关于军事问题者》，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方代表张治中、美方代表马歇尔三人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并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共同商谈关于解决军队整编问题。这样，张治中又一次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代表坐到一张桌子上进行谈判。

3月4日，三人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当张治中一行走下飞机时，早已等候在此的中共领导毛泽东等大步迎上前去。毛泽东用力握住张治中的手，亲切地说："欢迎你啊，老朋友！"张治中也高兴地说："很高兴又见到您，毛先生。"

当晚，中共中央举行了欢迎晚会。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对马歇尔、张治中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阐述了中共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张治中也在会上发了言，他强调了整军方案的重要性，希望国共双方都能百分之百地执行，彼此携手努力，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在结束讲话前，张治中以爽朗乐观的语调风趣地说："我已是第三次来延安了。第一次是去年8月陪赫尔利先生来接毛先生去重庆谈判；第二次是10月份签订了'双十协定'后送毛先生回延安；这次是为了贯彻整军方案来的。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啊！"

——张治中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949年9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解放大西北已提上日程。如何才能在战争中尽量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毛泽东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和他商谈怎样促使新疆的和平解放。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今天请你来，是和你商量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你当过新疆的主席，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给陶峙岳去个电报，让他们不要再和解放军动刀动枪了，学学傅作义和程潜，走和平起义的路，你看行不行啊？"

毛泽东的信任，使张治中很感动，可是一想到自己现在的情况，他没有把握地说："我当然非常愿意尽力。只是，我现在已经脱离那边了，他们未必听我的了。"

"哪里哪里，你这个'主席'还是很有影响的哩！据我们从新疆得到的消息，陶峙岳将军说，只要你出面发个电报，表个态，他们服从就是了！"

听毛泽东这样说，张治中不再犹豫："促使新疆和平解放，我也早有此意，现在毛先生也这样考虑，实在是太好了。不过从5月以后，我和陶峙岳他们就断了联系，不知道怎样才能和他们联系上？"

"这个问题好办，我们在伊宁已经建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到迪化去，我可以先和伊宁的同志打个招呼。"

“那太好了，我立即就去办。”

“不忙不忙，你先考虑一下，话怎样说才合适，要尽量办得稳妥一点。”

9月10日，张治中给陶峙岳发出一封电报说：“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电报发出后，张治中思前想后，考虑了陶峙岳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又于11日再发一电，就许多具体问题一一详细说明交代，要陶峙岳对那些心存疑虑的人“予以开导”，说明中共的有关政策，“以祛其疑惧之心”；对那些“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偾事”。并从军事上进行了相应部署，连军粮、冬服、饷项经费等事都做了详细布置。这两封电报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陶峙岳在电报中还希望张治中能“早日莅临领导”。接到电报，张治中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陶峙岳等人深明大义的决定甚为嘉许，张治中也复电称赞了陶峙岳的“态度正确，措置适当”，并要陶峙岳“不应再有所犹豫顾虑”，“即派员与彭德怀司令员接洽联系”。

9月25日，陶峙岳领衔致电毛泽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表示：新疆“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派人请来张治中，给他看了陶峙岳等人的起义通电，并用赞许的口吻对张治中说：“这件事情，你办得很好啊！”张治中心里十分愉快：不仅妥善完成了毛泽东交给自己的任务，而且也使自己多年来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如愿以偿了。见毛泽东称赞自己，他不由得谦虚地说：“这是大势所趋，不是我的功劳！也是因为大家都向往和平，才决心起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继续为新疆和国家的和平建设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

四、程潜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主席。游览中南海时，毛泽东亲自为这位“老上司”划船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会上，程潜当选为政协委员。不久，程潜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湖南省主席。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程潜与陈明仁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庆祝新中国的成立。

解放后，中共中央为程潜在北京和长沙准备了房子，让他两地随意居住。实行工资制后，程潜的工资定为三级，政府每年还发给他特别费5000元。

程潜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后回到长沙。11月26日，他在湖南省政府大礼堂谈到北平之行的感受时说：“我这次在人民政协会上受到很好的教育，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很大的鼓舞。毛主席和大家都赞扬湖南起义的功劳和起义的光荣，我个人只是惭愧。我有什么功劳，哪敢接受光荣二字。湖南人民一致要求和平，一致要求起义，要说起义光荣，那也是人民的光荣。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尽一切努力来实现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以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湖南。”

1952年秋天，毛泽东特意邀请到北京开会的程潜来家里吃饭。吃过饭，毛泽东说出去走走，两人边说边聊，来到了中南海边。这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中南海碧波荡漾，毛泽东对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点头笑着说：“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看到湖边泊着一条小船，便提议说：“我们划划船吧。”说着登上了泊在岸边的小木船。

两人在船上坐稳后，毛泽东操起桨，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国家主席，又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啰。何况你已是古稀之年，总不能让你划桨啊！还是客随主便吧。”说着，毛泽东操起桨划起来，小船悠然向湖心驶去。

自1954年起，程潜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称省长），达14年之久，是湖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省长。从1954年起，他任全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达12年。从1956年起，他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达12年。从1958年开始，他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达十年。作为资深国民党党员的程潜，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呢？这是有其原因的。

——毛泽东曾是程潜麾下的普通一兵。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少时聪颖，就学于晚清名儒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先生，曾考取秀才。青年时，目睹朝廷之腐败，愤于列强之欺侮，遂弃文习武，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考取湖南武备学堂，从此踏上军旅之途。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了大规模新军起义，枪声、炮声震撼着武汉三镇。翌日，一面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在武昌黄鹤楼警钟顶端高扬招展。“武昌为革命党人占领”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的古老中国，犹如遍地干柴。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了点燃这干柴的星星之火，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焰很快燃遍神州大地。然而，顽固的清朝统治者并不甘心灭亡，妄图倚仗手中的军队进行最后的挣扎，下令北洋大臣袁世凯迅速派兵南下镇压。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血与火搏斗在武汉三镇激烈展开了。

此时的程潜已于三年前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了四川新军第17镇（师）正参谋官。他奉统制朱庆澜之命，赴京参加永平秋操大典（军事演习）。行至天津时，得知武昌爆发起义，不由得热血沸腾。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的交往，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谆谆教诲等情景一一浮现在眼前。他觉得，实现理想、施展抱负的机会到来了。遂即折转南下，赶赴武汉投身革命，于11月7日抵达武昌。

得知程潜到达武昌的消息，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不由得大喜。当时，清军已夺占汉口，黄兴正在积极部署收复汉口的战斗，急需军事人才。程潜即被派往龟山炮兵阵地担任指挥，协助掩护起义部队向汉口的进攻。

由于兵力过分悬殊和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一，收复汉口的战斗失利了。不久，汉阳也被清军攻占。按黄兴之嘱，程潜回到湖南发展革命力量。1912年前后，他先后担任了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等职。程潜当时

绝没想到，在他属下的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中，有个名叫毛泽东的普通士兵，日后会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

当时，毛泽东风华正茂。在军营里，每日参加课操训练，学会了军人的基本动作要领。半年后，当南北议和实现统一时，毛泽东认为革命结束了，便退出新军继续求学去。尽管在当兵期间程潜并非毛泽东的直接上司，但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对程潜十分尊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可见，这半年的当兵生涯，令毛泽东十分难忘。

——程潜坚决拥护孙中山确立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方针。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于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立了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和程潜都出席了这次大会。不同的是，毛泽东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席的，而程潜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席的。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有过发言。这位个子高高、目光炯炯、思想敏锐、举止沉稳的青年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格外注意。程潜的目光也被这位"小同乡"吸引住了。他感到，这位青年人绝非等闲之辈。毛泽东也非常敬重这位志向高远的"老上司"。

程潜坚决拥护孙中山确立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方针，竭诚协助孙中山，深得孙中山器重。程潜从自己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经历中感到，要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非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不可。他于会后向孙中山提出开办军校的建议，在孙中山的批准下，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开办，程潜兼任校长。由于程潜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声望，以及他在湖南讨袁护法斗争中的英勇经历，使他在故乡名噪一时。此次大会上的中共代表中又恰有许多湘籍人士，除毛泽东外，还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等。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就中国的革命、湖南的发展侃侃而谈。因而，这次大会不仅成了程潜与共产党合作的开端，也是程潜与毛泽东相识的起点。后来北伐时，林伯渠一直在程潜的第六军中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两人之间建立了默契的合作关系，彼此还成了亲家。尽管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关系破裂，程潜一度在湖南也实行过反动的反共政策，造成了他终生的遗憾。但是，在国民党内

的派系斗争中，程潜很快失势闲居。这使他与那些多次带兵“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将领相比，手上要干净多了。

——程潜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回湘主政，倡导和平。

1945年8月，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这样，毛泽东与程潜又一次相遇了。8月28日，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重庆各界民主人士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程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深知蒋介石为人的程潜，对于毛泽东飞抵重庆的行为，感到由衷的钦佩。走下飞机的毛泽东微笑着与各界人士一一握手，对大家不顾炎热亲临机场迎接表示感谢。毛泽东握住程潜的手，含笑说道：“颂公，我们又见面了。”这时，程潜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他注视着毛泽东坚毅的脸庞，内心感慨万千，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眼前这位毛润之先生，已远非当年可同日而语了。如今，他已是叱咤风云、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代英杰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上清寺桂园，每日的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张。一天晚上，程潜单独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老上司”，两人在桂园客厅的沙发上相对而坐，就形势的发展、和谈的前景、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等各方面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程潜深知蒋介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禀性，对能否真正实现国内和平颇为担忧。毛泽东风趣地说，国共两党的谈判犹如两人在谈恋爱，现在中共一方已经表现出很大的诚意了，就要看国民党的了；只要国共双方都拿出诚意来，谈判成功是有把握的。毛泽东的话，给了程潜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两人谈至夜深兴尽，方握手告别。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到程府回访。程潜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自登门，颇有点诚惶诚恐。他一面亲自沏茶招待，一面连声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您现在是共产党的主席了，怎么能劳您的大驾！”毛泽东听了，戏谑地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再说，您还是我的老上级嘛！”

这一天晚上，两人又一次愉快地促膝长谈，从悠悠往事到这次重逢，从国际形势到国内政局，彼此各抒己见，直陈胸臆，乡音依依，话语滔滔。两次秋夜长谈，使程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也随之而增。重庆的秋夜依然暑气袭人，可是程潜的心里，仿佛有

一道清泉流过，备感凉爽舒适。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对程潜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还对程潜寄予殷切的厚望。交谈快结束时，他语重心长地对程潜说："颂公，您是国民党内资深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嘛！"

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来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不成，他如毛泽东所说，回湘主政，倡导和平，最终领衔起义。追根溯源，这一壮举的最早萌芽是山城之夜毛泽东与他的倾心长谈。

——程潜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湖南地下党组织与程潜接触，劝其起义。经过多方工作，程潜毅然脱离广州政府，倒向人民一边。1949 年 8 月 3 日，程潜起草了给毛泽东、朱德和四野林彪、邓子恢的电报：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邓政委：

潜等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日来说服各部队长，默察军心，知骤予转变，殊非易事，必须略俟时日，乃可潜移默化。此时配合行动，在如何争取军心，如何安定军心，敬拟权宜之计，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其原第一兵团暂改称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临时军政委员会为空洞名义，不设机关，亦无职权可行使，仅有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由委员会推定，派出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多则一月，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潜与子良兄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绝不阻碍接管最关紧要之军事行动。至于上项权宜设置，为时甚暂，但期减少刺激，安定湘境军政干部心情，并进图争西南各省。对于改革大计，实无阻碍。管见所及，提请鉴谅之。希俱赐同意，毋任感祷，并明复电。

程　潜

8 月 3 日，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通过地下党转告程潜、陈明仁，请派

一名得力干部，前来协商解放军入城事宜。陈明仁令参谋主任郑克林、参谋处长罗文浪与湖南省工委派来的联络员欧阳方前往解放军驻地，见到了四野和谈代表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等人。罗文浪对解放军代表说："程、陈两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毅然脱离国民党，率军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特派我们前来接洽。"说完将长沙附近的驻军地图交给了解沛然。罗文浪指着地图对解沛然说："关于驻军问题，行前我们开了个会，陈司令指示兵团主力驻河西，是避免接管长沙市时发生冲突，请贵方酌定。"

入夜，双方就接管长沙市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第二天下午，由程潜、陈明仁领衔，二十多名湖南国民党军政要员在《起义通电》上签字。通电说：

> 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致主义不行，外患踵至。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生养休息，和平建国。讵料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独裁、官僚资本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当即，毛泽东、朱德也致电程潜，对他所提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对他与陈明仁的起义表示祝贺。电文如下：

颂云先生勋鉴：

> 未江电敬悉。为对抗广州政府，为维持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多方，为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

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即可施行。省政府之移交，亦可嗣后进行。弟等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钦。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

解放后，程潜担任多项职务，均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在省长的位置上，不顾年老体弱，经常到各地检查工作，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为湖南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陈明仁就任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毛泽东和陈明仁游天坛后对他说：我们两人的合照，你要洗50打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陈明仁出席了这次会议。11月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辖52军、53军），由陈明仁任司令员。尔后，陈明仁又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

陈明仁在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一大早来到程潜、陈明仁等人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们。与毛泽东同来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领导同志。大家在十分亲切融洽的气氛中畅游了天坛。当走到祈年殿前时，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陈明仁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陈毅反应快，立即推了陈明仁一把，说：“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啦！”陈毅边说边把

陈明仁推到了毛主席的身边。陈明仁很恭敬地站在毛主席右边，照了张双人半身相。照完相，毛泽东对陈明仁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解释一下，写些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促使他们早日觉醒，及早过来。"

陈明仁立正，满口答应："是，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又说："你还可以把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的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好吗？"

"好。"陈明仁应道。

"你打算洗多少张呢？"毛泽东问。

"我打算洗 10 打，120 张。"陈明仁回答。

"不够，不够，至少要洗 50 打。"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得大笑起来。接着毛泽东又更贴近陈明仁说："子良将军，我们的新政协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陈明仁非常感动，主动向毛泽东检讨说："起义前由于认识不足，蒋介石和李宗仁派黄杰、邓文仪到长沙时，有人劝我把他们扣起来，我不仅没扣，还把已扣起来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健钧也放走了，错过了机会。"

"你没有错，不要扣，革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派飞机接，凡是愿意走的，我们派飞机送，你那种搞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讲闲话。"毛泽东劝慰道。

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安排好陈明仁的工作，曾两次找陈明仁商量。第一次，毛泽东亲切地对陈明仁说："你顺利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并问他："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一笔特支费，由你全权开支。"

"报告主席，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不过，我那个部队还是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陈明仁耿直地回答。

"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一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 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你有什么条件吗？

"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地服了共产党，我一点条件也没有。"

"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哟！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陈明仁时，陈明仁提出了条件，要求参加作战，为共和国立战功。毛泽东笑着对陈明仁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然多。作了整训后，如有机会，上前线打仗是很好的。"

9月23日晚，毛泽东、朱德又专门设宴款待陈明仁等26名从国民党营垒中回到人民阵营中的将领。这使陈明仁深为感动。

陈明仁，作为国民党嫡系部队的高级将领，并在抗击解放军、死守四平一月、为蒋介石立下了赫赫战功的爱将，为什么受到共产党的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和程潜一样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明仁，字子良，1903年4月7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洪源乡陈家岭的一个农民家庭，正好与程潜是同县老乡。陈明仁成人之时，正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合作时期。当时受大革命的影响，旧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都以军事报国为己任。1924年春，陈明仁告别家乡父老，只身前往广州，准备报考大元帅府陆军讲武学校。陈明仁到达该校时，已过了报名时间，后在校长程潜的关照下，学校破例将他收下。9月，因前方战事需要，陆军讲武学校仅有的四个队中，第三、第四队提前毕业随校长上前线，第一、第二队与黄埔军官学校合并。后又传不合并，陈明仁等12名学员代表学生去黄埔军校询问校长蒋介石。

陈明仁等回到学校后即被校方开除，陈明仁愤然离校而去。蒋介石见陈明仁颇有军人的气概，于是暗中派人将陈明仁接到黄埔军校，编入黄埔一期第六队。由此，陈明仁对蒋介石产生感恩之情，后来发展成为誓死效忠蒋校长的封建愚忠情感。

1924年冬，陈明仁从黄埔军校毕业。在蒋介石关照下，在蒋系将领的互相倾轧之中，经二十多年的苦苦征战，到1949年，陈明仁官至华中"剿总"副总司令，衔至中将。陈明仁是蒋介石的嫡系，自然为蒋介石打内战、消除异己出过死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原大战战场、鄂豫皖苏

区、中央苏区和福建事变的中心福州，都留下了他为蒋介石卖命的肮脏的足迹。好在抗战期间，陈明仁不愧是一名爱国的军人，率部参加了九江、桂南会战和著名的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作战，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战功。全国内战爆发后，陈明仁率第 71 军开赴东北前线，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特别是 1947 年陈明仁曾在四平以少量兵力固守月余，顽强保住了国民党军在辽北的唯一战略据点，为国民党立了大功，蒋介石为此提升他为第七兵团司令，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但事后因国民党将领内部争斗，这位“功臣”很快就被解职。此事对陈明仁打击很大，他对蒋介石的忠心开始大打折扣。蒋介石在遭受三大决战失败的打击之后，又重新考虑使用陈明仁这位爱将，胡宗南、白崇禧等也纷纷从前线来电要蒋介石起用陈明仁。陈明仁认为，几十年来我陈明仁都遭别人算计，这次我也来算计算计。经反复考虑，他认为到华中可以利用蒋桂间的矛盾，为自己谋发展，便接受白崇禧的邀请，出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后又兼第 29 军军长。

陈明仁到汉口上任不久，程潜托人来汉口做白崇禧的工作，想请陈明仁带部队驻守长沙。白崇禧表示同意，于是陈明仁带着“守卫长沙”的任务，率部来到长沙。

陈明仁到长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程潜。程潜见到昔日的学生，非常高兴，设宴招待他。酒席上，师生举杯把盏，各诉忠肠。陈明仁掏出了蒋介石给他下的手令，交给了程潜。程潜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秘密监视程颂公，必要时可行兵谏。”

看着这张字条，程潜苦笑着问道：“子良，你打算怎么办?”

陈明仁哈哈一笑，说道：“颂公放心，我陈明仁绝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我是您的学生，一切听您的。”

吃过饭，程潜把陈明仁引进密室，对他说：“子良，我已想了好久，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的道路，你看怎么样?”

此时的陈明仁，对共产党心存怀疑，但他看到大势所趋，国民党垮台只是迟早的问题，便点了点头。不过，他还是留了一手：“这件事，我只和颂公您保持联络，不与任何第三者发生关系。”

陈明仁回到湖南后不久，在四平之战中被东北野战军俘虏的胞弟陈明信来到了长沙。陈明仁见到胞弟，十分惊异，详细询问了陈明信被俘的情况。

陈明仁见解放军不记前仇，未因自己而杀胞弟，深为感动。

这天晚餐，陈明仁陪着陈明信喝了不少酒。酒后难眠，他想到了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前途未卜，想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不公正待遇和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

陈明仁决定和程潜一道，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到了1949年8月1日，经过数月紧张筹划的湖南和平解放事业，终于拉开了帷幕。这一天，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3日，程潜就稳定湖南局势致电毛泽东及四野领导，提出若干建议，并且表示“潜与子良兄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毛泽东于5日收到程潜的电报后即回电肯定说，程潜所提的建议“均属必要”，“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的事，均可商量办理”。毛泽东还赞扬程潜的通电是“大义昭著”。

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共同领衔正式发表和平起义通电，宣布湖南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协定，“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解放军为伍”，“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8月5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了古城长沙，三湘大地终于避免了一场血与火的浸洗，毛泽东、程潜和陈明仁共同为桑梓父老办了一件大好事！

8月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华中局和湖南省委：“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程潜的临时机构，不久很快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同一天，解放军和起义部队双方代表举行会议商定，成立湖南省政府，陈明仁任主席，袁任远任副主席；成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李明灏任秘书长。

8月16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程潜、陈明仁及全体起义将士，对他们

的义举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电文说：“……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程潜和陈明仁接电后，即复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潜等责无旁贷，遵命竭力以赴”。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直接过问下，作为曾为蒋介石出过死力的陈明仁将军，终于在人生历程的十字路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49 年 10 月 25 日，陈明仁以“北京归来”为题，向《新湖南报》记者发表了赴京开会及谒见毛主席的观感。

回到湖南后，陈明仁投入了紧张的部队整训工作。

11 月 1 日，陈明仁所部七万余人整编为两个军六个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 兵团。1950 年 2 月初，陈明仁率兵团司令部从浏阳移驻醴陵，所辖 52 军移驻攸县，53 军移驻安仁整训。12 月中旬，奉中南军区命令，率部进驻桂南，担负小瑶山及周围的四十八弄、同正、隆安、百色等地的剿匪任务，经过五个月的战争，共歼灭土匪三万多人。

1952 年 1 月，21 兵团司令部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所部投入了荆江分洪的建设。同年 10 月，由 48 军军部改编的 55 兵团司令部，又改为第 55 军，陈明仁任军长。不久，他率部开赴广东湛江，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的任务。

1955 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一级解放勋章。

六、陶峙岳被任命为解放军第 22 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王震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

1949 年底，新疆军区正式成立，中央军委下达了任命：彭德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兼任司令员；王震、陶峙岳和三区民族军首领赛福鼎均担任副司令员。陶峙岳还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原新疆起义部队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2 兵团，陶峙岳担任兵团司令员，后来又兼任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1950年，陶峙岳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回来后，他充满激情地对王震说："看到主席台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党的领袖，非常激动。这些党的高级领导人，那么朴实谦虚、平易近人，这些在国民党中是不可想象的。会上，我把每一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一字一句都记下来，回来后，我要好好学习消化，认真传达执行。"

陶峙岳，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因何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呢？

——陶峙岳一贯痛恨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

陶峙岳，湖南宁乡人，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陶峙岳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屡立战功，被提拔为少将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陶峙岳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对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围剿"十分反感。对于陶峙岳，蒋介石一直是不信任的。陶峙岳所领导的部队被称为杂牌军，常常受到正规军的排斥，他只好忍气吞声。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峙岳率部赴上海参战，他指挥的第八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日本鬼子苦苦鏖战，打到后来，一万余名官兵仅存七百余人，但阵地依然坚如磐石。虽然战功卓著，但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陶峙岳屡屡遭到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排挤。淞沪战役后，胡宗南将其明升暗降，让他当了有名无实的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实质上夺去了他的兵权。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陶峙岳到重庆开会，与张治中相遇，经过几次接触，两人相见恨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5年，张治中到新疆解决三区起义问题，住在陶峙岳处，老友重逢，分外高兴。经过与张治中的彻夜长谈，陶峙岳对张治中有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深为赞许，也帮他想了一些好办法。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特邀陶峙岳和他一起入疆，担任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欣然应允。陶峙岳到新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张治中的嘱托，将一百多名被盛世才关押的红军战士和共产党员释放出狱，并派出汽车，将他们送到延安。为这事，曾有人对陶峙岳说，释放共产党还是谨慎为好。陶峙岳果决地回答说："一切应该以大局为重。张治中将军托我办的事情，我一定要尽力为之，出了问题由我负全责。"

1948年8月，新疆局势再度陷入分裂，社会动荡不安，张治中委任陶

峙岳为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希望他能为扭转新疆的局势作出努力。陶峙岳上任后，按照张治中制定的和平政策办事，力避民族矛盾发生，较为妥善地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得到了张治中的赞赏。

陶峙岳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深恶痛绝，对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挑起内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所以，年初当他听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内战并没有结束的迹象，他又由高兴转为失望。内战，他实在不想再往下打了。所以，陶峙岳决定，扣下李宗仁的电报，不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部队绝不内调，他也不去南京。

——陶峙岳力主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1949 年 4 月 20 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决意走上了战争的绝路。身在新疆的陶峙岳，听到这个消息，对国民党彻底地失望了。

面对这种形势，新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已明显地分成两派。

以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反对与解放军做无谓的抵抗。

另一派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为首，则主张内战到底，与国民党共存亡。

马呈祥是国民党骑五军军长，此人是马步芳的外甥，系青海马家军的地方封建势力。马是个孝子，他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都留在青海老家，因而他一直企图率部打回去，与父母家人团聚。叶成是国民党整编第 78 师师长，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侍卫大队长，为胡宗南的亲信。三人中，他的兵力最强，部队装备最好。但此人十分惧内，没有什么主见，大小事情都由老婆做主，而老婆又是一个见钱眼开的爱财鬼，她一直希望能够回到内地，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所以极力主张丈夫打回内地去。罗恕人为第 179 旅旅长、黄埔三期的学生、胡宗南的心腹，也是有名的反共顽固分子，因反共有功，曾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反共态度坚决，而在驻新疆的部队中，差不多有半数人马控制在这几个人之手。所以，他们的动向如何，对新疆的局势影响很大。

为了说服主战派，统一部队思想，陶峙岳曾经召集师、旅长会议，替他

们分析当前形势，说明与解放军为敌的危险性，希望能够以大局为重，为新疆人民和士兵们的生死着想，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但是没有成功。会上，两派人马吵得很厉害。马、叶、罗几个人趾高气扬，气焰十分嚣张，一致表示要将队伍调往内地，与共产党血战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1949 年 9 月 20 日深夜，陶峙岳已经上床就寝，忽然传来“笃、笃”的敲门声。原来，叶成在副官的引导下，来到卧室外的客厅，叩门求见。陶峙岳披衣下床。客厅里，陶峙岳见叶成一身戎装，腰挎手枪，面露凶光，便问他道：“叶师长，深更半夜来访，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叶成粗声粗气地说道：“报告陶司令，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投降分子所包围。为了‘清君侧’，我们决定今晚把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扣押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想这事应该提前告诉你，他们表示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

“什么‘清君侧’？”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陶峙岳吃惊不小，但很快镇定下来。他一面把叶成留住，一面给罗恕人和马呈祥打电话，要他们务必来一趟。不一会儿，马呈祥、罗恕人二人来到了陶峙岳的住所。

陶峙岳一见他们，便问：“你们今晚要捕人，想到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们把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就可以带着队伍进关了？新疆情形特殊，枪声一响，你们能保证地方不致混乱？能保证队伍跟着你们走？”

陶峙岳语气威严，晓以利害，叶成等三人听了后，相顾无言。沉默了很久，罗恕人才嗫嚅地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却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每讲不过你，你要我们怎么办……”

“如果只知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该让我为你们考虑问题。如果你们认为我考虑的问题有什么不妥，可以直接向我提出，绝不能采取今天这种做法。”

陶峙岳严厉的语气，开始变得有些温和。三人又是一阵沉默。他们知道，陶峙岳在部队中有极高的威信，如果一意孤行，得不到陶的支持，事情肯定会失败。正是基于此，三人才决定要叶成先向陶峙岳报告。现在，陶峙岳态度坚决，他们也觉得不好办了。

过了好一会儿，罗恕人忍不住问：“那好，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陶峙岳见空气缓和下来，便放缓了语气：“全国战场的形势，你们知道

得很清楚，国民政府已失去了大半个中国。整个大西北，眼下只剩下新疆像一座孤岛浮悬塞外。目前，部队装备不足，军心涣散。从新疆到内地，纵横数千里，戈壁茫茫，大军开拔，谈何容易？队伍如果强行内调，出不了新疆，就会自行垮掉。即使能够走出新疆，也绝对出不了甘肃，彭德怀的部队在酒泉一线正张网以待，部队内调，无异于自投罗网。你们要杀身成仁，我不反对，难道还要那些无辜的士兵为你们垫背吗！你们说我被投降分子包围，可脑袋长在我自己身上，我是总司令，我要对国家做出交代，为全体官兵负责。今天，我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绝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共生存。我要尽到这样的责任，万死不辞！”说到激动处，陶峙岳站了起来。

听着陶峙岳的训斥，三人渐渐地低下了头。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告诉任何人，你们先回去想一想，如果还想不通，我们再谈。怎么样？”

三人自知理亏，点点头，退了出去。

——陶峙岳被毛泽东称赞为国民党的民主派。

1949 年 9 月的一天上午，彭德怀和王震乘坐专机由兰州直飞北平。一下飞机，两人来不及洗去路上的风尘，也来不及观赏北平城内的繁华热闹，便兴致勃勃地走进了中南海。

彭德怀、王震一落座，毛泽东就对他们说：“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主要是谈谈新疆问题。最近，陶峙岳，还有包尔汉，他们的动静如何？你们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如何解决新疆问题，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高见。”

“陶峙岳出于对蒋介石的不满，对南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软磨硬拖，一再违抗命令，拒不出兵关内与我军作战。据情报部门报告，最近陶峙岳曾到焉耆，与驻守南疆的 42 师师长赵锡光进行过密谈，有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意向。”王震腰板笔直地坐在沙发上，向毛泽东报告了他最近得到的消息。

彭德怀补充说：“我军向河西挺进时，陶峙岳曾派他手下的曾震五专程到兰州，与我接洽有关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事宜，看来陶峙岳是很有诚意的。”

毛泽东仔细听着王震与彭德怀的介绍，然后说：“陶峙岳我了解，此公

18岁即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在黎元洪的都督府任警卫，他一直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说起来，应该算是国民党的民主派了。”

毛泽东略带赞赏的短短几句话，高度概括了陶峙岳的前半生。

“陶峙岳很能打仗，有政治头脑，很爱国。”彭德怀接着毛泽东的话说道。

听完彭德怀、王震的介绍，毛泽东抽着烟，陷入了沉思之中。一会儿，他抬起头说：“只要我们工作得当，看来，新疆和平解放是完全有可能的。”

9月23日，胡宗南在成都分别向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发来了机密电令。

马军长、叶师长、罗旅长：

据悉陶峙岳暗中通敌，图谋不轨。特命兄等立即行动，果断处置。而后将军队拉到南疆，建立反共复国基地，我将空投支援你们。兄等须充满信心，等待时机，一俟美国参战，局势将发生急剧变化，彼时兄等将以党国功臣名列青史。

胡宗南

叶成等人去意已定，没有理会胡宗南的命令。

9月24日，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携带八百多两黄金和其他财物，乘汽车离开迪化向南疆进发，他们准备由南疆转道印度去香港。为了路途安全，陶峙岳派了一个加强排，乘卡车架着机枪护送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出境。

马、叶、罗走后，新疆反对和平的势力已基本清除，举行起义的时机也完全成熟。当天下午，陶峙岳找包尔汉商量起义的问题，9月25日、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联名给毛泽东和朱德发出起义通电。

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回电嘉勉陶峙岳、包尔汉：

你们在9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

> 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从此，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1970 年，年近八十岁的陶峙岳辞去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职务，回到阔别多年的湖南。

1979 年，陶峙岳当选为湖南人大副主任。

1982 年 5 月，90 岁高龄的陶峙岳再次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入党申请书上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于人类社会事业的实践。"几个月后，中共中央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第四章　老当益壮　身居要职

聚焦时间：1949 年 10 月

聚焦地点：北京

聚焦人物：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

聚焦话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四位革命耆宿就任共和国要职。他们还要在新中国舞台上继续描绘那一片绚丽的晚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中国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有一大批老当益壮、为国驱驰的高龄革命家，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就是其典型代表。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四老”以他们坚定的革命立场、丰富的斗争经验、勤谨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无比崇敬。

一、林伯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他的座右铭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到会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代表共六百多人。30 日下午，大会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军乐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下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全军迅速解放全国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林伯渠站在毛泽东身旁，心情非常激动。他从参加同盟会至今，度过了44个春秋，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为中国的民主、独立奋斗着。今天，新中国终于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来得多么不易啊！望着迎风飘舞的五星红旗，他知道夺取政权是艰难的，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更为艰难。他观看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直到晚8时30分才离开天安门，去参加九时举行的欢迎苏联代表团的宴会。

林伯渠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时候，已经是63岁的高龄。在当时，只有他最适合担当这项工作。为什么呢？

——林伯渠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处理全面工作的能力。

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是抗战时期，林伯渠都严格遵循当时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工作，并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延安时期，他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伟大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早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做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确定1931年临时中央成立后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以兴奋的心情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

意义。1936年9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林伯渠还借用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做比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说：汉学只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烦琐哲学；宋学则忽视实际调查，成了空想主义。他还做自我批评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

9月会议上，中央决定编辑印刷《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所以，从这时开始，在延安的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整风学习。1941年，林伯渠结合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六大以来的党内文件，写了长达5000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党中央先后做出了"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提出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林伯渠一贯注重调查研究，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1941年冬，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个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1943年，在中共成立22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林伯渠在恢复边区经济工作中充分体现了智慧和才能。

1948 年 4 月 22 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林伯渠十分高兴。他立即发表谈话，指出民主圣地延安之收复，是西北军民力量空前强大与宜瓦战役的直接结果，它标志着整个大西北全部的彻底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5 月 11 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胜利返回延安城。

林伯渠回到延安后，除继续领导边区政府支援战争以外，还积极领导恢复经济和生产救灾工作。当时由于蒋胡匪军的蹂躏，边区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边区人民被敌拉走和杀害的在 4000 人以上，粮食、牲畜、窑房、农具、家具及被服的损失甚巨。1947 年因此损害青苗 50 万亩，荒芜耕地三百六十余万亩，再加上旱、涝、雹、霜等天灾，耕种失时，误锄误收，边区粮食大幅度减产，以致到延安收复时，全边区即有 40 万以上的饥民，佳县、子长的局部地区还发生了瘟疫。

为了恢复边区经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土改中某些“左”的错误。还在回延安前，他即发出布告，郑重宣布：坚决贯彻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凡遭受蒋胡匪军重大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应本着保护工商业的方针，鼓励与扶助其恢复营业，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同样受到保护。曾因定错成分受到侵犯尚未纠正者，应一律迅速改正，退偿损失。他还提出，对尚有顾忌、窖藏货物不敢营业者，应宣传解释鼓励其恢复营业。对工商业的借贷和来往账债，应予保护。凡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论合伙或个人经营的工厂作坊，均应保护和奖励，并免征本年度营业税。以农业为主兼营工商业者，在征收公粮时，只计算其农业收入，其工商业部分，不得计为副业征收公粮。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受边区法律的保护。

林伯渠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48 年 5 月下旬，他在去洛川参加前委扩大会议返回延安后，6 月 6 日延安降了一场透雨。7 日，他给甘泉县县长写信说：“前日路经甘泉，得悉你们在生产救灾中已从事安置移民工作，殊为欣慰！延安六日通宵大雨，想甘泉亦会普降甘霖，这对于安置移民发展生产极有帮助。望即抓紧时机加强组织领导，并将安置移民步骤办法，安置的户口人数等具体情况及典型材料早日汇集告我为盼。”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林伯渠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新区不马上平分土地的指示，尽量减少新区的社会震动，以便增产粮食，支援战争。

此后，他连续发出了几个有关农业生产的布告，宣布边区的基本区经过土地改革封建制度已经或者基本消灭，已不再是平分土地问题，“而是普遍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并保障其不受侵犯，使人人安心生产，发家致富”的问题。允许基本区在一定的条件下继续存在租佃关系和雇长工、揽短工、包月工等雇佣关系，以便调节劳动力，避免荒芜土地。边区政府还决定在废止高利贷的前提下，允许私人借贷，提倡农民在生产中相互借贷，利息由双方自由议定。提倡组织合作互助，研究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政策，边区很快又出现了生产热潮。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恢复生产从事经济建设的同时，对边区的文化事业也给予了很大关怀。1948 年 6 月，边区文协的《群众文艺》创刊前夕，他致函编辑部，积极支持该刊创刊。他说：“从边区军民丰富的斗争生活和我们文艺界活动的广度与深度的相互比较来看，后者显然是稍显落后稍感贫乏的，很有必要出版这样一个刊物。”他在信中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三条意见和希望：第一，我认为还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虽已体验和了解了一些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但体验和了解不足，或仅限于体验和了解，还不能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结合起来。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健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作风，参加并深入实际斗争，去发掘创作的源泉，把伟大革命运动中的边区人民生活，即边区工农兵生活，特别是革命战争中，在攻坚或运动战的范例里，指战员们无比英勇的革命英雄主义，加以深刻理解和体会，踏实地反映出来，并普及起来。把党的各项政策（战争、土改、新区工作、生产救灾、城市工商业、知识分子、宽大政策等）的具体实施，通过文艺的形式贯彻到群众中去。第二，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未能使文艺作品更切合部队和边区的实际，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希望我们的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鞭策边区文艺工作者，扩大和整肃文艺阵容，普及与提高文艺作品，使文艺战线更加活跃起来。第三，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耐心地、坚持地团结和改造各种旧剧班与旧艺人。而在新区，这一工作更较落后，但却更为需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结民众剧团等对团结和改造旧剧班、旧艺人成功的经验，加以研究，指导其他，使旧的剧班、

艺人能推陈出新，转向为人民服务。

后来，林伯渠在记者节纪念会上讲话时，对边区新闻工作的方针、任务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新闻战线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歪曲事实，更不能吹牛撒谎。在当前要注意战争、生产和土改三件事情的报道。“不仅要宣传每一个战斗、战役，还要宣传士兵的每一个勇敢的故事”。“生产很重要，不论支前、改善人民生活都基于生产的发展，所以对生产不仅要介绍经验教训，而且要发扬好的，批评坏的。”“过去是分散的农业生产，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城市工业生产更重要了。”土改问题在我们这里已基本解决了，现在应将这一运动推向生产运动。他告诫大家：“只要把我们的思想作风改造好，报纸就能办好。”

——林伯渠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工作经验。

在1948年7月下旬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林伯渠着重总结了政权工作的经验。他说：“革命的事业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权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就是要把旧的统治阶级推翻，联合各个革命阶层，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党如何领导政权，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过去有四条正确的经验，现在还需要坚持，这就是：（1）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2）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执行工作，如果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超过民主集中制原则；（3）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服从党团决定的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4）调动党员时，必须经过党向政权机关取得辞职的手续。”

林伯渠在这次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还说：“政权工作要做好，必须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自私的现象打倒，真正地联系群众，要有民主的作风，建立民主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真正的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发展生产，更好地支援前线。”在人事工作中，“干部的任用应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只有培养与教育干部，才能使干部来源不绝，才能提高干部，适合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必须重视团结党外人士，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1948年9月中下旬，林伯渠在合阳雷家庄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时，再次讲了纪律和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他说：纪律问题很重要。我军在

初创时期，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说明我党的建军思想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西北野战军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半年来，又推广于全国各野战军，收效很大。过去，打一仗后，要整顿一次纪律，但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今年不同了，其原因即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依靠群众把纪律整好了。所以，整顿纪律的基础，必须是发动军队的民主。

关于自由问题，林伯渠说：只有阶级的自由，而无超阶级的自由。我们的各种政策，即是革命阶级的自由，而不给反革命阶级以自由。就是在革命阶级内部也得遵守纪律才有自由。从哲学上说，即懂得了必然，才有自由。比如，我们懂得了电，就可以利用它，就有了自由，不懂得即无自由。人类社会有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才有自由。机器发明了，商品产生了，私有制度成了法律上的规定。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知道生产是社会性的，而所有制是私有的，这是个大矛盾，于是得出了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所代替的结论。我们说改造思想，即要改造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

林伯渠的这些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论述，许多都是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对当时人们认识形势，坚定革命信念，更自觉地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帮助很大。即使在今天，也还值得人们思考、借鉴。

——林伯渠为新政协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8 年 12 月，林伯渠离开延安，到达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林伯渠此次调来中央，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在 1948 年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说明目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合作，拟定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而要实现这个步骤，首先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希望共策进行。中共的这一号召，产生了巨大反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起响应。从 8 月开始，各界代表人物接受中共的邀请，即陆续到达我东北、华北解放区，与我党共同研究

召开政协的有关问题。林伯渠抵西柏坡后，一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出席政治局会议，一面与在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田汉、周建人、符定一、张东荪等分别进行会晤，商谈国家大事。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临行前，林伯渠曾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指示："朋友们如有所问，找高岗把情形查清楚后商答"，"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今后政府成立，"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对此要有足够认识"。毛泽东还与林伯渠谈了接民主人士到北平时，中共应派哪些人到车站迎接，以及邀请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来西柏坡等问题。

1949年2月14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两天后到达沈阳。当时在沈阳的民主人士，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梅龚彬、赖亚力，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李文宜，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谭平山、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彭泽民、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庐、洪深、胡子婴、郭沫若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先后由香港、上海和国外许多地方陆续来到我东北解放区的。林伯渠到沈阳的当天晚上，与东北局的陈云、高岗、李富春等人研究了日程安排后，就去大和饭店看望旅居那里的民主人士。

19日，李富春召集在沈民主人士全体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讲话，代表党中央欢迎他们到北平共商大事，并征询了大家对行期等方面的意见。李济深代表全体民主人士致答词，表示对中共中央的衷心的感谢。会上并商定于23日起程赴北平。

在沈阳的几天里，林伯渠与民主人士频繁接触，"不是他们来看林老，就是林老去看望他们"。林伯渠在交谈中，获知民主人士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原则，拥护毛泽东在元月14日提出的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对于召开新政协，成立共和国政府，在原则上也表示赞同。但他们在新政府的产生方法、新政协组织与人事配备、今后各党派存在与否、他们的发展前途以及中共对民主

党派的方针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虑。林伯渠对他们做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希望他们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创建新中国，许多民主人士都感到很受鼓舞。

林伯渠此时已是63岁高龄，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兢兢业业，不辞劳瘁，有时竟连续工作二十来个小时。为了勉励自己，他在日记本上端端正正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项伟大斗争，做了许多工作，而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二、董必武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党中央曾把华北交给他，目的就是摸索、积累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经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作为中共代表之一的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第二天，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董必武代表政协筹备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

在报告中，董必武将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政府组织原则、政协的性质和作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等问题逐一提出，并加以说明。报告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国家观，阐明了党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获得了会议的赞同。

在9月30日的会议上，董必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隆重的开国典礼。董必武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0月19日，董必武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被任命为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和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1954年9月，董必武以68岁的高龄又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董必武与政治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因为他过去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都与政治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

——董必武曾在日本攻读法律。

1885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一个穷教书先生家里。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起义。从文普中学堂毕业后已在黄州中学教了一年书的董必武得知消息后，兴高采烈，立即赶赴武昌，参加刚刚成立的武昌革命军政府军务部，在蒋翊武手下任秘书，经管机要工作。

11月，武昌军政府改组，董必武和张国恩、姚汝婴等转入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协助理财部部长李春萱解决军政府日益浩繁的财政需要问题。在此期间，他和张国恩、姚汝婴一起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积极参与了同盟会湖北支部的组建工作，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

清王朝垮台以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不少革命党人又自认目标实现，革命胜利，于是各树旗帜，开始了争权争利的相互倾轧。董必武看到这些情况，对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大失所望。

1913年1月，董必武离开省政府财政司。1914年1月，得朋友资助，同张国恩一起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大学学习期间，孙中山正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失败，丧失信心，意志消沉。因此，中华革命党成立时，积极加入者仅有数百人。在革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却坚定地追随孙中山，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积极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在上海的中华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并回到家乡湖北，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活动。但由于计划泄露，董必武被黄安县反动知事两次逮捕入狱。第一次，董必武被关了三个月，第二次，董必武在狱中度过了半年。两次入狱，都因家乡人民的营救而大难不死。

1917年2月，董必武再次东渡日本，去结束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业。考试毕业回国后，他和张国恩一起，在武昌合开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职业作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董必武的人生开始了再一次历史性转折。

早在日本留学时，董必武曾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此时，他更是对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了一种渴望，并反复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三人讨论“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不断地失败”这个问题。

在李汉俊的引导下，董必武这位民主主义战士渐渐地看到了新的希望，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逐渐由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发展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董必武以他丰富的法律知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皖南事变发生后，董必武协助周恩来研究对策，四处奔走，发动了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暴行的运动。

1941年1月17日，他们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封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周恩来挥笔题写的“为江南死难者致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诗。

1月18日，董必武邀请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商谈对待皖南事变的斗争策略，后又召开谈话会，向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爱国人士介绍“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

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后，为挽救政治危机积极筹备召开二届国民参政会。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后由于蒋介石派出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出面劝说，董必武和邓颖超等13人联名发出了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公函，提出了“临时解决办法12条”，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董必武等中共参政员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同情，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1943年，蒋介石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这时，周恩来奉命调回延安，董必武肩负起领导南方局的重任。

9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此时在重庆的我党参政员只有董必武一人。国民党应允不在会上发表反共言论，经党中央批准，董必武单刀赴会。

会议开到第四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利用作军事报告之机，突然发难，指责我党我军不遵守军令、政令，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强收粮税，与国民党军队摩擦等。

何应钦报告一完，董必武立即依会议程序提出口头质问，用事实逐点加以批驳。董必武说："抗日战争初起，国民党政府号召守土爱国，人人有责。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保护求解放的人民，和敌后人民打成一片，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撑持着许多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他们的国民天职；扩大他们的游击区，就是紧缩了敌占区。政府四年多没有补充他们一颗子弹，三年没有给他们一文钱，纵然如此，十八集团军还是在敌后依靠人民坚持抗战，牵制敌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迭次'扫荡'。这些战情，我们都报告了军事委员会。政府不嘉奖这样的军队和人民，反谴责他们不遵守军令和政令，有什么道理呢？今天何总长代表军事委员会做报告，检讨近年来的战事，为什么对十八集团军那样艰苦地在敌后作战一字不提呢？难道不值得一提吗？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对十八集团军几十万人抗战功绩的抹杀，对敌后几千万人民抗战的冷淡！敌占区的粮税，在十八集团军未到以前，是被敌人收去了，十八集团军到后，当地人民解放了，组织民主政府，征粮征税，供自己的游击队支用，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说人民解放了，还应让敌人征粮征税吗？关于摩擦，那是由于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某些国民党军队奉命跟在后面去抢地盘搞起来的。皖南事变就是国民党军队制造摩擦最明显的事例……"

董必武是即席发言，但出口成章，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会场上鸦雀无声。

何应钦听毕，面红耳赤，色沮神慌，不能对答。CC分子破坏会场规矩，不等何应钦作答，就纷起叫嚣，无理起哄，使得会议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董必武乃向主席团声明请求退席，愤然离开会场。当晚，又致函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庄严声明从此不再出席这种宣传反共，破坏团结的会议。

董必武的"机智""勇敢""明敏"之举，博得了绝大多数参议员的同情和赞誉。国民党议员谷正纲十分感叹："董必武讲话，地下掉根针都可以听得出来。为什么共产党有这种老头子，而国民党没有?!"

——董必武曾在华北解放区摸索、积累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经验。

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东渡黄河来到了西柏坡。并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统一在一个党委、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指挥之下，实现华北的全面统一。

党中央的这个决策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

5月，华北中央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正式成立。董必武担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和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越明白中央的意图，董必武就越感责任重大，实际上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为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试点。

63岁的老人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并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和日后的全国政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经过紧张的筹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1948年8月7日在解放不久的城市石家庄开幕。在开幕词中，董必武精辟地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价值："我们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开幕了。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写下光荣的篇章。"

8月19日，经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正式组成华北人民政府，并选举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等27人为人民政府委员。在随即举行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9月26日，董必武率全体干部就职视事，启用华北人民政府印信，并明确指出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实施华北政府的施政方针，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从各方面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董必武领导下的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仅据1948年10月至12月的不完全统计，华北人民政府制定、颁布了旨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和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条例、政令不下50种，都是由董必武主持签发的。1949年4月1日，董必武签发了《废除国民党法统及其〈六法全书〉和一切反动法令》的训令。这些条例为以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章立制。在他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重要法规，以及工会法、农协组织法、劳动保险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人民法庭组织法和革命军人、革命烈军属、民兵、民工等优抚暂行条例等具体法令，纷纷出台。

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以前，董必武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工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之后，他又直接参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1954年9月，董必武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之后，他又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上这些法律、法令的制定，对于保护人民，打击敌人，保障社会改革运动和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谢觉哉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法制委员会委员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他表示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谢觉哉这天衣着整洁，精神振奋，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典礼。这几个月来，他一面忙于接收和整顿旧司法机关，制定新的法律法令，一面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参加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同时还主持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联合办公事项，主持和参加制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三个组织条例，并作为法学界推选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1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谢觉哉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以后他还出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谢觉哉在这次会议上激动地表示："党和人民如此信任我，我就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党和人民是高度信任谢觉哉的，知道他能够胜任人民赋予他的崇高职责。因为他的光荣经历，已经说明了一切。

——谢觉哉曾在中央苏区参与制定革命法规条例。

由于蒋介石不断对根据地连续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因此中央苏区许多必须的工作比如法制建设还没有来得及着手进行。谢觉哉协助毛泽东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令和条例办法。

谢觉哉当时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而这些法律知识主要是从实践中来。他最初接触法律，是年轻的时候，因见义勇为，常常帮助穷人打官司；后来，他的一位同学成了法律学家，他得到了这位同学的具体指导；而使他日趋成熟的是 1927 年担任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时，为了执法，他阅读了一些法律书籍，查阅了一些案例；到瑞金不久，他就在根据地区域内进行过几次考察活动，如 1933 年夏，他到福建河田，对于一些好经验、好办法，做过研究和总结。当时，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是经验较丰富的地方。谢觉哉虽未见过方志敏，但读过方志敏亲自起草的一些重要文件。他认为："那些文件都是用农民易懂的字句，写出人们的情绪和切实可行的办法，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指出奋斗的光明远景。"

中央苏区《选举法》是由谢觉哉参加制定的一项重要法规。这项法规的制定，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对于重视与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有着重要意义。为了帮助苏区人民正确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在颁发这项法规的同时，谢觉哉在苏区 1933 年出版的《选举运动周报》上发表了《劳动的人才有选举权》一文，对《选举法》的内容做了全面的介绍，他指出："选举法上规定，一切被雇佣劳动的及其家属，一切自食其力的及其家属，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些靠剥削为生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都要赶出政权之外。"他还这样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一切，是劳动者创造的，应该归劳动者自己管理。应该把不合理的旧世界——劳动阶级反被不劳而食的剥削阶级

所压迫的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同时为着镇压已被推翻了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谋反的企图，我们——工农阶级要严格剥夺敌对阶级的选举权，而努力发扬自己阶级的选举权。”“劳动人们的选举权，是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每个劳动者应该不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应该为选举运动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谢觉哉参加起草的其他重要法规还有《土地法》、《劳动法》、《税收条例》、《婚姻条例》等。同时，他还协助工农民主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起草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这些法规、条例的制定和颁发，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谢觉哉是革命司法制度的创始人之一。

谢觉哉早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和中央苏区，就起草过一些法规条例，在这些法规条例中，即体现了他的处处为人民的司法观点。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继承了大革命时期的人民司法精神，逐步完善着革命司法原则。当时的陕北民主政权，有的地区还没有建立起来，有的还很不健全，而“司法工作在边区似乎是政权中较落后的一环”。谢老认为司法工作对于巩固边区政权极为重要，便在总结大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司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调查分析了边区司法的状况：很少人有司法知识，对司法不注意，不去研究，人民又缺乏法律观念，司法工作是落后的。要改变司法的落后状况，必须反对司法人员中的教条主义：一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依靠群众，硬套书本条文。二是硬搬内战时期的司法经验。他指出，应该从目下边区人民的需要出发，建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司法理论与实际。为了做到这点，必须在判案经验中，了解民情，由人民来证明司法工作的对与否。要从各方面听取群众对司法的意见，听取当事人对审判的意见。这样，才可言司法建设，才可解决其他问题。谢老提出，要由司法去了解社会诸问题，从而创造一套新的法规和审判形式，制定出适合边区的单行司法条例。

但是，由于当时在边区严重存在着上述两种教条主义倾向，要改变司法工作的落后状况，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谢老强调指出：司法上的思想转变，比其他工作都要困难，因为它有很深的教条传统。

谢老就他的这些司法观点写信给毛泽东，有时还亲自到毛泽东住处当面交谈。毛泽东很赞成谢老的观点。他说：司法也该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做事。这是一条规律：任何事都要请教群众。

谢老根据这些见解，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司法落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改变。他经常主持召开司法委员会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他还常常亲笔起草给各分庭庭长和各县司法处长的函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和改进工作的方法，从而使边区的司法工作状况得到逐步提高和改进。他还创办了中国革命司法史上第一个司法讲习班和第一个司法研究会，以培养司法人才和提高司法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知识。谢老说：司法人员必须是有学问、有才干。司法是专门业务，要专门人才，“行政官不一定长于司法”。

当时，在边区的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司法的人不近人情”。谢老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因为法律是合乎人情的，“合乎人情的习惯，即是法”。他说解放区的法律和人情是统一的，因此他要求“司法的人，要懂情理。要懂得不近情之理和不合理之情，然后断案，就会合法”。合情合法，就是公正的断案。但是，要做到断案的公正，又是不易的事。一天傍晚，他和林老正在谈办案的事，省裁判部送来一件案子要谢老批复。案情是一个姓孙的外号叫“驴驹”的人，伙同两个人拦路抢劫，杀了人，抢走了财物。但原判机关只判孙驴驹一年徒刑。谢老批复说：“果真杀人，他是首犯，判一年太轻了。”这个案子还有赔偿损失的问题，但受害人嫌赔偿太少，不愿接受，而原判机关便给“充公”了。谢老在批复中又指出：事主嫌少不要，你们就把它充公，这是不公正的，只能合理赔偿，照数交还事主。他对判案人员说：法律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不能只宽不严，该宽就宽，该严就严。可是，原判机关对这一案子的杀人不严办、赔偿又充公的不公正判决不愿意改判，认为改判会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会失去群众的信任。谢老便向判案人员讲述了清朝时代的方法：前清判案是把批文挂在衙门上，上诉人抄着批子，就可以推翻原审衙门的判决，原审衙门就管不着他。谢老严肃指出，封建时代都能这样，何况我们现在？“司法威信的建立，在于断案的公正和程序的合法，不在于改判与否上”。

断案的公正，还在于敢于碰硬。在延安时期，发生了一件要案，主犯是个有革命资历的大人物。谢老根据事实和法律，坚持要判刑事处分，但有些人却以权势压人。谢老并不屈从，坚持不改主张，把他的观点和处置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此等原则立场我们绝不能放松，不管犯错误的是何等样的好朋友与好同志。最终，谢老协同边区司法机关，判了那个要人的

徒刑。几个月后，他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不遵守法令的，大都是公务人员，因为这些人往往藐视地方政府的法令，认为地方政府的"职权低弱"，管不了他们，因此在"三令五申"之后，就要坚持"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情，不理。要硬起颈骨来，做得几次，威信就建立了"。这件事流传至今。

——谢觉哉曾是延安边区宪法研究会的负责人。

1945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齐燕铭、吴玉章、张曙时、徐特立、刘少白、黄齐生等发了言。会议推选谢觉哉、何思源、李木庵、李鼎铭、齐燕铭、张曙时、陈正人七人为宪法起草人，并决定谢老为宪法研究会负责人。宪法研究会的任务是：一方面起草新民主主义宪法，一方面批判"五五宪草"。

党的七大会议结束后，谢老带着大会的精神，到宪法研究会开展工作。他根据宪法研究会的任务，首先组织批判"五五宪草"，以便统一认识。他在一次会议上，对于"五五宪草"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五五宪草"的所谓"权能分家"，不是为要政府有能，而是为要人民无权，因为人民的权利，全被"依法律"三字打消了。他认为，"五五宪草"比法西斯的宪法欺骗性更大，因为它是在"民主自由"的幌子下实行独裁专制。与此同时，他还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深人批判"五五宪草"的流毒。

在批判"五五宪草"的同时，谢老组织宪法研究会成员着手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宪法由起草到通过，将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他设想了几个有关新民主主义宪法的重要问题，提请宪法研究会讨论。这些问题是：社会结构即国体问题，政权机构问题、人民权利问题，一院制与两院制问题，地方自治问题、选举制度问题。他对此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及实行的意见。大家很赞成谢老的主张和见解，并依据这些原则起草了《宪法草案大纲》。谢老在他写的《宪法草案大纲》的说明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它的政权机构应采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并由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这便是全国解放后普遍实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早设想。这是谢老领导的宪法研究会对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贡献。

谢老将宪法起草的情况和有关宪法内容的原则问题报告给党中央。他在报告中说，这个宪法草案是边区宪法，也是全国宪法；是理想，也是现实。宪法草案中的人民权利和民主这一章，别的宪法是没有过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发明，是合乎我国社会情况的新发明。中央为此先后召开了会议，讨论谢老的报告和宪法起草的有关问题。谢老参加了中央会议，对有争议的问题做了说明。毛泽东的意见是，宪法必须请边区同志多研究，多提意见，成为边区自己的东西，要冒出泉水才有用，泼的水是无用的。外来同志尽泼水之力是需要，但必待它自己冒出泉水。为了贯彻这些精神，习仲勋主持西北局会议，由谢老报告宪法草案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根据讨论意见，由谢老主持，对宪法草案大纲进行了六次大的修改。谢老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和西北党校、延安大学等单位，讲解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和起草过程，广泛征求意见，力求完善周到。

1946 年 6 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老担任主任委员。委员有林伯渠、徐特立、陈伯达、李木庵、张曙时、刘景范、马锡五、廖鲁言、黄松龄、王明、黄觉民等。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成立后，除了继续修改宪法草案外，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展了新的立法活动。当时的任务是研究法律和草拟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6 月 17 日这天，谢老正在修饰他的长胡子，忽然从窑洞门口进来两个人，他急忙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沫，细一看才看清不是生人，是徐特立老先生和王明。徐老笑哈哈地走到跟前，摸着谢老的胡子说："你虽是'宁乡四髯'之一，还没有我的胡子长哟！我不是宁乡人，却是湖南人，咱们合称为'湖南五髯'吧。"接着他们告诉谢老，今天不是来看他的，是有担子给他担。然后交给谢老一张中央决定的法律研究委员会的人员名单，并传达中央的意见说：中央要你尽早召开成立会议，以利工作的开展。谢老感到责任重大，随即约请林伯渠和习仲勋等负责同志，详细交谈了有关问题。

谢老在这个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法律研究会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他坚定而鲜明地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是谢老历来主张的立法原则。

关于立法原则，早就存在着新旧法观点的争论。这场原则争论一直持续

到 1948 年，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在法研会的会议上，有人认为，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不仅不能批判，而且还要沿用，因为共产党还没有成套的法律，也不可能很快立出法来，因此必须沿用，也应该沿用。针对这种观点，谢老严肃指出：国民党的全部法律，是在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法律基础上，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而制定的，是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是必须废除的。他认为，我们的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不是继承旧的而是对旧的革命，不是对旧的修改，而是形式和内容的全部改造，不冲破旧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来，这就是“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他强调说明，法源在人民，在人民新的秩序、新的要求。人民对于新的秩序、新的法律的要求，已经是现实，制法已成为必需和可能。依据这些原则，谢老对宪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主张。

——谢觉哉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做了大量的开路清基工作。

1948 年 8 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谢老从他居住的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口村动身，冒雨赶来石家庄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县市村政权组织条例》的说明。他在就职会上发表讲话说：“人民政府”这个名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也没人敢这样称呼过。资产阶级国家自命民主，但胆怯，不敢叫他的政府为“人民政府”，怕人民戳穿他。人民政权，不只说政府真能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人民直接组织政权与管理政权，政权是人民自己的。谢老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几种政权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以及旧民主与新民主的本质区别。他认为，“民主事业是群众事业，不是个人的英雄事业”。他的讲话得到大家的称赞，认为这是一篇关于政权建设和民主制度的精辟论述。他还到华北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去讲话，进一步论述了这些观点和见解。从 9 月 27 日开始，谢老和杨秀峰等讨论司法部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和办公地址等问题。10 月 6 日，司法部正式开始办公，部址暂定西王子村。

谢老很重视司法人才的培养。华北司法部刚成立，开始工作不到十天，他即提出办司法训练班的主张。他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形势稍有稳定，就提出举办司法讲习班，这也是我国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司法讲习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第一批司法干部。为此，他亲自拟定司法讲习班的招生通知，

编写教材。开学前几天，他日夜操劳着这些事情。有天晚上已经午夜以后了，他还在灯下和陈守一讨论司法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和讲话问题，陈守一要求他这位第一任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长亲自担任一部分讲课任务，他欣然答应了。司法训练班于1949年1月15日正式开学。开学后第三天，谢老便坚持每天讲课，一次讲三小时，连续讲完他所担负的课程。他亲手写出详细的讲课提纲，其内容有：国家的概念问题，法律的概念问题，国体、政体问题，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对旧法律和旧法观点的批判问题，新的司法工作问题，学习方法问题。谢老在讲课中引述中外历史事实，说明“两个阶级，两种司法”的道理。他说：有的人不同意废除《六法全书》，认为这是最高法典。当反动派需要的时候，便“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也不顾他们自己立的《六法全书》了。因此，谢老强调指出，我们的司法是新的司法，我们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懂政治，不懂政治绝不会懂得法律。

1949年2月7日，中央决定，华北人民政府要于本月11日迁进北平。进京以后，谢老亲自起草了废除《六法全书》的通令。王明和中央法委会其他委员在此前后来见谢老，讨论成立新法学研究会、办法律学校、出版法律刊物等事项。谢老很赞成这几件事情，给以积极支持。

他还到华北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法律问题座谈会，并作了重要发言。会后，他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立法工作和训练司法干部提出了具体规划，并提出将已接收过来的朝阳大学改为国立北平政法大学。经过紧张的筹备，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宣告成立，谢老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8月11日，他出席了开学典礼，做了就职讲话。他由南长街迁居大四眼井八号以后，以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为政法大学编写讲课大纲，并亲自讲课。他主讲了学习态度与统一战线问题、政权组织问题、人民民主专政及团结国际友人问题。还讲了统一战线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解答了政协文件学习中的问题。

由于谢老具有上述经历和实践，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内务部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便是驾轻就熟了。

四、徐特立以72岁高龄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教育研究室主任和党史资料室主任。毛泽东称他为“先生”，朱德说他是一个“怪物”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徐特立作为全国人民政协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下午三时，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徐特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和首都30万军民一起，共同欢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精神焕发，心情格外激动。

徐特立进入北平的时候，已经72岁。他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还担任了两个学会的荣誉职务。

党和人民选择徐特立担当宣传教育工作的重任，是与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漫长经历和崇高品德分不开的。

——徐特立具有坚实而深厚的知识根底。

徐特立于1877年2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原名茂生，后来进入社会，“茂生嫌市气，特立见精神”，在28岁那年就改了名字。

徐特立从小读的是私塾，学的是八股文。到了16岁，便告别了八股文。而促使徐特立跟八股文分手的根本原因，还是陈云峰的点拨。陈云峰是长沙城内一位有名的举人。因为淡泊利禄，中举之后，就闲居不仕。徐特立做八股文做到第十一篇的时候，想请一位高明之士看一看自己的八股习作，看将来应试有没有中的希望，于是专程跑到长沙城里拜访陈云峰先生。老举人看了看他的那些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同时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好读八股？老举人的意思很明显，应当立志读书，不必把工夫用在八股文上。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这一次，陈云峰介绍他看张之洞的几部书，还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其中写

道："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

徐特立自从得到陈云峰的指教以后，便立志有计划地读书，不再在乱读上耗费时间和精力了。只是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要有计划地读书，首先要有书，而在乡村，借书很不容易，到长沙城里去买吧，一部《十三经注疏》要15串钱，一部《读史方舆纪要》要六串钱，一部《庄子》也要300文，而他教书的收入，第一年只不过三串钱，后来逐年有所增加，最多的时候是20串，少的时候十余串。教书的收入还不够买书的费用。

不过，徐特立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一点田产，这时尚可年收20石谷，可以算是"一个小有产者"。他考虑了一下，要准备读书，就必须破产。他还估摸了一下，大概花个十年工夫，可以把书读通，但十年也必定破产。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问题："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何去何从，必须抉择。他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做出了抉择——"破产读书"。他打算将每年教书的收入维持家庭用度，将祖母留下的一点田产逐步变卖，用来购置书籍。自然，他也想过问题的另一面，在当时，一个读书人只有会做八股文，才会进学，有出路；不会做八股文，读的书再多，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他既然听从了陈云峰的指教，抛弃了八股文，立志读书求学问，对于进学不进学就不去管它了。他相信：准备十年读书，读到30岁，书也可能读通了，谋生的问题也会解决了。

"破产读书"的计划决定了，徐特立就不顾周围的人们有些什么议论，而按照设想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做。买《十三经注疏》，买《御批资治通鉴》，买《读史方舆纪要》等，都毫不迟疑了。他白天教书，晚上读书。他读书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方《说文解字》部首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字，一年读完。读"经"，读"史"，读"子"，读"集"，他都坚持"定量"和"有恒"。他认为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消化，又不能记忆，读了等于不读。

徐特立在攻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还注意读地理、读数学。他觉得不读地理，有的书就读不通，比方，读《左传》，看了书上的地图，不识东西南北；后来读《禹贡》，里面叙述黄河的流向，说"南至于华阳，东至于砥柱"，就明白地图的方向了。他注意读数学，是因为经书中有许多涉及数学的问题。为了解答这方面的疑难，他曾跟从一位懂得古代数学的先生学习了

一个多月。又根据这位先生的指点，自学了代数、几何、解析几何等。

徐特立学习古代数学，得到了较大的收获，他在《六十自传》中说："我的数学不成一家，就破除了一切成法，反对把算术和几何截然分开，反对教几何从离开立体的平面起，而使点线面成为纯思想的东西。罗士琳的《比例汇通》，认为比例是乘除及开方乘方的一个过程。华蘅芳把微积分认为是算术的加减乘除比例开方乘方一直发展上去的。《周髀算经》说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把方圆统一起来。我接受了这种理论，就粉碎了学科学的教条。我快乐得很，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还是在乡下教蒙馆。"

1905年，徐特立28岁，"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已进行到第八年，祖母留下的田产，经过逐年"破产"，一年只收到四石谷了，教书的收入一年也只14串，眼见将要无产可破，家庭生活也难支撑了。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插曲发生了：清政府取消以八股取士，改试经义，加试历史、地理，并在岳州举办了一场这样的考试。听说，考中了将有被录用的希望。为了生计，徐特立决心报考试一试。

徐特立把参加这场考试看做早年经历中一个有趣的生活插曲。他在《我的生活》中用很风趣的口吻作过描述。他说，这场考试，考生有三千多人。地理题目是《汉之安息即今波斯，条支即今亚拉伯辨》，历史题目是《张居正毁天下书院论》。考过之后，他觉得对试题只知大概，以为不会录取了，也就不去看榜。不料发榜之日，半夜有友人来敲门，原来，徐特立在初试中以第19名被录取，叫他准备报名复试。复试要交卷费一块钱，他没有钱，一位同考的朋友送给他一块钱，他才复试了。徐特立回忆说，当时懂得历史、地理的人甚少，"这一来，我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年金由14串升到60串，一跃四倍。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胜利了"。

——徐特立具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和高超艺术。

1905年，徐特立在宁乡速成师范学习了四个月。毕业后，他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联合同道，创办了一所面向农民子弟的小学——梨江高等小学堂，附设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

1906年的春天，徐特立回到长沙，开始在周南女校任教。校长朱剑凡是徐特立在宁乡速成师范时的老师，就年龄说，朱剑凡比徐特立还小六岁。因为民主革命思想、信念的相通，他们相识之后，很快就由一般的师生关系

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徐特立原来很钦佩朱剑凡的品德、学问和革命精神，因此当朱剑凡一提出邀请，徐特立就慨然应允，满怀热情地来协助他办学。

创造事业开头难。徐特立来到周南女校以后，就倾注自己的全部心力，协助朱剑凡奠定女校的基础，基础奠定了，局面就好打开了。1910年7月，女校正式定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堂”，设有师范部、中学部、小学部及幼稚园。学校由粗具规模而开始蓬勃发展了。它像寒夜的原野上的灯火，吸引着许多追求光明、进步和解放的女青年。向警予、蔡畅、陶毅、劳启芳、魏璧等，都曾先后求学于“周南”。

辛亥革命胜利后，徐特立的老同学、老朋友姜济寰出任长沙县首任知事，颇想励精图治。在教育方面，他计划在全县建立1000所小学，提高国民文化水平，改变农村文化闭塞的状态。为此，就需要先办一所师范学校，尽快地培养出大批师资。筹办长沙师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物力、财力俱无，需要白手起家。经过徐特立的一番苦心筹划、奔波，长沙师范就这样创办起来了，于1912年春季正式招生开学。

湖南第一师范是一所有名的老学校，它的前身是清代的中路师范学堂。学校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南宋的城南书院。辛亥革命后，不少有声望的教师，如杨昌济、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都被延聘到校任教。徐特立在长沙师范做校长时，就在一师兼课，交卸了校长职务后，就改做专任教师，教“各科教学法”及修身，兼任教育实习主任。

1930年，徐老从苏联回国，到苏区从事革命的教育工作，为创办列宁师范费尽了心力。这所学校十分简陋，没有讲台，没有课桌，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徐老担任校长，也要担任教员，还要摇铃扫地，管理伙食。晚上忙于编写教材，每至深夜。

列宁师范师生在徐老的领导下，也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每天太阳还未升起来，起床号就吹响了，大家都要踏着露水，到操场上进行早操。然后，又分散到晨雾缭绕的树林里，各自看书学习。上午，按照课程表上课；下午，分成小组开讨论会，进行互助，消化所学的知识；晚上，八个十个人共一盏小油灯，自修功课，完成习题。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徐老还要组织学生到附近区乡的列宁小学进行实习，在实习中向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学习。平时列宁师范的师生也要开展军事训练，一个个像士兵一样，要练习射击、刺杀、进

攻，徐老总是亲临现场，加以指导。

学习生活是如此紧张，物质生活却是异常艰苦。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和苏区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粮食不够吃，按人定量；布匹不够，每人发了一套灰布衣服，穿烂了，补了又补还要穿。尤其是食盐供应紧张，最困难的时候，一块银元只能买到七钱盐。徐老是中央苏区教育部负责人，又是列宁师范的校长，但生活上总是和学生同甘共苦，一点也不搞特殊。他对学生总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吃饭的时候，常常还不见他来，一找原来他在伙房里帮着做学生的饭菜。他总要看到分配给学生吃的食盐下了锅才放心，因为那时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盐是很少很少的，是不能克扣的。

徐特立漫长的经历和实践，为他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特立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献身党的宣传教育事业的宏伟抱负。

徐特立像老黄牛一样，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赢得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体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过60岁生日时对他的评价中。

毛泽东给徐特立写的一封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你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肮肮脏脏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

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朱德在一封信中则说："徐老头，你是一个革命职业家，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教育家。你一生能勤工俭学，能吃苦耐劳，反抗社会不平制度并要征服自然，你是一个百折不屈的老革命家。你是封建社会里生长的人，从小就背叛封建社会的习惯，就染着了资本主义革命气习，嗜好民主自由平等的味道，参加了中国一贯的民族革命。你为了要看穿资本主义的西洋镜，曾跑到了最标本式的欧洲巴黎等地去勤工俭学，仍是不合你的脾胃。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是死心塌地地做了下去。"

朱德说："我俩在同一战线中奋斗，在南昌暴动至东征中央苏区，至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至今天，都在一路。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的模范，更教育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它前进的。"

陆定一在徐特立 70 大寿的时候，也著文回忆道："长征的时候，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一段。徐老那时是五十七八岁的人了。在长征的过程中，他又以自己的行动给我们写了没有字的教科书。公家给了他一匹马，他自己是不骑的，给别人骑，自己走路。自己用针线打补丁，自己做鞋子穿。对于这种苦事情，有的人愁眉苦脸，而他则是津津有味。困难不能使他皱眉，相反地，越困难他越有精神，他的生命越在困难之中就越加显得辉煌。这真是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应当好好学习的。这真是中国人民的最伟大的所在。"

"抗战期间，在党内一部分党员中，产生了另外一种坏东西，就是把革命忘记了，把困难也忘记了，把人民把群众也忘记了。只管自己生活得好，群众的生活就不管，只顾私人，不顾公家，有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像官僚军阀了，有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像恶霸了。在一次开会的时候，徐老对于这种堕落现象跳起来骂。徐老自己的生活呢？他对我说，他也丰衣足食了。他自己种菜蔬吃，公家给他的伙食费他想法省俭和储蓄起来，计划将来慢慢用自己的

储蓄来维持生活，节省公家的开支，桌子上本来是光的，现在添上了用旧被单做成的桌布，窗子上挂上用不知什么旧东西做的窗帘……他就是这样丰衣足食的。这一次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挑起内战，徐老70岁了。他对于反动派的愤怒比什么人都深，对于胜利的信心比什么人都高。他哪里像70岁的人？简直是一个青年革命家的气概。"

陆定一写道："我想了很久，人民教育家，他的特色应该在哪里呢？难道编几本教科书，写上'人民，人民'就算数了么？这样就把我们的后辈教育好了么？当然，人民的教育与剥削者阶级的教育，在理论上不同，办法上不同，教科书也要不同，没有这些是不行的。但人民教育家与反人民的教育家之不同，主要的还是在行动上。人人可以做人民的教育家，如果他的行动在当时当地有益于革命而为人民的表率。徐老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有许多建树，他又是在革命运动的许多生死关头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别人的。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

第五章　首任部长　人尽其才

聚焦时间：1949年10月

聚焦地点：北京中南海、南京

聚焦人物：章伯钧、朱学范、李书城、梁希、章乃器、史良、李德全

聚焦话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大批赫赫有名、曾发誓不做国民党高官的民主人士，欣然接受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任命，走马担任了新中国各部部长。这究竟是为什么？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开国大典后，身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深谋远虑的就是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政务院的班子“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照顾到被安排人的资历、职业和他的能力”。在政务院首设的34个部长职位中，就容纳了各方面的代表，其中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占到15席。他们在为建设新中国竭尽所能的同时，也展示了各自不同寻常的个性。

一、章伯钧，一个国共双方都看重的人物。蒋介石的封官许愿他不动心；新中国成立后，无意官场的章伯钧走马上任，欣然出任共和国的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性格的人物，连蒋介石这样的厉害角色也怕他三分。为了拉拢他，蒋介石曾封官许愿，除了外交部长以外，其他部长职位都可以让章伯钧选。但面对高官厚禄，章伯钧毫不动心，他不愿与蒋介石为伍。他说，就是让我当外交部长，我都不干。新中国成立后，不愿做官

的章伯钧却走马上任，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部长。那么，章伯钧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为何国共双方都如此器重他呢？

章伯钧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物，1895 年 11 月出生于安徽桐城。他年幼丧父，家境贫寒，备尝人间的艰辛。好在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卖掉自己的土地供儿子上学。母亲的为人给章伯钧以很大影响，形成了他倔强的性格。他读过私塾，后在桐城中学、武昌国立高等师范英语系学习，随后又留学日本、德国，1926 年回国后受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的学习生涯加上刻苦的攻读，使章伯钧有了深厚的理论根底。他能说会道，又有组织能力，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个有号召力的人物。桐城本是个出文化名人的地方，清代著名的桐城派就从这里发源。作为桐城的后人，章伯钧并未受桐城派文章内容贫乏、流于空洞的影响，无论是个人的文章，还是他代表民主党派发表的声明、宣言，都是大气磅礴，言之有物，很有说服力。的确，从综合素质而言，章伯钧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章伯钧性格倔强，眼里容不得沙子，是反蒋斗争的勇士。章伯钧早年曾参加国民党，投身于北伐战争，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士邓演达就是他的良师益友。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反革命面貌的暴露，邓演达义无反顾参加了反蒋斗争。他出任了由邓演达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参与了由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1935 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实行媚日卖国政策，章伯钧再次拍案而起，他发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干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打出了反蒋抗日的大旗；1936 年上半年，他又参加了李济深、李宗仁发动的两广反蒋抗日活动。总之，这一时期发动的反蒋事件很多，似乎每一次都离不开章伯钧的身影。

蒋介石对章伯钧的所作所为深感恼怒。在庐山召开谈话会时，没有通知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在南京成立国防参议会时，还是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国民党当局要取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章伯钧断然拒绝。

1941 年 3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同盟从策划到成立，都是同章伯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在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就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紧了对各抗日党派的迫害。同年 9 月，章伯钧出席国

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会上，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36人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又与罗隆基、黄炎培等55人联名提出了《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时局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11月，他又参与发起组织宪政促进会、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一切，都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分不开。在筹备阶段，章伯钧还参加了同盟组织法的起草，后又出任同盟的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

蒋介石从心底是反对民盟的，一个共产党就够他难受的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民盟。但是，章伯钧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角色，怎么办呢？他想，如果能把章伯钧这样的人拉进政府，也许对他消灭共产党会有所帮助，于是派人去游说章伯钧。他给说客的底线是，除了外交部长之外，当什么部长都可以。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还真的是下了大的价码。但是章伯钧的态度却让蒋介石十分失望。章伯钧让说客带话给蒋介石："即使给我当外交部长，我也不要！"

蒋介石绝望了。

章伯钧的反蒋立场更坚定了。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民盟代表成员的章伯钧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同国民党作斗争。会场内外，他十分活跃，以一流的口才和文章，痛快淋漓地斥责国民党当局，热情洋溢地赞誉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后，章伯钧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完全站到了蒋介石的对面。

早年曾担任过朱德秘书的章伯钧一直是共产党的朋友。

章伯钧一家与共产党有缘。他的两个弟弟均是中共党员，为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大弟章伯韬留学法国时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中共在法国支部的负责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国内，中共中央准备派他到南洋开展革命活动。不料，他突发肺病，不治而亡。小弟章伯仁，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能讲英、俄、法、德四国语言，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莫斯科大学教书，不幸英年早逝。章伯钧也是在德国学习时加入共产党，并给这时也在德国的朱德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

大革命失败后，当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之时，章伯钧还参加了由在德国相识的老朋友周恩来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他担任起义军总政治部副主

任兼第九军党代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时，他随军南下。起义失败后，他经潮州到达香港，从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仍然站在反蒋斗争的前列。抗战爆发后，章伯钧联合共产党一起抗日，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著名的八项政治主张。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中，章伯钧都能与中共保持一致的步调，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朋友。

周恩来也非常关心章伯钧的身体。据章夫人回忆，在民盟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章伯钧非常忙碌，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只好在小饭店吃点什么。她说：

> 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重庆的小饭店里吃了一顿饭。没几天，我发现他大便里有脓血，叫他休息，可是他说，已与周恩来约定上午十点见面，不可失约。就这样，他还是出去工作了……两天之后，伯钧得了痢疾，发烧得很厉害，昏迷不醒，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要用盘尼西林抢救。那时盘尼西林很贵，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周恩来来了，说道："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打了几针盘尼西林之后，伯钧得救了。出院之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她："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

周恩来的关心和蒋介石的迫害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怎能不教章伯钧成为共产党的朋友。

1945 年 7 月，章伯钧同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参观访问，所到之处，受到延安各方面的欢迎。延安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印象都很深刻。特别是通过同毛泽东的会谈，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得更多。他的心与共产党更近了。

1947 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章伯钧等民盟领导人表示放弃中间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1948 年，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时，身在香港的章伯钧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于 1948 年 9 月抵达哈尔滨，参与到新的人民政权的建设中。

章伯钧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也是一个颇有才干的人。新中国成立后，章伯钧被任命为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过去多次拒绝过蒋介石官位的章伯钧欣然就任。

交通是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部门。国民党统治时期，本来就没有拿出什么钱来修路造船，何况由于长期战乱，把公路破坏得千疮百孔。新中国成立后，把医治战争创伤作为主要任务，恢复和发展交通就是重中之重。章伯钧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同交通部的领导一起，不辞辛劳，为改变国家交通落后面貌而勤奋工作。

二、他曾活跃于上海滩，堪称国民党内“唯一的工运人才”；他又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朱学范当上了共和国的首任邮电部部长

早在 1940 年，周恩来在给致力于发展中国邮电事业的林卓午题词时说：“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可见这位未来的总理对邮电事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受命组阁的周恩来在考虑邮电部部长人选时，点将朱学范，要把这打通国脉的任务交给他。

朱学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曾活跃于上海滩，是工人运动中的“领头羊”，在国际工运舞台上，是位知名人士；他一生主持正义，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曾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暗杀人物的黑名单。因他早期有多年从事邮政工作的经历，被周恩来点将主持邮电部。

他是国际工运舞台上的活跃分子。朱学范长期从事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还在 1926 年他就发起组织了全国邮务工会，并出任总干事、常委委员；1927 年他率领邮政工人参加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朱学范在上海组织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代表上海邮务工会参加抗日救国会，担任调查科科长，带头抵制日货；1932 年 1 月，朱学范组织上海邮工救护队支持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对上海的入侵，朱学范自任队长，带领队员到前线救护伤员。五十多年后，他深情地回忆起在前线救护的情景，他说：

> 邮工救护队出发前，在老西门关帝庙开宣誓大会，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十九路军抗日救国，要不辞辛苦，不畏艰险，不惜牺牲，努力做好救护工作。开过宣誓大会后，大家怀着舍身报国的豪情，在我的率领下奔赴前线。
>
> 邮工救护队到闸北宝兴路，找到空无一人的工厂作队部，立即投入救护和送伤兵的活动。第二天，救护队到达吴淞炮台一带。翁照垣旅正在与敌舰进行激烈的炮战，我们这些初上战场的邮工，听到隆隆炮声，震耳欲聋。敌人的炮火，使吴淞镇上一部分民房燃起熊熊大火。我们的救护队员立即投入灭火战斗。翁照垣旅在吴淞奋勇抗战，每天有一批伤员，我们的救护车每天冒着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危险，频繁地运送伤员往返于吴淞和后方之间，还从租界带去当天的报纸，分送给旅部官员阅读。他们看到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和全国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无数动人事迹，士气大振。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朱学范在上海呼吁迅速发动全民抗战。上海“八一三”抗战，他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工人抗日武装参战。上海沦陷后，他辗转香港、广州、长沙到达武汉。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第一次发起人会议，筹备成立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积极发动工人参与抗战。

为争取国际工人的支持，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朱学范出访了许多欧美国家，参加了许多次国际工人运动会议。1938 年 6 月，朱学范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四届劳工大会。大会期间，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劳工代表和各国新闻记者，放映了从国内带去的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录影片，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他又举行了中国抗战摄影展览会。他把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带到法国、英国放映，引起国际工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

一有机会，朱学范就呼吁国际工人支援中国抗战。

1939 年 7 月，朱学范在瑞士苏黎士参加工会联合会第八届代表大会。由于他的呼吁，代表们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法西斯整个侵略行动的一环。全世界工人不但应给予中国工人道义上的同情，而且应给予切实的援助。

1941年4月，朱学范在美国纽约参加国际劳工大会。他在会上提出敦促世界自由民族对中国提供军械，以加强抗战力量的议案，获得一致通过。

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正在美国访问的朱学范应美国劳工部长的邀请，向美国全国劳工部会议做讲演，他介绍了中国工人和人民不怕牺牲、坚强抗战的真实情况，激励劳工部和美国工人反击日本侵略者。让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在美国政府的会议上做演说，这在美国是罕见的。

1942年，美国工人决定援助中国工人的抗日斗争，对中国工人每年援助66.6万美元。

朱学范不但向国际工人宣传中国工人抗战的英雄事迹，还利用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机会，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英皇乔治六世、副首相艾特利、外交大臣艾登、印度的尼赫鲁等，为争取各国政府对华抗战的支持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此，朱学范赢得了没有外交官衔的“人民外交家”的美誉。

朱学范在国际工运舞台上的积极活动，既提高了中国工人的国际地位，也增加了自己在国际工运中的影响。一系列头衔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先后当选为国际劳工协会理事、国际劳工局理事和世界工联副主席。

他曾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黑名单，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朱学范一生坚持正义。他在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对共产党越来越了解，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1939年到1946年他三次同周恩来的见面，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学范后来回忆说：

> 在这三次与周恩来的会晤中，他对我谈了很多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开展国际联谊和宣传活动，与世界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建立广泛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工会之所以能够冲破国民党的封锁，为反法西斯战争、为战后维护和平作出贡献，为世界工人和人民所了解，是与周恩来同志的卓见深谋分不开的。

朱学范佩服周恩来，亲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却对他越来越嫉恨。尤其

是在国民党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后，朱学范坚决“主张民主，反对内战”，针锋相对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更激怒了国民党蒋介石。他们狗急跳墙，决定对朱学范下毒手。

1946年11月25日，朱学范在看望友人返回途中，遭遇人为车祸，但万幸的是他仅左肩受伤骨折，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他伤愈出院了。朱学范在住院期间，认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大家通过这件事，更加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面目，坚定了反蒋立场。

1948年2月，朱学范从莫斯科来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在这里，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毛主席、周副主席鉴：

学范已和宁一兄到了哈尔滨。在巴黎时，看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这一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范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斗争。范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的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谨向你们致革命敬礼！

朱学范

1948年2月29日

李济深曾说，这是第一份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接受他们领导的电报。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朱学范回电：

朱学范先生：

接29日电示，欣喜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行动，表

示热烈的欢迎。此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

1948年3月4日

这是对朱学范最大的褒奖，也是对其他民主人士的真诚召唤。

朱学范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早年从事邮电工作的经历，对朱学范出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部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05年出生于浙江嘉善（今属上海金山县）的朱学范早年曾先后就读于上海敬业高小、上海圣芳济学院。1924年参加了中国官办邮政的考试，并被录取，分派到上海邮局当邮务生。当时这是邮局的初级职员。由于他奋发工作，到1926年就升任二级邮政官员。但朱学范并没有满足。当上海法学院招收夜校生时，他报名参加学习，成为著名律师沈钧儒的学生。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学成回国后继续在邮政局工作。

朱学范还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由于他出色的才干、热心工会工作，很快成为工人的领头羊。为利用帮会的力量开展工会工作，朱学范经人引见，与上海主要帮会的头面人物有过联系，他牵头组织的毅社实力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朱学范也以此为依托，逐渐成为国际工运舞台的知名人物。

朱学范丰富的革命经历，加上出色的才干和早期从事过邮电工作的经历，使周恩来在组阁考虑邮电部部长人选时，把目光锁定在朱学范身上。

朱学范走马上任后，面对因长期战乱而造成的邮电设施极端落后、通信线路多已破坏、专业人才极端匮乏的困难局面，没有退缩。他带领邮电系统的全体干部和职工为改变中国邮电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1950年，就修建了京沈、京汉、京沪三大干线；1951年又恢复和建立了西北、西南的电信路和邮路；1953年又开通了昌都到拉萨的邮路，开始了直达西藏的邮件运输。这样，东起沿海，西到新疆，北起满洲里，南至海南岛的邮政、电报、电话完全畅通，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邮电通信网。

作为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朱学范以出色的业绩而载入中国邮电发展史册。

三、经周恩来提名，67岁的李书城出任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不理解，周恩来一一作答

1949年10月10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时任政务院总理、奉命组阁的周恩来在考虑部长人选时，提议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提议一出，不少人为之惊愕。

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面对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局面，顺利解决四五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就成了巩固新生政权的关键因素。而农业在其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已67岁年近古稀的李书城能够担负起这个重担吗？不少对李书城阅历不熟悉的人更不服气，认为李书城对革命贡献不大，不能一飞冲天，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周恩来相信李书城的能力，也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针对大家的疑问，周恩来耐心做了解释。他说，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革命后，他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到讨袁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他的家里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是对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的最好说明。

李书城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有着深厚的革命资历。1892年出生于湖北潜江的李书城早年留学日本，与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是同学。他们由相识到相知，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

李书城在日本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经常到日本参加革命活动，李书城深深地被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05年，李书城通过黄兴认识了心仪已久的孙中山，他们一见如故，当即商议组织同盟会的事情。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李书城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

1908年10月，李书城到达桂林，先后担任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的监督。在这里，他组织革命力量，准备起义。1909年陆军小学举行毕业典礼，广西抚台张鸣歧准备参加。李书城同其他人商定，利用这个机会杀死

张，然后举行起义。因走漏消息，张鸣岐扬言要捕杀李书城。李书城被迫离职到了北京，经人引荐，担任了清政府军咨府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

武昌首义时，李书城正在北京。原准备在北方起事，以响应南方，但突然接到电报，令李书城等人赴南方与革命党议事。他趁机回到南方参加了南方的斗争。

李书城回到武汉时，黄兴已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对他的到来特别高兴，提议李书城为参谋长。

黄兴与李书城并肩战斗，共同指挥武汉革命军抵抗清军的反扑。

清军加强了对汉口的进军。在战斗中，李书城双脚起泡，眼睑红肿，嘴唇干裂，但始终不下火线。汉口和汉阳先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而陷落。李书城非常难过，主动承担责任。几十年后，他回忆这两次战役时，深感内疚地说：

> 我对这两次战役的成败，是应当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即黄兴——引者注）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

其实，汉口、汉阳的失守并不是像李书城所说是因为他的作战计划失误而造成的。但李书城坦荡的胸怀和敢于负责的态度却为世人所称颂。

作为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李书城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即便在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后，面对险恶的环境，李书城仍痴心不改，参加了反袁的护法战争和护国战争，为捍卫革命成果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就是在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对革命有功。

1890年出生的李汉俊，比李书城小八岁，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于1920年初同陈独秀、李大钊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同陈独秀、李达等发起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12月被军阀杀害于武汉。

1921年7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在经历长时间准备后即将在上海召开。然而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中国，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要召开这

样一次会议要冒巨大的风险，选定一个合适的会议场所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作为中共一大的主要筹备人，李汉俊在为一大选址时伤透脑筋，最后选中了他大哥的住所。

李书城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为兴业路76号）购置了房产。这是一座石库门式的三层楼房，为上海中产阶级的典型住宅。楼上做卧室，楼下做客厅。房子不大，却有独用之利，无邻居打扰之虞。这里是法租界的南端，再往南走就是旷地了，行人很少，是开会的理想场所。当李汉俊提出把会址设在他哥哥家时，其他人均表赞同，一贯对中国共产党筹建工作表示支持和赞同的李书城也表示同意。这样，李书城的寓所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见证。几十年后，周恩来在提议李书城就任农业部部长时丝毫没有忘记这段历史。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屡遭挫折的李书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没有消沉，他本人也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当孙中山提出国共合作时，李书城就表示坚决支持。国共合作后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并运用自己所学的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国民革命军打败北洋军阀做出了贡献。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李书城不愿与他们为伍，他同情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当局以“倾共”的罪名关押，直到1928年春才被释放。

通过这一连串的事情，李书城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性，开始参加反蒋的活动。1930年他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发起的反蒋战争；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湖北发起了反蒋的“和平运动”，成立了和平促进委员会。他还到长沙劝说程潜率部起义，为湖南实现和平解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20世纪30年代，李书城在家乡湖北担任过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管的都是与老百姓吃穿住行息息相关的事务，与农业和农村工作密不可分。

历史总是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李书城为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共产党没有忘记他。周恩来在考虑部长人选时，就想到了李书城。并特地派薄一波去找他谈话，希望李书城打消顾虑，出任农业部部长一职。

周恩来也没有看错人。面对农业基础设施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极端低

下的局面，为解决四五亿人吃饭穿衣这个大问题，年近古稀的李书城一方面刻苦学习党中央有关农业问题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知识，同时不辞劳苦，深入农村了解情况。有时他还头顶烈日，蹲在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研究如何改良土壤，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俨然是一位朴实的老农样子。他在农业部部长任内，一直大力提倡奖励农业科学研究，倡导技术革新，并为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兴修农田水利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一年农业就出现了转机。三年后，李书城在国庆三周年的前夕发表的《三年来新中国农业生产的伟大成就》一文中写道：

> 三年来，由于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体农民的努力，全国农业生产不但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而且超过了这个水平。这个辉煌的成就是值得庆幸的。由于这个成就，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已经稳固起来。

李书城在农业部长任上一直干到 1954 年，为提高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竭尽全力，为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国民党要他当农林部部长，梁希说："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的大事，岂不耽误大事?"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林垦部部长，梁希说："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1949 年 10 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了新中国首届政务院组成名单。66 岁的梁希被任命为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

对于一生淡泊名利的梁希来说，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就多次以高官相诱，他坚决拒绝。1945 年，国民党当局派人以农林部部长的高官相诱，梁希对人说："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的大事，岂不耽误大事?"

当然，那时的梁希是不愿与国民党为伍的。

新中国成立后，当周恩来公布首届"内阁"名单时，被任命为林垦部部

长的梁希感到不安。他递了一个条子给周恩来说："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立即回复一个条子说："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这次没有推托，他欣然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国民党要他出任农林部部长，共产党执政后也任命他为林垦部部长。的确，如果要论专业和学识，梁希确是林业部部长一职最适合的人选。

1883 年出生的梁希是浙江吴兴双林镇人。早年他学的并非林业。他先是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学习西方军事。因成绩优秀，又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并在 1907 年加入同盟会。尽管他接受了几年的军事教育，但他一生中除了短暂从事过军事训练外，无缘于军事和军队。

1903 年，梁希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主攻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从此，他就与林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6 年，梁希学成回国，先是在安东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后又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书。1923 年他自费到德国留学。在萨克逊森林学院德累斯顿——塔朗脱研究所研究林产化学和木材防腐学，历时四年。德国是林业林学最先进的地方，梁希走进这林学理论的殿堂，如饥似渴地吸收养分，这为他后来成为林学理论的一代宗师奠定了基础。

梁希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业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当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要他当官，他拒绝了，但他答应运用所学的知识造福桑梓，同意制订发展浙江森林事业的计划。为此，他的足迹遍及浙江的山山水水，在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上，写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传世之作。

眼看国家森林遭到破坏，他的心在流血。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能做的，就是在林业教学科研方面多做些实事。他拒绝了朱家骅让他当中央大学农业学院院长的邀请，专心致志做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就在中央大学农业学院，他苦心经营森林化学室长达 16 年之久，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又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作为中国林学理论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梁希出任林业部部长，可以说正是人尽其才。

梁希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对中国共产党一直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也是开国后周恩来力邀梁希进入首任内阁的原因。

梁希虽然喜好读书、教书和科研，但他不是书呆子，他关心国家大事，有着强烈的爱国心。1935年，当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时梁希就感到华北危急迫在眉睫，他和他的同事共184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已迁到重庆的梁希无时无刻不关心时局。面对国民党军队步步后退，梁希从心底里发出了“中国的前途在哪里”的疑问！

为思考中国的前途，梁希成为《新华日报》的热心读者。他甚至说，饭可以一日不吃，《新华日报》不可一天不看。这是因为他从《新华日报》上获得了许多在国民党统治区得不到的消息。他从《新华日报》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渐渐地，梁希开始同共产党有了联系，对共产党愈加了解。他对朋友说：“中国有灯塔了，中国有贤相了，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对在前方英勇抗战的八路军表示了无限的崇敬，而对那些不败而溃的国民党军队充满了厌恶。当为八路军组织捐款时，生活十分节俭的梁希一下就捐出了100元，作为八路军购置寒衣之用。

皖南事变后，对国民党失望的梁希提出要到延安去。他对中共地下党员陈晓原说：“你能不能转达周恩来先生，设法送我去西安，然后步行去延安。”周恩来知道后，从梁希年高体弱的实际出发，再加上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劝梁希暂时不要去延安。梁希虽然没有去成延安，但他的心的确是真诚的。在国统区，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投入到了参加要求民主的斗争。

抗战后期，重庆文化界开展了反内战、反投降、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梁希作为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在郭沫若发起的签名运动中签名。国民党当局诱迫他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梁希给他们回信时说：“名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备承关注，谨表谢意。”见软的不行，国民党当局竟运用军警，用武力逼迫梁希登报否认签名之事。梁希坚决抵制。他对特务头子徐恩曾说：“名已签了，怎好反悔？请你徐先生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能不能这样做。”徐恩曾和其他特务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梁希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他发表大量反独裁、反内战的言论，讥讽国民党政府，鼓励人民“提起精神，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来，打钟！打林钟！林钟是我们的晨钟，林钟是我们的警钟，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唤起社会，觉醒政府，警告脑满肥肠、醉生梦死的人们”。

梁希的言论惹恼了国民党。他接连受到了特务的恐吓。友人劝他暂避一时，从长计议。他对友人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之后，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

他继续战斗着，对自己的安危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对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还给予鼓励和支持。1948 年 5 月，南京市大中学校为纪念五四运动 29 周年在中央大学操场举行篝火晚会。梁希到会讲话，他不畏白色恐怖，面对国民党特务切断电源的捣乱，站在高台上，指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说："同学们！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学生们受到极大鼓舞。当天晚上，梁希写下诗句，表示要战斗到底的决心：

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
起看星河含曙意，愿抛鲜血荐黎明。

国民党政府在覆灭前，要对民主人士下毒手。梁希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梁希等人的安全，决定请他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离开南京。1949 年 4 月 8 日，梁希秘密离开南京，于 4 月 24 日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梁希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是他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共产党没有忘记老朋友。9 月 21 日，梁希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他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当周恩来宣布政务院组成人员时，梁希被任命为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

在国民党时代一直拒绝做官的梁希面对共产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毅然走马上任。

他在北平东城区米市大街无量大人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挂起了"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的牌子。他高兴地说："院子虽小，能装三山五岳；房舍简陋，可装下五湖四海。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研究中国林业的方针大计，小屋就是个起点。"

面对当时多达四十多亿亩的荒山荒地和仅占国土面积 5%的残破林区，梁希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对林业部的其他领导说："我这样的年龄应该在家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欢欢乐乐度过晚年。但是党中央委我以重任，

要为中国林业做一点贡献，这也是老骥伏枥。”

梁希不顾近七十岁的高龄，到全国各林区考察。在考察西北地区林区时，他骑着小毛驴到达林区。有谁知道，小毛驴背上坐着的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部长呢？

通过调查，梁希形成了发展中国林业的思路。他提出了“彻底消灭荒山，绿化新中国”的口号，号召大家迅速地、积极地在荒山上大力造林。他在为《中国林业》杂志撰写的《新中国的林业》一文中，为中国的未来山河描绘了一幅动人的远景：

>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化语成锦旗，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

梁希在新中国林业部部长职位上一干就是九年，他用自己的知识、汗水、心血为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五、蒋介石曾哀叹：“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就任共和国的粮食部部长后，章乃器以渊博的学识、非凡的业绩赢得毛泽东的赞赏

章乃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与蒋介石手下的得力干将陈诚私交不错，却又长期与蒋介石作对；他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却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他的经济理论在国内外都颇具影响；他没干过律师，但他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其滔滔辩才令人折服。陈诚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要他重用章乃器，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是的，在人生奋斗旅程中，在对比了国共两党后，章乃器已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了。新中国成立后，颇具干才的章乃器受到重用。他是政务院的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政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他又被任命为第一任粮食部部长。

“民以食为天”。在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部部长责任重于泰山，共产党如此信任章乃器，把这付重担交给他是有缘由的……

章乃器有着卓越的才干。1897年出生的章乃器是浙江省青田县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十分重视章乃器的学习，很早就把他送到私塾发蒙读书。稍长以后，又被送到青田县立敬业小学学习。章乃器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后来他又在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习，靠奖学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1918年，他先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后又到京兆银行工作、浙江实业银行工作。工作中他显示出很高的业务才能，受到老板的重视，担任过京兆银行的襄理兼营业部主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1932年3月，他还联合银行界其他人士，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6月，建立了中国征信所，章乃器任董事长。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他领导的征信所积极开拓，使原有四家外商信用调查机构先后倒闭，中国征信所则独步天下。

在实践操作上是一把好手，在经济理论上章乃器也大有建树。他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他勤于钻研、善于思考、经验颇丰，使他在经济理论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中国经济“国际化”，提出了“外国在华投资数字的增加，是战争爆发的寒暑表”的重要观点。他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独立而统一的货币，反对加入英镑或美元集团，是中国“废两改元”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对金融也有独到见解，他说，“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而“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信用之火”烧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沸腾洋溢，反而要浇灭“信用之火”；接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成了恐慌的现象，即所谓资产的冻结。

章乃器的经济学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年秋，只有中专学历的他被上海光华大学的沪江大学聘为教授，讲授“国际金融”和“中国财政”等课程；他的一些著作和论文被译成英文和日文，外国同行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经济理论方面颇有造诣的章乃器还具有一流的文才和口才。九一八事变后，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乃器发表了大量文章加以批驳；华北事变后，章乃器又代表救国会撰写了大量文件、宣言，他因此获得了“宣言专家”的美誉。章乃器曾多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但他毫不畏惧，以敏锐的思维、雄辩的口才与国民党当局较量。对于1936年那次“七君子

事件”，邹韬奋在《经历》一书中记载了章乃器在法庭上斗争的情形：

> 当审判长问章乃器曾否煽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时，引起了他抑制不住的愤怒，他昂首睁圆着眼睛大声说：“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力量还不够，倘若我有力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我要骄傲地回答审判长，我曾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审判长停了好一会儿，才又问道：“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动的，那至少是同情的。”章乃器又不假思索地高声答道：“是！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所受的虐待，和猪猡一样！请审判长问一问全法庭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同胞遭受侵略者这样残酷的待遇，谁不同情！”

章乃器在法庭上同审判长唇枪舌剑，使他们丑态百出，狼狈不堪，完全处在被告地位。在狱中，章乃器还以顽强的毅力写就了十万余言的《救亡运动论》。文中他批判了“中国必亡论”、“五十年后抗日论”、“三年亡国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论”、“物质对比论”、“唯武器论”等形形色色的亡国论，提出了“科学的抗战必胜论”。章乃器还批判了“个人恐怖主义”、“本位救国论”等，认为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他在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与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观点异曲同工，足见章乃器不凡的学识。

章乃器虽与陈诚私交不错，一生却与蒋介石为敌，他是一个明是非、重气节的君子。章乃器与陈诚两家是世交，两人是同窗好友，章乃器还是陈诚父亲的学生，他们的私谊甚厚。陈诚也钦佩章乃器的才干，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起用章乃器。蒋介石软硬兼施，但章乃器不为所动，他看不惯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一生与蒋介石唱对台戏。还在 1927 年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章乃器就在他创办的《新评论》半月刊上著文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指斥蒋介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叛徒。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发表大量文章批判蒋介石的错误国策。他在《四年间的清算》一文中写道：

> 几年来，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青年！毁灭了多少的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

> 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想到这种种，我不能不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

这是一颗颗投向蒋介石的重磅炸弹。

1936年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三人在南京与蒋介石面谈时，蒋介石又老调重弹，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结果章乃器他们与蒋介石不欢而散。章乃器顺道走访同窗好友陈诚时，一见面，即针对蒋介石在面谈时的一些观点，质问陈诚为什么现在仍然不主战而一味对敌屈服，为什么现在还继续打内战。陈诚极力为蒋介石辩护，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陈诚只得败下阵来。

蒋介石想笼络章乃器。先是委任他为四联总处专员，章乃器辞而不就。蒋介石想让章乃器出任陕西或甘肃省财政厅长，他又拒绝了。陈诚奉命当说客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章乃器对陈诚说：

>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真读过，也很佩服，还办起了一个刊物叫《新评论》，为他作过宣传。我一直决心当三民主义的居士，不必出家当和尚了。其实有些居士信佛，比起和尚还来得虔诚。我见过偷吃狗肉的和尚，却未听说过有口是心非的居士。

一席话说得陈诚哭笑不得。章乃器从此再也没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

软的不行，蒋介石来硬的。秃顶的章乃器由此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

1946年2月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重庆校场口广场举行。特务们在会议开始前就进行破坏。几个特务围攻章乃器，对他破口大骂，挥起拳头向章打来。谁知章乃器多年习武，就势一闪，特务的拳头落了空。但是，更多的特务向他扑来。原来特务事先得了通知，要他们重点进攻秃了顶的人。章乃器秃顶明显，成为第一个攻击对象，他在几个学生的

掩护下，戴上一顶帽子才得以脱身。施复亮也是秃顶，受伤最重。

惨案发生后，有人劝章乃器离开重庆暂避风头，但他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坚决站在反暴斗争的最前面。他在家里准备了一些酒瓶、石块，以在不测时作防身之用。

随着蒋介石反动面貌的日益暴露，章乃器对在国民党统治下追求民主政治的幻想破灭了，而与共产党从情感到行动则逐渐靠拢。

章乃器和他的家人与共产党很早就有渊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章乃器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朋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设法支持共产党。他的大弟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知道的事。大革命失败后，大弟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换成钞票，充作党的活动经费。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到在上海的同学郑文利处。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一次杨汇来6000元巨款，国民党特务跟踪调查。章乃器得到消息后，迅速将汇款全部转移，结清账户。特务查到银行时一无所获，党的活动经费安然无恙，地下党组织也避免了一次劫难。

1938年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到安徽任财政厅长时，也按照周恩来的嘱托，通过工作释放了安徽境内绝大部分政治犯。对于新四军他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新四军在安徽购买物资，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拦，章乃器就通知新四军有关人员，以后由财政厅代购有关物质。当新四军在山区作战缺衣少药时，章乃器就通过战地工作团给新四军送去急需的药品。

新四军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财政困难。章乃器知道情况后，就大胆地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这在全国各省中绝无仅有。

章乃器还和中共安徽省工委及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张云逸、张劲夫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对共产党的主张深表赞同，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的方针，是抗战的大方针。他还答应从财政上支持中共安徽工委组织皖西人民自卫军。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对民主建国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随着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章乃器的这一愿望只能是空中楼阁。他与国民党完全决裂了，与共产党真正站到了一起。1948年当毛泽东向章乃器发出邀请电，请他北上共

商国是时，章乃器义无反顾，投身到人民的怀抱。他于1949年初到达北平后，受聘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面对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在经济上企图搞垮共产党的图谋，章乃器运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为稳定金融、币值和物价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深知这一部门的重要性。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就说得非常露骨："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显然，国内外一些希望共产党垮台的人正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如果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将难以稳定。

章乃器上任后，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为了扭转粮食生产的被动局面，章乃器一面呼吁大力生产，一面协助中共中央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这在当时对解决粮食问题的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章乃器在主持粮食部工作期间，保持着学者的本色，做事严格按规律办事，强调粮政管理科学化，通过努力工作，实现了粮食企业的扭亏为盈。由于他勇于负责，多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毛泽东称赞粮食部的工作是"后来居上"，周恩来则请章乃器向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人介绍粮食部的经验。

六、在新中国首批部长任命名单中，史良、李德全榜上有名，她们一起写下了中国女性担任政府部长的第一页历史

1949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的人员任命名单。在政务院首批部长任命书中，出任司法部部长的史良和担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因是众多部长中仅有的女性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女性走上政府部长的重要岗位，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是新中国给了妇女当家做主的机会；是史良、李德全非凡的贡献、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品，才使她们有机会成为书写中国第一页历史的人。

出任司法部部长对史良来说是人尽其才。她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律师。1922年她从女子师范毕业后，于1924年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最初学习政治，后转学法律。这个选择与她以后出任司法部部长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为什么转学法律，史良在接受记者子冈采访时说得非常明白，她说：

> 在学校里我比较活泼，喜欢做点事，发言的时候也极多，慢慢的自己有了一种企图，想改造环境，想做一点事，也许是有点领袖欲吧。当时又是傻傻地痴想着要一个国家走上正途，只要政治上来几个人才好了，真有点“一手打成天下”的怪想头。所以我起初是进政治系，过了半年想想政治太空洞，不如学法律，还好像有一样东西放在那里。我又感到法律虽然被一般人轻视，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所有物，是特权阶级的护身符，但在目前我们还需要它，我们现在还是在这需要法律的国家，同一样东西要看人的用法怎么样。我曾看见多少被陷害的有着革命意志的青年，弄得有冤无处诉，他们没有钱，没处请律师，我便感到不妨在这方面试一试，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入学后，史良学习非常用功。在这里，她还遇到了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董康。史家与董家是故交，董康对史良多有关照。后来史良能成为上海的大律师，也与董康的关照提携有一定关系。

1927年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然而，刚刚走进社会的她因得罪上司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进了监狱，而且一关就是两个月。

这一次牢狱之灾，使史良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正是通过这件事，她认识了国民党的黑暗，认识到国民党司法制度的弊端，坚定了要当一名主持正义的律师的决心。

1931年，史良开始了她的律师生涯。最初是同老师董康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并深得老师的喜爱。她对《六法全书》非常熟悉，竟然能全部背诵出来，这对她做律师非常有帮助。大约一年后，史良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而且旗开得胜，第一场民事官司就打赢了，赢得酬金500大洋。

史良当律师主要不是为了赚钱，有时一些穷人请她当律师，她分文不收。为营救一些革命者，史良也不遗余力。在她的帮助下，著名左翼作家艾芜、贺龙的前妻向元姑、中共地下党员熊瑾玎和任白戈、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都被营救出狱。

在“七君子事件”中，史良更以对法律条文的谙熟和出色的辩才，驳得检察官张口结舌。

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法律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史良走上司法部的领导岗位，自然是共产党量才录用的结果。但共产党让史良走上司法部部长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看中的却不光是她出色的业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贡献和人品。

史良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五四时期她在常州积极进行爱国宣传，呼吁国人发奋救国。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时，她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九一八事变时，她的心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华北事变后，史良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救国组织——妇女救国会，后来她又成为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袖之一。全面抗战开始后，史良积极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争取妇女的平等合法权利，是妇女运动的代言人，是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多年的奋斗中，史良逐渐认清了蒋介石的面目，日益向共产党靠拢。还在重庆谈判时，史良就对毛泽东说，蒋介石这个人不可靠，在谈判中不能上他的当。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事件发生后，史良对蒋介石更加痛恨，她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参加了筹办李公朴、闻一多等人的追悼会，同时更加积极地投身到争取民主的斗争行列。国民党为了禁止史良参加民主运动，于1947年3月初，通过上海的一个法院给史良送来传票，限令她到案。史良对此嗤之以鼻。当她得知国民党当局禁止她参加三八妇女节的纪念活动时，非常愤怒，勇敢地出席了上海妇女界主办的纪念活动。1948年，史良又积极参加了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

史良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欲除史良而后快。在上海临近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电：“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有人打电话提醒史良“小心，小心，今晚捕人”，她不仅没有躲藏起来，反而继续设法营救其他被捕的战友。直到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可靠情报

正式通知史良，国民党特务要逮捕她，史良才与丈夫一道暂时躲避。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史良才开始了她新的生活。已心向共产党的她，积极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各项活动，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这位旧中国名声显赫的大律师，终于在新中国有了施展自己才干和抱负的大舞台。

作为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同样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

李德全有着特殊的身份，她是爱国名将冯玉祥的夫人，在复杂的政治军事风云中，她尽力辅佐丈夫，投身社会实践，体现出一位优秀女性卓越的才干和胆识。

1896年7月，李德全出生在直隶省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德兴庄草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境虽然不好，但阻挡不了李德全求知的渴望。1915年，她几经周折考取了私立协和女子大学，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之一。1924年她和冯玉祥结成终生伴侣。冯玉祥是一位敢作敢当、治军严谨、颇具爱国心的军事将领。他反对过袁世凯称帝、讨伐过张勋复辟，时任陆军检阅使。

李德全和冯玉祥的结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长期在教会和学校圈子中活动的李德全，从此接近士兵，参与政治，接触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而李德全学过的现代西洋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又在某种程度上为冯玉祥的生活展现了新的世界。他俩各有所长，又非常相似。他们都有健壮魁伟的体魄，慷慨直言的性格，富有号召力的演说才能，都勤奋好学，生活俭朴，接近群众，在政治风云中又能相互鼓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冯玉祥的前妻留下五个子女，多未成年。李德全操持家务，精心抚育幼小。同时她伴随丈夫辗转军旅，深入官兵中嘘寒问暖，深入到眷属身边排忧解难，还为随军和驻地儿童开办学校。她力图改变这支以穷苦人民为主的军队的素质，向广大官兵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消除封建习俗。通过她的不懈努力，冯玉祥所部萌发出追求进步的政治倾向。

在冯玉祥从一个旧时代的军人转变为革命军人的过程中，李德全也起了重要作用。

为帮助冯玉祥领会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李德全把孙中山赠冯的《建国大

纲》一书的装订线剪断，挑灯夜读，精心研读。

为了解代表时代进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李德全又陪同冯玉祥访晤了中共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聆听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1926 年 5 月，为寻求革命真理，李德全还陪同冯玉祥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莫斯科，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款待了他们，并赠给冯玉祥一部俄文版《列宁全集》和一支手枪。

李德全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心的中国人。九一八事变后，正隐居泰山的冯玉祥、李德全不计个人荣辱，直奔抗日前线。1933 年，李德全积极支持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开赴抗日前线。

这一时期她还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泰山，她经常为当地老百姓和学生放一些进步的影片，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在南京、武汉、重庆，她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为抗日呼号。在一些大型集会上，常可见李德全演讲的风采；在抢救难童及伤病员的"战场"上，可看到李德全活跃的身影。

李德全还是一个为和平民主而不懈努力的斗士。她不惧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暴力，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线。就是在 1946 年远赴美国后，仍克服各种困难，公开揭露蒋介石独裁卖国的行径，抨击美国政府的援蒋内战法案。1948 年初，李德全、冯玉祥就 20 年来对蒋介石的亲历见闻，合作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是一颗投向蒋介石的重磅炸弹。

1949 年 2 月，早已心向共产党的李德全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北平。中国共产党没有冷落这位杰出的女性。9 月，作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的李德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首批部长名单中，李德全占有一席，与史良一道，成为仅有的两位女部长。

第六章 “五马”进京 朝野刮目

聚焦时间：1952年8月

聚焦地点：北京

聚焦人物：邓小平、高岗、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

聚焦话题：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炙手可热的“东北虎”高岗，坐上了“经济内阁”第一把交椅。当时，谁能料到他后来会遗臭千年

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家中枢亟须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人才。于是，毛泽东分兵点将，刘少奇具体落实，将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北五大局的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和习仲勋五名领导同志调进北京，就任新职。国家各项工作进一步走上正轨。一时间，“五马进京”传为佳话。

一、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副主任。毛泽东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根据1952年7月中央的决定，作为“五马”之一的邓小平由西南局调来北京，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以后还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的上级是周恩来。于是，这对当年曾经在上海和巴黎共同战斗过的伙伴，又开始了新的合作。

当时，中共人才济济，何以邓小平一人被刮目相看，迅速擢拔？我们从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一段对话中，可以获得圆满的解答。

1951年，民主人士梁漱溟等在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回京后，9月3

日，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南海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梁漱溟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收获，并谈到他对四川工作和邓小平的印象。他说："解放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深知梁漱溟是一位不随俗、不趋时、不媚上甚至很孤傲的人，难得听到他称赞别人。而年轻的邓小平却得到了这位民主人士的赞扬，毛泽东显得尤为兴奋，他笑出了声，大声地赞同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在军事上，邓小平是一把好手。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考虑由谁率军挺进大西南、谁进驻上海的问题。陈毅出于对刘、邓的敬重，提出让刘、邓进驻上海，因为刘、邓挺进大别山消耗太大，而由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刘伯承和邓小平则表示，他们对西南更熟悉，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留驻华东更为有利。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把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刘、邓。

解放大军渡江以后，5 月 23 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预先号令，指示刘、邓统率第二野战军主力做好进军西南的准备，尔后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共同完成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任务。6 月 17 日，中央军委又指示刘、邓：二野西进时机似以 9 月较为适宜。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此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二野便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争取尽快西进。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南也加紧了抵抗的部署。蒋介石于 8 月飞抵重庆，一下飞机就发表谈话，扬言"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

蒋介石企图依靠残存在西南的45万正规军队与地方杂牌军，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凭借川滇黔边的险峻地势，与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如固守不成，则保存实力退向康、滇或逃窜国外。

可是，毛泽东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战略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我军的计划是以二野为主力采用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位于川北的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位于陇海路西段的我第18兵团等部，首先抑留胡宗南于秦岭川北地区，待二野主力入川切断敌退路后，再迅速入川，协同聚歼川境之敌。

按此计划，我军于11月1日发起川黔战役，突破敌军防线，于11月15日一举攻克贵阳，16日解放彭水，直通乌江东岸。至28日已形成对重庆的包围之势，并挺进川南切断敌军南逃的后路。

11月27日，毛泽东电告刘、邓，蒋介石已令胡宗南将其第三军用汽车运送重庆，希望二野注意吸引更多敌人于重庆，再聚而歼之。刘、邓研究后回电毛泽东，提出不宜迟缓过久攻打重庆的建议，毛泽东当即回电同意。30日，刘、邓命令发起重庆战役，这个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当日获得解放。蒋介石于进攻前几小时从重庆飞逃至成都。

重庆解放以后，刘邓又发出“继续西进”的指示，大军向成都方向进发。在此形势下，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联名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布和平解放。蒋介石部署在成都的嫡系胡宗南集团军，已成为瓮中之鳖。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

成都的解放标志着进军大西南战役的胜利结束，共歼蒋军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九十余万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的挣扎。

1950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西南局依据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制定了“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的规划和任务。邓小平解释说，这就是安置、教育和改造起义、投诚、俘虏的90万国民党官兵，剿灭90万土匪，发动6000万西南地区的人民搞土改闹翻身，提高60万干部、战士的素质，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通过努力，这四项任务都得到了较好的完成。

在这次西南战役中，邓小平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政治上，邓小平也是一把好手。

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书记和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当初曾考虑"经营西藏问题"由西北局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但成都战役后，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苏联访问中致电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诸同志，称："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担。"毛泽东还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毛泽东又说，"西南刚刚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毛泽东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邓小平接毛泽东电示后，连续召开西南局常委扩大会议，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加紧了筹备工作。1月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拟抽调第18军，在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担任进藏任务，并报告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莫斯科得此报告，非常欣慰，于10日回电中央及邓小平等人："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

2月15日，西南局和军区颁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指战员努力奋斗，"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完成统一祖国的事业"。

按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亲自起草了如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活动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邓小平提出的这十条报中央后，毛泽东仅在第八条“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一句中，加写“及西藏领导人员”七字，对十项政策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这十项政策既是和西藏当局进行和谈的基础条件，又是进藏解放军开展争取工作的依据和遵守的准则。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是年 10 月 7 日，第 18 军经过充分准备，开始向西藏进军。10 月 24 日，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歼敌五千七百余人，解放了昌都，打开了解放军进藏的大门。与此同时，还加紧了争取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进展。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协定以邓小平草拟的十条为基础，规定了 17 条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10 月 26 日，解放军进驻拉萨，胜利完成了解放西藏的任务。

在进军西南和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非凡的政治智慧。

——在经济上，邓小平还是一把好手。

主管财政经济，对邓小平来说，是一项比较熟悉的工作。1932 年，时年 28 岁的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就十分注重财政经济工作，提出了独具一格的治县方略：抓春耕，促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也始终是他主管的重要工作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八路军129师以小米加步枪的装备，在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接济的情况下，为何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呢？邓小平深谙创造这个奇迹的秘诀。他说：

> 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而上述经验中，其中一条成功的做法，就是"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通过实行"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按纳税实力分等累进的纳税原则，既照顾了群众的负担能力，又照顾了抗战的需要。在解放战争时期，刘、邓挺进大别山后，针对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卖不出去，几十万大军面临生计维持的问题，邓小平说，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搞垮了工商业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由于邓小平及时地纠正了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做法，保护了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大别山的经济发展，同时在军事上又成功地击败了蒋介石对根据地的合围，因而使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1948年初，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解放大西南以后，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党、政、军重要职务外，还有一个在当时来说非常重要的兼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亦称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西南局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财委的工作，名义上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因受邓小平领导，实际上是西南局的财委。财委听起来似乎只管财政经济工作，但由于经济工作在当时十分重要，关系到方方面面，会上讨论的问题，不仅是财经问题，政治、经

济、人事都有所涉及。实际上，财委是军政委员会中除了军事工作外，总揽了其他一切工作的一个综合性大区行政领导机关。

邓小平长期从事财经工作的实践，尤其是他主持西南财经工作两年多的丰富经验，为他到中央主持财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兼任财政部长期间，注重发扬民主，坚持调查研究，勇于承担责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邓小平在当时繁忙的工作中，坚持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当时正是1953年夏季财政会议以后，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小平同志察觉了这一点。有一次部办公室会议，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的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做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两句话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上做了一个准则性的回答。由于权责分明，使得下面的同志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

邓小平还根据对全国财政收支状况的详细调查，于1954年1月，在中央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当时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三句话精神，提出了著名的财政工作六条方针，即：

第一，预算归口管理；
第二，收支包干使用；
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交；
第四，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
第五，动用国家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
第六，加强财政监察。

邓小平还简要论述了为什么实行财政工作六条方针的原因：

第一，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

第二，只有集中财力，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

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第三，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

在这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一定要以中央、全局、集中统一作主导，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局，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

邓小平在主持财政部工作中提出的上述财政工作方针和基本指导思想，很快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迅速扭转了国家财政的被动局面，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高岗由东北调进北京，出任国家计委主席。董必武说："现在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要请客"

1952 年 8 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调进北京，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于是，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和习仲勋，陆续从东北局、西南局、华东局、中南局和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11 月 16 日，中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下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任主席。这时候，高岗还有数项要职在身：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他还是七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别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体制规定：国家计委不属于政务院所属，是直接归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的制定国民经济规划和预算的最高行政机构，素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计委主席的职位在中央举足轻重。

至此，高岗从权力、地位上看，都是十分显赫的。难怪董必武开玩笑地说："现在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要请客！"

高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瞩目的显赫地位，是有其原因的：

——高岗有着令人惊羡的红色履历。

高岗原名高崇德，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他小时候放过羊、打过柴，也上过学，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冯玉祥任总司令的国民联军从事兵运工作。不久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教官。

这时的高岗年轻英俊，精力充沛，对工作满腔热情。由于勤奋好学，他在理论方面有独到的一面，不但能系统地向学员阐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还常常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旁征博引，因而常在课堂上赢得阵阵掌声。他说：“将来革命还得凭军事、靠武装。喊口号解决不了政权问题。”在1927年初，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着实不易，足见高岗是有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的。

就这样，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黄埔军校毕业的刘志丹讲军事，高岗讲政治，被誉为“中山军校双璧”。

大革命时期，高岗和中山军事学校中的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直接参与领导了陕西农民运动，很快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潮。至6月，全省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50个，有区农协179个，村农协3828个，会员41万，农民自卫武装人员在十万以上。

大革命后，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采取合作态度，陕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高岗离开中山军事学校后，及时找到省委有关负责人。在他的要求下，省委将他派往甘南从事军事工作。

经受过革命实践锻炼的高岗，在甘南工作中，很快显示出其才华，受到省委领导的肯定和赞许。不久，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高岗调回省委，1930年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交通员。

1933年10月4日，刘志丹等人回到照金。高岗与刘志丹并肩合作战斗。10月16日，国民党第17路军孙友仁团及民团数千人，配合炮兵，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被迫撤离薛家寨。10月18日，陕甘边红军在临时总指挥部的指导下攻克合水县城，毙伤俘敌两百余人，缴枪两百余支。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期三天，会议做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42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1月8日，红26军第42师在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

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

作为师政委，这时的高岗开始以陕甘红军的核心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火热的三秦大地上。

1935 年 4 月底，敌人调集重兵，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军情紧急，高岗被党组织调回陕北根据地。

在刘志丹、高岗的领导下，红 26 军投入了激烈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1935 年 5 月 1 日到 8 月底的四个月中，我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战果辉煌。共歼灭敌正规军五千余人，民团三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七千余件及大量军用物资等。

年仅 30 岁的高岗荣任这一英雄部队的统一领导机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

1935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并改组了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还决定西北红军和红 25 军合编为红 15 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高岗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这次胜利会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高岗的上述经历，自然奠定了他在党内不同凡响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高度信任高岗。

1935 年 9 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指挥东北军主力，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战略逐步压缩陕北根据地，企图围歼红 15 军团于保安、安塞地区。

正当士气高昂的红 15 军团将士厉兵秣马，准备迎击来犯之敌时，红 15 军团发生了不幸事件。王明“左”倾路线所制造的肃反扩大化，使刘志丹、高岗等红 15 军团主要领导被自己的同志关了起来。

在米粮山监狱，高岗被作为主要犯人单独关在一间黑暗潮湿的土牢里。从牢狱人员与警卫员吵闹的声音来判断，高岗知道这次被肃反关押的至少还

有刘志丹、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军人。

不幸之中还有万幸，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结束长征，来到陕北。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得知刘志丹、高岗等被错误地关押在狱中，立即指示：停止和纠正这个错误。并派王首道等率人把他们都救了出来。

毛泽东很快会见了刘志丹、高岗等，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感激地说：“我们真高兴！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啊！”

毛泽东同样激动地回答道：“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是我们回到了家嘛！”

刘志丹和毛泽东可算得上是老朋友，他们在广东时就有过交往，而对于跟毛泽东一样搞农运出身的高岗，毛泽东也同样表示友善，予以关注。

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亲自提拔高岗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他欣赏高岗年轻有为，办事干练。

当然，高岗对毛泽东的救命之恩和赏识之情，更是心存感激。因此，他常背着盒子枪，带着保安巡逻队，亲自检查可疑人员，为建立和巩固陕甘宁边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东征宣言》，之后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浩浩荡荡的东征队伍中有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15军团、刘志丹的红28军和阎红彦的红30军，高岗作为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留守陕北红军的大本营。

历时两个月的东征完成了原设想的战略意图，用行动宣传和证明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东征作战中，红28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从此，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继谢子长、刘志丹先后牺牲后，就剩下高岗这位最主要的代表了。

中央书记处开会时，毛泽东微笑地指着已很熟识的高岗说：“我们初到陕北，人生地不熟，高岗同志为中央机关的安全出了大力，将来在保安树碑时，要给高岗同志树一块最高最大的碑。”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先后提议高岗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等职。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陕甘宁边区作为人民抗战的总部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战的心脏。怎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安全，是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后须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央组建了边区保安队，直属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指挥。边区保安队由原陕甘宁边区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共五千余人，高岗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作为边区保安司令，高岗率领这支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精锐之师，一方面抵挡外来的敌、伪、顽军的直接进攻；另一方面又要时刻保持警惕，肃清混入边区的特务和叛徒。

这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工作，它需要勇敢和缜密。

高岗深知其意义重大，经常亲临保安一线，认真组织展开各项斗争，在抗日烽火中始终保住陕甘宁边区的一方平安。

毛泽东曾和高岗开玩笑说："你是我的保镖。"

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

高岗不仅勤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而且果断、干练，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他是搞农运出身的。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他领导的北满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同时，他还领导北满军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军队建设，大量扩充兵员。到1946年底，北满根据地共补充兵员三万多人，使得四平保卫战后遭受损失的主力师均达1万至1.2万人左右，有的师还增编了补充团。

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1946年8—10月，为了适应作战需要，更大地发挥主力部队机动作战能力，民主联军总部将北满部队编成三个野战纵队又七个独立师。

到1948年1月，根据我军发展变化，中央军委改东北民主联军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为第一副政委，高岗等任副司令员。

辽沈战役前夕，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这片黑土地上已可谓"无敌"。

恶战即将来临，为了适应东北大规模作战和下一步战争发展的需要，中

央军委对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高岗为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移师辽西，专务作战。而繁杂的大量的地区性、事务性工作交给高岗领导。

高岗退出东北野战军领导职务后，一方面通过展开军区地区性事务工作，配合野战军前线作战；另一方面着手地方群众工作，组建东北各级地方政权，为日后建立巩固的东北战略大后方做准备。很快，辽沈战役取得辉煌胜利。

东北战场尘埃甫定，留下来的高岗出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这时候，高岗更加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1950 年 2 月，当高岗向毛泽东提出回京工作要求时，毛泽东说：“哎呀不行，你现在把守东北边关，那里还需要你。一旦爆发战争，你这个大司令还得重振雄威呢！别人在东北，我不放心。”

高岗回东北局后，便对干部讲：“毛主席说，只有我他最放心。我在东北守大门，他才能睡得着觉啊！”

——高岗在 1951 年得了“两分”。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土改后农村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的政策上，基本的思想倾向是“左”的。1949 年 5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指出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反的”。到 1951 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结局是：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高岗的意见得到了肯定。

第一个问题：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如何正确处理工会同党、政府、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被提出来了。1950 年 7 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公营企业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了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

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

高岗对邓子恢的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1951年4月，他主持写出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指出，公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是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高岗于4月22日写信请毛泽东审改此文。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支持了高岗的观点，这就使高岗在政治上得了“一分”。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业互助合作。

土改以后，我国的个体农业要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党内意见是一致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劳动互助的形式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的积极作用，党内也无异议。但对农村基本中农化以后，是否应当允许少数富裕中农冒尖，以及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是否仅通过组织合作社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在党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之一是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为此，应该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因素，在互助组织中逐步地增强，使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以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

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刘少奇则持另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

在党内关于中国农村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意见中，毛泽东批评

了刘少奇关于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并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就在这重要时刻，高岗于10月14日向毛泽东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报告说：东北农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发展生产的运动，农村经济获得了普遍的上升。经济上升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95%。其中上升到中农水平的约占60%—70%；较土改时有显著改善的约占25%—30%；上升户中约有20%已成为富裕中农。新富农发展较慢，据各省中发展最多的黑龙江省统计，约占农户的0.8%。“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

毛泽东看了高岗的报告以后，于10月17日将此件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嘱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毛泽东还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充分肯定了高岗的报告。批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这样，高岗又得了“一分”。

1952年，“五马进京”本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但高岗却想歪了。他自忖道，既然五员大将进京加强党中央的领导，不正说明毛泽东也感到中央目前的班子不那么得力吗？在上次那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中，刘少奇的主张和处理措施，不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吗？这是明摆着对刘少奇的不信任嘛。而我高岗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保持了与毛泽东的一致，现调我进京任要职，这不也是明摆着的，毛泽东要我高岗逐步取代刘少奇嘛！

在这种自鸣得意的主观猜测下，高岗野心进一步膨胀，并开始了罪恶的阴谋活动。

高岗的如意算盘是，把刘少奇、周恩来挤到一边，自己担任党的副主席，当政务院总理，以后逐步夺取最高权力。这一点，高岗后来在自己的反省材料上也有交代："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高岗对刘少奇的忌恨由来已久。刘少奇在天津讲话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甚至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后来还一度担任过财经方面的总顾问）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他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用"一箭双雕"的手法，把刘少奇的许多话加在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他还把刘少奇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一贯的、系统的，是路线错误。他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高岗还把搜罗到的所谓刘少奇的"错误"集中起来，作为攻击的资料。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要高岗找刘少奇直接谈清问题。他不予理睬。刘少奇两次主动找他谈话，并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诚恳的检讨。他却对人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他诬蔑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自己迷上了"圈圈"主义、宗派主义，在他的眼里，自然这也成了"圈圈"，那也成了"圈圈"，一切正常的事情都被颠倒了。他的种种飞短流长、故布疑阵、谣言惑人的把戏，都是为他的分裂党、篡党夺权的活动服务的。党内出现了这种人，就不得安宁了，许多的鬼事、怪事和歪风邪气都会冒出来，党内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1953 年 2 月，党中央为加强集体领导，拟将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加以调整，委托刘少奇找人商拟调整方案。刘少奇考虑，可以试行中央各

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征询高岗的意见。高岗竟以为这是刘少奇想把握书记处的权力，不予合作。

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安子文将这个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向饶漱石谈过。高岗又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向他进行试探的。于是，他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并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

高岗还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时而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如此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损害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实际上，毛泽东对高岗的阴谋早有所觉察，并予以及时的制止。毛泽东说：“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不允许的。”

可是，高、饶并未停止他们的活动。他们还误以为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此后高岗利用休假为名，周游华东、中南等地进行大肆活动，拉拢一些高级干部。他制造所谓“军党论”和“两党论”的论调，说中国共产党是由“根据地的党”和“白区的党”两部分所构成的。整个党都是军队创造的。他则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他声称，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所以需要改组中央。

事隔二十余年后，邓小平于1980年3月再一次回忆当时的情景：“这

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位置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到陈云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

陈云和邓小平都拒绝了高岗的拉拢，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问题。邓小平明确地表明了支持刘少奇、周恩来的态度，同时提醒毛泽东，如果容忍党内这种“不在其位欲谋其政”的危险权力欲的存在，那么将是党无宁日。

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毛泽东就对高、饶的情况有所掌握。针对他们的阴谋活动，毛泽东还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多次讲话中强调重视团结，消除山头。但是，高岗无视毛泽东的告诫，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团结的分裂活动。

为了给他们狠狠一击，在掌握了他们的大量证据之后，中央政治局于1953年12月24日举行了揭露高、饶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岗他们是在“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些人”。

为了消除高岗到处活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正在杭州休养的毛泽东专门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谈。据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专门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党内和国内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师哲，师是陕西人），楚就是湖南（毛指着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说的陕西人是指高岗。

在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

刘少奇等44人在全会上作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们回头是岸，立地成佛。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中的一些话，语气尖锐，实有所指。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

《决议》批判了“独立王国”，指出“有人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还批判了“小集团”，指出“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

由于高、饶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于1955年3月21日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决定撤销高岗、饶漱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邓小平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高、饶事件败露以后，高岗拒不悔改，并想自绝于党和人民。8月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高岗迟迟不起床。进卧室一看，他已经死去。化验的结果是，高岗头一天晚上吞服了大量安眠药。

至此，一场较量终于以高、饶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三、邓子恢奉调进京，被安排住在中南海。毛泽东对他说：“你是抓农村工作的一把好手。这次调你回来，由你筹建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初，一辆由武汉开往北京的列车，风驰电掣地奔驰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57岁的邓子恢伏在窗前，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一边眺望北方的雪景，心情显得格外的激动。他沉思着：“这次进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刚到北京，邓子恢被安排住在中南海，与毛泽东离得很近。第二天，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一见面就问："昨晚睡得好不好？"

"睡得好！睡得好！"邓子恢回答。

"睡得好？只怕冇讲真话，看你那眼睛还通红的呢。"毛泽东边说边笑。

邓子恢没吱声，只是陪着发笑。

毛泽东说："这次调你回京，由你组建农村工作部。你是抓农村工作的一把好手。"接着，毛泽东交代了组建农村工作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

邓子恢深知，党中央安排他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表明了党对他的信赖和期望。他一方面感到要参加领导中国四亿多农民摆脱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的落后状况，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责任是何等重大；同时，也感到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以及全国农民强烈的革命愿望，对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充满了信心。

毛泽东说得对，邓子恢抓农村工作的确是一把好手。中央选定由他组建农村工作部是十分正确的。

——邓子恢曾出色地领导了华中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6年春，全国内战危机已经十分严重。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放手发动农民，开展反奸清算和减租斗争，积极准备自卫战争。华中解放区在邓子恢为书记的华中分局领导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指示，着重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对华中各部队进行整编，组成华中野战军，分辖第一、三、四、六、七、九六个纵队，粟裕担任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邓子恢在淮安多次召开分局党委会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侵吞抗日解放区，甚至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非法武装组织"、"股匪"的反共行径，强调华中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在整编之后不能给国民党一枝枪、一个人。同时，指示把各地民兵武装隐蔽保存起来，随时准备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二是在城镇组织反霸斗争，在农村进行退租退息。在抗日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战热情。在此国内危机严重、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动农民投入自卫反击战争，已经十分迫切。解放区农民群众也不满足于减租减息，纷纷要求清除封建剥削，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邓子恢这个农民家庭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完全理解并深深同情农民对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深恶痛绝。华中分局成立以后不久，他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清算，在老解放区抓紧‘退租退息’斗争”。为了取得经验，他请分局民运部副部长李坚真带领工作队到农村搞试点。李坚真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位长征老干部，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央根据地最早的一位女县委书记，对于从事农民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她在邓子恢直接领导下，从 1946 年 2 月开始，分别抓了淮安县鹅钱乡、陈圩子乡两个试点。

鹅钱乡和陈圩子乡是老解放区，一经宣传发动，群众斗争情绪极其高涨。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已经不满足于减租减息和退租退息，反映了对于土地分配的要求。当时，中央还没有正式发出关于土改的政策文件。邓子恢根据华中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指示工作队按照中央苏区时期的经验，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访问调查，组织阶级队伍，成立贫雇农特别会议，通过退租退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基本满足了农民的要求。

在土改分田试点中，邓子恢反对打乱平分的办法，仍然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保留中农土地，把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抽补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土改分田工作进行得迅速顺利。经过大约两个月的工作，鹅钱乡和陈圩子乡在分配土地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同年春季，中共中央根据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决定改变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支持农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正义要求。4 月间，邓子恢和曾山、罗克明等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华中解放区工作，参加中央召开的研究土地问题的会议。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个文件指出：“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情绪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解决着土地问题。”这个文件还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党必须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支持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行动，批准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

中获得土地。

在延安，邓子恢直接参加了对这一政策的讨论。当会议做出决定之后，他兴奋异常，为终于能够彻底解决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于土地的渴求愿望而欣喜若狂。一回到住所，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好消息报告给同来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畅谈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5月间，邓子恢从延安返回淮安，召开了华中分局委员及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精神，部署华中解放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华中分局在听取了邓子恢传达之后，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强调彻底平分土地，坚决消灭封建剥削制度。邓子恢一面指示李坚真率领的工作队继续在鹅钱乡和陈圩子乡试点总结经验，迅速推广，同时，他主持华中分局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华中实际情况的土改政策，指导华中土改运动顺利进行，要求“在整个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达到耕者有其田”。指出：“封建剥削是否基本消灭，广大农民群众是否从地主手中获得足够的土地，这是今后检查各地执行中央指示是否彻底，群众是否发动的标准。”在土地分配政策方面，邓子恢他们规定，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平分，重申：“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人人有田耕，人人得其平”，“使封建残余势力彻底肃清，这正是革命的基本要求”。

——邓子恢领导中南地区胜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大陆已经基本解放的形势，除在东北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以外，分别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区成立军政委员会。1950年2月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林彪为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邓子恢还兼任中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区财政经济工作。与此同时，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撤销。不久，由于林彪未到职，由邓子恢代理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

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正值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战后的严重困难。特别是在1949年冬至1950年春中南地区遭受到严重的水旱虫灾，受灾人口达1300万左右。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残余势力趁机制造谣言，挑动暴乱。邓子恢对当时的形势曾经做了这样的回顾：“当时突出的情况，是物价暴涨，货币下跌，灾情严重，人心浮动，社会不安。”当灾荒最严重的时候，一部分富农和中农轻信谣言，不明政策，不敢发展生产；广大贫苦农民则缺

粮缺种，无力生产，陷于饥饿。匪特分子和不法地主乘机胁迫群众组织暴乱，抢劫公粮，袭击暗害区乡工作人员，造成了农村秩序的严重混乱。

邓子恢冷静地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不仅影响公粮损失，影响春耕生产，影响城市交易，而且要造成农村大乱”。他与华中局以及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研究以后，认为要稳定局势，巩固新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打落地主阶级和土匪恶霸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和局势的发展，一方面号召与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大量发放农贷，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同时领导了“以准备和实行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包含三个部分：第一是在军事上坚决剿匪，镇压反革命；第二是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退租退押，解决农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第三是大力宣传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鼓励农民打消顾虑，劳动致富。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剿匪反霸斗争在中南各省已经全面展开。他们又颁布了紧急法令，严厉镇压抢粮为首分子，平息暴乱，加紧剿匪肃特，维持社会治安。然后，他们把主要力量集中于退租退押运动。但一般干部由于不理解农民的要求，对于减租减息和退租退押表现得不那么积极。有些同志则准备等待剿匪反霸结束之后再进行减租减息。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地主已经没有多少油水，不必搞退租退押，而应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针对这种情况，中南局于1949年冬发出指示，批评了对于减租减息的消极态度。指出：“在未实行土改以前，减租减息是农民改善自己生活的最低要求与普遍要求，这种要求与打倒地主当权派的统治的要求是同时存在的，不论任何地区只要环境安定秩序恢复之后，我们就应该在反霸清匪的同时积极去宣传和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以消灭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更广泛地团结农民，取得农民的拥护，使我们在农村中建立初步基础。”他指示各级干部，不应把剿匪反霸与减租减息机械地划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不应等到剿匪反霸结束以后，再来计划下一阶段的减租减息。随后，邓子恢又针对干部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亲自组织撰写论述退租退押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文章，在《长江日报》上连续发表，指导运动的健康发展。结果，中南六省广大农村在6000万人口的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减租减息和退租退押，全区退租达十亿斤谷子，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活困

难，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且迅速稳定了农村局势，取得了解放以后农民对地主阶级第一个回合斗争的胜利，为今后大规模展开土地改革运动铺平了道路。

邓子恢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十分注意把握斗争时机和每一斗争阶段工作重心的转移。当剿匪反霸和退租退押运动获得了一定成效，而春耕生产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他和军政委员会的同志们立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领导春耕生产上来。为了不失时机，稳定和提高各阶层生产情绪，完成中央下达的增产16.5亿斤粮食的任务，夺取解放后第一年的大丰收，邓子恢根据中南农村的具体情况，主持制定了《关于发展春耕生产十大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

（一）保证劳动收益权，谁种谁收；

（二）保证雇工自由，工资双方面议商定；

（三）保证借贷自由，有借有还，有本有利，禁止强迫借粮借款；

（四）贯彻减租，停止退押；

（五）保证产权佃权，地主依法减租，农民依法交租，地主不得借故夺佃，不得变卖土地；

（六）保护耕牛牲口，禁止宰杀耕牛，奖励添买耕牛；

（七）奖励开垦荒田，熟荒三年、生荒五年免交公粮，荒地归开垦者所有；

（八）调整公粮负担，酌减征收数量；

（九）严禁破坏生产，违者严加惩处；

（十）奖励劳动致富，严禁侵犯勤劳致富者的利益。

毫无疑问，在土地改革尚未开始的情况下，中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方针所采取的这些农村政策，是切合实际和积极稳妥的。从而，中南各省农村灾情基本得到控制，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中南地区农村当年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全区粮食获得普遍丰收，比1949年增产10%，超额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

——邓子恢成功地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上旬，邓子恢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向大会分析了全国解放以后的有利形势，并告诫大家，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是新解放区，大量土匪需要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尚未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调整，失业现象还很严重，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号召在全国新解放区开展有步骤有秩序的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部署土改运动。会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是，从1950年秋季开始，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展开了彻底铲除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

9月16日到27日，邓子恢主持召开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作全面部署。当时，全国需要进行土改的新区有3.1亿人口。中南六省有1.2亿人口的地区需要土改，任务相当艰巨。邓子恢在会上多次讲话，指出这“是关系到中南区一万万二千万农民今后生活与幸福的问题”，土地改革的胜利，将为中国发展农业和实现工业化开辟道路。他要求各级干部充分认识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斗争胜利。

邓子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土地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非常清楚，在全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这场土改运动，决不同于十年内战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更不同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这次土改不仅将彻底摧毁农村封建统治的基础，而且是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开端。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他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认真研究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和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他根据自己调查研究所得到的体会，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着重在理论上向委员们阐述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及基本政策。

邓子恢认为，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着三种土地生产方式：一是贫农的佃耕方式；二是中农的自耕方式；三是富农的雇工经营方式。贫农佃耕方式在中国农村占的比重最大，也最为普遍。在这种制度下，佃户必须以一半以上收入向地主交纳田租，农民的生产情绪和生产能力当然很低，是生产力最落后的方式。中农自耕方式因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耕自给，收获物全归已

有，因此中农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是中国目前较为进步的一种方式。至于富农雇工经营方式，虽然在理论上比中农自耕方式要进步些，是旧资本主义国家由地主经营过渡到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一种必然途径。但在中国，由于人口过剩，劳动力低廉，富农雇工经营不如地主出租经济发达，因此富农经济在农村所占比重极少，而且也是许多富农带有半地主性出租形式的重要原因。

基于这一分析，邓子恢认为："现在我们要实行土地改革，基本方法就是使第一种贫农的佃耕方式从封建租佃制度下解放出来，变为第二种中农自耕方式，并坚决保护中农，以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其次是保存富农经济的雇工经营方式，维持其生产，并以此鼓励中农和即将上升为中农的贫农，努力生产，敢于发家致富。"邓子恢估计，经过这场改革，可以达到消灭佃耕方式的目的，使自耕自种的中农经济达到总耕地面积的90%，以这一方式生产的农民，占农业人口的80%—90%。这就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使中国农业得以迅速发展。因此，他指出："土改的主要内容，实际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的出租土地来分给贫雇农与其他需要土地的劳动人民，适当满足雇贫农的土地要求与解决其生产资料问题。同时对中农的土地财产必须坚决保护，中农应得的利益必须酌量给予，这就是土改的基本要求。土改成绩的好坏，就看对这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来决定。"

邓子恢在土改运动即将展开的时候，引用刘少奇的一句话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土改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指出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地主阶级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基础，地主阶级倚仗这一社会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和压迫农民；而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同地主阶级展开了无数次英勇的斗争。"这就是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斗争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客观原因。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与地主不断进行这种斗争的历史。……因此，土地改革的进行就必然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懂得这一点，这就是政治上极端幼稚和极端糊涂的表现。"

为了彻底孤立和消灭地主阶级，邓子恢反复强调党在土地改革时期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他指出："雇贫中农是我，富农、工商业者、小土地出租者、开明士绅是友，而顽抗与反动地主则是敌。"他号召全体同志共同努

力，发动群众，壮大阶级队伍，“务求于今冬明春胜利完成五千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这一个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业”。

土改全面展开以后，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了大批干部，分批派赴各省土改地区，指导土改工作。1951 年春，中南地区完成了 5000 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1952 年冬，又完成了 7000 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从此，中南六省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以外，全部结束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为即将到来的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邓子恢上调中央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又为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饶漱石接替陈云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说："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不给中央打招呼"

1952 年，在完成了经济恢复、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以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进北京，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饶漱石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北京的。当时，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饶漱石来京不久，便和高岗密切配合，在中央政治局发动了一场“讨安伐刘”的斗争。

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1953 年 3 月，高岗向安子文讲，毛泽东要对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过于轻信、草率，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饶漱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批判安子文。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做了书面检讨，并受到书面警告的处分，但饶漱石仍揪住不放。在组织部的部务会上，饶漱石指着安子文的鼻子进行斥责："有的问题，为什么不先向我反映，而先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 你这是胆大妄为！你眼睛里没有我这个部长，我就要你认识认识我这个部长!"

刚来不久的部长在部务会上没完没了地整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中央组织部的正常秩序被搅乱了。饶漱石如此大整安子文，搅乱组织部，自

有他的考虑和目的。他认为刘少奇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肯定不行了，而高岗却风头正健，地位有上升的趋势。许多人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线上的人”，这可不好。高岗曾对饶漱石明确讲过，安子文是刘少奇的心腹亲信，又正在饶漱石的手下当副部长，狠狠整一下安子文，既可证明他不是刘少奇“线上的人”，洗刷自己的“清白”，又能因此博得高岗的好感和信任。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1953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与高岗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采取的“批薄射刘”的政治手法一样，饶漱石纠集一伙人，故意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对1953年以前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说那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他们大批安子文，但攻击的矛头是刘少奇，导演了一出“讨安伐刘”的闹剧。他们甚至要公开摊牌，要挟中央，要求改组中央组织部，夺取人事大权。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央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即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毛泽东批评饶漱石说：

> 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那么，饶漱石怎么会调到党和国家的中枢工作呢？

——饶漱石在抗战时期为华中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赣东北、浙西一带从事青年活动。他很早就去了东北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5年，饶漱石赴苏联，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莫斯科期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饶漱石回国。1940年夏，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工作。

不久发生的“皖南事变”既是对饶漱石的严峻考验，又给了他一个机遇。在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东南局书记项英遇害。饶漱石脱险了。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整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饶漱石从皖南脱险去上海休养了一段时间后，由党的地下组织派人护送到苏北盐城的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军部。1941年5月，饶漱石被任命为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华中军分区常委，同年兼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饶漱石协助刘少奇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为新四军的恢复和壮大，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2年1月20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举行。3月4日，刘少奇在所作的大会总结报告中最后说：

> ……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的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饶漱石调来中央，可以缓和他与华东局一些领导同志之间的矛盾，使华东局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饶漱石矮胖身材，满头黑发，浓浓两道眉毛下，一双小而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说话不多，而且常常言不达意，欲言又止，做人十分小心谨慎的样子。据他的夫人说，他这个人常常是欲言又止，让人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又胆小得要命。

按道理说，胆小、慎重，应该是比较安守本分的。可情况正好与此相反。他内心却是野心勃勃，且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惜在别人背后搞小动作。早在1942年初，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指定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一职，饶漱石畏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和在新四军中的威信，想早日成为正式的书记，于是借口陈毅在红四军时曾两次接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煽动策划整陈

毅。并致电延安的毛泽东、刘少奇，歪曲和捏造一系列事实，挑拨毛、刘和陈的关系，欲将陈毅挤出新四军。他的阴谋终于部分得逞，1943 年 11 月，陈毅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不仅如此，饶漱石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曾经采取过瞒骗的手法。1949 年 10 月，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上，按当时的一般情况，是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两次说由陈毅来任这一职务。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的，推辞让饶漱石当。毛泽东说让华东局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连忙对陈毅说："你确实是够忙的，行，还是我来为你分担一部分工作吧！"此事根本就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他却以华东局的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问起此事，饶漱石竟撒谎说："主席，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这个职务，就只好由我来担任了。"毛泽东信以为真，便同意了。毛泽东想，除了陈毅，确实也只有饶漱石最合适了。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大区司令员、政委高一头了。

1952 年 1 月，饶漱石患眼神经痉挛症，病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经常头痛，看不清东西，工作无法坚持，粟裕出于同志间关心爱护的目的，特意向中央反映情况，建议让饶漱石离职休息。

2 月 2 日，毛泽东以党中央的名义批准了粟裕的建议：

> 接 2 月 1 日 14 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饶漱石在粟裕的陪同下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富有心机的饶漱石一路沉默不语，不露声色，但脑海里却像煮沸的热水，剧烈地翻腾着：我的病真的有那么重了吗？为什么粟裕给中央报告，中央马上就决定要我休养，而且必须离开上海？为什么要我一休息就是两个月，职务立即由别人代理？我的

职务，别人随时都可以代理，我饶漱石岂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了吗？为什么要粟裕陪我进京，是为了一路照顾我，还是监视押送我？

饶漱石以一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在猜测着、琢磨着……

饶漱石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他听说中央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下子触动了他的心病，对中央不满的话脱口而出：“看来我是不行了，华东的工作我没有搞好，派一个能干的人去了，我这个不能干的住进医院了。”

饶漱石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病情很快就好转了，中央安排他出院到北京东华门翠明庄高干招待所继续疗养一段时间。

1952年4月4日的深夜，饶漱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他白天听到的消息仍在脑海里盘旋着：中央没有派彭真去华东，改派薄一波去了，薄一波去后，“三反”、“五反”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中央曾几次批转上海的经验，号召其他地区认真学习。他似乎恍然大悟：原来叫我上北京休养治疗，是为了好让别人乘虚而入，是精心设下的一个圈套让我钻进去，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似乎听到了陈毅、粟裕、薄一波等人“计谋”得逞后得意的笑声，心里特别地不自在。

饶漱石同华东局其他领导同志的隔阂，中央是清楚的。为了避免这种隔阂继续下去，有利于华东局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中央认为，将饶漱石调离上海，来京工作，是合适的。

——饶漱石的政治野心和阴谋诡计尚未被毛泽东完全察觉。

饶漱石倚仗他在华中局时候的一些老资本，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饶漱石甚至可以在毛泽东面前颐指气使，毫无顾忌。

一天午夜，他去丰泽园见毛泽东。

饶漱石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浴血奋斗，顽强拼搏，为党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取得的成绩。然后，话锋一转，点出问题的关键，说出闷在心中几个月的疑问：我饶漱石对敌斗争是否勇敢？是否右倾？我饶漱石在华东的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我饶漱石的病是否真的这么严重？是否必须离开上海？为什么要用粟裕陪同的方式把我饶漱石调到北京？

毛泽东尽管已连续工作了八个小时，感到有点疲倦，饶漱石深更半夜闯

来，又火药味十足地一连提出几个质问，但他极有耐心地对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并对饶漱石的工作进行了肯定。他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中央文件递给饶漱石说：

> 没有谁说你在华东犯了路线错误。你看我刚才还批转你们上海“五反”的经验。就是这个，我念给你听：上海市委4月2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望一切正在推行“五反”或准备推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反问饶漱石说：“你看，这难道是说你斗争不坚决，犯了路线错误吗？中央对你是信任的。”

饶漱石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有点冒失了，语气也不再是慷慨激昂，小声嘀咕起来：“4月2日上海市委的报告，那是我到北京以后的事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但仍耐心地说：上海市的经验也不是这一两个月才有的，有一个过程，包括你来治病以前所做的工作实践的总结，你是书记，一把手，理所当然也有你一份。

饶漱石无言以对，但又不甘心，还想说什么，张张嘴……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显然想结束这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话：“饶漱石同志，如果你自己认为身体还可以，中央同意你立即回华东工作，可以今天就走，派飞机送你。”

饶漱石只好告辞了，不过他感到总算有收获，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知道中央对他还是信任的。

但是，一个心怀叵测、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想长期隐蔽下去是不可能的。高岗和饶漱石相继调到中央后，他们两个一无渊源、二无深交的人，因野心相合、气味相投而走到了一起。饶漱石看中高岗“一马当先”的发展势头，高岗则相中饶漱石执掌的组织部的重要，于是两人自然而然相互靠拢了。

高岗调中央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此前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当时权倾一时，但他仍不满足，因刘少奇、周

恩来在党内排名都在他前面，他首先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1953年6月，高岗利用主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之机，离开会议原定主题，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私下里，高岗活动频繁，利用多种手段，企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达到由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的目的。

高岗的心思，饶漱石心领神会。一向被刘少奇器重赏识的饶漱石为什么对高岗反对刘少奇来了精神呢？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前后，毛泽东曾几次批评刘少奇，善于钻营的饶漱石以为刘少奇已经失宠，接班人的地位岌岌可危，而高岗此时却“如日中天”，来势看好，于是他一改过去对刘少奇的尊重态度，转而对高岗的“倒刘”战术紧密配合，成为高岗“攻刘”的主将，在中央组织部发动了“讨安伐刘”的斗争。

于是，当高岗在全国财政工作会上发出攻刘的信号后，饶漱石紧步其后尘，在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效仿高岗的做法，背离会议的原定主题，纠集一伙人，故意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对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全盘否定。表面大批安子文，实则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觉了饶漱石等人的阴谋，提议会议暂停进行，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毛泽东对饶漱石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对饶漱石的“讨安伐刘”计策是当头一棒。饶漱石只好求救于高岗。高岗两次找毛泽东说情，要求保护饶漱石，却被毛泽东“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从全国财政会议后期开始，毛泽东已逐步觉察到高、饶的活动不正常，他对党内问题的看法，历来是见微知著，础润知雨，从不会掉以轻心。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强调搞好团结的重要性，告诫领导干部要加强团结，消除山头。与此同时，一些同志也陆续向中央揭发了高、饶的分裂活动。1953年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饶发出严重警告，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找人谈话，调查研究，很快掌握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基本情况。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并作报告，报告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根源进行了深刻分析，对他们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揭露，态度鲜明地表示：“对于那种有意

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也在会上发言，严肃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但他们仍执迷不悟，不做深刻检讨，不痛改前非。

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上海市委分别召集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肃清他们在这些地区的错误影响。陈毅在华东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饶在解放前，思想上“革命”是主要的，而到了全国解放以后，“做官”占了思想上的主要地位。为了要做更大的官，个人主义的权欲膨胀，因此就产生了投机心，于是用鼻子到处嗅。当饶嗅到刘的“股票”行情可能下跌，高的“股票”行情可能上涨，于是就弃刘靠高，有如旧社会的政客投机。结果，饶对“股票”行情没有看准，“偷鸡不成蚀把米”，阴谋暴露了，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鉴于高岗死不悔改，饶漱石也态度不老实，无悔改之意，1955 年 3 月下旬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改悔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4月，饶漱石因包庇反革命等问题被逮捕审查。1965 年 8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1975 年 3 月 2 日因中毒性肺炎死亡，终年 72 岁。

五、习仲勋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他出色的组织宣传才能应验了贺龙当年说的一句话：“怪不得延安时毛主席亲笔题词送你，你是政治家嘛”

1952 年 9 月，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在邓小平调北京工作后不久，也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综观习仲勋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工作的不平凡经历，可以说，这一位置他是当之无愧的。

——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壮大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

地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不久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与刘志丹等一道为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4年11月，他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不幸的是，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随红军西征。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长达六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在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戴。鉴于他的出色表现和才能，1943年1月，毛泽东称赞他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并亲笔为他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坚决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习仲勋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率359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国内战争。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艰苦激烈的浴血奋战，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获得了空前伟大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一边放出“和平谈判”的烟幕，一边又拒绝签订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协定，继续穷兵黩武，涂炭人民。战争的烽火无法止熄。蒋介石集团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托于西北地区的40万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队伍还妄想垂死挣扎，东山再起。因此，西北战场这枚棋子，在中国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整个棋盘上，显得尤为重要。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各战场友军的配合下，发扬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在敌我力量悬殊、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接连创造出战场奇迹。大军陆续西进后，发动群众大力支援前线就成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贺龙和习仲勋。习仲勋经常被一些老百姓拦住，请示送粮送物的事情，他深有感触地对贺龙说：“我们这些人，正是靠了群众这一点，才站稳脚跟的。陕甘闹红那会儿，我才十几岁，跟着刘志丹、谢子长闹革命，整天在做群众工作，动员老百姓跟着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像鱼儿钻在水里游。敌人到处抓我们，可就是抓不住，明明追着我们进了村，等到他们挨家挨户搜查时却一个人影儿也找不见。其实我们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哩！”在枪林弹雨的解放战争中，习仲勋仍然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信赖共产党和解放军，支前工作搞得热火朝天。习仲勋曾信心百倍地对彭德怀说：“彭老总，我们准备从解放区动员民工700万人，牲畜200万头，大车约100万辆，各种小车不

计数目，全力以赴支援前线。西进大军开到哪里，支前的人民群众就跟到哪里，尽管是人担驴驮，但保证成为坚强后盾！”

为了迅速打败敌人，习仲勋还善于运用统战策略。黄正清的迅速起义，就是习仲勋、王震等促成的。黄正清是一位藏族上层人士，国民党中央委员，甘南拉卜得藏军保安司令。习仲勋秘密和他会面，帮助他分析形势，指出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很快就要灭亡，希望他迅速做出决策，倒向人民一边，启发他弃暗投明。随后，王震又写信给黄正清，最终促成了起义。

起义几天后，黄正清乘车来到兰州，见到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在宴会上习仲勋把黄正清介绍给参加宴会的人士，然后举着一杯酒，对黄正清说：“你这次率部起义，参加革命，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做出了表率，是值得学习的！”事后，贺龙对习仲勋说：“怪不得延安时毛主席亲笔题词送你，你是政治家嘛！”

1947年3月中旬后，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又协同彭德怀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一道，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为战胜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还和林伯渠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被转发至全国各解放区。

——习仲勋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及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五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大胆而有效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

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2年10月，他指导文化部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演出期间，周恩来到会讲话，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做了详尽的阐述。为在理论文化界更好地落实这一方针，习仲勋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与此同时，他又扎扎实实地抓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有小学52.7万所，在校学生5110万人，比1949年的2439.1万人增长了109.5%，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增加了2742万人；有中等学校6053所，在校学生314.5万人，比1949年的127.1万人增长了147%；有高等学校201所，在校学生19.1万人，比1949年的11.7万人增长了63.2%，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增加了3.6万人。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委员，继续为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

第七章　“内阁”重臣　各显其能

聚焦时间：1954年9月

聚焦地点：北京中南海

聚焦人物：陈云、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贺龙、聂荣臻、乌兰夫

聚焦话题：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产生了十位副总理，他们是：邓小平、陈云、林彪、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子恢、李先念、李富春、乌兰夫。1956年为了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又增补聂荣臻为副总理。11位副总理都是久经考验的国之栋梁，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凭借其杰出的智慧和才能，演绎了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

昔日驰骋沙场、战功卓著的战神骁将，进入和平建设时代将如何施展执政治国的抱负？在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人民委以他们重任，使他们又成为共和国“内阁”分管一方或几方的重臣，在新中国建设的蓝图上尽情挥洒浓墨重彩。

一、谁来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向党中央推荐了陈云

在1954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的十位副总理中，陈云是一员老将。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唯一继续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的。

1949年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筹建新中国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周恩来一定要参加政府工作，其

性质是“内阁”总理。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要当好新中国的总理，必须要有一批得力助手。周恩来开始物色各方面人才。

谁来主持中央财经工作？这是关系到新中国经济发展甚至关系到新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向党中央推荐了陈云。毛泽东一听，连连点头：“好好，这个将点对了，由他来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1949 年 2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请陈云来中央一叙。

接到电报，陈云立即起程。他千里迢迢，马不停蹄，赶到了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与陈云彻夜长谈。

陈云没有推辞。因为这是党的安排。只要党需要，他就会无条件地服从，这是他坚强党性的表现。

陈云没有谦让。因为他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有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他能搞好财经工作。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5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6 月 4 日，周恩来在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上正式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成立中财委，陈云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0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陈云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重工业部部长，负责财经工作。

就这样，陈云走马上任，挑起了领导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重担，成为党和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关键人物。

这一年陈云 45 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器重陈云，不是没有原因的。

——陈云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陈云是上海青浦人。青浦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境内有青龙江和五浦，所以叫青浦。陈家很穷，既无土地，又无房产，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是一个朴实

的庄稼汉，母亲廖顺妹是个家庭妇女。长年累月的辛劳，使他们积劳成疾。陈云两岁的时候，父亲丢下病妻幼子，离开了人世。两年后，母亲也因病去世。

外祖母怜惜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把陈云姐弟俩接到自己的身边。舅舅廖文光无儿无女，便认陈云为儿子，改名为廖陈云。

幼年失去父母的陈云，早早体味了人间的悲苦。他非常懂事，到舅舅家生活后，体恤舅父舅母的辛苦，主动给舅母帮忙。舅父舅母也视陈云如己出。在陈云八岁的时候，舅舅送他到私塾受启蒙教育，第二年又送他到一所小学读书。1919 年 5 月，陈云从小学高小部毕业，因舅父一家经济有困难，再供陈云上学已不可能。

经老师介绍，陈云到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工人运动上。1925 年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五卅运动，陈云参加了这场斗争。同年夏，陈云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大罢工，并被选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委员长。罢工后，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出色的组织才能逐渐为党组织所发现并重视。

仅仅从学历方面看，陈云没有任何优势。因为当时在党内，有许多知识分子，总书记陈独秀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此外，还有李大钊、邓中夏、李达等，或为大学者，或为大学生。

从资历方面看，陈云也没有什么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成立时就有五十多个党员。陈云是在 1925 年加入党组织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陈云入党仅五年，就开始进入中央领导层。1930 年 9 月 21 日，陈云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一年他 25 岁。三个月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4 年 1 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这表明他已经进入中央高层领导层。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是陈云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秘诀。

陈云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思考问题。政治上的清醒来源于理论上的成熟。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陈云目睹王

明、博古等人唯共产国际指示是从，只知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和照抄苏联革命的经验，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的事实，深感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

他对毛泽东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中国革命佩服至极。他后来回忆说：

> 我们学习毛主席思想，确实要认真学习他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得我在延安组织部工作时，看过毛主席的许多电报，我体会，主席的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精髓是实事求是。

陈云理论上是这样认识问题，实践中更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一次会议。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陈云坚决支持毛泽东。会后，他起草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些都反映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37年底他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党的组织方面的工作。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他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认为："对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算真正爱护人。"他在负责审查干部时，主张"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他说："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穷的力量。"

陈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赢得了党内同志的敬重。

1938年秋，一位叫丁秀的男青年和一位女青年奉命从外地来延安。他们以为是来延安学习，心中十分高兴。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陈云亲自与他们谈话。

陈云问："知道找你们回来干什么吗？"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是回延安学习的。"

陈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们说："现在有人说你们是托派，有一个还是托派特委委员，调你们回来，是在审查你们。"

两位青年一听，感到非常意外，吓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并申

诉自己不是托派。

陈云态度和蔼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先不要哭，要相信党，事情总会查清楚的，我保证替你们查清这个问题。”

在陈云的直接关心下，两位青年被证明不是什么托派。陈云又把他们找来，告诉他们，问题已经查清楚了。

两位青年事后非常感动，高高兴兴地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新中国成立后，丁秀担任过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几十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感慨地说：“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到康生手中，这一辈子就完了。”

这一番话，说出了从延安过来的同志的心声，是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发自内心的赞誉。

——陈云是抓财经工作的一把好手。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能文能武的的确不少，但懂珠算会经营的却不多，陈云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有这个本领，在经营管理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陈云参加革命后，他擅长经营的特长引起了党内高层领导的注意。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陈云的经营活动有声有色，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表扬，也引起了当时主要领导者周恩来的特别关注。

不久，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陈云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了善后事宜。在处理这个事件中，陈云所表现出的果断和干练，给周恩来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1931 年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分管工会工作和白区工作。但他仍然密切关注苏区的经济工作，先后写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怎样订立劳动合同》等文章，表现出他在经济工作方面的特殊才能。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担任过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1945 年 2 月，他针对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做财经工作的几条基本原则：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要有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二、“先小人后君子”，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

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严格检查，仔细核算；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表面上好像是找茬，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是对革命负责。这些理财的原则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解放战争时期，陈云被派往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在这里，他的经济才能再一次得到充分展示。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许多大中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陈云的领导下，城市的接管工作进展顺利，经济也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陈云根据自己的实验经验，写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的简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将它批转给全党学习。毛泽东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采纳了陈云的做法。

——陈云在全国财经工作上打了一个“淮海战役”。

那是1949年夏天，上海已经解放。

上海一直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的资本家历来就看不起共产党，以为共产党都是土包子，根本不懂经济。他们甚至公开扬言：共产党搞政治可以打80分，搞军事可以打100分，搞经济打0分。不法资本家在上海兴风作浪，向人民政府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经济上的进攻。

上海面临着一场没有枪炮声的战斗。

陈云不信投机资本家这个邪。他指示上海军管部门查封了当时已成为投机分子大本营的证券交易所。

不法商贩不甘失败，他们看准了上海缺粮缺棉这一弱点，采取囤积办法，引起整个物价上涨。

陈云精心组织了反击投机商贩的斗争。他命令从东北调大批粮食入关，囤存在北京，并且让京、津两地的粮贩子知道国家已经掌握了大批的粮食，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招收到明显效果。

陈云集中力量对付上海的投机商贩。8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明确提出，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解决这一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国计民生。

这就是陈云的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这是陈云的优势，他善于从全局来把

握问题的解决。他解决问题往往是大手笔。

他通过调查掌握了情况，于1949年11月13日为中财委起草了指示电，连续发出了12道指令。这12道指令主要是：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日至30日于石德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间，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各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

（十一）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市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

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售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指令的内容一环紧扣一环。

电报起草完后，当晚即上报中央。周恩来看后，知道这已经是决战前夕，他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于是，电报划破夜空，飞向全国。一场全国范围内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势力的战斗拉开了帷幕。

此时，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投机分子还蒙在鼓里，得意忘形。

11月16日，陈云再次电令全国，全国各地加紧各项准备工作。

条件已经成熟。

11月25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

最初，不法商贩以为赚钱的机会来了，他们大批吃进。然而，市场上的纱布货源充足，价格急剧下跌。他们开始觉察出大事不好，但是想退也退不出了，因为陈云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加紧征税，不能迟交，迟交一天，罚税金的3%。

有人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就会天下大乱。

投机商贩受不住两面夹击，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买进他们吃进的棉纱。国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棉纱。

陈云指挥的这一仗，大获全胜。当时上海的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方面有奇才，一位资本家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毛泽东评价陈云领导的稳定物价之战，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经过几个回合，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彻底认输了，再也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持续十几年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被制伏了。到1950年，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通过这一仗，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陈云指挥经济建设和理财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和复杂的经济形势，作为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陈云更是殚精竭虑，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在重拳出击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之后，又于1950年3月，向党中央、政务院提议，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由于这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到5月，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接着他根据抗美援朝开始的困难局势，提出财经工作应该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的方针，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1953年10月，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保证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及其价格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他兼任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写下了浓重一笔。

二、李富春具有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和突出的统筹规划能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中央选定他分管计委工作

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革命家李富春，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有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党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领导人。

1954年9月29日，有着丰富财经工作经验和统筹规划能力的李富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

李富春，字友仁，湖南长沙人。1900年出生。李富春的祖父在长沙三兴街40号开“李福星扇店”，兼售纽扣、牛皮筋、旱烟袋杆、棉絮等。李富春就诞生在这个店里。他的父亲李曙云是清末庠生，以教书为业，学识渊博，生性乐观，为人忠厚正直，对子女要求严格。李富春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富春积极投身这一运动。随后，他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李富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推举为中共旅欧总支部负责人之一，亲自参加并领导了旅欧支部和华人的革命斗争。1925年回国，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对第二军的工作认真负责，全面具体，在宣传教育、民主改革、发展组织、团结内部和友军等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当时二军军长谭延闿称他为“才如天上鹤”，政治部官兵赞他“雅量风清兼月白，高情绚碧与山红”，表达了对他的敬重之情。

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李富春历任中共江西、江苏、广东、陕甘等省省委书记，为这些地方革命工作的组织和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富春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和陈云一道，为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8年底，由李富春牵头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随后改为财政经济部，林伯渠任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李富春过去对财经工作并不熟悉，但自从他开始负责财经工作以后，他就像以前对待党的组织工作一样，马上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这一新的领域中来。

1939年2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以中央的名义，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他在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他说，生产运动我们以前还没有大规模做过，这是“党给予我们每个同志新的战斗任务”，今天我们要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行动起来。他还指出，为了能够解决我们将来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每个人都应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和战斗性去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党给我们

的艰巨、伟大的生产任务而斗争。

这次会后，驻延安的各单位迅速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传达李富春的报告精神，制订了生产计划，很快出现了全边区大生产的热潮。

著名的359旅开垦南泥湾，就是大生产运动骄人的一部分。而开辟南泥湾，是李富春下的决心并经中央批准的。1943年9月，李富春率领中直机关各生产委员会主任到南泥湾了解屯垦情况，学习生产建设经验。旅长王震热情地接待了李富春一行，介绍359旅的生产经验，领他们参观了自办的纺织厂、铁工厂、木工厂、农具厂、酱菜厂，请他们吃了八菜一汤的丰盛午饭。临别时，王震特意要李富春为夫人蔡畅带了一篮子小辣椒和一筐红薯，说：这是蔡大姐爱吃的，请她品尝一下南泥湾的丰收果实。

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不仅扭转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局面，而且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到延安参观的许多进步人士、国际友人都以惊奇的眼光关注大生产运动，无不为此称赞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和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

1942年初，李富春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分管行政、财经、教育、科技、卫生、出版方面的工作。为了克服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坚持抗战，李富春从下半年开始，帮助毛泽东搜集根据地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的资料，总结生产建设经验，研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经过半年的努力，毛泽东完成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扭转边区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提高生产能力，李富春于1939年春，向中共中央提出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建议。1940年初，中央正式成立自然科学院，李富春为院长（1941年初，由徐特立接任）。自然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担负起改造手工作坊、扩大生产的任务，并建立起一批新工厂，逐渐形成边区新的工业体系。

1946年1月，李富春来到中共西满分局。1947年5月，奉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主管东北财经、军区后勤并兼管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李富春为首的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当时，东北地区财政处于分散状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局限性，既不利于经济发展，又不能保证大规模战争的军费供应。为了统一财政，李富春多次主持召开东北局财

经委员会会议，基本摸清了东北地区财政、税收、贸易、军需等方面的情况。李富春在会上强调："战争是决定一切的。一切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要从此出发。"因此，必须要实行战时经济，要统一筹划，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一切为前线。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统一部署东北财经工作，对集中财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特别是辽沈战役，做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东北工业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继续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并描绘出发展东北工业的新蓝图，得到中央的首肯与支持。

1952年6月，李富春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协助陈云领导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9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苏联政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援助问题。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后，李富春主持与苏联政府的谈判工作，主要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

1953年3月30日，苏方米高扬交给李富春三张表：民用工业表、国防工业表、有色金属项目表。这是苏联研究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后，提出的具体援助计划。

李富春表示非常感激苏联政府，对米高扬说："我们是小兄弟，你们是老大哥，谢谢老大哥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我们的计划，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

米高扬回答说："哥哥走过的路，走错了的，弟弟不要重复。"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的领导下，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工作，就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大项目谈判，取得圆满结果，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委托的历史重任。

1953年9月29日，李富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主管国家计划工作。在这一岗位上，李富春充分发挥了他的财经统筹管理能力，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就是在他的建议下开展的，这也是他上任后唱的第一台好戏。根据他的建议，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了由国家计委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迅速传达到全国各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

部队、学校，立即掀起了增产节约热潮。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节省了不必要的开支，减少了浪费，集中了大批财力物力于重点建设工程，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好转，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扭转。

1955年2月底，在陈云、李富春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经历了三年时间，终于编出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4月7日，李富春会见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听取苏联专家、顾问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意见。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纲要》。这一纲要的通过，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的实施，把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8年，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李富春也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全能“超英赶美”，国民经济指导方针出现了失误，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但随着国民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李富春认识到了“大跃进”的弊病，为尽快扭转经济形势，他多次主持并亲自参加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李富春于1961年8月提出“整顿、巩固、提高”的国民经济六字方针。周恩来仔细研究了计委的报告，在“巩固”后增加了“充实”两字，这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李富春等人的领导下，八字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到1963年底，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李富春是我国计划经济的开创者，具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他对我国建立重工业基础、提前实现“一五”计划，以及1962年以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三、“主席还是别请宋子文了，一定要我干，我就试试看。”李先念受命掌管国家财政大权

1954年春，毛泽东找李先念谈话，要他当财政部部长。

要掌管一个国家的财政大权？这是李先念所始料未及的。他赶忙推辞说：“主席，财政这一块，我可是外行，恐怕干不了，您还是请别人来干吧！”

毛泽东幽默地说：“好啊，你要是不干，我就请宋子文来干！”

李先念一听，知道毛泽东心意已决，推是推不掉了，赶紧回答说：“那还了得！主席还是别请宋子文了，一定要我干，我就试试看。”

当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由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10月，李先念又兼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等工作。

其实，要李先念管经济，并不是毛泽东"乱点鸳鸯谱"．李先念对于财政经济工作也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外行"。事实上，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过程中，李先念抓财政、抓经济都有突出的表现，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李先念，号克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读过私塾，当过杂货店学徒，学过木工，人称"小李木匠"。1926年10月，李先念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并积极投身农民运动的洪流之中。1927年10月，他率领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以后，李先念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团、师、军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为建立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3月，他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因敌我力量悬殊，消耗无法补给，西路军在西征中遭到惨重失败。李先念率余部四百多人，以非凡的毅力，经过47天的艰苦征程，翻越冰封雪冻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风沙迷漫的戈壁滩，进人新疆。这四百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特种兵的骨干力量。对此，徐向前元帅曾说："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很了不起。"毛泽东则高度评价说："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中等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李先念历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和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这支部队总部所在地离武汉只有一百多公里，紧贴着国民党统治的重心区域，在李先念的领导下，部队深入群众，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先后在鄂东、鄂北、鄂南和江汉、桐柏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局势，李先念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在全面加强军事、政治、后勤等工作的同时，特别注重扭转财经状况。

1942年，鄂豫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日军频繁“扫荡”，国民党大举进攻，自然灾害，日伪军大肆掠夺，使根据地分成十几个“豆腐块”，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空前困难。

1943年，李先念和边区党委提出了“战争、生产”，“生产、战争”的口号，要求各地在战争动员中，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保证了部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能自力更生。李先念还亲自出席边区财经会议，他在会上强调，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加强财经工作，以保障部队供给。在加强财经工作的过程中，采取了两个步骤以提高生产力。一是在根据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实行农业低税制，减轻人民的负担。二是要求机关、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增加经济收入。至今，安陆县还保留着当年修建的水塘和堰坝。这些措施，克服了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抗战、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战争。

对此，毛泽东在延安多次点名表扬李先念，说他在武汉近郊受着敌伪顽匪的三面围攻，在那里孤军苦战，是值得全军学习的榜样。

1945年9月，李先念和第五师党委率领主力由大悟山转移到四望山整编，将五师部队和起义不久的豫南第13游击纵队编成第五师野战军。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后，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并围困中原，大搞经济封锁，欲置中原解放区军民于死地。李先念向部队发出了“自力更生，坚持斗争，临危不乱，生产自救”的指示。他一面组织部队自卫还击，一面想方设法加紧筹措物资，保障战争供给。6月，在敌人强大的攻势下，为保存实力，中央命令李先念中原突围。李先念接到命令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分散游击、创建根据地的三个步骤：一是各部队到达指定地区，获得相当的休整；二是解决财政给养，部队尽快立足生根；三是逐步发展及创建根据地。为解决财政困难，获得经济保障，他和中原局指示：在群众工作中，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丁、抗差等斗争，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和民兵自卫队。这些政策措施，保障了部队后勤供

给，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对中原突围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来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率军挺进中原进行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和物质基础。陈毅曾写诗赞颂：“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任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面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工作。这位在敌人炮火中浴血奋战的将军上任后，立即转换思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湖北进行实地经济调研，了解湖北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情况，很快掌握了湖北财贸工作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他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湖北人民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中去。

1949 年 8 月，李先念在省委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了《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认为剿匪反霸，完全解除封建势力的武装，首先要在经济上削弱或消灭其一部分，并提出“要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农村，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必须搞好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思想。

1949 年，湖北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完成艰巨的救灾任务，李先念提出“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的口号。他鼓励农民在不贻误生产的前提下，从事各种副业生产，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广泛发动群众互济互助，允许民间自由借贷，融通农村资金。后来又采取了减租减息、以工代赈等措施。这些措施对缓解灾情，恢复湖北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李先念在积极组织生产救灾的同时，还与湖北省委、省政府一道领导组织全省调整物价和统一财政经济管理的斗争。一方面，重点打击投机资本家、刹住涨价风；另一方面，重点抓统一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等。通过这些有力的措施，湖北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他还注意抓城乡物资交流工作：成立各种专业公司、扶持正当私营商业、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和庙会，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城乡贸易。

以后几年，李先念在领导湖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组织领导一些紧迫的经济建设项目，多次强调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关系。他指出，在重点建设重工业的同时，要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兼顾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他还特别指出，要实现工业化，农业是基础。

在李先念的领导下，湖北省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为他日后当好党和国家的“财政管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54年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以后，他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主张从全局着眼，国家财政必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尽力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保包括165项在内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他多次指示，要坚持贯彻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因地制宜的方针，发挥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发动大家动手，全党办财政。通过各方面的努力，1955年全国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节余，为实现“一五”计划后两年的指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忍辱负重，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争取国民经济取得一定的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继续参加领导调整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1992年5月，李先念重病卧床，但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建设事业，他说：“如果说我现在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老区的建设怎样加快。这些年来，我想了两件事：一是在陕北建设一个大化工基地，充分利用陕北的煤和油田，带动整个大西北经济的腾飞。二是在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攀枝花的矿，综合开发，推动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开发。”这就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李先念的唯一遗言，也是他最后的心愿！

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的陈毅，在谈判桌上也是一把好手，由他分管外交可谓人尽其才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外交工作。就在邓小平告诉他这一消息的当晚，陈毅心头久久不能平静，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念。”“绠短汲深”是陈毅的自谦之说，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外交工作所负重大责任的谨慎态度。

由陈毅分管外交工作，是党中央对他的才能的了解和肯定。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四年后，1958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他兼任外交部部长。

陈毅不仅具有独特的外交家才赋——思维敏捷，文思如泉涌，口才如江河，生性爽朗，豪迈不羁，处变不惊……更重要的是，他还有早期的外交实践经验。

陈毅早年的诗文充满神奇的想象和对未来的美好展望，浪漫中又凝聚着深沉。

陈毅早年喜爱文学，曾一度决心走从文之路，这培养了他出众的文才和敏锐的观察力。早在上小学时，陈毅就因作文像刻板印刷一样又快又好，而被称为“陈刷板”。留法勤工俭学期间，陈毅广泛地阅读卢梭、雨果和莫泊桑等名家的文学作品。1921年秋，他因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当年除夕，对己事、家事、国事百感交集的陈毅挥笔写下一副春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无成事事成。横批：春待来年。

1923年，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还不时地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并以笔名“曲秋”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和小说，还尝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影响中国文学。1925年以后，陈毅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停止了文学生活。但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写作，无论是艰苦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他都用笔抒怀、咏史、写景、叙事。

陈毅战争年代的诗文，或表现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或表达胜利后的喜悦心情，或描写军民情深……其诗文中最为典型的是《梅岭三章》和《卫岗初战》。

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军队围困了二十多天，死神随时可能降临，他写下了《梅岭三章》以为“绝笔”：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首诗气吞山河，充分表现了陈毅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操和充满胜利信心的伟大胸怀。“绝笔”成为千古绝唱。

1938年5月，陈毅被委派率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6月中旬，陈毅与粟裕领导组织了卫岗伏击战，击毙敌人近一百人，缴获了大量军用品。陈毅当即口占《卫岗初战》以示庆贺：

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这首诗后来在《茅山一年——江南游击区》一文中提到，文章于1939年11月发表于《群众周刊》后，极大地振奋了西南后方的人民，也在后方广为流传。许多人都惊叹：这位挺进敌后的陈将军，竟是一位文采飞扬的诗人！

陈毅不仅诗文斑斓，而且谈吐非凡，有着非同一般的雄辩口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奉命于1937年8月，先后赴大余、赣州就共同抗日事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谈判桌上，陈毅一面保持高度警惕，一面以渊博的学识、机智的谈吐，降服对方，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在赣州，国民党第46师政治部主任狐假虎威，以轻蔑的口吻说：“陈先生多年不出山，不知山外事，所谓国共合作的事，英美是不习惯的。”陈毅一听此言，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质问：“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如果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也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们的脑袋也得变变！”

陈毅的态度镇住了所有在座的国民党人员，他们不得不连连向陈毅赔礼道歉。

1948年6月17日至19日，陈毅向中原局、中野机关和附近驻军团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方针政策。在长达三天的传达中，他

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地讲，语言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几乎没什么重复的话语。说到与中原野战军密切相关的外线作战问题时，陈毅豪情顿起：“外线出击时，我们丢掉的是几门大炮，将要得到的却是整个中国！”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是中原广大干部对陈毅的赞赏、信任和无比敬重！

上海解放后，陈毅全身心地投入上海的整顿治理和建设工作中。为做好资本家的思想工作，陈毅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开上海市各行业三百来个资本家座谈会。陈毅非凡的谈吐让不少资本家折服。会后，他们都说：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如此谈笑风生，平易近人！

无论是陈毅豪放激扬的文采，还是他的谈笑风生、唇枪舌剑，都在熔铸着这位战功赫赫的元帅日后的外交风范。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陈毅就参与处理过一些外事，为他后来的外交实践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1944 年 7 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8 月 10 日，陈毅与美军代表见了面。美军代表对这位没有头衔的外交官留下了深刻印象。1945 年，在美国代表的协调下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周恩来在重庆拟“复案”并附“备忘录”三条，报请中共中央审示。毛泽东批转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陈毅等负责人研究，以提出具体意见。陈毅写信向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同美蒋关系的长篇建议。毛泽东阅后复信说：“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谕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1946 年 1 月，陈毅在临沂设宴招待了济南军调部美方代表哈里斯上校。哈里斯上校在宴会上指责中国进行内战，说：“中国不应该打内战，否则是没有出路的。”陈毅作即席讲话，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严正声明：“现在停战了，我军坚决遵守协议，但停战和平不决定于一方，现实的内战危险，仍然十分严重。我们一定会居安思危，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国民党强加给我们的内战再次爆发！”

2 月，美军雷克上校来到临沂，与陈毅会谈了两天。会谈中，陈毅再次揭露了国民党进攻我军的事实，同时又做了某些克制性的让步。整个会谈过程中，陈毅既声明了我方的严正立场，又不失风趣幽默。

雷克后来对美军代表说：“像陈毅将军这样有才能的中国军事将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以后，雷克上校与哈里斯上校及克莱门将军等美军代表，又多次到临沂拜访陈毅。

可以说，这期间的陈毅将军，已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外交才华。他在中国外交战线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第一步！

1949年7月6日，上海市举行纪念“七七”抗战胜利及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集会，几十万军民欢欣鼓舞地庆祝游行。美国原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擅自驾车闯入游行队伍，阻断了游行的行进，引起群众的愤慨。陈毅果断下令：“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这位副总领事最后不得不交出“道歉书”。上海市民无不对此拍手称快，说：“过去美国吉普车压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美国副总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

这一事件，体现了陈毅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外交原则，也是他日后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

1958年春到1968年底，陈毅出席的外事活动近七百次，参加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中苏谈判，发表讲话，会见外宾，出访友国……在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生涯中，人们无不为他如水银泻地般的艺术匠心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伟大气魄所倾倒。对待挑衅的敌人，他有如“一头露出爪子的狮子”，叫人“丧魂落魄”；对待朋友，他谦虚平易，讲求民主、平等。在任何场合，他都能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把政治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他与周恩来一道，为中国赢得了日益增多的朋友。

陈毅不愧是当代杰出的外交家。

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贺龙都特别关注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由他统管体育大军正是众望所归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身材魁梧的贺龙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党政军领导和著名

民主人士共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邓小平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贺龙兼任体委主任。中央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当即表示：“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多年来驰骋战场，屡建奇功的贺老总任体委主任？这岂不是大材小用？当时许多同志对此表示不可理解。

长期于戎马倥偬中关注文化体育事业的贺龙却格外爽朗开心：“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我们有责任把它甩掉！”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县。出身贫苦的贺龙只念过几年私塾，自幼喜欢在河流中游泳，喜爱习拳练武。对习武，他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武术基本功。这使他从小就体魄健壮，勇气过人。1909年，年仅13岁的贺龙开始走南闯北地做生意，贩卖盐、茶和骡马。他整天走乡串寨，跋山涉水，不仅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也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

青少年时期的各种锻炼，不仅造就了贺龙健壮的体魄，而且培养了他对体育运动独有的热爱。

1914年冬，18岁的贺龙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结束了当骡子客的生涯，投身武装革命。此后，他追随孙中山征战十年。然而，回顾十年征战历程，贺龙参加的每一次运动都遭到了失败，他不禁茫然。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和与共产党人接触机会的增多，贺龙看到，中国的希望就在共产党人身上，他开始不懈地追求共产党。

1927年8月，朱德与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出南昌，进军广东的途中，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最为艰难的时候，贺龙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布要跟共产党走到底！

战争年代，贺龙以其健壮的体魄、坚定的信念，带领战士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如果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领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么，贺龙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强调部队要搞好体育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出“锻炼

体魄，好打日本”的伟大号召。贺龙也更加重视部队体育运动的开展。他认为，生动活泼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能培养指战员勇敢顽强、机智灵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优良作风，而且，“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支纪律严明又生龙活虎的部队才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1938年初，贺龙率领的第120师直属机关干部组织了一个业余篮球队。贺龙亲自给篮球队命名，他说，我们红军有过“战斗球队”，八路军嘛，还是要战斗的。我师有了“战斗报社”、“战斗剧社”，球队也叫“战斗队”吧。

从此，这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战斗”篮球队随军转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到处打球，活跃部队生活，并带动第120师的体育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冀中抗日时，1939年4月23日，齐会战斗打响了。贺龙临阵不乱，他巧布兵力，为敌人撒下天罗地网后，已是下午三四点。他轻松地来到“战斗”篮球队队员的住处，鼓励他们打一场激烈的球赛。这时三里地外的枪声清晰可闻，贺龙像往常一样，从容不迫地在球场边坐了下来，还不时地给队员们指点战术和动作。球赛结束，贺龙把队员们及“战斗剧社”的人叫到一起，要他们抓紧时间练习，说：“要记住，我们是在艰苦战斗中成长的，也要在艰苦战斗中经受锻炼。锻炼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拉得动、打得赢，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服务。”

贺龙于从容中指挥的齐会战斗取得胜利，振奋了冀中抗日军民的斗志。事后，人们都称他为“活龙”，因为不论是他亲自指挥作战，还是他的队伍打仗，都镇定自如又生龙活虎。

为推动部队体育运动的发展，贺龙经常观看或率“战斗”篮球队参加比赛和运动会以及各种体育活动。

1938年5月1日，第120师在岚县开运动会，为加强与晋绥军的团结，贺龙特邀阎锡山部赵承绥骑兵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一起观看“战斗”篮球队和骑兵篮球队的友谊赛。

1939年4月上旬，第120师和冀中军区、冀中行署在河西村开联欢会，贺龙出席并观看“战斗”篮球队和行署篮球队比赛。赛后他与队员们亲切交谈，鼓励他们说：“要好好打，互相学习，打出好风格，赛出高水平来。”

1939年12月30日，贺龙率“战斗”篮球队和“战斗剧社”到河北张家庄参加军政大学总校第五期学员毕业典礼，并表演球赛和文艺节目。

1940年5月1日，第120师在兴县李家湾举行全师体育运动大会，有军事、体育等项竞赛。贺龙亲临运动会作报告，发表了扣人心弦的讲话，深入地阐述了开展体育活动的意义。

1942年8月，贺龙要求“战斗”篮球队赴南泥湾慰问359旅，并指示他们帮助359旅开展体育活动，同时向他们学习，把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紧密联系起来。

9月1日，延安“九一”运动会在文化沟青年运动场隆重开幕，贺龙为运动会筹委会副会长。“战斗”体育队步行千里，由晋西北来到红色首都延安。10月上旬的一天，贺龙陪同毛泽东接见“战斗”队全体成员。毛泽东对120师在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的极端困难环境中开展体育运动给予了高度赞扬。

革命战争年代，贺龙还特别重视部队文艺工作。他多次召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生座谈，并在晋绥边区文化救国联合会上讲话，鼓励文艺工作者到敌人后方去，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

对“战斗剧社”，贺龙经常提出指导性的意见，给部队文艺战士以有力的鼓舞、教育和鞭策。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剧社一面随部队参加战地工作，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粮食，护送伤员，一面抓紧空隙时间进行排练和演出。这不但丰富了部队文化生活，也大力支持了革命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更加关心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1951年，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和西南体育总会组建体育工作队，贯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体育工作方针。

1952年5月4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盛大运动会——西南地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重庆隆重召开。贺龙亲自提议并主持了这次大会。他为大会题词：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而服务。开幕式上，贺龙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说：“人民大众的体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项革命事业。”他号召全体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一定要把体育运动真正普及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中间去，成为他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体育才有生命、有力量，并能发

挥它应有的作用”。

1952年6月，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8月，在北京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25周年体育运动大会。贺龙指示西南军区成立了体育代表团。

贺龙为西南地区发展体育事业，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体育人才花费了许多精力和心血。在他的提议和关心下，雄伟壮观、设备完善的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建成。它是新中国最早建成的现代化体育设施之一，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体育活动及竞赛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

体委正式成立以前，体育事业由青年团中央主管，当时，许多群众和体育工作者写信给中央，建议由贺龙来管这项事业。

1952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从此，他统领了中国的“体育大军”。

1953年，贺龙在北京接见国家体委干部，他勉励大家要把体育当做毕生的事业来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体育事业会大大地发展起来。”他还风趣地说，他当体委主任，是周总理和邓小平点的将，是毛主席下的令，“毛主席要我干，党中央要我干，我就干”！

贺龙一心为革命、一心为党的精神，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体委广大干部，也促使中国体育事业突飞猛进，到“文化大革命”前，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中国运动员打破了一百多项世界纪录，获得12项世界冠军，填补了中国体育史上的空白，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建立了功勋。

六、为了实现青年时代的夙愿——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聂荣臻主动挑起了负责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重任

1956年，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帅聂荣臻，结束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这项工作任务确定后，许多同志为他担心，劝他说：“这个工作极其繁忙，千头万绪，还要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肯定不少，你身体又不好，最好还是不要接手。”

这些话似乎句句在理，可聂荣臻却丝毫没有动摇过。几十年来，他目睹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感受过科技落后的被动，因此，他希望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国家的科学事业，实现青年时期的夙愿。

1899年出生于四川江津县的聂荣臻在苦难中度过了儿童时代。年少的他目睹了农村的动荡，农民生活的苦难，以及军阀暗无天日的混战。

1919年，怀着变革社会现状的满腔热情，聂荣臻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决心学好科学技术，以救国救民于水火。

在法国，聂荣臻一边学习一边进工厂做些简单的技术工作。为了做工，他跑了许多城市，进了许多工厂，当然，也得跟着换学校学习。为了实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美好愿望，什么样的苦他都能吃。

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因为比利时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是一所工科大学，专学机械、化工等课程，而且费用比较低廉，还设有专门的寄宿宿舍。经过近一年的补习，他进了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系。

沙洛瓦大学建筑精致，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学习环境优越。聂荣臻本来可以在这里一心一意地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然而，这时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界观也转变了。

国内军阀混战的消息不断传来，已经参加过几次勤工俭学学生大规模斗争的聂荣臻不禁思考：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控制，中国的现实如此，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成为工程师，又有什么用呢？

随着接触马克思主义机会的增多，聂荣臻愈加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了。1923年2月，聂荣臻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旅比支部的工作。1923年初，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聂荣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党务工作的不断增多，他的专业知识的学习与革命工作的开展发生了冲突。为了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聂荣臻放弃了沙洛瓦大学的学习，他"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梦也就此打住了。

聂荣臻的科技救国梦破灭了，但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始终困扰着他，而他也始终在思考、寻找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方式和途径。

1924年9月，聂荣臻由组织安排，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第二年，

他又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并接受军事训练，任中国班的党支部书记。聂荣臻是第一批进入红军学校学习的。1925年8月，聂荣臻回国，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期间，他还负责主管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两次起义最终都失败了。他深刻地总结了这两次起义的教训。除了分析战略、战术、政策、组织等方面的原因外，聂荣臻还以独到的眼光指出，当时的技术水平落后，也是导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香港写总结时，批判了党内普遍存在的“技术人才不要紧，只要听指挥”的错误认识，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的建议。

1932年3月，聂荣臻和林彪接手红一军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红一军团几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而从它恢复到取消的近六年时间，聂荣臻一直任政治委员，为它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红一军团在中央根据地是反“围剿”战争的主力，也是长征的先遣部队，在陕北，它取得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以红一军团为主力组建的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然而，在所有这些辉煌成绩的背后，聂荣臻都看到同一个问题：我们的军队装备太落后，科学技术太落后。

国民党围困江西时，我们的部队严重缺枪，因此，每支缴来的枪都被不分昼夜地使用着，使用多了，出了许多毛病。一次，一个国民党士兵后脑中了枪弹，扑倒在地，清醒后，伸手摸摸后脑，只有一个比弹头大一点的肿处，他捡起红军射中他后脑的弹夹：原来发射这颗子弹的枪筒，来福线早被擦光，没有射击力。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我军根本无法解决缺枪少弹的问题。聂荣臻暗下决心，我们总有一天会改变这种状况的！

在晋察冀边区，枪支、弹药、炸药的缺乏仍是最严重、最普遍的问题，来源主要也是缴获。许多在战争中夺来的枪，连刺刀都失落了。白刃战中，战士们只能用梭镖来代替刺刀。

为解决缺枪少弹的状况，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聂荣臻与军区军工部长刘

再生和张珍等同志，带领广大军工战士想了不少办法，使边区的军事工业能翻沙、铸弹和修理枪炮，制造出迫击炮弹、手榴弹、地雷和复装子弹等，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在晋察冀边区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斗争时，聂荣臻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懂科学技术，所以他经常对干部说："知识分子懂科学技术，要重视他们。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队伍，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当时曾动员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工作。这对发展晋察冀边区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军事工业，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武装队伍起了重大的作用。

1949年1月3日，聂荣臻、罗荣桓率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身兼六职：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这是他一生中最忙的时期。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重点抓情报工作和后勤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留给聂荣臻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们因技术装备落后，吃了许多亏。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如何逐步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是聂荣臻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还认识到，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越强，即使别人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因此，国防科技工业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当时，他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

抗美援朝战争中，超负荷的工作量使聂荣臻病倒了，为了他的身体健康，毛泽东命令他暂停手中的工作，到杭州疗养，但他却闲不住，仍然担负了许多工作，并特别关注科技工作的进展。

1954年，聂荣臻分管军工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为了摸清家底，他到

西南地区调查。在重庆，这个曾被称之为国民党军工基地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些破窑洞，谈不上是什么军工厂；在昆明，那里的光学仪器工厂只能生产低倍率望远镜，连瞄准镜都不能生产。西南之行，使他再次感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

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4月份以前，制定出1956—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聂荣臻直接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10月的一天，时任党总书记和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的邓小平找到健康状况已经有所好转的聂荣臻，传达中央对他工作安排的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由聂荣臻接手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二是任北京市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听完邓小平的传达，聂荣臻当时就表示愿抓科学技术工作，他说：“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

就这样，青年时代怀抱“实业救国”理想，远涉重洋勤工俭学的聂荣臻，下定决心，把他后半生的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承担起科学技术工作重任的聂荣臻，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完善和落实科学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解决科研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建设一批必要的试验基地……

他坚信，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一定能把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国！

七、乌兰夫是我国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全国的民族工作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彩旗招展、红灯高悬，一位魁梧健壮、神采奕奕的蒙古族人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无比激动的心情一道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部队。他就是为内蒙古的革命

和建设，为中国的民族事务立下不朽功勋的乌兰夫。

10月22日，乌兰夫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会议，提出起草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条例等问题。最后，他被指定与刘格平、刘春、杨静仁等共同起草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条例草案。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曾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内蒙古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乌兰夫作为蒙古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把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第一次变成现实，他为中国各民族的革命和建设，贡献了毕生心血，建立了光辉业绩。

1954年9月29日，乌兰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后，他又多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参加新中国成立纪念庆典大会和盛大的阅兵式。

看到全国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大好形势和祖国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乌兰夫热血沸腾，不禁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内蒙古建设得更好，把民族工作做得更好！"

乌兰夫，1906年出生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幼名庆春，学名云泽。乌兰夫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1923年10月，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在这里，他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迅速地成长起来。年底，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成为蒙古族第一代觉醒的革命青年之一。1925年，乌兰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乌兰夫参加了大会文件的翻译工作。他是列席六大旁听的唯一的蒙古族青年。

1929年6月，乌兰夫带着一本《资本论》取道蒙古人民共和国，秘密回到家乡。回家后，他身着当地农民服装，以拾粪、赶车为掩护，经常四处奔波，秘密联系隐蔽的党员和革命者。邻居不明内情，说："别人家的孩子念了书都在外面当大官，做大事，云泽留学回来，怎么拾起粪来了！"乌兰夫不做任何解释，他一心一意地建立党组织联络点，组织农民协会，选送蒙古族进步青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校学习，为党培养干部扩大革命力量。

后来，他又在王若飞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斗争

不断向前推进，把各民族的抗日、解放斗争纳入中共的领导。

蒙古亲日派德王在府邸建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企图实现大蒙古帝国皇帝的美梦。1935 年冬，为争取德王抗日，乌兰夫以教师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拜会德王，劝他改弦更张。德王狡辩说，自己是利用日本人的金钱和武器实现蒙古族的自治。由于德王降日决心已定，一意孤行，谈话没有结果。在争取了傅作义将军的支持后，乌兰夫于 1936 年 2 月 21 日，通过云继先、朱实夫，秘密领导百灵庙军事暴动，打击了德王的投降行径，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支队伍被组建为蒙旗保安旅(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又扩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开赴抗日前线，成为蒙古族的抗日劲旅。

1938 年年底，乌兰夫在新三师部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党中央在《决定》中赞誉新三师是内蒙古各民族中最大、最先进的部队，官兵们顿时备受鼓舞，情绪格外高涨，都振臂高呼：“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到底!”“驱逐日寇，收复失地!”

然而，这支抗日劲旅却不断遭到国民党的排挤，乌兰夫处境日益危险，1941 年 8 月，乌兰夫辗转来到延安。9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乌兰夫任教育长。乌兰夫又是主要授课教师之一，在他的影响下，延安民族学院成为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1942 年春，乌兰夫在中央党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你回国后，在绥远地区做群众工作，做军队工作，还搞了百灵庙暴动和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斗争中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

抗日战争胜利后，乌兰夫全身心地投入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工作。1945 年 9 月 9 日，在苏蒙联军某些人的支持下，原伪蒙疆的补英达赖等人成立了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并宣传独立的主张，制造分裂祖国的舆论。为贯彻中共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张，乌兰夫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补英达赖等人改变态度，维护了祖国的统一。1946 年 2 月 25 日，东盟的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提出内蒙古和外蒙古合并的主张。乌兰夫立即展开与东蒙主要人物的会谈。他诚挚的态度、对内蒙古革命深刻的理解和分析，使东盟主要人物都转变了立场，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地促成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结束了内蒙古数百年的分裂历史。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方针、政策的一个巨大胜利，更是乌兰夫立下的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成为新中国的“封疆大吏”，全面主政内蒙古，为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呕心沥血。

乌兰夫善于正确而恰当地解决民族问题，因此得到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他的领导下，内蒙古出现政治稳定、经济昌盛、文化繁荣的大好局面，为其他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包头钢铁厂落成开工；煤炭、机械、电子、化学、森林等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草原上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乌兰夫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处理民族问题，他强调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消灭旧的民族关系，建立民族间自由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新型民族关系。1949 年 12 月 25 日，乌兰夫出席欢庆绥远省各届领导人大团结的宴会，他在讲话中指出：“绥远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特别是蒙汉人民杂居的地区，但不要担心民族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和如何解决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问题一定能得到正确解决。”1950 年 4 月 28 日，乌兰夫赴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十次会议，作《关于当前民族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民族关系的状况，提出进一步消除民族间残存隔阂和矛盾的措施。他的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

1959—1961 年，神州大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天灾人祸，全国食品极度缺乏，无数的孤儿处于饥饿状态。为尽可能地救助他们，乌兰夫决定成立以自治区卫生厅厅长为首的专门机构，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十名孤儿（大的不过七岁，小的只有两三岁），送给牧民抚养或先送专设的育婴院抚养。这些孤儿在牧民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他们为发展蒙古民族，繁荣牧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乌兰夫为国分忧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和以实际行动办好民族事务的高度责任心。

在以后的几十年，乌兰夫时刻都关心着祖国的民族事务。为做好民族、统战工作，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不时地为党中央献计献策，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促进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第八章　十大元帅　排定座次

聚焦时间： 1955年

聚焦地点： 北京中南海、各大苏区、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各大战场

聚焦人物：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聚焦话题： 有道是"不愿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元帅是军人的最高荣誉和最高追求。中国十大元帅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各自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1955年元帅军衔的评定及其排名先后是否客观公正？有关这些问题，多年来社会上有颇多传闻，究竟孰是孰非

1955年的金秋，北京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

9月27日下午，在这一庄严而又神圣的历史时刻，曾经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帅们，一个个身着戎装齐聚中南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授衔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下午五时整，元帅授衔仪式开始。一阵嘹亮的国歌声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正式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毛泽东亲自为元帅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命令状和勋章。

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也隆重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十位元帅、十位大将、57位上将、

177位中将和1360位少将。其中十大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耀眼的前卫阵容。

一、“红军之父”、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朱德排名第一

朱德是十大元帅中最年长的一位。他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农之家，1955年当他穿上元帅服时，已是69岁高龄了。他是一位从旧军队里冲杀出来的革命者。自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1928年率部挺进井冈山之后，朱德在人民军队中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指挥、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被誉为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在十大元帅中朱德排名第一，这是由他的资历、人格、贡献及其在党和军队中的崇高威望所决定的。

论资历，朱德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堪称资深革命家。

早在1909年，朱德就只身离开家乡，考进设在昆明的云南讲武堂，入学不到半年即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蔡锷领导的云南武装起义，以后又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青年时代的朱德带兵有方，英勇善战，常常出奇制胜，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才干。1917年，三十出头的他就担任了少将旅长，成为滇军中著名的将领。

尽管如此，时世的动荡不安，军阀的连年混战，老百姓的流离失所，使生活在旧军队里的朱德陷入了一种苦闷状态。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相继爆发，朱德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定到国外去学习和游历，以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走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就这样，1922年，朱德巧妙地逃离云南，同好友孙炳文历经磨难，由上海前往法国，再由法国来到德国柏林，在这里见到党组织负责人周恩来，并由他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在德国和俄国历经四年的寒窗苦读，于1926年回国参加实际工作。

早期投身军界的特殊经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杰出的军事才能、系统的理论学习以及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了解，为朱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建功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业绩，朱德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德被誉为“红军之父”。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筹划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 年初，他又发起湘南暴动，在湘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达三个月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随后，他率部挺进井冈山，与先期到达井冈山的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建了全新的中国工农红军。朱毛会师建立了当时党领导下的最强大的一支革命武装，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从此，朱毛领导的红军威震天下。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井冈山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但朱毛联手，精诚合作，在实践中摸索并实施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接连粉碎敌人的“进剿”，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1929 年，朱德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他们在同“左”倾路线迂回曲折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大好革命形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 年至 1933 年间，蒋介石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朱德先和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前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朱德又和周恩来运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而遭到失败。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路上，朱德不计个人荣辱，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担任八路军总指挥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37 年 9 月至 1940 年 5 月，年过半百的朱德亲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山区，指挥整个华北抗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八路军由挺进华北时的 3. 2 万人发展到 22 万人，并建立了晋察冀、冀中、冀南、晋冀豫、鲁西南等十多块抗

日根据地。此后，朱德奉命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地抗战，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

解放战争之初，作为党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朱德，在延安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平绥战役和承德保卫战，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还击，为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1947 年 3 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等部 25 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26 日，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4 月，朱德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会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人，重点解决好晋察冀军事问题。10 月，朱德亲临前线，具体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清风店战役，歼敌 1.7 万多人，活捉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并乘胜夺取石家庄，为扭转华北战局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 年 4 月，在陕北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达河北阜平县，与朱德、刘少奇会合。此后，朱德与毛泽东等中共主帅在西柏坡共同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工作，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丝毫没有懈怠。为了尽快实现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朱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朱德的关怀和推动下，经过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新中国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空军、海军、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兵等新军兵种，改变了过去人民解放军由步兵组成的单一格局。这些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的新军兵种，在抗美援朝、保卫国防的战斗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支援国家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人格，朱德在我们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是有口皆碑的一代楷模。

早在滇军任少将旅长时，朱德每月月薪就有大洋 1000 元，还有洋房、股票，生活已是十分安逸，然而面对黑暗的现实，他深感在旧军队里充当一介武夫，不是人生的理想归宿，毅然放弃高官厚禄，投身到共产党的怀抱，而且一旦确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矢志不渝。后来在南昌起义失败的严

峻形势下，他仍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坚定地对部下说："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这面旗帜不能丢。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总会有胜利的那一天。"正是凭借这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不可摧的刚强意志，才使得从南昌城头走出来的这支军队很快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并克服重重困难，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朱德是享誉中外的红军总司令，然而在他看来，权力意味着责任。他时刻不忘重任在肩，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部队冲锋陷阵，克敌制胜。他无限忠于党的事业，革命几十年总是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他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发自内心地称赞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天性善良，作风朴素，对一切大事小事都十分认真。他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喜欢跟普通战士打成一片，深得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钦敬和爱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

对于朱德来说，还有一个促使他走向人生辉煌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毛泽东不同寻常的关系。

有人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的确，朱德和毛泽东虽然早期阅历不同，但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朱毛井冈山会师以后，两人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此，他们一起闯过腥风血雨，一起面临生死考验。在1928年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后，他们虽然有过短暂的意见分歧，但很快就烟消云散。尤其是经过一段实际斗争，当耿直的朱德认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后，便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并坚信不疑。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在长征路上，朱德都毫不迟疑地信赖毛泽东、支持毛泽东。历史不会忘记红军长征懋功分兵后朱德与张国焘的那场较量。当时张国焘强行改变北上路线，另立中央，用武力逼迫朱德发表声明谴责毛泽东，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面对张国焘的围攻和辱骂，朱德忍辱负重，旗帜鲜明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他说："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关键时刻，朱德全力维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书写了朱

毛关系的动人篇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尽管根据地将朱德和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悬挂，但他始终把毛泽东看成是党和人民军队的统帅，自觉辅佐毛泽东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任务。正因为这样，朱德和毛泽东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崇高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历久弥坚，牢不可破。

综观朱德戎马一生，无论是资历、能力，还是品德、业绩，在我们党和军队里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是和毛泽东齐名的一代元勋，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元帅。

二、“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劳苦功高的彭德怀排名第二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写给彭德怀的一首诗，诗作字字千钧，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彭德怀元帅的高大形象。

自古将相出寒门。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1898 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饱尝人间的辛酸苦辣，要过饭、拉过煤、挑过堤。幼年的磨难培养了他刚毅果敢的倔强性格和同情民众的赤胆忠肠。

彭德怀自称是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他发誓要为解除父兄的贫困和民生的苦难而战斗。1916 年 3 月，彭德怀投入湘军。他曾在连里与几位同道者组成“救贫会”。后因路见不平，拔刀杀掉恶霸地主欧盛钦，而被迫逃离军队。1922 年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再回湘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这期间，尽管他身在旧军队，但从不沾染恶习，而是仗义疏财，为民除害，在士兵中享有很高威望。

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员段德昌的影响下，彭德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看清了旧中国的腐败和旧军队的反动本质。1928 年 4 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 7 月 22 日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建立工农红军第五军。从此，他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平江起义犹如沉沉黑夜里的一声惊雷，响彻在整个湘鄂赣的上空，大大地鼓舞了处于革命低潮中的革命者的斗志，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敌人分兵几路围攻平江，7 月 30 日，红五军在城郊与敌激战一天，终因寡不敌众于当晚撤出战斗。

面对湘鄂赣三省军阀的疯狂反扑，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与敌周旋几个月，于年底到达井冈山，在宁冈新城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王佐部队担负起留守井冈山的艰苦使命。1929 年 1 月，湘赣两省军阀“会剿”井冈山。彭德怀率部与敌苦战三日后突围。8 月，他率部重返湘鄂赣边。1930 年，红五军发展到六七千人，成为红军中的一支劲旅。6 月，红五军与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兼军团前委书记。7月，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一举攻克长沙，创造了以 8000 人胜敌一万人的军事奇迹，一时声震中外。不久，由于反动派的反扑，彭德怀率部撤出长沙，向浏阳开进。8 月 23 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此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历次战斗中，彭德怀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率红三军团“横扫千军如卷席”，与红一军团紧密配合，接连粉碎敌人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34 年三四月间，李德、博古强令红三军团固守广昌，以正面顶牛的办法与敌人拼消耗。性格耿直、正气凛然的彭德怀挺身而出，与“左”倾教条主义据理力争，痛骂他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彭德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挥红三军团连续突破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以后，在湘江两岸与 40 万敌军遭遇。面对强敌，他亲临江岸指挥部队与敌血战，坚守渡河点界首三昼夜，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过江的任务。红军进入贵州后，1935 年 1 月召开了遵义会议。彭德怀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尖锐批判“左”倾路线的错误。这次会议以后，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一、红三军团，按照毛泽东的作战意图，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二占遵义，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长征路上险象环生。1935 年 8 月，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张国焘阴谋挟持中央南

下，并企图谋害毛泽东等人。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一个团的兵力，秘密保卫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护送他们迅速脱离险境，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关键时刻，彭德怀拼死“护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毛泽东的信赖。红军走出草地后，红一、三军团合编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此时他已成为毛泽东并肩携手的红军主将，而蒋介石则悬赏十万大洋取他的人头。

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八年抗战中他指挥的战役战斗不计其数，而其中最辉煌的战绩当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为了打破日军对我根据地的“囚笼”政策而发动的一次历时五个月的重大战役。我八路军参战部队先后达到一百多个团，破坏了敌人控制的铁路近五百公里，公路1500公里，拔掉敌伪据点3000个，歼敌伪军三万多名。“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斗，打出了国威军威，也展示了彭大将军的胆识和气魄，成为抗战史上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

彭德怀的军事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再次得到充分体现。1947年3月，西北胡宗南等国民党军队25万人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担任西北战场总指挥、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的彭德怀指挥着不足三万人的兵力，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一个半月内，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全歼敌军三个旅，接着又出击陇东、收复三边，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一个师部，使西北战场转入内线反攻阶段。1948年4月22日，他率兵收复延安。1949年5月解放西安，7月向大西北进军，在扶郿战役歼灭胡宗南四个主力军达四万余人，8月下旬又解放了兰州。随着新疆的和平解放，彭德怀完成了收复大西北的光荣使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中国刚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关键时刻，毛泽东点将，由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率师抗美援朝。入朝后，他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军事原则，指挥志愿军于10月25日到12月24日，连续向敌军发动了两次反击战，歼敌五万余人。经中朝两国人民军队的共同战斗，于12月6日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从1950年底至1951年夏，中朝军队并肩作战，进行了三次反击

战，歼敌 18 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经过大约三年的艰苦征战，最终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彭德怀也因此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军事家。

1953 年，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 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担负起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的领导重任。

彭德怀是一位农民的儿子，是那个特定的时代迫使他走上从军的道路。他在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刻苦自励，成长为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大将军，即使跟同时代的其他高级将帅相比，也有许多过人之处。首先，他是中国革命史上战争经历最丰富、最全面的一位。他几十年如一日，出生入死，参加和指挥了从北伐战争到抗美援朝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战役战斗，从未间断；他纵横驰骋，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乃至异国他乡；他的对手有旧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也有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光辉战绩。其次，在中国革命最危难的紧要关头，他或临危受命，或挺身而出，承担许多最紧迫、最艰难的任务，发挥了其他将帅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是十大元帅中打硬仗、恶仗、大仗最多的一位战将。翻开中国革命史，我们看到：在井冈山保卫战中，他指挥留守部队 800 人与 20 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掩护了红四军主力顺利转移；长征路上的湘江血战，他率红三军团一马当先，以巨大的代价阻击敌军，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在西北战场，他指挥西北野战军战胜了十倍于己的强敌，扭转了西北战场的整个局势；抗美援朝，他率兵出征，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打败了以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者。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彭德怀英勇无畏、顽强拼搏的硬骨头精神，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第三，我军指挥员亲临前敌的指挥特点在彭德怀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几十年戎马生涯，他始终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最前线，在枪林弹雨中来回穿梭，在炮火硝烟中摸爬滚打。在和白军鏖战之际，他甚至挥刀上阵；在红军攻城时，他亲自挖地道、装炸药。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与战士共存亡。因此，他指挥作战，往往能够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攻势凌厉，无坚不摧。第四，彭德怀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素质。他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危难关头投身到被“强者”追杀的共产党队伍中的。他怀抱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体恤孤寡、同情苦难民

众；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性格耿直，疾恶如仇；他生活俭朴，力戒奢靡，赤足草鞋，朴实无华；他律己甚严，治军有方，所率部队以军纪严明、战斗力强而著称。他的一生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动人故事。

彭德怀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特殊的军政素质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表现出的勇气、胆识和才能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决定了他在人民军队中的崇高地位。1955 年，劳苦功高的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排名仅次于“红军之父”朱德，位居第二。这是他应得的荣誉。

三、捷足先登的后起之秀，多谋善断的“常胜将军”，年轻有为的林彪排名第三

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的林彪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但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结局。他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军事家，却又是一个乱党乱国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二者在林彪身上似乎并不矛盾。

林彪 1907 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他自幼性格内向，但骨子里却蕴涵着不安分的因子，喜欢扮演山大王的角色。他九岁入私塾，后入本族堂兄林育南创办的浚新小学，14 岁考入武汉共进中学。在共进求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底，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黄埔军校的学习和训练，是林彪军事生涯的开始。黄埔军训科目之严，已超越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林彪体形瘦弱却争强好胜，经常超负荷、大运动量地给自己“开小灶”。他文化基础好，又肯动脑筋研究一些战术问题，各种考试成绩均为优良，深得一些教官的青睐，同学们都羡慕地称他为“军校之鹰”。

1926 年 10 月，林彪结束军校学习，被分配到北伐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1927 年 4 月，叶挺部队在河南与奉系军阀部队展开激战，三连把溃军追至渭河边，林彪不顾连长停止追击的命令，率队乘胜猛冲过桥，各排亦紧追其后，结果大胜敌兵，俘敌八百多人。林彪在战斗中初露锋芒。

林彪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成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战将。

初到井冈山，林彪就有出色的表现。特别是龙源口之战，林彪善用疑兵、机智灵活的战术风格，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28年夏，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湘赣边遭受沉痛的“八月失败”，其间有“军中美髯公”之称的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毛泽东、朱德悲痛之余，任命21岁的一营营长林彪担任由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构成的28团团长。委此重任，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高度欣赏和器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彪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辖四个纵队，林彪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1930年2月，中央根据地红军扩编为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赏识下，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林彪率部连战皆捷，再立新功，1932年3月，25岁的林彪被任命为红一军团军团长。

年轻的林彪之所以能在短短四年时间里，由一个营长升至军团长，除了机遇，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和高超的指挥才能。紧接着，担任军团长的林彪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孚众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黄陂、草台岗大伏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50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一二月份，林彪连续两次接到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主动出击与敌打遭遇战的电令，但林彪觉得，打遭遇战，敌人容易见硬就缩回去，达不到歼敌的目的。于是，他指挥主力部队趁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的黑夜，悄悄进入敌军必经之地——黄陂，在这里设伏待敌，派重兵堵住敌人可能突围的沟口。2月28日，敌52师走进了林彪设置的“口袋”，红军出其不意地迅速出击，将战线长达十余里的敌人切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我军居高临下，使陷于谷底的敌人被动挨打，不到三个小时，全歼敌一个整建制师，击毙敌师长。3月1日，敌59师亦被歼灭。接着在草台岗，林彪指挥所部用几乎相同的战术，重兵埋伏在山势险要的山路两侧。当敌11师师长肖乾进占草台岗时，才发现天气地形皆有利于偷袭者，但为时已晚，尽管有飞机大炮助阵，也难逃全师覆灭的下场。此役令敌将陈诚气得口吐鲜血。蒋介石闻讯哀叹：“此次损失异常惨重，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黄陂、草台岗两战，歼敌三个师，俘敌一万多人，战后红军光清扫战场就用了

一个星期，缴获各种枪支弹药不计其数。敌人遭此重创，元气大伤。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

真正让林彪名扬中外的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平型关大捷。这次战役是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灵县一个叫乔沟的地方展开的。这里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沟，谷底是敌人仰攻平型关唯一的一条山路。日本板垣师第21旅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进入林彪设置的包围圈，被堵住头尾，切成数段，损兵折将近千人。此役打出了国威军威，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也使林彪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

1938年3月，林彪在山西隰县被友军哨兵开枪误伤而离开战场回到延安，后又到苏联治疗养伤。等他再次披挂上阵时，中国的时局已进入解放战争了。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被任命为自治军总司令，经略东北。众所周知，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延安，而新中国可靠的根据地则是东北，没有东北战场的胜利和巩固的根据地，也就没有全国的胜利。在东北大决战的前前后后，这里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在林彪手中，由此林彪扮演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

硬仗开始了。1946年4月，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反击国民党军进犯四平的四平保卫战。这一役双方都损失惨重，国民党军死一万人，而民主联军也付出了8000人的代价。通过这次战役，国民党认为自己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时机尚不成熟，而林彪则深感自己的部队亟待整训。于是，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休战四个月。林彪不失时机地抓住大战来临前的空隙对部队进行整训。他将自己一生征战的心得体会总结概括为“三三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六条战术原则，这就是著名的“林六条”。东北民主联军按照“林六条”整整训练了半年，结果战斗力大大增强。1947年1月，东北国共两军再度交手，在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歼敌四万余人。此后，东北战场上，国民党由攻势转为守势。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战役是战略决战的第一大战役，胜败事关全局。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此时，林彪在究竟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问题上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执行毛泽东的作战意图，先取锦州，关门打狗。林彪与罗荣桓等人指挥东北野战军苦

战52天，歼敌47.2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为了抓住战机，辽沈战役结束不到半个月，东北野战军又奉命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共同发起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顺利完成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人，基本解放华北全境。

从1949年4月起，林彪率部南征，一路攻势凌厉，所向披靡，迅速解放整个中南地区。

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后，林彪住进花城，成为镇守中南的大将军。

不久，邻国朝鲜又燃战火。不过这次林彪态度反常，他不主张出兵朝鲜，并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点将。

但他仍然春风得意，在1954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排名第三。

林彪获此殊荣，历史地看，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战争年代的林彪在人民军队的将帅队伍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首先，他是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林彪是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中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新思想、新知识，18岁考入黄埔军校，随后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就有上佳的表现。1928年4月上井冈山，几个月后就被提升为红四军主力团团长，此后几乎一年一个台阶，25岁就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可谓一马当先，后来居上，这在红军队伍里是绝无仅有的。林彪的提升有其实力基础，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以更加突出的表现，巩固和发展了他年轻有为的优势地位，成为鹤立鸡群的“后起之秀”。其次，他是一位多谋善断的“常胜将军”。林彪喜读兵书，爱动脑筋，善于琢磨。他曾说，对于敌情、地形、部队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琢磨、不能间断。这样做不能看做是重复，而是一个不断深化提高的过程，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勤于勘察、勤于思索、爱读地图，正是林彪作战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他的仗越打越好，越打越精。他精于谋划，巧于布阵，以智取胜，出奇制胜，经常采用伏击、突袭等办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打击敌人，往往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战果。胜败乃兵家常事。林彪指挥的战役战斗不计其数，但很少留下败绩。他指挥的许多战役干净利索、意蕴深厚，令兵家叹为观止，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范例，也为他赢得了“常胜将军”、“无敌元帅”之称。第三，他是一位战绩

辉煌的有功之臣。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林彪指挥的部队都是精锐之师，往往担负着最重要的作战任务。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他指挥着红军主力部队一次次粉碎强敌的进攻和“围剿”，发展壮大了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抗战伊始，他指挥115师大战平型关，取得了抗战“开门红”；解放战争中他再展雄风，指挥东北野战军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是各大野战军中战线最长、解放面积最广、战果最丰富的一支大军。

但是，在他赫赫战功的背后，其人格中的阴暗面也在一天天地膨胀。事实上，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林彪头脑中的消极因素就有所表露，如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想当逃兵；在井冈山，他又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的思想上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性格孤僻，难以与人相处共事；生活作风也不够检点，等等。但总体而言，战争年代的林彪还是一路风光。评定军衔，固然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人的军事素质和军事建树，而林彪在军事上的造诣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有鉴于此，在当时情况下，授予林彪元帅军衔，排名第三，还是无可厚非的。至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则又应另当别论。

四、革命战争的开路先锋，足智多谋的兵法传人，智勇双全的刘伯承排名第四

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四的刘伯承被称为中国的“战神”。他在几十年的军事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几次担任先锋官的角色，主动承担了许多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并以其伤残之躯屡建奇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刘伯承足智多谋、神机妙算，他把古代兵法用于现代战争，从而把中国的兵法大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军事谋略，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被誉为“当代孙武”、“兵法传人”。

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泥脚文人”。家庭的熏陶和父辈的教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刻苦攻读的习惯。然而置身于腐败昏庸的清王朝的统治下，目睹民不聊生的现状，刘伯承决心要当一个“拯民于水火之中”的军人。他1911年参加辛

亥革命学生军，1912年考入四川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同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五师当司务长、排长。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带领川东护国军进行讨袁护国战争，在丰都战役中，右眼和颅顶受重伤，后经医生手术，取出右眼，装上假眼，从此开始了他独目看世界的军旅人生。

在讨伐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战争中，刘伯承任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他带兵浴血奋战，骁勇异常，且多谋善断，被誉为“川中名将”。1926年，在吴玉章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12月，他与杨闇公、朱德等人发动并直接指挥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

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

1927年8月1日，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前敌委员会参谋长。三个月后，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吴玉章等人到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1930年8月，刘伯承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务日常工作。1932年1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后复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前线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刘伯承是红军长征的先锋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担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先锋官比一般的讨伐出征更加艰辛。因为长征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开路先锋面对的是围追堵截、穷凶极恶的强大对手。在这关键时刻，刘伯承勇挑重担。他率部冲杀在前，屡闯险关。

突破乌江，智取遵义，他把红二师指挥得如神兵天降，威震敌胆。

巧渡金沙江，更是出奇制胜。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后，亲率军委纵队和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

红军进入彝族区时，他与沽基家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留下了民族团结的千古佳话。

抢渡大渡河是刘伯承执行先遣开路任务的又一杰作。这是一场惊险的战

斗。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部奇袭安顺场，击溃守敌两个连，占领渡口强渡大渡河后，沿左岸向泸定城疾进，又击溃敌人一个旅，有力地保证了红二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从而粉碎了蒋介石企图让红军当“石达开第二”的迷梦，为整个红军北上打开了胜利之门。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他与朱德一起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刘伯承在抗战中担任129师师长。他指挥八路军这支精锐之师东渡黄河后，奉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10月，刘伯承率部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二十余架，歼敌百余名，有力地支援了友军的忻口战役。此后，他和政委邓小平率领所部转战晋冀鲁豫，创建抗日根据地，并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刘伯承以军事家的胆识和缜密的组织作风，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总结出了伏击、袭击、急袭、吸打敌援等一整套游击战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交通作战等形式，出色地发挥了游击集团的巨大威力，实行了“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扫荡”，积累了宝贵的敌后抗战经验。

一个有作为的军事家并不仅仅在于他指挥了几次著名的战役，更重要的是在军事行动中总结出能够举一反三的“学说”，丰富战争学的内容，并开创兵法学的新篇。刘伯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他善于通过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创造出一整套有很高价值的军事理论。这是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宝贵财富。

一个军事家的成熟往往体现在一场战争的关键时刻或重大战役中。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期间他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委是邓小平。1946年，刘邓指挥部队相继取得上党、平汉、定陶、巨鹿、滑县战役的胜利。1947年，刘邓又奉命率十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担当起全国战略进攻突击队的重任。

大别山位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解放军只要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集正集中在东西两翼作战的兵力与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达到将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

区的战略目的。基于此，中共中央选择大别山作为战略反攻的主要突击方向。

1947 年 6 月 30 日夜，刘邓大军以出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随即在鲁西南地区连续作战 28 天，歼敌五六万人，打开了南下的通道。紧接着，部队迈开大步，长驱南征，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了一条血路，然后穿越黄泛区，行程千里，于 8 月末进入大别山。与此同时，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进入豫皖苏平原。到 11 月，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从而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进军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打开局面后，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与其他各路野战军密切配合，逐鹿中原，鏖战淮海，然后渡江作战。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取得节节胜利。

1949 年 10 月 1 日，刘伯承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即赶赴西南前线指挥作战。

此时，蒋介石匆匆飞往重庆，企图挽救灭顶之灾，组织了“川东大反攻”，急调胡宗南的两个军前往增援。

我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直逼重庆南岸，在南温泉与胡宗南部队硬碰硬打了一仗，互有伤亡，打成平手。

蒋介石闻讯兴奋不已，大力嘉奖胡宗南所部。

刘伯承出其不意，乘轻便火车从左翼迂回打过长江，到达重庆西南，钳制胡宗南部，北路大军在各个渡口强行登陆，一举突破敌“新长江防线”。接着一鼓作气，摧毁敌人“川南防线”，分北、中、南路成钳形向重庆杀去。

蒋介石见势不妙，只得乘飞机逃跑了。

山城重庆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进入重庆的刘伯承指挥部队乘胜前进，一路如秋风扫落叶，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让云贵川遍插五星红旗。

1950 年 7 月，刘伯承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负起培养军队高级干部的重任。此后五年，他组织军事学院编写编译各类教材数百种之多，组织实施士兵示范演习 35 次，大规模现地作业 12 次，写下了我军训

练史上的新篇章。

刘伯承智勇双全，文武兼备，是我军又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从资历、军政素质、各个时期担负的职责、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方面的卓越成就等方面考察，与其他元帅权衡比较，在十大元帅中他排名第四。

五、“两把菜刀闹革命。”颇具传奇色彩的贺龙排名第五

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五的贺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靠两把菜刀起家的职业革命家；他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他和他的战友开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苏区之一的湘鄂西苏区，创建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八路军三只铁拳之一的120师奋战在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彭德怀经略大西北；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又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转战大西南……一部中国革命史处处闪耀着贺龙的名字。

贺龙1896年生于湖南桑植县。幼年贺龙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因为家境清贫，加之不满旧式呆板教育方法和塾师粗暴的体罚，他只读了三年私塾，便辍学回家，帮助父亲挑起生活的担子。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伴他度过了少年时光，也培养了他坚毅顽强和果敢正直的品质，同时在他幼小的心里播下了仇视豪强、反抗压迫的种子。

1914年，贺龙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带领二十多位热血青年，手持菜刀，夜奔芭茅溪，杀死民愤极大的税警队长，夺得12支毛瑟枪。这次战斗，第一次显示了贺龙过人的胆略和军事才能，从此，“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很快流传各地。1917年，他在家乡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参加了护法战争。1918年以后，贺龙先后担任靖国军营长、团长、四川讨贼军旅长、建国川军师长和澧州镇守使。这期间，贺龙所部几经转战，由几十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严饬军纪，救济贫民，打击地方豪绅。他还下令砸毁了一块丧权辱国的石碑，扣留了日本轮船上的大量军火，同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率部重占澧州，挺进鄂西、攻克宜昌。1927年在河南逍遥镇、临颍战役中大败奉

军，贺龙所部被誉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的“钢军”。他本人也成为威名赫赫的北伐名将。这年6月，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

贺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正当贺龙挥师逐鹿中原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下。此时贺龙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向往共产党，接近共产党，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贺龙受党的委托担任了起义军总指挥。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8月下旬，在起义军南征途中，经过战争考验的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利后，贺龙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回湘鄂西“搞队伍”。1928年1月，贺龙与周逸群、卢冬生等人历经种种风险，由上海到达武汉，然后坐江轮溯江而上，于2月底到达家乡桑植县洪家关。他仅用一个月时间即组建了一支三千多人的工农革命军，并举行了桑植起义。8月，贺龙所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四军），贺龙任军长。此时红四军面临的环境异常险恶，多次遭到强敌袭击，损失惨重。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1929年5月，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井冈山为榜样，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7月，他率部采取诱敌深入、三面埋伏等战术，接连取得南岔战役、赤溪河战役的胜利，歼敌两千余人，创建了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1930年上半年，贺龙率部挺进洪湖。7月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此后，贺龙、周逸群依靠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逐个拔除洪湖根据地的白军据点，并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很快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包括湘鄂边、鄂西北等几块根据地在内的湘鄂西根据地。到1932年初，湘鄂西根据地发展到二十多个县，成为红军时期最具影响的三大苏区之一。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1932年秋，湘鄂西根据地丧失。1932年11月至1933年初，贺龙率部从洪湖退到豫西，又从豫西到陇东，转战3500公里，回到鹤峰、桑植。1934年夏，到达川贵东部一带，经过三个月

的艰苦奋斗，开辟了纵横一百余公里的黔东根据地。这年10月，贺龙在黔东迎来从湘赣突围远征的红六军团。两军在印江木黄会师后，成立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紧接着，贺龙指挥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1935年2月，正式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这一年贺龙越战越勇，相继取得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大捷，粉碎了20万敌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主力由四个师扩展到六个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红二、六军团长征是贺龙的"神来之笔"。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妄图把长江以南仅存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贺龙决定声东击西，先避敌锋芒，突入湘中，待敌尾追而来，再回师贵州。

我红二、六军团于11月中旬突围长征，迅速控制湘中、湘西的广大地区。等敌兵尾追而来，红二、六军团又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摆出东渡资水的态势。敌人果然上当，大批拥向湘东南。此时贺龙见机行事，急忙来了个"向后转"，率部向西北方向疾进。时值隆冬，红军冒雪在崇山峻岭中日夜兼程，于1936年2月到达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贺龙率部进入了乌蒙山区。由于敌人堵塞了通往黔西南的道路，红二、六军团只得在乌蒙山中辗转回旋近一个月，转得敌人晕头转向、疲惫不堪。然后趁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悄悄地从敌人结合部钻出敌人包围圈，兼程急进，直奔普渡河。这时滇军倾巢出动，到普渡河两岸防堵，省会昆明成了一座空城。贺龙乘虚而入，指挥红二、六军团调头南下，直扑昆明，摆出一副攻打昆明的架势。当敌人急如星火回保昆明时，贺龙率部转向滇西，日行百里，向金沙江迈进，把敌人远远抛在后面。4月底，全军一万多人顺利渡过金沙江。

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成立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在北上途中，贺龙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终于促成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红二、六军团长征历经一年多艰苦跋涉，打破了国民党一百四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时仍保持出发时大体相当的人数，毛泽东称赞："这

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任八路军120师师长，率部挺进晋西北。10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首战告捷。1938年春，光复晋西北七个县，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寇加紧对冀中地区的“扫荡”。关键时刻，贺龙奉八路军总部之命，于12月率120师主力挺进冀中。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贺龙采取避实就虚，与敌周旋于平原，然后相机集中兵力歼敌的作战方针，接连取得大曹庄、东唐旺等战斗的胜利。1939年4月，不可一世的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八百余人向齐会村发起进攻，包围我驻齐会村的716团三营。贺龙得到消息后，立即调集主力七个团并三纵队一部投入战斗。齐会战斗打得相当激烈，贺龙在身中日军施放毒气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大大鼓舞了我军的杀敌士气，结果歼敌七百多名，创造了抗日战争平原作战的范例。这年9月，贺龙又成功地指挥了陈庄战斗，歼敌旅团长以下两千多人，被誉为“模范歼灭战”。其后，他多次率部粉碎日军的“扫荡”，巩固了冀中根据地。

1940年贺龙回师晋西北，当年8月参加了“百团大战”。1942年，贺龙担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统管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指挥和财经建设。1945年7月，贺龙率部打退了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8月参加对日大反攻，收复了大片领土。日寇投降后，贺龙奉命挥师北上，解放了晋中广大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战场的战斗。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后方根据地建设，担当起西北战场“粮草官”的职责。

1949年10月1日，贺龙以第一野战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不久，他率第18兵团和第七军等13万大军由陕入川。12月，在川西北消灭胡宗南部八万余人。接着协同刘邓大军解放了大西南。

1950年2月，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他与刘伯承、邓小平一道，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政策，顺利完成了对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90万部队的改造任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歼匪百万的伟大胜利，并参与领导和指挥了西南、西北军区部队向西藏的大进军，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贺龙任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等职。

贺龙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军队建设丰富经验和高超指挥艺术、政治上成熟可靠的一代名将。他长期在党的领导下独当一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写下了不朽的篇章。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综合权衡各种因素，在十大元帅中，贺龙排名第五。

六、“上马杀敌，下马写诗。”能文能武的陈毅排名第六

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六的陈毅是一位“上马杀敌、下马写诗”的“两栖”元帅。他能诗工文，诗作气势磅礴，高雅脱俗，名冠当代诗人；他能征善战，在战场上擒龙伏虎，功名显赫。他原本想做一个文学博士，过浪漫人生，并且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然而时势却把他造就成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功勋远远盖过他的诗文成就。我们不妨循着他的人生轨迹，一睹这位诗人军事家的文韬武略。

陈毅1901年生于四川省乐至县一个书香之家。他自幼聪明好学，12岁考入当地有名的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这期间，他勤学苦练，打下了很好的诗词文学基础。1919年，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当时他希望当一个文学博士，走“文艺救国”之路。然而现实很快将他的“文学博士”梦击得粉碎。法国战后经济的萧条给勤工俭学带来重重困难，陈毅陷入了做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境地。为了“求生存、求学权”，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学生运动中，1921年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次年回到家乡四川，希望能找一份工作，结果四处碰壁。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回到中国，一连串的变故使陈毅认识到，不推翻黑暗的旧社会，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他决定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并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的头几年，陈毅是用笔而不是用枪与敌人作斗争。1923年初，他到重庆担任进步刊物《新蜀报》的主笔。10月，进入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在这几年中，陈毅创作了大量小说和杂文，在抨击军阀政治、宣传革命主张的同时，过了一把文学瘾。

1926年，陈毅受党中央指派，回四川策动川军响应北伐。11月，参与领导了顺（庆）泸（州）起义。1927年4月，四川革命形势恶化，陈毅来到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党委书记，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南昌起义爆发后，陈毅暴露身份，8月6日，他赶到南昌，此时起义军已经南下。他便连夜追赶，于8月8日在括州赶上了起义军，并随军南征。1928年1月，他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发动了湘南起义，随后率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成红四军，陈毅任第12师师长等职。从此，革命摇篮井冈山留下了这位红军创始人的战斗足迹。

陈毅同毛泽东、朱德领导开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他曾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该军的情况，受中央委托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归来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他历任红六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等职。1934年8月在兴国县老营盘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当主力红军长征时，他留在赣粤边境，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撤退后，中央苏区留下红24师及地方武装1.6万人，伤病员三万多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项英对严峻的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仍想“依靠主力打胜仗、集中兵力保苏区”，一心想恢复中央苏区昔日的繁荣。结果导致苏区红军处处被动，并付出了惨重代价。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和项英打来“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苏区尽快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这一电报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为中央苏区红军摆脱覆灭的绝境指明了方向。

3月，陈毅等人率部突出重围，来到赣粤边境。这时国民党军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并对湘粤边发起大规模“清剿”。面对强敌，陈毅等人采取公开与半公开、分散与集中、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办法，将游击队化整为零，让干部、战士以职业作掩护，深入赤白交界地和白区与敌周旋。结果，不仅打破了敌人的“清剿”计划，而且壮大了游击队。

反“清剿”取得重大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牺牲，许多红军指战员为之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严酷，断粮、缺医少药是经常的事。1936 年冬，陈毅被敌围困在梅岭达二十余天，饥寒交迫，难以脱身。面对死神，陈毅奋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梅岭三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 年 10 月，南方八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从此，陈毅的命运便与新四军部队的沉与浮紧密联系在一起。

1938 年 2 月，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6 月，陈毅奉命率第一支队进入茅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一年，陈毅模范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发动和组织群众作为敌后抗战的中心工作，军事上坚持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迅速打开了江南抗战的局面。

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来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会见了陈毅、项英等人，共同制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这年夏天，陈毅率部“向东作战”，在南京至上海间相继取得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接着派第六团东进，打黄花塘、战浒墅关，夜袭虹桥机场，火烧了日军四架飞机，轰动上海，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

与此同时，陈毅积极做好分兵北渡的准备工作。1939 年 11 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总指挥。这时，在苏北泰州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商请陈毅帮助他们将弹药从江南运至江北。陈毅抓住这一良机，派第四团主力去完成这一任务。该团至江北后改为苏皖支队，留在江北开展斗争。接着又派管文蔚的挺进纵队去江北，造成了发展江北的有利态势。

1940 年夏，陈毅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挺进苏北，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合并，成立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下辖三个纵队七千余人。

苏北是打通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的桥梁，为日、伪、顽、我必争之地。此地除日军占领主要城镇和运河沿线外，还有两部分国民党军。一是位于兴化以北苏鲁战区的韩德勤部，约七万人，是顽固派；一是位于泰州一带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部，约三万人，是地方实力派。两股势力既相互勾结又有矛盾。陈毅综合分析各种情况，确定了“灭敌、联李、反韩”的

六字方针。在联李方面，陈毅先后三次冒险去泰州，与“二李”联络感情，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军事上，当李部进犯我驻地郭村时，我新四军给予必要的还击，但打到距泰州城3.5公里的地方，又停止前进，让他们知道新四军可以轻取泰州而不入，使其心存感激，从而不敢搞反共摩擦。政治上则更好地争取“二李”中立，将每月税收五万元的吴家桥让给“二李”，以此为交换条件，使“二李”为新四军东进让路。

7月24日，陈毅率部东进黄桥，经过“二李”防区，“二李”果然朝天鸣枪，为新四军让路。新四军进入黄桥后，在那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很快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在黄桥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忌恨。10月初，韩德勤自恃粮多兵足，调兵进犯黄桥。陈毅、粟裕严守自卫立场，率部迎头痛击，毙俘顽军1.1万人，取得了黄桥大捷，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胜利的基础。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在陈毅、刘少奇的领导下，新四军立即开始整编部队，布阵华中，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3月，陈毅还演出了一场“捉放韩”的精彩活剧。当时，韩德勤趁日军对盐埠进行“扫荡”之机，进犯我抗日根据地。对顽军的无礼行动，陈毅下令予以坚决还击，并生擒韩德勤及部下一千余人。但为了抗日大局，陈毅对韩晓以民族大义，并将其释放。事后韩德勤对新四军感激不尽，双方签订了《共同抗日协议》。

在新四军时期，陈毅在执行我党统一战线原则，团结朋友，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的斗争中，做得有理、有利、有节，为民族大业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华，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毅正式担任了新四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调整战略部署，让陈毅赴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的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华东解放区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面对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的敌军，统率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部队的陈毅，决定集中兵力在华东打几个歼灭战。11月，国民党军队

兵分四路，向苏北、鲁南大举进攻。陈毅看准敌间隙大、应援不便的弱点，集中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宿迁以北歼敌第69师2.3万人，取得解放战争中山东部队与华中野战军会师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宿北战役胜利后，陈毅、粟裕率军移师鲁南。1947年1月2日，鲁南战役打响，陈毅指挥27个团分两路纵队发起攻击，激战15个小时，歼灭敌第26师及第一快速纵队。接着乘胜扩大战果，全歼敌第51师。此役共歼敌5.3万人，并利用缴获的美制坦克、榴弹炮、汽车等武器设备建立起中共第一支特种兵部队。

输红了眼的蒋介石很快又集中23个师，企图在临沂地区与陈、粟野战军展开决战。而陈毅却挥师北上，在莱芜地区一举吃掉蒋军17个步兵团共5.3万人，缴获大量新式轻重武器，取得著名的莱芜大捷。

陈毅在华东的辉煌战绩，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兴奋不已。他们认识到陈毅已是一位能够独当一面、支撑大局的人物了。1947年1月下旬，华东全军统一整编，正式成立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和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陈毅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前委书记，统率野战军和地方部队57万人鏖战华东。

4月28日，陈毅截获敌方的电报：敌决定以整编第24师和25师为攻击部队，于5月11日先行攻占蚌埠。

为对付敌军，陈毅和粟裕研究决定：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人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割断第74师与其左右邻的联系，打掉蒋介石这一王牌师，这叫“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战役从5月13日黄昏发起。陈粟按原定计划完成对第74师的包围，以五个纵队担任围歼任务，四个纵队打援。15日总攻开始，激战两天，在孟良崮及附近全歼敌74师3.2万人，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取得了粉碎敌人对山东重点进攻的决定性胜利。

1947年秋，陈粟大军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直逼豫皖苏，在沙土集、陇海、平汉路吸引和消灭了大量敌人，破坏了蒋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接着与刘邓大军协同作战，逐鹿中原，决战淮海。1949年渡江作战，4月23日解放南京，此后连克数城，5月3日占领杭州，5月4日占领上饶，5月27日解放上海。随即担任上海市市长，肩负起改造和建设大上海的光

荣使命。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陈毅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共消灭敌军245万人，解放了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等五省一市在内的华东大陆，并和兄弟野战军一起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十位元帅中，陈毅是唯一因故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尽管当时南方游击战争艰苦异常，但毕竟不可与长征同日而语；在新四军前期，陈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此时他仅仅担负某一方面的工作，到了皖南事变后，才担任代军长、军长；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在军事上已经炉火纯青，作为第三野战军的主帅，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也要看到，这其中与名将粟裕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与排名前五位的元帅相比，陈毅略显“前轻后重”，位居第六。

七、“人类庄严一典型。”我军政治工作的杰出代表罗荣桓排名第七

人们常用“一介武夫”来形容军人，似乎军人就应该以脱离政治为荣。其实真正的军人，其政治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军事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可谁也离不开谁，军事为了政治，政治依靠军事。作为一个大军事家，首先要懂得什么是政治。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尤为明显。

十大元帅排名第七位的罗荣桓，就是以政治工作成效显著而独树一帜的。他是最早配合毛泽东做军队政治工作的红军将领，他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并身体力行地渗透到实际工作中去，是我军政治上最成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人民武装，而人民武装的战斗力，靠的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密所在。

我军政治工作最突出的一点是支部建在连上。当毛泽东在标志着我军新生的著名的三湾改编中做出这一决定时，是罗荣桓首先在士兵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最先实践这一决策。当时他是特务连党代表，毛泽东为这批新党员主持了入党仪式。

罗荣桓1902年生于湖南衡东县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是一位童蒙塾师。罗荣桓自幼开始读书，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到长沙读中学。1923年到北京补习功课半年，次年考入青岛大学预科。他经历了那个时代青年学生共有的爱国活动。1926年11月，他回到家乡南湾开展农民运动。第二年4月又到武汉中山大学理学院学习，不久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罗荣桓被湖北省委派往通城从事农民运动。他在那里组织了一支农民自卫军并担任党代表。

那时候，罗荣桓最敬佩的人是毛泽东。还在学生时代，他就读过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受到很大鼓舞，但两人一直未能谋面。1927年9月9日，湘赣边境秋收起义爆发，罗荣桓亲率农民自卫军参加了这次起义。19日，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集结，罗荣桓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面对起义的挫折，毛泽东把革命力量比做一块石头，把蒋介石比做一口大水缸，他用充满信心的语气说："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

小石头要敲碎大水缸，需要磨得锋利。

红军要打胜仗，磨刀石就是政治工作。

巩固部队，让战士勇敢，才能出战斗力。让士兵懂得为谁而流血，部队才能巩固。干部爱兵是第一位的。很多带兵的人只注意严格管理，却忽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作用。红军初创时代，打骂士兵几乎是家常便饭，毛泽东讲，用拳头来代替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罗荣桓自参加秋收起义以来，特别尊重士兵的人格，从不打骂士兵。士兵有过失，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教育，并同打骂士兵的坏习气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正因为罗荣桓治军有方，他带领的部队士气高昂，英勇无畏，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罗荣桓政治素质好，在风雨变幻的年代里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1930年8月，红一军团搞起了肃反扩大化，许多无辜同志被捕被杀。担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挽救释放了许多人。在红12师，他一次就指示释放了30人，从而保持了这支部队旺盛的战斗力，为第一次反"围剿"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作为政治干部，罗荣桓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在重大的

战斗中都亲临前线指挥。他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灵魂和生命线，每次战斗都要布置战斗动员，组织班排和个人制订杀敌立功计划；召开党团会议讨论党员团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宣传员运用文明戏、活报剧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做战时鼓动工作。可是一旦有了问题，罗荣桓又敢于承担责任。为此他曾两次被撤职。其中一次是1932年10月，因为毛泽东受“左”倾领导者排挤牵连他这个“同伙”。此时，身处逆境的罗荣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对也被撤职的唐天际说：“越是处境困难越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仍积极为党工作。

长征路上，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十分注意用自己忍饥耐寒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和带动部队。他指示部队：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靠这些人了。所有的伤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由此给战士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达陕北后，罗荣桓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爆发后任115师政训处主任。他没有参加洛川会议，却对毛泽东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的方略理解得很透彻，领会得很快。1937年10月，他在晋西北率115师骑兵营收复曲阳，并在阜平建立民主政权，扩大武装。为此，这位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指挥员，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1938年2月，林彪负伤返延安。罗荣桓实际主持115师的全面工作，不久就被任命为师政委。他与代师长陈光率部挺进山东，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根据地。1939年九十月间，湖西发生“肃托”事件。罗荣桓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果断制止了错杀军内无辜同志的做法，稳定了当地的抗日形势。

罗荣桓在军事上很有见地，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广泛传诵着他率领部队智勇斗敌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留田突围。

1941年11月，日军为消灭在山东的中共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五万兵力参加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指挥者就是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11月4日，罗荣桓和师部等三大机关约三千人被四面包围，而我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营。

罗荣桓分析敌情：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集结重兵、严密封锁，往

东只能钻人敌人布置的口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北面的沂鲁山区被国民党军所控制，而此时，国共关系正比较紧张，北进，很可能被日、顽两军夹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而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敌人估计我军不敢向其大本营进击。既然敌人已将重兵调集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据此，罗荣桓决定，先向南突围，然后折向西，进入鲁南与沂蒙结合部。一切准备就绪，罗荣桓率部乘夜机智而大胆地向敌人大本营所在地临沂方向突围，从两股敌人之间仅 1.5 公里的缝隙处，快速穿越三条公路，一举跳出包围圈，到达预定地点。几千兵马，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安全地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这无声的战斗成为抗战史上又一典型范例。

罗荣桓还根据反“扫荡”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即将八路军主力配置在敌我边沿地区，当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时，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因为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在敌占区也十分孤立，而我八路军在敌占区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1942 年，罗荣桓运用“翻边战术”，多次打乱敌人的行动部署，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扫荡”、“蚕食”活动。

1943 年之后，山东的党政军重任都落到了罗荣桓一人肩上。此时罗荣桓因劳累过度，尿血不止，但仍坚持战斗在前线。他运用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和主要方向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在鲁西南、鲁南击退了人鲁反共的顽军李仙洲部，占领沂蒙山区和诸莒山区，然后粉碎日军对鲁中和清河的“扫荡”，进而发起 1944 年春、夏、秋、冬和 1945 年春、夏的一连串攻势，给日伪军以重创。到 1945 年 7 月，山东五块解放区连成一片，拥有 170 万人口、20 万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50 万民兵和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成为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非常满意，他高兴地说：“山东换了一个罗荣桓，全局都活了。”

罗荣桓对我军抗战胜利后出兵东北之举非常赞同。他说：“那里背靠苏联，是工业基地，可以做大后方。有了东北，中国革命胜利会更快到来。”1945 年 11 月，罗荣桓奉命到达沈阳，成为东北战场的重要指挥者。

1946 年，罗荣桓因肾病到苏联治疗。1947 年 6 月，他不顾医生提出休养三年的建议，由莫斯科返回哈尔滨，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当时东北人

民解放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一些执行纪律方面的问题。罗荣桓及时进行政治教育，要求部队保持高度的集中，加强兄弟部队间的团结，反对骄傲自满，并主持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当时正值秋季，他指示部队："现在正是苹果成熟的时候，要教育干部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挂在树上的，收在家里的，掉在地下的，都不要吃，也不要用钱买。这一条纪律要坚决执行。"部队坚决执行这一纪律，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好的影响。

在东北，罗荣桓除了抓思想政治工作，还负责后勤和军工生产。辽沈战役打响前夕，中央军委制订了先取锦州、关门打狗的作战计划。但林彪对于南下打锦州迟疑不决，其中一大顾虑就是担心后勤运输线太长。为此，罗荣桓与李富春、钟赤兵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以中长路为界的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分别负责部队的供应；在专区和县成立了党政军民参加的战勤委员会，在运输线沿道路设立兵站；在作战的主要方向冀察热辽地区增设野战医院，从而有力地保障了辽沈战役的后勤供应。同时对林彪临阵动摇、不打算执行中央军委决定的态度，进行批评和劝说，终于使林彪下决心执行中央军委的部署，并和林彪一起指挥了整个辽沈战役。

东北解放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作战，仍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统一指挥。针对一部分东北籍士兵怕入关后回不了家，少数干部斗志有所松懈的情况，罗荣桓亲自进行思想动员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振奋了精神。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人，在罗荣桓的主持下，顺利地完成了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1949年2月，罗荣桓又向中央军委提出在北平市委统一计划内，直接吸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军。后来，这些知识青年随军组成"南下工作团"，为部队建设和开辟新区工作增添了力量。6月，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10月1日，以第四野战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职务很多、任务繁重，但他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政治工作上。1953年，他主持创建了解放军政治学院，并担任院长达七年之久；1954年，他和陈毅领导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结了我军政治工

作的经验，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罗荣桓一生忠诚老实，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对人宽。从井冈山到解放东北，他一直和不好相处的林彪做搭档，且配合得很好。林彪专务作战，对其他事很少过问。罗荣桓十分了解这位老搭档的特点，称为“林总的重点主义”，对他予以充分谅解。毛泽东曾说：“这个同志有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很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里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林彪在战场上能够百战百胜，与罗荣桓出色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罗荣桓是治军的高手，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杰出代表，堪称新型人民军队的一座丰碑。叶剑英称他是“人类庄严一典型”。1955 年，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与其他元帅相比，罗荣桓参加革命稍晚，而且长期甘当绿叶护红花，即使负责全面工作，也担任与其能力和实际责任不太相称的较低的职务，有鉴于此，在十大元帅中他排名第七。平心而论，罗荣桓被评为元帅是合情合理的，排名第七，不高不低，恰如其分。

八、胜不骄，败不馁，红四方面军正确路线的代表徐向前排名第八

在新中国的高级将领中，北方人为数不多，因为南方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十大元帅中只有排名第八的徐向前是北方人，当年他也是从北方来到南方从事革命活动，在南方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的一代名将。

徐向前 1901 年生于山西五台县。青少年时代，他随母亲做过杂活，当过书店的学徒，教过书。1924 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他戎马一生的革命军事生涯。

徐向前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过东征、平定夏斗寅叛变和讨伐四川军阀杨森的战斗。1927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革命斗争。黄埔军校的学习和早期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为徐向前后来军事才华的展现奠定了基础。

鄂豫皖根据地是徐向前展示其卓越军事才能的最初舞台。1929 年 6 月，徐向前被中央军委派到鄂豫边，任红 31 师副师长。当时师长吴光浩刚牺牲，

为稳定军心，此消息“秘而不宣”，徐向前实际担负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刚到鄂豫边就碰上了敌人的三次“会剿”。徐向前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率领部队与敌人兜圈子，然后寻机歼敌，不但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而且发展壮大了红军，开辟了鄂豫边根据地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形成了鄂豫皖有特色的红军游击战术。1930年4月，徐向前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后，又率部奇袭杨家寨车站，进行杨平口伏击战和袭击花园镇之敌的战斗，一月之间三战三捷，徐向前的威名开始传扬。1931年3月，他和曾中生、旷继勋指挥红四军在双桥镇歼敌第34师五千余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从此，他的名字便与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他相继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共歼敌六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人，鄂豫皖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百五十余万。其中黄安战役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苏家埠战役歼敌三万多人，堪称我军初创时期的光辉战例。

1932年6月，国民党调集30万重兵压向大别山区。而此时张国焘在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在军事上盲目组织进攻，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转移。当时四川军阀派系林立，连年混战。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川军斗智斗勇，于千难万险中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入川后，跋山涉水，多方调查，把四川的敌情、民情及山形地貌熟记于心，并找出其特点和规律。他认为川陕与鄂豫皖不同，鄂豫皖适合于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和远距离奔袭；川陕根据地到处是深山峻岭，地形复杂，适合打阵地战辅之以运动战。环境变了，敌情变了，战法也要变。根据环境和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军事艺术的精髓。他根据川陕根据地的地理环境和红军与川军的实际情况，提出“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一次次打破川军的围攻。在他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2月至10月，粉碎了川军田颂尧的“三路围攻”，随即又胜利进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共歼敌3.4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迅猛发展到五个军共八万人，根据地面积扩展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万，使川陕根据地

达到鼎盛时期。

1933年10月，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集中20万兵力，兵分六路向川陕根据地发起"围攻"。徐向前和其他领导人根据反"三路围攻"的经验，于1933年12月至1934年8月，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后取得第一期收紧阵地和马鞍山反击战、第二期收紧阵地和分水岭反击战、万源坚守防御战、东线反攻、西线反攻的胜利，毙俘敌人八万余人，取得反"六路围攻"的空前胜利。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胜利会师后，徐向前积极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并在事关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同党中央和中央直属纵队向巴西地区开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前进。红军进入茫茫大草原，行程更为艰难。就在这时，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前进，公然反对红军北上，并电令左路军南下。毛泽东深知红军南下前途将极其不利，便果断地单独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此时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打来电话向徐向前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对此徐向前头脑清醒，斩钉截铁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向前一声命令，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这一伟绩，历史应重重地记下一笔。

1936年10月下旬，徐向前和陈昌浩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率一支两万多人的红军部队，西渡黄河，征战祁连山，以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西进途中，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三万余人和十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徐向前以其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率部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又一场血战。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西路军孤军奋战四个月，虽歼敌2.5万余人，但最终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灭。祁连山下留下了许许多多忠骨贞魂。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胜不骄，败不馁”。经过失败的徐向前在以后的日子里步子迈得更加坚实、沉稳。抗战初期，徐向前任129师副师长。他曾随同周恩来到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谈判，促使阎锡山在山西境内与八路军合作抗战。尔后率部转战晋东南，和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晋东南抗日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先后指挥了反“六路围攻”、“九路围攻”、响堂铺伏击战等震惊华北的战斗。其中反“九路围攻”，历时23天，歼灭日军四千多人，收复了18座县城，将占领晋东南的日军赶到铁路沿线据点，巩固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根据地。

1938年4月，徐向前率129师“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开展平原游击战。徐向前多年战斗在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而平原地区无山地依托和隐蔽处，如何打游击战？面对新情况，徐向前创造性地提出在平原创造“人山”的著名思想。他指出：人民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伟大力量。在平原开展游击战必须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群众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向前领导冀南军民进行大小战斗四百余次，杀伤日伪军五千多人。毛泽东游击战的思想在冀南遍地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前往山东，任八路军一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八路军各部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对山东进行了空前的大“扫荡”。徐向前根据敌人“扫荡”的新特点，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接连取得了冀鲁边、鲁南、鲁西、胶东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发展了山东根据地，使八路军力量大大增强。1940年徐向前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1943年任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直到抗战胜利。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伤痛未愈的徐向前主动请缨到太行前线，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同年12月，他指挥部队攻打晋南战略要地运城，1948年3月至5月，指挥了著名的临汾战役。临汾自古为军事重镇，城墙坚固，阎锡山吹嘘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为了以较小的代价攻下这一堡垒，徐向前指挥部队采取迫近作业、坑道爆破等战斗，逐步向临汾逼近，最后攻克临汾城，解放晋南全境。临汾攻坚的经验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我军攻克临汾后，阎锡山急忙布阵晋中，准备固

守太原。当时敌我兵力对比是13∶6，加之太原是军工基地，城防工事坚固。面对严峻的形势，徐向前决定先消灭晋中之敌，扫清太原障碍，然后相机进攻太原。为此，徐向前于1948年6月至7月，集中六万余人，发起晋中战役，先以一部佯攻，诱敌主动增援，然后以主力部队断敌归路，并采取伏击、拦击战术，将敌人逼入我军设置好的“口袋”，一举将阎锡山的王牌军“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包围在平遥地区全歼，打掉了敌人的锐气。随后又打了几个漂亮仗。至7月21日，晋中战役结束，共歼灭阎锡山主力十余万人，解放了14座县城，使太原成了一座孤城。晋中战役是徐向前胆略过人、以少胜多的军事杰作。1948年10月，徐向前又指挥了太原战役。此役历时六个月，歼敌13.5万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总参谋长。1954年任中央军委委员。

徐向前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然而最值得回味的还是红军时期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在这一时期，徐向前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他同他的战友开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苏区之一鄂豫皖苏区，创建和领导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他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有力抵制，特别是在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的关键时刻，作为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果断制止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恶性事件的发生。仅凭这几点，徐向前就可以称得上功高盖世的开国元勋。但就在同一时期，徐向前经受了最痛苦、最严峻的考验。在鄂豫皖苏区，从1931年9月开始，张国焘坐镇白雀园，搞党内“大肃反”，借此排斥异己，建立他个人的统治，近三个月时间就肃反了2500人以上的红军指战员。我军一大批优秀指挥员，如许继慎、周维炯等以及为数众多的对党忠诚的优秀干部被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作为军事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强敌“进剿”面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考虑作战问题。与此同时，他在自身遭到怀疑的情况下设法保住了一些干部。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在“大肃反”中他不仅失去了一批并肩作战的战友，而且失去了心爱的妻子。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在十大元帅中他排名第八。

九、顾大局，讲人道，抓根本，人民战争思想的模范实践者聂荣臻排名第九

人们一般很难将一位“厚道人”、一个“活菩萨”同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大将军相提并论。然而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九的聂荣臻却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事实上，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幸福，破坏一个旧世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一个新世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够夺取伟大胜利，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正义战争。聂荣臻深谙其中的道理并身体力行，即使在两军交战的状态下，也时刻不忘“信义和平”。正因为这样，他常常能够取得“兵不血刃”的理想效果。“信义和平”虽然不能概括聂荣臻的全部，但这一点却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他身上表现出的人性之美，为中国革命赋予了崭新的内涵。

抗日战争时期，入侵的日军肆意发泄兽行，杀我同胞连妇孺都不放过，甚至把中国的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这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1940 年 8 月，聂荣臻率部参加“百团大战”。20 日上午十时，中央纵队向娘子关、井陉、微水至石家庄等地发起全线进攻。傍晚时分，我军战士在炮火中救出两个小女孩，大的约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中。战斗结束后，前方战士发现这两个女孩是日本人，不知如何处置，打电话请示聂荣臻。聂荣臻接电话后回答得很干脆：“马上派人把二姐妹送到前线指挥所来。”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聂荣臻像慈父般给予她们以精心照顾。后来考虑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无数，若把她们留在中国，难保不发生意外。于是，聂荣臻利用战斗间隙，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找了一位可靠的老乡，把这对小孩送到石家庄敌占区，交给了日本方面。当时许多在场的日本兵，特别是一些杀害过中国儿童的人，见此情景，羞愧得无地自容，纷纷称赞聂荣臻是一位“菩萨将军”。

抗战之初，聂荣臻任 115 师副师长（党内仍称政委），与师长林彪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1937 年 11 月，太原失守。中共中央敏锐地认识到，至此，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抗战已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敌

后游击战转入主导地位。为担负起华北抗战的重任，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八路军分成四块：120师开辟晋西北，129师开辟晋东南，115师一分为二，主力由林彪率领转向吕梁山，开辟晋西，另一部由聂荣桓率领，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

11月7日，中央正式发布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晋察冀地区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在这里能够成功地建立一块抗日根据地，就可以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地。然而这一地区四面被敌包围，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很大损失。聂荣臻临危受命，率领一支仅3000人的队伍，开始了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聂荣臻一步一步地打出他创建根据地的几大措施：一是宣传政策；二是整编部队；三是坐镇阜平；四是培训骨干；五是机动歼敌；六是建立政权；七是制定法规；八是开辟冀中；九是进军冀东。一系列政治、军事齐头并进的有力措施实施后，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不仅站住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军事上，聂荣臻坚决贯彻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中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多次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扫荡”，击毙了清水少将及“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等日军高级将领多人。到1939年，晋察冀边区发展到72个县，1200万人口，武装部队有了31个主力团近十万人，另有民兵等地方武装十多万人。中共中央称赞晋察冀是“敌后模范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号召全党全军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

在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对老百姓一往情深。

1942年，由于日军加紧对华北地区的“扫荡”和掠夺，又逢大旱，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发生粮荒。老百姓断粮，就摘树上的叶子与野菜掺在一起煮着充饥。部队的粮食也吃光了，就请示聂荣臻，问部队可不可以采摘树叶子。

聂荣臻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军区部队：我们宁可忍饥挨饿，也不能与民争“食”。随即命令政治机关下发一道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不准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

军令如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边区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深受感动。他们三番五次找到区政府，要求聂司令员收回训令，他们泣不成声地说："司令员，部队要打鬼子，战士们怎能饿着肚子上前线呢？"

聂荣臻对老百姓说："就让我们共渡难关吧！"

训令没有收回，军民情谊更深了。

为了克服困难，聂荣臻领导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的生活很快得到改善。

战争的伟力就在于民众之中。聂荣臻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真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这就是晋察冀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从10日起，聂荣臻指挥部队对日军发起强大反攻，先后解放了察哈尔、热河、河北、辽宁、山西、绥远等大片土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荣臻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把主要精力用于支援东北。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聂荣臻率部攻打清风店，解放了石家庄，取得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

1948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央决定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

此时，聂荣臻胸怀全局，根据中央作战意图，在平津战役打响以前，指挥华北野战军积极配合东北野战军实施钳制性作战，拖住了傅作义集团，阻止傅作义出关参战。

1948年冬，解放战争进入焦点时刻。聂荣臻奉命与林彪、罗荣桓共同指挥平津战役。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很快，杨得志和杨成武率部一举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歼敌五千八百多人，全歼傅作义王牌第35军，斩断了傅作义西走绥远的退路。

此时，聂荣臻陷入了沉思。他想，傅作义西逃之路堵死以后，如果再把塘沽、天津拿下来，卡住南逃之路，傅作义就成了瓮中之鳖。这样，只要我方努力争取，傅作义从自己前途着想，完全有可能弃暗投明。北平是几代皇都，有许多珍宝和祖国文化遗产。如果能够和平解放北平，那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聂荣臻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罗荣桓，罗荣桓表示赞同。可

是林彪不以为然。他说："想法很好，但只不过是幻想而已，还是要靠打来解决问题。"

为了避免与林彪争吵，也为了不在争吵中延误时机，聂荣臻决定以个人名义，单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看了电报后，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很快，我军以强大军事攻势解放了天津。

接着，罗荣桓和聂荣臻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后与傅作义达成协议，傅作义接受我方条件，宣布起义，所属部队出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一封电报，使文化古都免遭兵火之乱，充分显示了"和平将军"的深谋远虑和非凡力量。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进城后，聂荣臻经历了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此时他身兼六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工作千头万绪，聂荣臻思路清晰，有条不紊。他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迅速改编傅作义20万起义部队；二是消灭土匪，稳定北平局势，让北平人民享受和平带来的幸福。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

这时，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休假。聂荣臻任代理总参谋长，主持参谋部工作。

为了夺取抗美援朝的胜利，聂荣臻分析工作重点，狠抓了情报和后勤工作。一方面为战争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为前线打仗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这期间，聂荣臻以高度的责任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为抗美援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后，聂荣臻又主动挑起我国尖端武器研制的重担……

聂荣臻因文武双全，功勋卓著，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他革命经历丰富，早年曾留学海外长达五年之久，回国后给中央领导当助手，后来与林彪合作共事，直至抗日战争之初。1937年11月，聂荣臻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开始独当一面，并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在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排名第九。

十、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军中“高参”叶剑英排名第十

叶剑英是十大元帅中又一位文武兼备、德才双馨的开国元勋。他一生中有许多光彩照人的亮点，尤其是在复杂的革命转折关头表现出非凡的胆略，起到其他任何人无法与之比拟的作用。他一生中所做的几件事都关系到社稷安危，堪称力挽狂澜的功臣、治国安邦的栋梁。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梅县。他读书时的启蒙老师林修明是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受其影响，叶剑英从小就把加强和提高自身素质作为实现报国救民的基础。他十分珍惜时间，发奋攻读，少年时即打下了扎实的古文诗词功底，培养了高尚的爱国情操。1916年，他曾随父亲到南洋马来西亚谋生。1919年回国就读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投奔到福建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任司令部见习官，并于1920年加入国民党。从此，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之路。

1921年5月，叶剑英作为大总统的随员，与孙中山到广西桂林参与北伐准备工作，后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送孙中山南下广州。

1922年，陈炯明叛变。叛军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宅越秀楼。叶剑英临危不惧，在孙中山率舰队进军白鹅潭打击叛军途中，他手把机枪，与士兵并肩向叛军猛烈射击，掩护军舰驶进白鹅潭。此后五十多天，叛军蓄意谋杀孙中山，叶剑英亲率士兵巡逻放哨，严密监视叛军行动，保卫了孙中山的安全。在1923年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叶剑英任第八旅参谋长，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师参谋长。

1924年，叶剑英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任教授部副主任。1925年参加东征，在进攻中，以其智勇，置惠州围而不打，以主力东进，直捣陈炯明老巢海丰城。此举令与其分兵进军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暗暗佩服。

北伐时期，叶剑英任中路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随军由湖南来到江西。1927年初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尽管蒋介石对叶剑英许以高官厚禄，百般拉拢，但叶剑英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毅然通电反蒋，这在当时的军界引起极大震动。

随后，他应邀在张发奎部第四军任军参谋长。

叶剑英早在黄埔军校时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27年经周恩来批准，正式成为中共党员，为了让他在“内线”更好地发挥作用，暂不公开身份。此后不久，汪精卫在庐山密谋以召集开会为名，罢掉贺龙、叶挺的兵权，并围歼叶、贺部队。军情紧急，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找到叶挺，让他们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很快，以贺龙、叶挺部为主力的举世震惊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张发奎听说南昌起事，叶、贺出走，立即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官员研究对策，许多人主张立即派兵追赶，捉拿叶、贺。此时，叶剑英不慌不忙，力陈不追的理由：广东现在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去广东，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请我们回广东相助。此时我们便可以打起援粤旗号，直趋广州。这比跟着叶、贺的屁股后面打、两败俱伤更胜一筹。叶剑英的话正中张发奎的下怀，于是放弃了尾追叶、贺的企图。这样，叶剑英就以特殊的方式策应了起义军。

1927年9月，叶剑英从武汉来到广州。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准备，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1928年，叶剑英奉党中央之命前往苏联学习。1930年学成回国。第二年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和红军学校校长，参与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中央红军一路历尽艰辛，于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正当红军将士欢庆战略转移的暂时胜利时，张国焘倚仗人多枪多，反对红军北上，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当时红军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当左路军到达阿坝时，张国焘按兵不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命令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回过头来迅速南下。毛泽东等人深知南下凶多吉少，便给张国焘发出电报，劝其北上，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并于9月8日给右路军前敌政委、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陈昌浩发出电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电令到达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叶剑英首先看到这份电报，便装着入厕，飞快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抢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果断决定，立即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抢先一步脱离险境。随后，叶剑英以南下“打粮”为名，率中央纵队乘夜追赶，终

于在9月11日拂晓，与毛泽东会合。

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长征结束后不久，1936年9月，叶剑英奉命前往西安，出使东北军，做少帅张学良的工作。

当时的西安城内，特务猖狂，军警密集，戒备森严。叶剑英身居虎穴，险象环生。他多次秘密会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商团结抗日大计，并及时向党中央提供各种情报。通过我方的积极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熟悉情况的叶剑英又成为和平谈判的重要成员，并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全力投入善后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别无选择中走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道路。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随后，被派往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以公开身份在国统区开展工作。后来又到武汉、长沙、南岳、桂林和重庆，一干就是四年。

在国统区，叶剑英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一切有利机会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于抗日洪流，广泛宣传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思想，并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春，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他原打算在这次会上公开宣布共产党、18集团军（即八路军）的"罪状"，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制造舆论。叶剑英作为18集团军的参谋长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刚开始，蒋介石就杀气腾腾地批评冬季攻势打得不好，要进行检讨。接着话锋一转，直击18集团军，说18集团军"游而不击"是造成冬季攻势失败的根本原因。紧接着国民党顽固势力发动了对八路军的恶意围攻。

叶剑英不动声色，冷静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会议到了第三天，叶剑英便主动要求发言，他有针对性地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摩擦问题。

叶剑英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更有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当他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在十多年前就领教过这位老对手的厉害。当叶剑英讲到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18集团军时，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大声质问："有这么回事吗?"叶剑英响亮地回答："有!"便立即把缴获的张荫梧与日伪军勾结的有关材料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驳得蒋介石哑口无言。

叶剑英义正词严，"舌战群儒"，大乱了蒋介石的阵脚。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好自认倒霉了。

中外有识之士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为中共外交"三骑士"。叶剑英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在统战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成为毛泽东、朱德军事上的得力助手。他好学深思、足智多谋，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和建设，提出了很多的谋略和意见，使参谋部成为中共最高统帅部的灵通耳目和高效的指挥机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国民党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同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准备反击他们的军事进攻。1945年12月，叶剑英参加中共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团，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同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问题进行会谈，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946年1月中旬，叶剑英由重庆飞往北平，着手建立军调部我方机构。随后领导我方人员同国民党、美国政府代表围绕调处全国范围内的一切冲突这一中心问题，进行了长时间尖锐复杂的谈判斗争。在谈判中，叶剑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同时积极争取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和进步舆论的支持，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7年2月，全面内战七个月之后，军调处的工作日趋困难，环境也越来越艰险。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回到延安。此后一个月国民党集中兵力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延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决定将中央和军委两大机构一分为三：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由刘少奇、朱德等负责从事中央委托的工作；

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进驻晋西北地区，由叶剑英负责统筹后委工作。

后委担负着繁重的中央后方保障和参谋工作。叶剑英利用当地电台固定等有利条件收集情报，及时掌握国内外特别是国民党的动态，整理上报中央，通报各作战区；同时负责沟通中央与全国党政军各方面的通信联络，成为中央和各地的“耳目”，为毛泽东直接指挥陕北作战和全国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后委被誉为中央的“最佳参谋部”。

1948年底，叶剑英被委任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叶剑英着手进行全市的接管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为北京建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8月，刚刚完成接管北平任务的叶剑英改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负责解放祖国的南大门。10月14日，南下大军解放广州，叶剑英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成为主政广东的“封疆大吏”。

1953年5月，叶剑英调任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司令员。1954年调回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透过叶剑英的革命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他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在他担任的众多职务中，任职时间最长、担负的职责最具体、最重要的是参谋长一职。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担任过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红军时期，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长征中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完全可以说，叶剑英是我军“最高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和主要代表，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其二，他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秘密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周旋于敌人的心脏地区，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其三，他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因此，在十大元帅中他排名第十。

第九章 八大盛会 群星璀璨

聚焦时间：1956 年

聚焦地点：北京中南海

聚焦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陈毅、罗荣桓、李富春、贺龙、刘伯承、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聚焦话题：在党的八大上，战略家毛泽东在党内高层人事安排，特别是接班人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于是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党的优秀干部纷纷走向前台，担负起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责。一时间群龙戏水，气象万千，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局面

探索需要勇气，建设需要人才。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党的八大在确定了我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后，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安排在重要领导岗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毛泽东提出要退居二线，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党的主席

中共中央领导层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是毛泽东在考虑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作用以及接班人问题时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关键是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分为“一线”和“二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后来还有林彪，在“第一线”，毛泽东退居“二线”。

其实，这一决策的准备工作在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前后就

开始了。当时，毛泽东已在考虑：他要退出众人注目的中心，不再演主角，而要退下来，去做一个配角。

在八大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只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由刘少奇作主题报告。这个报告也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毛泽东赞扬了这个报告，并在扉页上写道：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刘少奇。这表明，毛泽东要把他的接班人推到前台。

这是因为毛泽东已多次向党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他认为让他摆脱第一线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担任党的主席，仍然可以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有必要时，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新党章中，为实行"一线"和"二线"的计划所做的另一项改革是：设立一个性质与原来不同的书记处。原来的书记处一直由毛泽东担任主席，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这样的人选说明，这个书记处是最终决定着路线、方针的制定、组织及管理的。

现在，以前的书记处的职责将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承担。而新的书记处虽然也有很大的权力，但其中只有总书记邓小平一人进入制定政策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在中共八大正式选举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因其杰出的贡献、崇高的威望以1026票的全票当选。也就是全体代表都投了他的票。这在中外选举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但这时的毛泽东，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就在中共八大后，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时的毛泽东为什么会想到退居"二线"呢？

毛泽东本人对此曾做过解释，这主要是为了保持领导班子的平稳过渡。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时就说过：

> 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

在八大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充实了比较年轻的陈云和邓小平。显然，毛泽东在作挑选接班人的考虑。他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十分注意集体领导问题，注意提拔年轻干部担任重要职务。

因此在八大党章第三章第三十七条就加入了这样一句话：“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显然，这一位置就是为毛泽东留的。对此，毛泽东1961年在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关于接班人问题时说道：

> 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帮助帝国主义掀起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护林顶住了。
>
> ……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确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在中央委员会设立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求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呢？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

在八大以后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1957年4月30日，他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时更明确地表示，到二届全国人大时一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要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一次。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主动提出要限制国家主席的任期，并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还打算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

主席。这种考虑和设想，确是在考虑改革党和国家的制度以及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交替，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同时，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提出反个人崇拜，对毛泽东震动很大。作为一个党包括个人如何避免斯大林的悲剧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重点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

> 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面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
>
> ……总结斯大林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不是为了指责别人，而是为了我们党防止和克服类似的问题。

显然，毛泽东这时提出中央设“一线”、“二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注重培养接班人，的确也吸取了斯大林前车之鉴的教训。毛泽东在威望和权力达到极致后，从众人注目的中心引退，把接班人推到前面，这样便于新老交替，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领导班子的平稳接班；同时也便于他从日常繁杂的事务中跳出来，能够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可惜的是，这一计划未能坚持下来，以致出现了后来一连串的失误，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内乱。

二、五个副主席中，排头的是刘少奇。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

在如今日新月异、高楼林立的北京，政协礼堂现在已是一栋很不起眼的建筑。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它却是最具气派的标志性建筑，这座会堂当时成了很多重要会议的场所。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与七大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不是由毛泽东作的，而是由刘少奇作的。对此毛泽东风趣地对外国朋友解释："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在9月26日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后来加上林彪，共有五位副主席。在这些副主席中，刘少奇是领头的。他是实际上的第一副主席，是毛泽东当时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呢？这与刘少奇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与刘少奇的学识人品与能力声望、与刘少奇当时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密不可分，也是毛泽东高度信任和器重的结果。

刘少奇，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他家与毛泽东家相距只有几十公里。他于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他于1922年从苏联奉命回国后，就长期在白区工作，是党的白区工作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党在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根据自己在白区工作的实践，系统地总结了白区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如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充分利用敌人营垒里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主要的敌人；在形式和方法上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区分，而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密切结合等。他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毛泽东称他对白区工作问题有丰富的经验，"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抗日战争开始后，刘少奇身处抗战前沿，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肩负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刘少奇就多次向中央提出富有政治远见的建议，并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倒，如南天一柱，迅速扭转新四军困境，所表现出的领导才能，为全党所赞誉。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刘少奇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果断决策，及时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把关注的目光和工作重点放在东北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又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探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步方略。1949年6月，他就写了《关于新中国建设的经济建设方针》，半

年后又写出了《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1年7月，他又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刘少奇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思路基本反映在他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中。实践证明，他的构想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的这一基本思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

平心而论，在中共几位高层领导人中，刘少奇对经济是比较在行的。建国初期，他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保存富农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主张，初步显示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非凡才能。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我们原来所借用的苏联模式的弊端的日益显现，谙熟经济规律的刘少奇潜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经济改革方略。

显然，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杰出贡献，决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

刘少奇之所以被确定为接班人，与他的学识和人品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本身是一个文武全才，对接班人的人品和才干自然十分看重。

刘少奇的人品在党内是有口皆碑的。他不计名利，服从组织；不惧压力，坚持真理；清正廉洁，乐于奉献，堪为全党楷模。

他出色的才干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得到充分展示。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在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组织五卅运动，领导白区斗争，开创巩固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应付突发的皖南事变，创建东北根据地，筹划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等一系列事件中，他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果断决策、应对准确的组织才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具有高深的理论修养。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既是毛泽东的自谦，也是对刘少奇的赞扬。的确，刘少奇对理论的重视和娴熟运用，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他既有扎实的理论根底，又长期在第一线领导全面工作；既长于理论研究，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是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体的领导人。刘少奇一生理论建树颇多，尤其在党的建设方面建树最多。他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即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本重要论著；新

中国成立后，他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论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也是刘少奇成为接班人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刘少奇在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可谓尽心尽力。还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身份与会的刘少奇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抨击"左"倾路线；在华北局主持工作时，他明白无误地提出华北局不但要把工作做好，还要成为毛泽东批判王明路线的基地。刘少奇号召大家"要学毛泽东，不要学王明"。他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有了真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问题有了金钥匙，王明是披了马克思主义外衣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听了顺耳，用了不灵。"刘少奇的坚决支持对毛泽东成功清算王明路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40年，刘少奇给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1943年后刘少奇不但郑重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对它做出完整概括和系统论述，七大时写入党章，使之成为全党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对此，王光美曾对她女儿说："在七大以前，毛泽东还没有那么高的威望，是你的父亲和其他领导人协助他建立了崇高的威望。"的确，威望的建立除了自身的实力外，别人的协助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共七大后，刘少奇更加尊重和维护毛泽东的声誉。他常说，毛泽东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代表，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精神。我们党历尽千辛万苦，在危急中找到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是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的保证。毛泽东是我们党正确路线的代表。

刘少奇维护毛泽东的声誉，真心诚意拥戴毛泽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具体表现为严格要求自己，不接受个人崇拜，把自己当做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以此提高毛泽东的声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养成了夜间通宵工作的习惯。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那里通知开会，而刘少奇已经睡下了。工作人员只得在电话里如实把情况告诉毛泽东办公室。结果，秘书还得请示主席，主席又要考虑改不改时间，叫不叫他起床。为此，刘少奇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了一条规矩：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你们要及时告诉我，不管我是在休息、睡觉还是在开会，都要马上叫我。并说：如果我休息

了，你们可以先要车，后通告我起床。这就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真诚态度。

当然，毛泽东在相当一段时间对刘少奇也是器重的。可以说，毛泽东的全力扶持，是刘少奇走上权力巅峰的关键。延安时期，他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升，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外出时，都是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其中，经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决议，明文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职务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 1945 年 8 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二次是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三次是 1953 年 12 月，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并主持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他是党内唯一代理过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人。毛泽东也一直把刘少奇当做自己的接班人来看待，注意突出刘少奇的地位，利用各种机会把刘少奇推向权力舞台的中心。

三、毛泽东说：我看陈云同志行。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

八大在党中央领导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个大胆尝试。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六人组成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朱德已年届 70，毛泽东 63，刘少奇、周恩来 58，相比之下，50 挂零的陈云、邓小平则是“年轻人”了。显然，这一人事安排是为以后的新老交替做准备。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陈云当时排在邓小平前面，是党内的第五号人物。

对于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毛泽东是比较看重的。他在向七届中央委员会推荐陈云时说：陈云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他是工人阶级出身。

在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能文能武的的确不少，但对经济管理比较在行的却不多。陈云就是一位难得的懂经济的帅才。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经济工作的主帅。他走马上任

后，指挥了几个漂亮的“战役”，其中稳定物价这一仗的意义被毛泽东称为“不下于淮海战役”。在随后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制订“一五”计划的过程中，又显示了他卓越的经济才能。

其中，1953年后开始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被称为新中国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的第二次大的战役。这是因为，新中国诞生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赤字40亿斤。加上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形势相当严峻。政府手中能否拥有足够的粮食，已不是简单的吃饭问题，而是能否保持社会稳定，能否保证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渡过危难的大问题。

还在1951年底，陈云就开始酝酿粮食统购问题。1952年1月由他主持起草向中央作的《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农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1952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后效。如试验成功，即于1952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由于一些地方的同志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中央在1952年实际上并未试点。

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陈云向中央建议：对粮食问题采取又统又配，即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同时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召开，陈云详细分析了粮食购销形势，指出现在只能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出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

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办法，危险性可能小一些。

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同意中央的决策。

10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2月初，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这一政策施行后，到底效果如何，1955年1月陈云还亲赴江苏青浦小蒸乡进行调查。在这里，他约见了自己的特约联系户，拜访了烈士家属，向来访的居民和亲友嘘寒问暖，还专门看了米店、粮仓，找农民、商人、小学教员、居民、干部座谈，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意见。通过调查，陈云心中有底了：农民不是对统购统销的政策有意见，而是对上一年征了“过头粮”有意见。回到北京后，陈云根据调查情况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和办法，即定产、定购、定销。“三定”后三年不变，通过这种办法来解决征购“过头粮”的问题。这个政策出台后，立即得到农民的好评，认为“共产党又兴了个好政策”。

粮食统购统销和相关补充政策的出台，作为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陈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一政策的实行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它对于缓解工业化初期粮食紧张的局面，解决城镇人口吃饭问题，从而稳定人心、保持社会稳定是有重要作用的。

熟谙经济工作的陈云还主持敲定了“一五”计划草案。制订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计划管理的重要环节。但对于刚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入经济建设领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1951年开始，中财委根据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开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间几经反复，多次修改，一直没有定型。

进入1954年，由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明确提出来，苏联援助中

国的建设项目已基本确定下来，"一五"计划基础条件已成熟，在陈云的主持下，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1954年6月，陈云向中央汇报计划编制情况，特别强调"我的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

8月，在陈云主持下，八人领导小组连续举行了17次会议，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954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在广州集中了一个月的时间，共同审核了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

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了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同年6月，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作了适当的修改，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经四五年时间，大的修改工作进行了五次。在陈云的主持下，中财委、国家计委以及各经济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参加编制工作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工作，当时的计算手段很落后，每一个数据都是用手拨珠算、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的方式计算出来的，每次方案稍有变动，上千个数据都得相应改动，要做到精确计算，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从"一五"计划的编制过程看，整个工作的进行是很审慎的，也是比较圆满的。"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是空前的，其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七亿两黄金。这一计划的实施，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崭新篇章，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的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到后来的解决粮食问题、敲定"一五"计划，新中国哪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的出台和实施，都离不开陈云的身影，正是由于陈云的艰辛努力，精心组织，科学决策，在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政治孤立的夹缝中，百孔千疮、一穷二白的年轻

共和国才能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最艰难的时刻，迎来了经济和社会的初步繁荣和稳定。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在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李先念对陈云就很敬佩，他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对此，陈云却十分谦逊。早在 1945 年，中共七大上，他就说，对功劳要有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特别强调，这样的次序不能颠倒。1982 年在编辑出版他的 1949 年至 1956 年文稿时，他特别嘱咐在后记中要说明，他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调查研究包括他做的必要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他强调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个人的身上。

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掌舵人”陈云，毛泽东、党中央没有忘记，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会忘记，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四、“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在中共八大上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步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

邓小平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是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标志，成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

邓小平任此要职是从中共八大开始的。此前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是中共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在中共八大会上，刚刚 52 岁的邓小平在众多的中共领导人中脱颖而出，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对此，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作为中央总书记人选时做了很好的说明。

1956 年 9 月 13 日，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谈了关于设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问题。当时邓小平就表示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却说：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邓）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此后，毛泽东还对邓小平做了多次宣传。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一面指着随员邓小平，一面对赫鲁晓夫说，那个小个子很有智慧，将来会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1958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谈到他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还说过，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

毛泽东对他的同事和战友，从来没有这样多次在不同的场合，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这除了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信任和器重外，也说明邓小平具有非同一般的才能。在中共八大上，年轻的邓小平能登上主席台的中央位置，不是偶然的。

的确，就人品、才干而言，邓小平在党内都是出类拔萃的。首先，邓小平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早年在欧洲、苏联留学，他就奠定了较

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凡起草文件、工作报告、经验总结、讲话稿等，从来都是自己动手，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

其次，邓小平有安邦治国的丰富经验。从抗日战争时起，邓小平先后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中原解放区主持工作，开拓局面，解放后又主政大西南，积累了丰富的多方面领导工作的经验。

再次，从带兵打仗来说，邓小平也是一把好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就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顺利组织过百色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出任129师政委，同刘伯承等一起，以华北太行山为依托，开辟、建立和坚持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历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兼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与刘伯承一起指挥部队首战上党，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再战平汉线，歼敌三万余人，大大增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随后，邓小平又和刘伯承等一起决战淮海，挥师渡江，挺进西南，“横扫千军如卷席”，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除此以外，邓小平那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工作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进入中央工作以后，邓小平在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期间，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不拉“小圈子”，坚决揭露和反对高、饶的反党宗派、分裂活动，维护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和权威，赢得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作为毛泽东又一个接班人的地位。

毛泽东对中共高级干部要求严格，很少赞扬，偶尔评价几句，说某人“是个老实人”，某人“比较忠厚”，就是很高的赞语了。而对邓小平的评价却非同寻常。即使在中共八大后，他还继续在国内外一些公开重大场合宣传邓小平，多次明确透露出把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

从中共八大担任总书记，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邓小平

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年。作为毛泽东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助手、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和内定担任党的一线领导的接班人之一，邓小平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决策，他日理万机，组织领导和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后来曾回忆说："在我一生中，最忙的就是（当总书记）那个时候。"

五、从七大到八大，中间长达 1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又增添了邓小平、林彪、陈毅、罗荣桓、李富春、贺龙、刘伯承、李先念八位新人

从 1945 年的中共七大到 1956 年的中共八大，从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到北京政协礼堂，中间间隔了 11 年时间，这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夺得江山社稷又逢太平盛世的岁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充满着自信和喜悦，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幸参加如此盛会的代表们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八大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与中共七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相比，除任弼时因病英年早逝，高岗因犯错误自杀身亡，康生、张闻天从政治局委员变为候补委员外，又增添了邓小平、林彪、陈毅、罗荣桓、李富春、贺龙、刘伯承、李先念八位新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是七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伯渠、董必武是延安"四老"中两位著名人物，也是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均以丰富的工作经验、杰出的才能和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当选为八大政治局委员。

彭真是中共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召开之际，正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五四时期就投身革命运动。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后担任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29 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关押达六年之久。1935 年出狱后，担任中共北京局驻冀东代表，不久调任北方局组织部长，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

动。抗战期间，担任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1938年至1941年，彭真作为北方局组织部长代表北方局和聂荣臻一起领导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1年9月任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副校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在争取东北、发展东北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从1948年12月开始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1951年2月又兼任北京市市长。1954年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林彪是在1955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补选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邓小平因在开国和治国中卓著的功绩，加上他出众的胆识、过人的能力，在党内深孚众望，他不但进入了政治局，还成为了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毛泽东赏识的接班人之一。众所周知，在平型关大战中一举扬名的林彪，是中共党内一名出色的战将，在解放战争中立下奇功，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委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重任，1955年十大元帅授衔时，资历并不算老的林彪仅居朱德、彭德怀之后，排在第三位。

陈毅、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均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他们参加革命较早，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具有不俗的战功，是中共党内的开国元勋，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均被授予元帅衔。

解放后，陈毅受命出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在治军、从政方面均显示出卓越才干，他的高尚人品在饶漱石问题暴露后也深为大家钦佩。1954年9月，陈毅上调中央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还兼任着上海市市长。这时的陈毅除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日常公务外，还要兼顾外交、科学院、政法、文化领域，也参加国防领导工作，后来又兼管国务院“八办”的工作，还得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家打交道，抓公私合营的复杂工作。好在陈毅斗志旺盛，精力充沛，头脑灵活，即使对他不太熟悉的工作，也能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处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毅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罗荣桓是我军唯一出自政工系统的元帅。他先后出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15 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并代理师长，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平津前线政委等职务，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他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并身体力行地渗透到实际工作中，成为政治上最为成熟的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 年，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是部队的精简整编。当时战士的复员数量很大，有 100 万人，占全军总人数的 1/4。不少人担心自己老弱病残了，回去后生活无着落，为此部队战士思想上的波动很大。有些人发牢骚说："打仗时用我们，和平了就不要我们了。"罗荣桓为此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细致具体的安排，在一年内就顺利完成了整编工作。为了向国防现代化进军，罗荣桓组织领导了部队学文化运动，还为培养指挥员和技术人员兴办了各类军事学校。全军的干部配备工作都是在罗荣桓主持下进行的。1955 年 9 月，罗荣桓因身体不好，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的职务。中共中央 10 月间同意了他的请求。此前不久，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有高尚人品、高度党性原则和出色组织领导才能的罗荣桓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贺龙则在 1949 年 10 月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1952 年邓小平上调中央后，他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领导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西南地区的工作，在组织实施解放西南的战役、剿灭西南土匪、改造起义部队、团结民主人士、指挥进军西藏、推动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等重大事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 年，贺龙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是干一行爱一行通一行，在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由于他对发展体育事业有独到的见解和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以及重视人才，任人唯贤，使新中国体育事业突飞猛进，彻底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他承担的其他国务活动如中央一级精简整编任务等也完成得十分出色。在中共八大上德高望重的贺龙也理所

当然进入中央政治局。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为解放、稳定和发展大西南做出了重大贡献。1950 年 10 月，中央根据刘伯承的请求，同意由他组建我军第一所高等军事学府，即随后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从这时起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是刘伯承在军事教育、军事科研、军事翻译上大展宏图“拼老命”的岁月。他不顾战时的累累伤痕，不顾仅余的左眼视力日渐减退的风险，为高标准建成我军第一所高等学府，早日培养出我军优秀的军事人才而忘我工作。由于他的卓著成就，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但刘伯承专心致力于军事学院建设，未能就任训练总监部部长一职。在他的精心经营下，仅用五年时间，军事学院就发展到 12 个系，学员三千余人，教员、译员一千三百多名，编写和翻译各类教程达数百种之多。军校还引人注目地组织了 35 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12 次较大规模的现场作业，为人民解放军摸索出了组织现代军事演习的经验，在我军训练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战争年代的卓著功绩，和平时期不计名利、勤勤恳恳致力于军事科研和教育的刘伯承，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李富春，同样具有扎实的革命资历。他于 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 年入党，先后担任过中共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委，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经济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西满分局书记，中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开国伊始，李富春作为共和国副总理、国家计委首任主任，受命执掌计划工作后，主要负责组织编制“一五”计划、领导 156 项重点工程，被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为落实 156 项重点工程和实现“一五”计划的宏伟目标，殚精竭虑，建立了功勋。中国“一五”计划时期 156 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和投产，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基础，而李富春堪称领导 156 项重点工程的总工程师。李富春响应毛泽东关于“以苏为鉴”的号召，开始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方式进行理性思

考，不仅是对国民经济重大方针政策的认识上，还是对完善中国计划工作的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索。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参与了同苏联的谈判工作，比较了解真实情况。早在与苏联商谈156项工程回国后不久，他就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苏联的经验的问题，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战略管理方法、管理体制。1956年，李富春等国家计委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就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性的问题，阐述了观点和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对产业结构主要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不少观点就来自当时国家计委和李富春汇报的内容。李富春是我们党从战争年代转到和平时期后难得的熟悉经济工作的将才，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李先念也是在中共八大上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之所以入选，其原因主要是：首先，他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1909年李先念出生于后来在中共党史上享有盛名的“将军县”湖北黄安，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和率领数百名青年参加了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时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的李先念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费尽周折，创建了西路军总支队，保护了一批红军指战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曾驰骋疆场，指挥过不少战役，屡立奇功，树立了丰功伟绩。其次，李先念具有较强的主持全面工作、善于开拓新局面的能力，是我党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时期难得的治国安邦的人才。李先念不但能打仗，是个将才，更难得的是在做党务和政府工作方面也是一把好手。早年的李先念在担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就显示出主持全面工作的非凡能力，他办事公道，敢作敢当，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湖北解放后，他又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党、政、军的全面工作，面对战后千疮百孔、万事待兴的湖北，他分清轻重缓急，抓住矛盾中心，通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生产自救等举措，迅速稳定了局势，各项工作走上正轨。1954年李先念上调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担负着为人民管好家的重任。实践证明，李先念是一个合格的“管家”，在当时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为安排好人民的吃、穿、

住，为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李先念殚精竭虑，贡献卓著，在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中共八大增设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和薄一波入选

在中共八大领导班子选举中，与中共七大相比，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增设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和薄一波六人成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员。

作为主政内蒙古自治区的首脑，乌兰夫能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排头人物，自然与他出生于蒙古族、是优秀的少数民族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乌兰夫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卓越的贡献也是他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关键因素。

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的乌兰夫，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这一年他就发起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组织指挥了归绥的群众运动。1929年他结束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四年的学习，回到内蒙古就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为把内蒙古的革命烈火点燃起来，他不辞劳苦，不顾安危，四处奔波；为了民族的利益，他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只身会德王，以争取投敌的德王抗日；为打击德王的投降行径，他策划了著名的“百灵庙暴动”，建立了中共掌握的蒙古族抗日武装。江青一伙后来曾诬陷他是想搞“蒙古大帝国”，当成吉思汗第二，周恩来则称赞他大智大勇，为维护祖国统一立了大功。他把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第一次变成了现实，拯救了日渐衰落的蒙古民族，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内蒙古统一起来。1945年9月，在苏蒙联军的支持下，原伪蒙疆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伪蒙疆自治政府委员达木苏化吉尔格勒，日寇在东北成立的蒙古铁血团领袖第里嘎尔图等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温都尔庙，成立了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他们宣传独立的主张，大造分裂祖国的舆论。乌兰夫受中央的委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使这伙人态度改变，决定就地重新选举“临时政府”组成人员，结果，乌兰夫以最高票当选为主

席。此后，乌兰夫又组织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务委员会，积极推动了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结束了内蒙古数百年分裂的历史，使内蒙古人民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任命乌兰夫为内蒙古分局书记、自治区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主持内蒙古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在任期间，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包头钢铁厂在包头平地崛起；内蒙古的煤炭、机械、电子、化学、森林等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作为自治区重要产业，更是得到加强，内蒙古人民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乌兰夫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特殊身份、特殊贡献的人，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排头兵，是可以理解的。

张闻天也是一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留学苏联的张闻天原是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代表王明、博古的密友，曾经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在遵义会议后，及时从“左”倾营垒中醒悟过来的张闻天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成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自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达八年之久，与毛泽东保持着良好的共事关系，毛泽东高兴地承认张闻天是个“开明君主”：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

张闻天的个人品质决定了他所担任的一个又一个职务，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马列学院院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在中共七大上，张闻天虚心诚恳地对自己曾犯过的错误做了深刻检查，坦诚地叙述了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受到了大会代表的欢迎。在七大的中央委员选举中，张闻天以较多的票数当选，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45 年 10 月，张闻天前往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探索做好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51 年张闻天就任驻苏大使，由于当时我国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方针，驻苏大使这个职位是相当重要的。张闻天不但注重抓使馆的建设，在较短的时间内“把驻苏使馆改造成一个模范单位”；还积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 项工程”的具体落实就浸透着张闻天和驻苏

使馆全体人员的心血。1955 年 1 月，张闻天结束驻苏使馆的工作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围绕加强外交部的机关建设、提高外交工作的业务水平、培养外交干部、开展国际问题研究、进行国际问题与外交政策宣传等工作，他做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对他的贡献和人品的肯定。

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陆定一，也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而进入政治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陆定一是中共党内出名的“红色秀才”。他于 1906 年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的一个大户人家，祖父陆蓉虽是个商人，却很重视读书。父亲陆澄宙是前清秀才。陆定一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成诵。他 12 岁考入南洋大学（交通大学）附中，16 岁升入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系。大学毕业后又多年从事理论工作。他在主编《中国青年》杂志时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调查分析理论文章，在党内已有相当知名度。后来他又先后负责编辑过刊物《青年实话》、《红军报》、《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他挥一支妙笔，著锦绣文章，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其次，陆定一也有非同寻常的革命经历。陆定一出身于江苏无锡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曾任首都检察厅厅长，也是著名律师，家中广有田产。父亲曾对他说：“你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如果公费考不上就自费。”可他毅然走上了有坐牢杀头危险的以革命为职业的道路。他于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冒着生命危险做党的秘书工作，又多次受到王明路线的残酷打击，多次被撤职和降职，而且结发妻子唐义贞在 1935 年 1 月被国民党铲共团杀害，就义时只有 25 岁。1980 年，陆定一才在福州见到了他长征后妻子在苏区生的现已 46 岁的儿子小定；1987 年，81 岁高龄的陆定一才在南昌与他失散 53 年已是 56 岁的女儿叶坪见面。尽管历经坎坷，但陆定一的革命意志始终不改，对党的信仰坚定不移。第三，陆定一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战线上，是党的宣传工作领域中重量级人物。陆定一先是主编刊物，后来先后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5 年他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他在宣传文教战线上大胆改革，

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遗余力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他是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在我们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的大背景下，凭陆定一的学识、贡献、地位，进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行列，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则与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关系。陈伯达的发迹是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的，此前他的人生之路并不顺畅。1927年陈伯达隐瞒自己的历史加入共产党，是年冬他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因参加托派组织于1930年被遣送回国。次年陈伯达应聘到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授，稍后在天津被捕。1932年自首出狱。1933年后他参加过托派的活动，也参与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活动。1937年陈伯达到了延安。由于他上过大学，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在当时的延安也算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在1939年春就调到了毛泽东身边当秘书。这使他有机会施展他的笔下功夫，也为他的升迁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陈伯达的名字引起全国人民甚至海内外人士的关注是在1943年。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评〈中国之命运〉》，发表在1943年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的一本“名著”。它由国民党顾问陶希圣捉刀，却署上了蒋介石的大名，于1943年3月10日出版。这本书很快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人人必读的政治“圣经”，是大、中学校最重要的课外读物，是各级教育部门的正规考试科目。

《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号召尊崇儒家传统的同时，还认为读者应该相信古代社会制度形式的完美，以及在古代的典范中尤其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探索模仿榜样的必要性。在此书中自命为孙中山继承者的蒋介石，实际上把自己的思想信条和国民党奠基人的民主主义对立起来了，否认在中国实现民主原则的可能性。

蒋介石的上述思想显然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悖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反击。

陈伯达受命撰写了一篇反击文章。关于文章写作的经过，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专门采访过陈伯达，据陈回忆：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延安也有了。毛主席看了，

笑着对我们几个“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

我领会了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写反驳的文章。我写《评〈中国之命运〉》，是毛主席的话启发了我，我才有写那篇文章的想法。

我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当然要吃饭，也略有休息）。我一面写，一面哭，我太激动了，因为极大义愤吧。我以前写过文章，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以什么名义发表——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呢，还是评论员文章呢，所以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文章的原标题是《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写完以后，我马上给毛主席送去。当时毛主席住在枣园。记得，送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休息。我不敢惊扰他，就把稿子留在那里，回去了。

毛主席起来后，就看我的稿子，一口气看完了，然后在原稿上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并署上我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毛主席派人把我找去。毛主席把稿子给了我，上面写着他的批示：“送《解放日报》发。”

……

此文发表后，蒋介石发了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这个小册子，并叫我做“陈逆伯达”。

其实，写这篇文章，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是党的工作。如果说是功劳的话，那是党的功劳。

我确确实实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启示我，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就不会有这篇文章。如果我不去延安，也不会有这篇文章。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才能写出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代表中共的观点。文章处处以“我们共产党人”的口气，况且又是在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头版头条刊出，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抨击。

文章彻底揭露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它一发表，立即引起

广泛反响，蒋介石也特别恼火，严禁这个小册子。陈伯达凭借此文一举成名，被誉为中共一支“大笔”。

从此，陈伯达备受毛泽东器重了。

1945年4月至6月的中共七大上，陈伯达第一次被列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上。这意味着他进入了中共高层领导圈子之中。

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主要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进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行列。

新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薄一波，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1925年，时年只有18岁的薄一波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投身革命后，先后经历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白区斗争、军队工作、狱中斗争、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做过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工作，经受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考验。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委员。那时薄一波只有37岁，算是比较年轻的。1945年8月至1948年5月，薄一波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和军区副政委，主要是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做好支前和各方面的统战工作。

后来薄一波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谦虚地说：

> 由于刘邓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指挥作战中，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就由我主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千百万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用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应该说，这期间，我们的工作还干得不错。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战略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对华北局委以重任：做好进城的准备，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聂荣臻任第二、第三书记。之前，刘少奇提出，两区合并后的华北中央局由薄一波任书记。为便于工作，薄一波建议少奇同志挂个

名，自己做具体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这个建议。

从这时起，40岁的薄一波开始主持华北局的工作。

对于薄一波这样一个在政治、军事、根据地建设诸方面都具有相当经验，政治上可靠又善于开拓工作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党中央和毛泽东是十分看重的。新中国成立后，为组建强有力的财经领导机构，以解决当时十分紧迫的财经问题，毛泽东点将陈云主持中财委，还亲自找薄一波谈话，要薄一波到中财委任副主任，不久又委以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的重任，主要是协助陈云做好财经工作。当时，薄一波还须主持华北局的工作。毛泽东考虑这点后，对薄一波说："那你就把华北局搬到中财委去办公嘛！"从这时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已开始把薄一波作为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来培养，并让他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兼顾华北局工作。

颇具干才的薄一波并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在任职期间，他协助陈云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的各个战役中，积极施政，成绩卓著。

然而，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却抓住新税制的问题，怀着阴谋推倒刘少奇的目的向薄一波发难。

所谓修正税制是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中央财委和财政部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了此问题，并于同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颁发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制。修正税制有两个原则，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但由于在操作中事先未广泛征求意见，有些问题考虑不周，变更了纳税环节，并不恰当地强调"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修正后的税制一经公布，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和波动。

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对修正税制一事尤其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给予严厉批评。

高岗历来善于探测风声。这次毛泽东批评新税制，高岗得意至极，决心

利用此机会，整一下薄一波，并借批评薄一波之名，“挖刘少奇的老底”。

财经会议一开始，高岗即在私底下鼓动一些人“放炮”，他自己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以达到影射刘少奇的目的。高岗还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曾说过的与毛泽东意见不大一致的话都安在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

由于高岗的干扰，这次全国财经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新税制和薄一波的会议。会议后期，毛泽东发觉会议走偏了方向，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恩来尽快做结论。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云和邓小平对薄一波是比较了解的，也比较欣赏他的才干。尤其是陈云，长期与薄一波共事，对薄一波最有发言权。

在谈到薄一波的问题时，陈云首先指出：近几年来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即令是事务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人顶住事务性工作，中财委的工作是无法全面进行的。后来薄一波充满感激地回忆说：“在高、饶的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

邓小平回京后，也在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的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薄一波虽然被解围，但仍被撤销财政部部长职务，只留任中财委副主任，协助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好在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高、饶问题被揭露出来，财经会议“批薄射刘”风波最后真相大白。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到他的住处参加书记处会议。一进门，毛泽东就对薄一波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是个好同志。

这年9月，中央在西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薄一波主持国务院第三产业办公室（即重工业口）的工作。1955年5月，中央指定薄一波组织一个有各主要工业部长参加的大型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工业方面的一个大会。回国后，薄一波建议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

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均被中央采纳，并任命薄一波担任国家建委主任。不久中央又调薄一波任国家经委主任。每次工作调动，毛泽东都找薄一波谈话，勉励他做好工作。薄一波从毛泽东多次谈话中，从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上，也感到“误会”解除，又“一步步对我委以重任”。

1956年初，薄一波组织34个部委向毛泽东汇报，历时两个月，直接为毛泽东论述十大关系问题提供了主要的资料。9月，党的八大召开，毛泽东又指定薄一波在会上发言，重点讲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八大探索成果之一。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康生本是中共七大时的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八大时变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实施所谓“抢救运动”，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段历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康生在生活上也不太检点，尤其是与小姨子苏枚的暧昧关系更是闹得满城风雨。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就同苏枚“住机关”。1933年，他去莫斯科，苏枚也陪同前往。后来，他到延安，苏枚又随他回来。他们形影不离，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忍无可忍的康生夫人曹轶欧一天当着康生和苏枚的面大吵大闹，闹得苏枚要跳楼自尽，而她自己也因神经受到强烈刺激病倒了。然而，吵闹过后，情况依旧。康生在山东主政时，小姨子苏枚主持山东党校工作；康生转到杭州、北京休养时，苏枚还是陪伴在身边。当然，康生退出政治局委员的岗位，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山东主要负责人的康生意气用事，长期病休，没有任何政绩的缘故。那是1949年3月，刚刚出席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康生，突然宣布因患“重病”要休养了。此时的康生担任着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后来兼任山东省省主席，可谓重任在身，身体不错的他怎么会突然患了“重病”呢？其实是他得了“心病”。原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饶漱石为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为副职，自认在政治赌场上吃了大亏的康生一气之下便撂担子。在他看来，饶漱石的资历远比不上自己，顶多只能做自己的副手，现在居然骑在自己的头上，他接受不了；另外，尽管他也愿意回老家山东任职，但他最迷恋的地方还是上海。华东局所在地上海

是他的发迹之地，而其一把手管辖着鱼米之乡的几个大省，这是他十分眼热的。撂担子不干的康生选择青岛的风景区荣成路四号别墅作为自己的疗养地。他终日绘画、写字、雕刻精石，读消闲的书。1950年夏，他又转到“人间天堂”杭州去休养。不久转到北京医院，一直住到1955年才正式宣告“痊愈”。实际上，善于投机的康生这段也没闲着，他窥视着政治风向，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1956年9月，党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时的康生坐不住了，他要选准时机出山。果然，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康生就抓住了饶漱石参与高岗反党联盟已身败名裂的机会，利用参加1月30日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重登政治舞台了。在中国政坛“隐退”已久的康生的名字又重新见报。9月，在党的八大会上，康生还是保留在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通过各种阴谋手段，成为政坛上能呼风唤雨、权倾一时的人物。在党的十大上，他爬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参考书目

毛泽东：《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李涛编：《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王稼祥选集》编写组：《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本书编写组编：《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宋镜明编：《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李良民：《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共双峰县委员会：《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戴绪恭：《向警予传》，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杨琴、李伟：《刘伯承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版。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1）（2）（3）（4），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

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3），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3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35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41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3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4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9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1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2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7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21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25 卷，陕西人民出版

社 1985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33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53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工人出版社编：《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一卷，工人出版社 1983 年版。

工人出版社编：《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二卷，工人出版社 1983 年版。

工人出版社编：《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三卷，工人出版社 1984 年版。

工人出版社编：《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四卷，工人出版社 1985 年版。

张义渔主编：《上海英烈传》第五卷，百家出版社 1989 年版。

马连儒：《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1 年版。

韩泰华：《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

于俊道编著：《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廖盖隆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人物分册）第 1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涂绍钧：《林伯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张树军：《张国焘》，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唐纯良：《李立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编：《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至第十集，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林雨星：《林彪全传》，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

陈石平：《中国元帅刘伯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文辉抗、叶健君主编：《新中国第一代》丛书（4 种），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刘汉等：《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彭真生平大事年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夏远生等：《相伴百年——李富春与蔡畅》，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